

刘东主编 彭刚 副主编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人文与社会译丛

运动中的力量

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Sidney Tarrow

[美国]西德尼·塔罗 著 吴庆宏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运动中的力量

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运动中的力量》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它综合了社会运动与革命研究方面的各种文献，行文流畅，见解丰富……无疑将赢得广泛的读者和持久的生命。

——道格·麦克亚当

马克斯·韦伯视理论的本质为“创造清晰的概念”，如果此见不谬，则塔罗的书堪称理论珍宝。它对于社会运动研究的贡献，堪与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方面的贡献媲美。

——戴维·L.拉廷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封面设计 胡 芾

ISBN 7-80657-977-X



9 787806 579770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ISBN 7-80657-977-X

I·695 定价: 23.50元



运动中的力量

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美国]西德尼·塔罗 著 吴庆宏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 (美) 塔罗 (Tarrow, S.) 著; 吴庆宏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12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SBN 7-80657-977-X

I. 运... II. ①塔... ②吴... III. ①社会运动-研究 ②政治斗争-研究 IV. ①C916 ②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1687 号

Copyright © 1998 by Sidney Tarrow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3-096号

| | |
|------|------------------------------------|
| 书 名 |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
| 作 者 | [美国]西德尼·塔罗 |
| 译 者 | 吴庆宏 |
| 责任编辑 | 李瑞华 |
| 原文出版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
| 电子信箱 | yilin@yilin.com |
| 网 址 | http://www.yilin.com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印 刷 | 丹阳兴华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毫米 1/32 |
| 印 张 | 12.12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260千 |
| 版 次 |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0657-977-X/1·695 |
| 定 价 | 23.50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1993年《运动中的力量》第一版完成以后，在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领域又发生了很多事件，其数量之多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任何一个五年内的事件总和。尽管1989年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但其教训尚不足以立刻在学术性著作中得到反映。那些以和平为主的运动造成的却是若干国家的不稳定，有时还引发反复无常的暴力运动，甚至在前南斯拉夫导致一场野蛮的国内战争。所以，我在本版中试图把从这些转变中得来的教训也吸纳进来。

1989年和其后发生的事件虽然也证明了我在第一版最后一章中的某些暗示，却不能支持跨国斗争迅速扩散这一论点。我对无国界之分的运动世界的预测，仍然持谨慎的态度。不过，特别在西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欧洲联盟可能会引发新一轮跨国运动。甚至在西方国家之外，跨国倡议网络也已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民族社会运动。这些变化如此显著，本版为此特别单列了一章进行论述。

其实，自《运动中的力量》第一版发表以来，研究社会运动和斗争政治的学者一直很活跃。在欧洲和北美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新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涌现。在这一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好几套新丛书已经面世，同时还出现了一本完全致力于斗争政治研究的新杂志——《动员》(*Mobiliza-*

tion)。我因此得以在本版中借鉴若干最近发表的著作,如唐纳泰拉·德拉·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所著《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所著《抗议的社会心理学》、汉斯皮特·克瑞埃西(Hanspeter Kriesi)和他的合作者所著《西欧新社会运动的政治》、阿尔贝托·梅卢齐(Alberto Melucci)所著《挑战规则》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著《英国的群众斗争》。本书第二章的结构与剑桥出版的一本比较政治研究论文集《对社会运动的比较观察》相近,这得感谢该论文集的编辑者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约翰·D. 麦卡锡(John D. McCathy)和梅耶·N. 扎尔德(Mayer N. Zald)。

我们是否正生活于一个“运动社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说自己知道答案。不过,我在新的结尾中提出了若干问题,并对它们的含意进行了解释,比我五年前说得更透彻。而如果说本版有助于向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和学者阐明运动社会的问题,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和戴维·迈耶(David Meyer)在出版最新论文集《走向一个运动社会:新世纪的教训》时的合作。此外,我还得感谢马克·利齐巴奇(Mark Lichbach)和汤姆·罗尚(Tom Rochon),他们为本版的初稿提供了颇具文化敏感和睿智合理的评论。

随着新的社会运动在世界上的产生,学者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究,我个人的观点也随之起了变化。自《运动中的力量》第一版问世以来,我一直试图了解社会运动理论是如何延伸到对斗争政治的一般研究、西方民主之外的领域和对革命的综合研究中的。为此,我参加了一个联系密切的学者研究网络,并获益匪浅。我和其他学者在梅隆基金会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合作研究斗争政治。我们共同思考,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互相启发,最终使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这个

项目中与我合作的麦克和 T2 两位,他们帮助我进一步澄清了社会运动和斗争政治之间的概念关系;为此,我很感谢他们。 xii

致 谢

和社会运动一样,一本书的创作也是一次集体行动。在作者和题目等明确标示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段学术研究与合作的漫长历程。本书实际包含了尤为长期的集体努力,得到了若干机构和个人的多方支持,而这却是封面标示上看不到的。

我对社会运动的好奇始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期间。20世纪60年代的伯克利不仅是培育社会运动活动的温床,也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提供了富于创造和竞争的环境。我在那里学习研究时,得到了戴维·爱普特(David Apter)、已故的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埃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和约瑟夫·拉帕罗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四位老师的指导,结果写成了《意大利南部农民共产主义》一书。

一般对社会运动历史感兴趣的人迟早都会去巴黎。我于1969年到了法国政治生活研究中心,迎接我的法国同仁都是非常乐意帮助我的朋友,他们在不经意间帮助我形成了本书中所表述的思想。我特别感谢已故的安尼克·佩尔什隆(Annick Percheron)和盖伊·米舍拉(Guy Michelat)、雷内·莫里奥(René Mouriaux)和弗朗索瓦·苏比洛(Françoise Subileau)等,他们帮助我以CNRS学会特别成员的身份于1990年在巴黎度过了富有收获的一学期。我还十分感谢巴黎大学的达尼埃尔·塔达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她毫无保留地给我讲了关于法国

历史斗争的大量知识。

本书的许多思想都来源于我对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意大利运动的研究。我于 1980 年到 1981 年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院高级进修中心颇有成效地学习了一年,随后又从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两项资助,从而写成了《民主和混乱》一书。

xiii 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之所以能实现这个转变,得感谢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的帮助,是它们给我提供了从事阐释性研究的基金。我从美国的“德国人马歇尔基金”获得的资助,也有助于我研究国际政治和国家运动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还在 1985 年到 1996 年间为大学教师举办了四次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暑期研讨会。通过这一渠道,我大大拓展了研究思路。我感谢参加研讨的四十八位同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萌发了本书中的许多观点。而在所有参加了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的人中,我又特别感谢道格·伊米格(Doug Imig)和戴维·迈耶,他们后来都成为我最珍贵的合作者和朋友。

同时,我也衷心感谢那些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替我阅稿的同行,包括唐纳泰拉·德拉·波塔、马里奥·迪亚尼(Mario Diani)、比尔·盖姆森(Bill Gamson)、玛丽和皮特·卡赞斯坦(Mary and Pter Katzenstein)、伯特·克兰德曼斯、汉斯皮特·克瑞埃西、道格·麦克亚当、戴维·迈耶、弗兰西斯·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迪特·汉希特(Dieter Hancht)、苏珊·塔罗(Susan Tarrow)和理查德·瓦勒里(Richard Valelly)等,他们分别就我第一版原稿的所有或部分章节提出了详尽而颇有创见的看法。格伦·奥尔舒勒(Glenn Altschuler)、罗恩·艾米塞德(Ron Aminzade)、本·安德森(Ben Anderson)、戴维·布拉特(David Blatt)、斯图亚特·布

卢明(Stuart Blunmin)、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肯·布什(Ken Bush)、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玛丽亚·库克(Maria Cook)、林恩·亨特(Lynn Hunt)、道格·伊米格、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Keck)、戴维·科泽(David Kertzer)、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约翰·马尔可夫(John Markoff)、戴缪德·马格雷雷(Diarmuid Maguire)、保琳·迈尔(Pauline Maier)、格里·马维尔(Gerry Marwell)、约翰·迈耶(John Meyer)、乔治·摩西(George Mosse)、维克托·尼(Victor Nee)、帕姆·奥利弗(Pam Oliver)、克里斯·鲁茨(Chris Rootes)、比尔·斯维尔(Bill Sewell)、马克·斯坦贝格(Marc Steinberg)、安妮—玛丽·齐曼斯基(Anne-Marie Szymanski)、莎拉·塔罗(Sarah Tarrow)、马克·特劳戈特(Marc Traugott)、乔治·泽比利斯(George Tsebelis)和周学广(Xueguang Zhou)等也审阅了各章节或各章草稿。其中,本·安德森(Ben Anderson)始终是个敏感而富有挑战性的评论家,他的著作恰是“模块化”(modularity)概念的来源。我对这些朋友和同行深表感激。如果我没有能吸收他们给我的所有知识,我也在这里也向他们表示歉意。

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许多同事为本书作出了贡献,大大地增加了它的价值。尤其是吴桑(Sung Woo),他和安尼塔·李(Anita Lee)、小泽知子(Tomoko Owazawa)及安德烈·皮尔斯(Andrea Pierce)查找不太重要的参考书,校对拼写,并列出了各个章节的参考书目;莎拉·苏尔(Sarah Soule)则由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友好而敏感的合作者、评论者和编辑者;伊娃·罗塔·海德曼(Eva Lotta Hedman)使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实用性不应该局限于欧洲一角和北美;利内特·哈维(Lynette Harvey)、卡罗琳·林恩(Carolyn Lynn)和卡雷尔·塞德拉拉斯克(Karel Sedlacek)的耐心和细致也令我不胜感激。

我还要特别感谢查尔斯·蒂利、皮特·兰格(Peter Lange)和玛丽·卡赞斯坦三位学者,因为他们在本书的构思和完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查尔斯·蒂利在其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形成了斗争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方法,从而表明:社会研究可以既受理论驱动,又不超出历史;皮特·兰格远不只是剑桥比较政治系列丛书的主编,他别具一格地把理论的严密和政治的敏锐结合起来,对我进行鼓励、诱导、刺激和督促,并给我提了不少建议;玛丽·卡赞斯坦提出了许多深思熟虑和令人振奋的建议,却并不把xiv 她的观点强加于本书。

最后,我要感谢苏珊·塔罗,她总是每日被隔壁房间传来的计算机键盘敲击声所吵醒。她已记不清这样过了多少年,这种声音一直陪伴着她,从伊萨卡岛到埃尔巴岛、佛罗伦萨、牛津、巴黎(二次)、(非常潮湿的)凯尔西和悉尼等地,从没有中断过。计算机不能理会她的痛苦,我则永远感谢她对我的忍耐和关爱。xv

目 录

| | |
|-----------------------|-----|
| 图表目录 | 3 |
| 前言 | 1 |
| 致谢 | 1 |
| 导论 | 1 |
| 一 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 | 13 |
| 第一部分 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 | |
| 二 模式化集体行动 | 39 |
| 三 出版和结社 | 59 |
| 四 国家创建和社会运动 | 74 |
| 第二部分 从斗争到社会运动 | |
| 五 政治机遇和限制 | 95 |
| 六 斗争行动 | 122 |
| 七 构造斗争 | 142 |
| 八 动员结构和斗争政治 | 165 |
| 第三部分 运动的动力 | |
| 九 斗争周期 | 189 |
| 十 争取改革 | 216 |
| 十一 跨国斗争 | 237 |
| 结论：社会运动的未来 | 263 |

| | |
|-----------|-----|
| 注释..... | 283 |
| 参考文献..... | 306 |
| 索引..... | 351 |

图表目录

| | |
|---|-----|
| 2.1 西欧和北美的“旧”和“新”斗争手法 | 43 |
| 5.1 前苏联 1987—1992 年间游行示威的抗议动员 | 99 |
| 5.2 政府力量和主要战略——一些西方民主国家 斗争政治的组织原则 | 109 |
| 6.1 1996 年 11 月 19 日至 1997 年 2 月 12 日 贝尔格莱德抗议事件的参与情况 | 124 |
| 8.1 运动相关组织的类型 | 183 |
| 9.1 1848 年每月大事记, 1847 年 3 月—1849 年 8 月 | 203 |
| 11.1 跨国集体行动的分类 | 248 |

导 论

1997年3月17日《国际先驱论坛报》首版报道,欧盟拒绝派部队去阿尔巴尼亚收拾一项金融计划失败造成的严重局面: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公民破产,抗议者和暴徒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发起暴乱,洗劫军火库里的枪炮和坦克,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瘫痪,政府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注意到,这一事件令人不安地与90年代早期南斯拉夫的分裂相似,并可能还使人联想到:阿尔巴尼亚危机大概是由当年初在塞尔维亚爆发的和平运动触发的,在那次和平运动中,上万名抗议者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确认反对派在地方选举中的胜利(见第六章)。

同一期《国际先驱论坛报》还特别报道了世界上与社会运动、抗议及叛乱相关的另外七条消息。首版同时报道了扎伊尔东部发生的武装叛乱,以及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三国工人为抗议最近比利时一家汽车制造厂关闭而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见第十一章)。第四版报道了两万泰国穷苦百姓为反对一项政府开发计划举行的和平抗议游行,还有印度尼西亚对立民族群体之间发生的一次暴力冲突;第八版简要报道了阿尔及利亚军队和伊斯兰教武装分子之间发生的一场枪战,双方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处于野蛮的内战之中;再就是萨尔瓦多的选举,从前的游击运动组织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被允许进入政府;就连第

十五版商业信息也离不开斗争,描述了面临失业的德国矿工前一周的抗议活动。一份普通的新闻日报竟然包含近十条关于斗争的新闻,涉及从比利时到婆罗洲这样完全不同的地方,这表明了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力量持续存在。

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

上述事例表明,现在普通民众常常会突然冲上街头,企图用斗争手段反抗国家或敌对势力。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广大民众就多次走上街头,要求变革,先后发动了美国民权运动、和平运动、环保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及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反独裁主义运动。他们在斗争中取得了不少成功,而即使他们的行动遭到了失败,也仍然推动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变革。

一旦普通民众(经常与较有权势的公民结盟)携手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对立者,斗争政治就产生了。虽然这种斗争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之初,但是为了反抗强大的敌对势力而发动、协调和支持这种斗争,却是社会运动(一种现代发明和现代国家兴起的伴随物)的独特贡献。我在本书中论述到,当变化的政治机遇和限制使那些自身缺少资源(resource)的社会参与者受到刺激时,往往会触发斗争政治。一般来说,社会参与者会采取被普遍认可的手法进行斗争,并利用这些手法所留有的回旋余地进行创新,拓展出新的斗争手法。在紧密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在能引起文化共鸣和产生行动导向的象征物的激励下,斗争政治将造成与对手之间的持续互动,其结果就是社会运动。

那么,普通民众怎样利用由变化的机遇和限制造成的刺激?他们怎样将常规的和富有挑战的活动手法相结合?他们怎样把社会网络和文化框架转换成行动?会有什么结果?在主要的抗议周期(有时是革命)中,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是怎样结合的?

在我们走向 21 世纪之际,社会运动正在怎样变化?——这些都是本书的主要议题。

由于今日社会运动具有广泛传播和日益多样的特点,这些问题特别重要。我们首先目睹了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接着是始于美国进而席卷西欧的生态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及和平运动,还有独裁和半独裁体制下的人权运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宗教极端主义运动、印度的印度教好战分子运动,以及最近西欧的反移民暴力运动、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巴尔干半岛和前苏联地区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总之,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新形式的斗争风潮已经从世界的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

不过,并非所有上述事件都是我所限定的“社会运动”,即以潜在社会网络和使人产生共鸣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能发展出对强大对手保持持续挑战力的斗争政治事件。当然,所有上述事件都可以看作既能在体制内部出现又能扩展为革命的广义斗争政治的一部分。本书的中心目标就是从历史和分析的角度,把社会运动和它的独特动力置于斗争世界中来研究。 2

研究的方法

在本书中,我既不想描述斗争政治或社会运动的历史,也不想把一个特殊的理论观点强加给读者,或以此攻击别人——那只会使这个议题更令人激动,而不是更清楚。实际上,我只希望在更普遍的斗争政治范畴内,为理解社会运动、斗争周期和革命的地位提供一个宽广的理论框架。学者们常常聚焦于某些特别的理论或运动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例如,直到最近,在如何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学者们一般主要从它和其他大变革的关系角度来研究,而从不把它与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的抗议

周期问题或社会运动问题相比较(Goldstone 1997 除外)。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宽广的框架,使社会运动、斗争政治和一般政治联系起来。^①

事实上,所有社会运动、抗议和革命在根本上都离不开斗争性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表现方式各种各样:或短暂,或持久;或为制度化的,或为破坏性的;或平凡,或引人注目。大多数集体行动发生在社会体制内部,由一些打着几乎无人怀疑的旗号的合法群体挑起。当它被无法正常进入体制者、根据新的或不能接受的要求采取行动者,以及从根本上挑战他人或当权者的人所利用时,它就会变得富于斗争性。

斗争性集体行动之所以成为社会运动的基础,不仅因为运动总是激烈的或偏激的,还因为它是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对抗具有装备优势的对手或强大政府的主要常常也是唯一的资源。但这并不是说运动只在于斗争,它其实有许多事要做,如建立组织,阐明思想,联络和动员支持者,加强成员的自我发展和构建集体认同等。即使有些运动在根本上是非政治性的,只关注自身内部或其成员的生活,它们也会像社会学家克雷格·考霍恩提示的那样,与当局发生冲突,因为当局有责任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为社会制订标准(Calhoun 1994b:21)。于是,运动组织者就利用斗争来开拓政治机遇,构建集体认同,把人们团结在组织内,动员他们向更强大的对手挑战。运动和国家之间互动的历史大多就可以被看作是运动积极分子和掌权者之间策略与反策略的二重唱。

所以,我们必须从集体行动理论开始探讨,同时必须注意:

- 3 集体行动不是一个处于历史之外并远离政治的抽象范畴(Hardin 1982;1985)^②。斗争性集体行动形式之所以不同于市场关系、游说或代议制政治,就在于它们使普通民众与对立者、

社会精英或当局发生对抗。它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挑战掌权者,制造团结,在特定的人群、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

这就是说,我们将不得不用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人类学知识,把集体行动理论的一般公式置于具体历史记录中去研究。尤其是我们将看到,需要一种社会的解决方案,把不同地区、不同需求和不同特性的人集合在集体行动的协调作战中,以使人们团结起来,与对手进行持续的交互作用。这个解决方案包括:第一,发起集体挑战;第二,利用社会网络、共同目标和文化框架;第三,通过联系结构和集体认同,增强团结,以支持集体行动。这些就是社会运动的主要步骤。

运动的基本特性

18世纪随着民族社会运动的出现,早期的理论家一般聚焦于最让他们担忧的运动的三个方面问题:偏激、贫困和暴力。法国革命和19世纪早期的工业主义都加重了这种反应。19世纪的学者们在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Durkheim 1951)的领导下,把社会运动看作是混乱和社会解体的结果——短语“发疯的群众”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见 McPhail 1991 的评论)。

尽管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许多运动趋向于“文明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运动——仍然符合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助长的那种暴力与过激的形象。自1989—1992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来,随着种族和民族紧张关系的日益加剧,这种对社会运动的否定看法又进一步加强。我们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冲突中“祖传的仇恨”论调上看到这一点。根据社会运动理论,巴尔干的冲突大多是一回事^③。同样,20世纪90年代接踵而至

的美国民兵运动和欧洲反移民的暴力运动,因为唤起了人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种恐惧,也加强了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否定看法。

然而,社会运动更基本的特征恰恰与偏激、贫困和暴力完全相反。偏激是见于所有社会运动的一种被夸大的意义框架形式;贫困是所有运动表达的共同目标的一个特殊源头;暴力是集体挑战的加剧。我并不把社会运动看作偏激、贫困和暴力的表现,而是更合理地把它们定义为群众在与社会精英、对立者和当局的不断相互作用中,以共同目标和社会团结为基础发动的集体挑战。^④这个定义包含根据经验得出的四个特性:集体挑战、共同目标、社会团结和持续互动。下面让我们简要审视一下每个特性。

集体挑战

集体行动的形式很多,从选举和利益群体的联盟到宾果赛和足球赛,只不过它们都不是最典型的社会运动的活动形式。运动一般通过直接破坏活动,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其他集团或文化规范,有代表性地发起斗争挑战。由于破坏大多在本性上是公开的,所以还可以采用协同个人抵制的形式,或集体肯定新价值的形式(Melucci 1996)。

集体挑战常常以打断、阻碍他人的活动或导致他人的活动不确定为标志。尤其在高压体制下,集体挑战可以通过口号、服装或音乐形式等来表现,还可以通过用新的或不同的符号重新命名熟悉的旧事物来表现。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中,人们也能通过言语、着装形式或称谓以及象征集体目标的私人行为来支持运动。^⑤

斗争虽然是与其他行动者相互作用的最典型方式,却并不

仅仅局限于社会运动。有时,与那些暂时目标一致但根本上毫不相同的政治党派、自发组织和普通市民一样,利益群体也进行直接的挑战。斗争性挑战并非我们在运动中所见到的惟一行动方式。运动——特别是有组织的运动——涉及很多其他行动,包括给成员提供“选择性刺激”、在当前或未来的支持者中建立舆论、向当权者游说并与他们谈判、通过新的宗教或个人实践来挑战文化规范等。在最近几十年里,正如利益群体和其他群体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斗争政治中一样,运动领袖也越来越善于在公共体制内把斗争与合作相结合。

尽管社会运动具有不断发展的专门技术来组织游说、合法挑战与公共关系,其最典型的行动还是斗争性挑战。这不是因为运动领袖心理上倾向于暴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稳定的资源——资金、组织、进入政府的通道——这些都为利益群体和政党所控制。为了吸引新的支持者,同时为了坚持他们的主张,斗争可能是运动所能控制的惟一资源。因此,运动就利用集体挑战使之成为支持者关注的焦点,引起对立者或第三方的重视,并创造一批能代表它们利益的选举人。

共同目标

有人提出过很多理由来解释人们为什么参加运动,包括从年轻人对权威的蔑视到暴徒的邪恶本能。尽管一些运动以娱乐和狂欢态度为标志,另一些运动则揭示出暴徒可怕的疯狂。不过,人们在运动中结为一体的较根本较平常的原因,还是为了提出他们共同的主张,反对对手、当局和社会精英。当然,并不是所有这种冲突都产生于阶级利益分歧,人们共同行动的基础还在于他们的利益完全或部分相同。

“玩乐论”和“暴徒论”的问题是,它们都忽视了民众在集体

挑战武装精良的当局时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和损失。挑战罗马帝国的造反奴隶,一旦失败就会被处死;反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发动者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至于美国南方的黑人大学生,他们被迫与白人分开就餐,而一旦落入那些手拿棒球拍辱骂他们的暴徒之手,也别指望会有什么好下场。其实,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人们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或牺牲宝贵时间去参加社会运动的。

团结和集体认同

社会运动最常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虽然它只不过是观察家强加的一个客观范畴。因为只有运动参与者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社会运动潜能才可能变为现实。运动缔造者通过动员舆论,为刺激共同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只有激起较根深蒂固的团结一致感和身份认同,才能创造一场社会运动。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作为运动组织的基础,民族主义和种族或宗教总是比社会阶级的绝对律令更可靠,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促进团结一致和集体认同(Anderson 1990; Smith 1996)。^⑥

那么,一个单独的斗争事件,如一次骚动或暴乱,是不是社会运动呢?一般不是,因为这些斗争形式的参与者的典型特征只是暂时团结,他们不能持续地挑战对手,虽然有时甚至骚动也能表现出具有共同目标或团结一致的迹象。所以,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骚动,还是1992年洛杉矶暴乱,它们本身都算不上社会运动。不过,它们都由警察虐待少数民族而引发的事实表明,它们都产生于广泛传播的不公正感。暴乱、骚动和自发的集会更多地是一场运动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标志,而不是运动本身。

持续的斗争政治

远在有组织的运动产生以前,历史舞台上就已出现多种斗争政治形式,包括粮食骚动、抗税、宗教战争和革命等。但只有通过持续集体行动来反抗对手,斗争事件才演变为社会运动。共同目标、集体认同和可识别的挑战都有助于运动的形成。但除非它们能持续挑战,它们不是转化为一种个人主义的怨愤,即詹姆斯·斯科特所谓的“抵抗”(Scott 1985),并强化为知识分子或宗教的宗派,就是退回到孤立的境地。持续地开展集体行动以与强大的对手相互作用,这是社会运动与早期的斗争形式不同的标志,尽管早期的斗争形式在历史上领先于社会运动,而且在今天仍然伴随着社会运动。

作为组织信号的政治机遇

运动很少由一个领导或组织控制,它们怎样才能面对个人顾虑或自我中心、社会解体和国家镇压的威胁而继续集体挑战呢?这是一个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令集体行动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研究者很感兴趣的难题。我强烈主张,政治机遇和限制的变化,为开辟斗争新阶段创造了最重要的诱因。这些行动反过来也为最初的造反者和后来的参加者,最终甚至是对手和当权者,创造了新的机遇。随之而起的斗争周期——很少是革命——就建立在这些行动者所获得和创造的外部条件的基础之上。这类斗争浪潮的结果并不取决于目标的正义性或一场运动本身的说服力,而取决于它们的广度和社会精英及其他群体的反应。

本书概要

过去的二十年里,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经济思潮的影

响下,开始从集体行动难以产生之谜入手,分析社会运动。因为谜终归是谜,而不是社会学法则,在很多情况下,面对很多不利条件,集体行动确实还是发生了,并常常由那些几乎没有资源和持久影响力的人发起(Linchbach 1995)。

第一章的首要任务是考察集体行动的参数,但本章探讨了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一,动员开始后,其动力之所在;二,为什么运动结果会发生变化,经常达不到最初宣布的目标?本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般的理论概述,其证据可以在书中其他章节所分析的运动和事件中找到。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说明了18世纪西方民族社会运动在各地的发展情况。因为直到18世纪,民众才第一次有可能在持续不变的时期内,在跨国范围里,集结起把集体行动变成社会运动所需的资源。第二章的重点是我和理查德·蒂利所谓的集体行动的现代“手法”;接着,在第三章,我开始探讨支持集体行动转化的社会变化。第四章则研究了建立国家和社会运动的具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第二、第三和第四章都论述到,“模式化集体行动”一旦形成,就会随国家扩张、出版和结社以及斗争手法的全球扩散传播开来。

再根深蒂固的主张,如果不被激活,就没有生命力。因此,作为本书的分析核心,第五到第八章概述了我在运动中所看到的主要力量所在。第五章描述了引发斗争事件的政治机遇和限制的变化;第六章概述了运动所利用的斗争政治的三个主要方面——暴力、破坏和常规活动形式。第七章分析了象征符号和集体行动“框架”在动员运动支持者并帮助他们提出要求方面的情况。第八章探讨了主要的社会团结形式,它们都有助于运动组织的形成。这是运动中的四种主要力量。

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从上述关于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分

析,转向了对它们的动力和结局的探讨。

从18世纪晚期开始,一旦普通民众和那些宣称代表普通民众的人获得持续集体行动的资源,斗争就会传遍整个社会,从而形成若干动荡和重新调整时期,即我所谓的“斗争周期”。正如我在第九章所表明的,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在于:一旦一个斗争周期开始出现,就可以使其他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代价降低,并使行动主义的主要框架和模式也传播开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运动,不需要像依靠社会中的一般化机遇那样多地依靠内部支持,社会精英对必须应付的普遍斗争背景,也必然会作出比应付单个运动大得多的反应。

如此普遍混乱的时期,有时导致立即的镇压,有时导致改革,经常都是两者兼而有之。而在政治体制和个人文化方面,斗争周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一场运动的鲜明目标,这既可以从政府发生的变化中看到,也可以从随后的运动遣散阶段中看到。我在第十章论述到,斗争周期的结果是政治参与方面、流行文化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持久扩张。

这就把我们引入了对当今斗争政治的探讨,和对两个重要新问题即“全球化”与可能出现的“运动社会”的探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并在20世纪70年代的南欧剧变、80年代的拉丁美洲剧变和1989年后的中欧、东欧和非洲剧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90年代爆发的新一浪“丑陋”运动,由于根源于族裔和民族主义要求、宗教狂热及种族主义,使世界动荡和暴乱更达到了几十年来闻所未闻的极点。当今电子通信和廉价国际交通手段对种种联系的加强,则使民族社会运动时代终于有可能终结。如果说民族运动是现代国家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新一浪运动的中心问题就在于:它们是否正在创造一种威胁着民族国家结构和主权的跨国运动文化。这些 8

都是我在第十一章所讨论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将使我们从经常很激烈的非西方国家的跨国运动,转向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相联系的较和平的公民运动。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 19 世纪的罢工和游行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或者,斗争的绝对声势是否会在动荡的不受约束的政治汪洋中,淹没选举的常规程序及利益群体的参与呢?

引起混乱的冲突确实已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爆发,就像它们总是在战争结束和帝国解体时发生那样。但是,如同选举运动和罢工在 19 世纪被同化为制度化常规一样,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产生的许多新的参与形式,在 20 世纪末正被驯化。未来的运动前景将不取决于斗争的激烈程度和广泛传播的程度,而取决于它如何被民族国家同化和如何改变民族国家。

一

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

斗争政治的出现是对政治机遇和限制所发生的变化们的响应,是社会参与者对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党派基础的和群体基础的、长久的和暂时的各种刺激做出的反应。资源很少的人们可以依靠机遇,采用普遍认可的行动手法,开展哪怕是零星的连续斗争行动。如果他们的行动以紧密的社会网络和联系结构为基础,以公认的有行动导向的文化框架为依靠,他们就可以持续地与强大对手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面临社会运动;如果斗争像有时发生的那样,扩散到整个社会,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斗争周期;如果这样一个斗争周期是围绕对立的或多样的主权构成的,其结果就是革命。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共同的认识、紧密的社会网络和联系结构,以及对文化上能产生共鸣的行动方式的运用。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体行动是由政治斗争的起伏引发的。

我在本章中列出了上述每个要素,因为我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用它们来描述、分析和反思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而在此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几代活动分子和学者对集体行动问题及其与怨愤、资源、文化框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这会对我们大有裨益。

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

许多社会学家都对法国革命的恐怖和群众暴怒的负面反
10 应来探索社会运动领域的发展。塔德(Tarde 1989)和勒邦(Le Bon 1977)一类作家,虽然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是群众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对反对其观点的理论家来说,却是容易引起争端的起点。在本书中,挑战者和当权者之间的矛盾将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现象,而不是什么失常。所以,我们将从看出社会结构内在矛盾的卓越理论家卡尔·马克思谈起。

马克思和阶级矛盾

最早的社会运动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不会问这个问题:什么原因会促使个人从事集体行动?或者,他们可能把集体行动作为社会结构性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看出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却严重低估了从事集体行动所需要的资源,以及它的文化维度和政治重要性。

对于个人如何被卷入集体行动的问题,马克思主要从历史决定论的角度进行了回答。他认为,当人们所属的社会阶级与敌对阶级的矛盾充分发展之后,他们就会开展集体行动。就无产者而言,这就是说,当资本主义把他们逼进大工厂,让他们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又使他们形成了包括阶级意识和工会组织在内的集体行动资源时,他们就会开展集体行动。正是工厂里社会化的生产节奏,把无产者锻造成了一个阶级,并催生出使无产阶级成形的工会组织。关于这个议题,有许多较为精彩(也较为模糊)的简洁陈述,其中最简洁明了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陈述:

资本主义无意促进的工业的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他们斗争的真正收获不在于直接的成效,而在于不断发展的工人联盟。(Tucker 1978:481,483)

马克思还扼要地探讨了一个一直困扰着活动分子们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应该”造反的群体的成员经常不去造反?他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缺少了一部分重要成员的协作,工人运动就不能成功?为此,他提出一个“虚假”意识理论——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工人不能按“历史”的要求行动,是因为他们还笼罩在阶级敌人所制造的无知的迷雾之中。这个理论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没有人能说出谁的意识是虚假的,谁的意识是真实的。马克思以为,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日益加深,随着工人们通过多年并肩劳作变得日益团结,工人将看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这个问题将自行解决。

我们现在知道,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将促使工人分化 11 并创造出各种机制将他们纳入到资本主义民主当中。通过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工人时常与资本主义结盟,这就表明:工人要发起代表他们利益的集体行动,远不只需要阶级矛盾。必须创造一种意识形态,让它把马克思的工会意识转变为革命的集体行动。可是,谁能创造这种意识呢?马克思既没有明确的领导概念,也没有工人阶级文化概念,根本没有详细说明何种情况可以为革命动员创造机遇(1963b:175)。

列宁和资源动员

列宁的主要关切是解决所有问题中最首要的问题——领导

问题。列宁从西欧吸取的经验是：工人本身只会为了狭隘的“工会利益”而采取行动。他建议创立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精英组织——“先锋队”（1929：52—63），以保护工人的真正利益为己任，取代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但是，当它于1917年在俄国成功地获得权力之后，它以党的利益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颠倒了原来的等式。（最终又通过斯大林主义的形式，以领导者的利益取代党的利益。）但在1902年，这些后话尚不得而知。对列宁来说，“先锋队”似乎是解决工人集体行动问题的答案。

现在看来，列宁对马克思的理论在组织问题上的修正，是针对沙皇俄国特殊历史背景做出的反应。通过给年轻而单纯的俄国工人阶级配备一个思维活跃的先锋队，列宁使马克思的理论适用于一个高压的国家及其统治下的落后社会，否则这两种条件将延缓阶级意识的发展并抑制集体行动。^②因此，先锋队理论是在工人阶级不能自行发动革命的历史情况下做出的组织上的反应。后来，这个理论被不加区分地应用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很少顾及社会和政治的机遇和限制，造成很多问题。列宁的一个后继者又开始着手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

葛兰西和文化霸权

1917年的俄国革命没有能传播到西方，这使葛兰西这样信奉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至少在西方，要发动革命仅有组织还是不够的。对葛兰西来说，有必要加强工人的自觉意识，因此他把工人运动构想为一种集体智慧，其基本任务之一是创造工人阶级文化。

这个变化虽小却很重要。由于葛兰西觉得意大利和俄国的社会条件相似，他接受了列宁关于革命政党必须是先锋队的指示。不过，当他被关进墨索里尼的监狱后，他又给列宁的组织解

决方案添加了两条法则：第一，党的根本任务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创造有历史性的力量集团（Gramsci 1971:168）；第二，只有在工人阶级内部发展起“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干部，去补充党内“传统的”知识分子，才能完成党的根本任务（pp.6—23）。

结果表明，这两点创新都取决于对文化力量的坚定信念。^③葛兰西消除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方案是：以党为核心在工人阶级中制造舆论，使他们有能力自发地主动采取行动，并在他们和其他社会组成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这个过程将是漫长而缓慢的，需要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战壕和堡垒”中运转，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宣传引导，并学会对待教会一类文化机构。

然而，从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的方案带来了新的困境。如果党以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在工人和资产者之间进行长期对话，那么什么才能阻止后者的文化力量，即葛兰西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识”，去改变党，而不是被党改变呢？^④没有政治动员的理论，葛兰西对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就与马克思和列宁的一样，对政治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葛兰西尽管证明战斗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壕沟和堡垒中展开（1971:229—239），却既没有指明战斗应该怎样进行，也没有把机遇和限制程度不同的国家加以区分。

总之，上述每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强调了集体行动的一个不同要素：马克思着眼于为动员创造潜在可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社会运动学者后来称之为“怨愤理论”（“grievance theory”）；列宁创造了结构运动并防止它流于狭隘的团体主张所必需的运动组织——美国学者称之为“资源动员理论”；葛兰西强调围绕党的目标建立舆论的必要性——现在被称为“构造”（framing）和形成“集体认同”理论。他们都没有详细说明：在何种政治条件下，资源贫乏且受到剥削的工人可能被动员起来，为

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我们将之称为政治机遇和限制问题。

社会科学家、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三个要素虽然很少被指明,却与近来出现的有关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3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集体行为理论家,虽然并不赞同马克思对阶级的偏执,也不赞同马克思的断言:历史将产生单独一个高于一切的阶级矛盾,却也着重强调社会怨愤是民众动员起来的根源;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家,虽然并不赞同列宁对一个精锐的先锋队的信赖,却也集中对领导和组织问题进行了探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架造”和形成“群体认同”的理论家,虽然并不总能详细说明谁有责任去创造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力量集团,却和葛兰西一样,聚焦于运动中的舆论来源。下面就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些最新思想流派是如何在最近的西方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出现的,以及它们对我们理解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发挥了什么作用。

社会怨愤和集体行为理论

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花了很长时间才形成一种政治上相关联的社会运动观。事实上,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把运动看作社会正常机制之外的东西,看作后来被称为“集体行为”的结构的一部分。^⑤集体行为理论假定:在一连串“突发”现象,从流行热潮和谣传到集体狂热、骚动、运动乃至革命中,运动是最有组织和最自觉的。

在集体行为理论的某些变体(如 Kornhauser 1959)中,社会本身被看作是无判断力的,动员是由人们改造社会的迫切要求造成的。这可以与涂尔干的“失范”理论联系起来。“失范”理论

认为,丧失传统角色和身份的个体,常通过个人在运动中的重整来寻求新的集体认同(Durkheim 1951; Hoffer 1951);在集体行为理论的另一一些变体(如 Gurr 1971)中,除了以个人贫困作为分析的中心外,不存在全面分析视野;集体行为理论最复杂的变体是把集体行为和一种社会功能观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功能的紊乱会造成各种不同形式的集体行为,其中一些采取了政治运动和利益群体的形式(Smelser 1962; Turner and Killian 1972)。

集体行为理论家与马克思不同,他们没有首选的社会主体,不像马克思拥有一种阶级理论,可以用来预测哪个群体有望在资本主义的什么阶段动员起来。可能因为集体行为理论家把运动与更冲动的表现形式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倾向于不详述动员过程。又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假设集体行为不属于日常生活范畴,所以他们很少有人确定集体行为和政治的关系(除了 Smelser 1962; chs. 9, 10)。这就是为什么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新的社会运动周期时,几乎没有一种集体行为理论的变体能保持流行的原因。

14

理性选择和资源动员

社会运动的研究复兴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美。新一代学者大多经历了 60 年代的运动,他们给社会运动赋予了一种新的较肯定的形象,尽管集体行为的传统深受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现实世界的可怕现象影响。这样,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坚定的青年活动积极分子的形象,对于先前的运动积极分子及其研究者来说,就很难再与早期那种在分裂的社会中寻根探源的“真正的信仰者”的形象相吻合(Keniston 1968)。

由于经济学正成为主要的社会科学,集体行动的研究也受

到了这种趋势的影响。从微观经济学来看,集体行动的问题已不再是阶级如何斗争和国家如何统治的问题,而变成了集体行动怎么会在受狭隘自我利益引导的个体中间也有可能发生的问题。

研究这个难题的最著名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曼科·奥尔森(Olson 1965)。他的理论自始至终都在探讨个体问题,虽然他也承认非物质刺激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集体行动问题就是怎样集合一个群体尽可能多的成员,基于集体利益而参与行动的问题。只有集合起一个群体尽可能多的成员,基于集体利益而参与集体行动,这个群体才能向对手证明自己的力量。奥尔森在他的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在一个很大的群体中,只有其最重要的成员才有足够的兴趣担当领导,为集体谋利。他们虽不是列宁所说的“先锋队”,但也差不多。

不过,上述这条法则也有一个例外,即它不适用于那种个人和集体利益紧密相连的很小的群体(Olson 1965:43—46)^⑥。一般来说,群体越大,宁愿“不劳而获”而不愿那些在集体利益中有强大个人利益者采取行动的人越多。^⑦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奥尔森建议,以领导自诩的人要么得对组织成员施加纪律约束,要么得给组织成员提供“选择性刺激”(selective incentives),以使他们确信参加行动是值得的(p. 51)。

奥尔森的著作如果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大概不会有人注意。那时,人们一般认为,社会怨愤足以解释集体行动的产生。而在 60 年代,人们对集体行为研究方法表示不满(McAdam 1982:ch. 1),他们越来越相信社会运动研究者的看法:单凭社会怨愤,无法说明群众动员,奥尔森的著作就汇集了这些看法。实际上,奥尔森认为,受个人利益引导的理性的人,一旦看到别人愿意为他们采取行动,很可能自己会避免采取

行动。

但是,奥尔森的观点在斗争政治研究领域并没有被迅速而一致地接受。因为在斗争政治正在进行并逐渐繁荣的年代,奥尔森一个劲地解释斗争政治不可能发生的原因(Hirschman 15 1982),实在可笑!更糟糕的是,他似乎把集体行动的动机局限于物质动机和个人动机。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60年代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别人的利益罢工、游行、暴动和示威又是怎么回事呢?此外,奥尔森虽然称他的理论是“集体行动”的理论,但除了个人的动机和集合水平之外,没有多少别的东西好说。他的理论怎么能和60年代的运动周期相一致呢?

两位社会学家,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聚焦于先进工业化社会中越来越容易获得的资源,提出了他们的观点(McCarthy and Zald 1973, 1977)。他们与奥尔森一样,认为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们主张,扩大的个人资源、专业化发展和运动可获得的外部财政支持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专业的运动组织。^⑧

前辈学者重点探讨的是集体行动为何会产生产生的问题,而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的“资源动员”理论重点探讨的却是集体行动者可利用的手段,即如何进行集体行动(Melucci 1988)。这种对手段的强调使那些试图为运动的起源寻找结构性解释的批评家非常失望,却给运动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具体性,在此之前,运动研究一直被看作是关于思想意识的抽象观念的表达。对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而言,奥尔森所谓的“不劳而获者”的悖论是有合理答案的,这个答案就在于组织。

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的资源动员理论已经成为社会学家研究社会运动的主要背景范式,不过矛盾的是,它得到的更多的还是批评,而不是欢迎。为什么

会这样呢？首先，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使用经济学语言（如他们谈到运动“实业家”、“运动产业”、运动“部门”），撇开了许多60年代运动参加者的经验，以致批评家质问道，那么思想意识、责任感、价值观和对不公正的抵抗又该如何解释呢？其次，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所说的社会运动组织(SMOs)常常很难与利益群体相区分，特别是欧洲学者想知道他们的理论如何在猛烈的、反应迅速的欧洲斗争领域中存在下去。第三，他们强调的专业运动组织“方案”好像忽略了60和70年代在欧美出现的许多普通群众运动(Evans and Boyte 1992)。

到8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模式，它强调的是非正式参与和内部民主(Fantasia 1988; Rosenthal and Schwartz 1990)。而由于人们在70年代和80年代普遍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一些人后来从90年代早期在反政治气氛下出现的与资源动员理论相反的文化中，又找到了新的范式性替代理论。

斗争的文化

集体行为范式理论对社会怨愤的强调让人想起马克思的理
16 论，资源动员理论对领导权的强调则与列宁的理论相似，而近来社会运动研究的文化方面则是葛兰西理论的回声。就像葛兰西给列宁的阶级霸权概念添加了文化层面的涵义那样，最近许多作者也试图把社会运动的研究重点从结构因素转向集体行动的“构造”。E. P. 汤普森对阶级观念的文化阐释(1966)最早暗示了这种理论范式的转变。汤普森并不想抛弃阶级观念，而只想强调阶级的自我创造，以取代生产力论马克思主义。为此，他远离工厂车间，考察了习俗、谷物占有和消费心理(1971)。在一个先前被阶级矛盾所困扰的领域，汤普森又把对阶级间的交互作用的感受，引入了斗争研究，称之为“道德经济”因素(1971)^⑨。

第二种影响来自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Geertz 1973),他的“深描”方法在那些对本学科的定量研究方法感到灰心的学者中,特别有影响。格尔茨要求把分析和阐释区分开来,他根据自己的洞察,认为阐释方法似乎可以给集体行为参与者提供行为意义,因而倾向于阐释方法。

第三种影响来自于社会心理学,首先是欧文·戈夫曼的构造概念(Goffman 1974),其次是伯特·克兰德曼斯的“舆论动员”概念(Klandermans 1988, 1997)和盖姆森的“意识形态包裹”概念(Gamson 1988)。从假定存在社会怨愤起,社会运动研究者就开始注重研究运动是如何把具体的怨愤置于情感承载“包裹”中(Gamson 1992a),或置于各能使参与者确信他们的事业公正而重要的各种“框架”中(Snow, Rochford, Worden, and Benford 1986)。与这些认识部分地混合在一起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从历史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引入的“话语”概念(Foucault 1972, 1980)。

并非有人故意而为,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那么时兴以前,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结构方法就逐渐让位于元叙事的文化方法,这种转变在70年代和80年代“新的”社会运动的挑战下,得到了加强,因为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些运动似乎已经用“生活空间”的要求取代了过去老的结构计划(Habermas 1981)。^⑩

有了这种对文化的新的强调,对资源动员理论的反动就变成了相当新的范式。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同”政治——特别是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和少数民族的权利运动(Gitlin 1995),还有民族主义研究的新高潮,都使这一点得到了加强。在民族主义研究新高潮中,社会建构论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的隐喻所减弱(Anderson 1991)。而对更系统的革新者来说,所有的运动都建构意义,意义建构是社会运动的

基本功能(Eyerman and Jamison 1991)。

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为什么运动浪潮会出现在一些时期
17 而不出现在另一些时期?为什么一些运动比另一些运动更擅长
利用文化符号呢?如果找不出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建构论可能
会像它的支持者希望取代的结构主义一样,是一种机械的元叙
事。政治科学家与政治观一致的社会学家对这个难题给出了
一个回答:问题在于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工作方式的变化。

政治斗争的条件

忠于传统的美国学者,在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兴起的
斗争政治的引导下,首先形成了一种研究运动的更加政治化的
方法,它最后的中心是后来被称为“政治机遇结构”的概念的几
种说法。^①查尔斯·蒂利 1978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从动员到革
命》实际上为这种新的研究传统奠定了基石。^②在这本书中,查
尔斯·蒂利提出了一个“政体模式”的概念来分析集体行动。他
详细描述了集体行动动员的一系列条件,并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
挑战者的机遇—威胁和当权者的助长—抑制(Tilly 1978:
chs. 3, 4, 6),这两者都使集体行动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蒂利认为,民族社会运动的发展是与巩固的民族国家的兴
起相生相倚的(1984b)。因此,运动必须和政治联系起来研究,
运动的策略、结构和成就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这也是赛达·
司考克普尔(Theda Skocpol)等社会革命研究者在探讨的认识,
而比较政治科学研究者则很快对此熟悉起来(Kitschelt 1986;
Kriesi, Koopmans, Duyvendak, and Giugni 1995; Tarrow 1989a,
1989b)。

因为蒂利的观点是以欧洲的社会思想为基础的,所以他的
模式是绝对与结构有关的(即它强调不能按行动者的意愿塑造

的条件)。美国学者的模式对政治过程的工作方式较为敏感。政治科学家如迈克尔·利普斯基(Lipsky 1968)和皮特·艾辛格(Eisinger 1973)特别注重美国城市政治:前者将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运动和作为政治资源的抗议活动联系起来,后者则将抗议和不同的地方机遇限度联系起来。与此相似,弗兰西斯·福克斯·皮文和理查德·克洛沃德则把注意力放在了福利政策和社会抗议之间的历史关系上(Piven and Cloward 1993)。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却通过追踪美国民权运动发展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意识上的变化,把这些方法综合成为一个十分完善的社会运动动员的“政治过程模式”(McAdam 1982)。

虽然机遇—威胁和助长—抑制只是蒂利最初的综合的一部分,但政治过程理论家在整个80年代却倾向于把他们的关注点局限在机遇上。一些学者步艾辛格的后尘,研究不同的政治结构如何为造反群体提供或多或少的机遇(Amenta, Caruthers, and Zylan 1992; Kitschelt 1986);另一些学者则着眼于某些特别的运动如何利用由制度造成的机遇(Costain 1992);还有一些学者则着眼于一个特别的运动机遇如何随时间而变化(Jenkins and Perrow 1977);再有一些学者为了理解动员浪潮的兴起对后继运动的影响,研究了整个抗议过程(McAdam 1995; Tarrow 1989a)。在一个重要的比较综合研究中,汉斯皮特·克瑞埃西和他的合作者还利用政治机遇的概念分析了四个西欧国家内的新社会运动(Kriesi 1995)。

随着这些著作的进展,缺陷和含混不清也显现出来。^⑬例如,政治过程模式很少被系统地应用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以外的地方(除 Boudreau 1996; Brockett 1991, 1995; Scheider 1995)。第二个问题在于,威胁对运动形成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问题直到90年代才有人在唐纳泰拉·德拉·波塔(1995,

1996;della Porta, Fillicule and Reiter 1998)关于警察行为的讨论的启示下,开始探讨并写出了一系列著作。第三,一些学者(McAdam 1996;Tarrow 1996b)从有限的机遇因素着手研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和运动形成之间的关系显现,政治机遇的概念已趋于拓展(Gamson and Meyer 1996)。¹⁹

无论如何,对于先前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为什么斗争政治好像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展开?为什么斗争政治有时造成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有时却偃旗息鼓变成宗派之争,或被镇压?为什么运动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采取的形式不同?政治过程—机遇的方法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就像我在这里指出的那样,政治过程—机遇的方法并没有宣称能解释斗争政治或社会运动的各个方面,所以它可以成为由社会运动理论其他分支一起构成的综合体的一部分。

走向综合

本书最有力的主张将在于,当政治机遇和限制的模式变化时,人们就会投入斗争政治,并随即通过有策略地采用集体行动手法,创造新机遇,让其他人在扩大的斗争周期中加以使用。如果他们的斗争始终围绕着社会上的广泛分裂,使人们团结在所继承的文化符号周围,并建立或构建起紧密的社会网络和联系结构,这些斗争事件就会造成与对手的持续互动,尤其在社会运动中。

政治机遇和限制

我所谓的政治机遇指的是:鼓动人们投身斗争政治的一贯的政治斗争因素,它们不一定是正式、长久或全国性的;我所谓的政治限制指的是:阻碍斗争的因素,如镇压,还有当权者向造

反者展现统一阵线的能力。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预测斗争政治出现的时间,既因为上述变量在不同的历史和政治条件下不同,也因为不同的因素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变化。所以,“政治机遇结构”这一术语不应该被理解为必定会造成社会运动的不变模式,而应该被理解为暗示斗争政治何时出现的一系列线索,它调动着一连串可能最终导致挑战者与当权者持续互动并由此产生社会运动的因果关系。

政治机遇的概念强调的是群体外部的资源。这些资源与金钱和权力不同,甚至可以被弱小的或无组织的挑战者所利用,而决不“属于”这些人所有。在第五章中,我谈到,当普通公民,有时在对抗的精英或领袖人物的鼓励下,对政治机遇作出回应时,斗争政治就出现了。因为政治机遇能减小集体行动的代价,显示潜在的联盟力量,表明精英和当权者的脆弱,并使社会网络和集体认同围绕共同主题变成行动。

像汉斯皮特·克瑞埃西和他的合作者一样(1995),我在第五章中还谈到,国家结构和政治分裂都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机遇。其中最明显的要素是进入制度的形式和镇压的能力。无论如何,不断变化的机遇和限制都为资源贫乏的参与者从事斗争政治提供了可能。斗争是否将变为社会运动,这取决于人们如何集体地行动,如何围绕共同主张动员舆论,以及动员结构的力量和位置。

斗争的手法

人们并不是简单地“集体地行动”。他们请愿、集会、罢工、游行、占领机构、阻断交通、放火以及为造成人身侵害而袭击他人。正如宗教仪式或民间庆典一样,斗争政治不是产生于组织者的大脑中,而是铭刻于文化中,传播于社会中。有知识内涵的

斗争传统是社会公众文化的一部分。^⑮社会运动汇聚了一个社会历史上特殊常规的知识库,这些知识库能帮助运动克服典型地存在于穷人和无组织者中的资源和信息不足的问题。(Kertzer 1988:104—108)

社会运动很少会既没有标新立异的动机或对参加者的限制,也不受机构惯例的约束,所以领导者在选择集体行动形式上具有创造性的作用。为了使那些可能待在家里的人支持他们,领导者要发明、改造和结合各种斗争形式。艾伯特·赫施曼就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抱怨奥尔森仅把参加集体行动当作一种牺牲,而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受益(Hirschman 1982: 82—91)。就那些生活陷于困苦和绝望中的人而言,令人激动的、冒险的、或许有益的集体行动,很可能给他们提供一种收益。

斗争的形式都是继承下来的或特殊的,惯常的或陌生的,孤立的或协调运动的一部分。与它们相联的,不是铭刻在文化中的主题,就是现场发明的话题,或更多的是传统与新的意义结构相混合的因素。根据政治科学家迈克尔·利普斯基的看法(1968),抗议是一种资源,而斗争形式本身则是动员的集体刺激,是对敌手的挑战。

关于斗争形式,某些群体具有特别的历史和回忆。工人知道怎样罢工,因为他们的先辈早在他们之前就进行过罢工;巴黎人设置街垒,因为在巴黎人的斗争史上记录着街垒;农民夺取土地,因为土地上留有他们祖先过去使用过的印记。政治科学家斯图亚特·希尔和唐纳德·罗特希尔德这样表述道:

基于过去与特定群体或政府的冲突,个体建立了一个既描述了其特定情况下的对策,又解释了其行动合理性的抗议或骚动的原型。(Hill and Rothchild 1992:192)

我将在第六章详细讲解这些斗争形式。

舆论动员和认同

集体行动的协调性,取决于有着共同的认识和认同的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或者用一个更宽泛的范畴,取决于使集体行动有道理、有尊严和有生气的集体行动框架。正如戴维·艾普特在他的《意识形态和不满》中所说,意识形态会夸大不满,识别怨愤的对象,掩盖交叠群体不相干的怨愤(Apter 1964:ch. 1)。

不过,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促使人们行动的动因是一种相当呆板的方法。近年来,社会运动学者已开始用认知框架、意识形态包裹和文化话语等术语,来描述鼓舞人们参加集体行动的共同意图。^⑩但无论用什么术语,学者们并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强加的知识范畴,或作为怨愤的自动结果,而是一致认为,运动进行了充满热情的“构造工作”:把怨愤变成更广泛更容易引起共鸣的要求(Snow and Benford 1988),并以这些要求为核心,激发出威廉·盖姆森所谓的“热认知”(hot cognition)(Garnson 1992a)。

构架不仅与怨愤的普遍化有关,还在运动的对立结构中界定了“我们”和“他们”。挑战者依靠继承的集体认同和塑造的新集体认同,来定义他们未来的支持者,同时也根据实际的或想像 21 的特质和罪恶,来界定他们的敌人(Hardin 1995:ch. 4)。他们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息内容来限定敌我一样,根据自己给敌友设计的形象来限定敌我。这就意味着既要关注集体行动者在公众舞台上出现时穿的“服装”,又要关注对他们的要求的意识形态构造。我们将在第七章中对此进行讨论。

虽然运动组织者都积极地从事构造工作,但并不是所有的

构造工作都在他们的控制下进行。他们除了指望继承的文化条件外,还要和媒体竞争,因为媒体能传递运动必然企图塑造和影响的信息。正如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所发现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帮助形成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大多数信息,都是以媒体为中介传递的,而没有通过本来必须依靠的那种早期的组织上的努力(Gitlin 1980)。

此外,国家也在不断地构造议题,一方面为了获得对其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为了抵制运动在公众领域内设置的意义。在运动常涉及的关于意义的斗争中,它很少能在和国家的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因为国家不仅控制着镇压的工具,还拥有可以随意支配的重要的意义建构工具。国家和运动之间的斗争不只发生在大街上,还发生在关于意义的争论中(Melucci 1996; Rochon 1998)。

动员结构

虽然是否参加集体行动是由个人决定的,但是,只有在面对面的群体、社会网络和它们之间的联系结构中,运动才最经常地处于活跃和持久状态。这一点在最近的实验室研究和运动动员实际中都很明了。

早期的集体行为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把单独的贫困个体视为集体行动的主要参与者。而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发现,把行动的潜能转换成社会运动的是群体内的生活(Hardin 1995:ch.2)。例如,道格·麦克亚当关于“自由之夏”运动的著作表明,在决定谁将参加这个运动和谁将留在家里的问题上,恰恰是“自由之夏”报名者所根植的社会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远不只是他们的社会背景或意识形态(MacAdam 1986, 1988)。^⑧

一些机构为运动提供了可以在其中生长的特别经济的“寄主”环境,尤其在大革命前的法国那样的等级社会中更是如此。当时,法国地方议会就为自由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机构空间(Egret 1977)。而在今天的美国,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社会学家艾尔登·莫里斯证明,民权运动的源头与黑人教会机构的作用 22 有密切关系(Morris 1984)。政治科学家玛丽·卡赞斯坦则发现,在非国教女修道士关系网的形成中,天主教世界的内部组织充当了无心的同谋(Katzenstein 1998;另见 Levine 1990; Tarrow 1988)。

社会网络和机构在刺激运动参与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曼科·奥尔森关于大群体不支持集体行动的论点。因为当我们着眼于运动组织时,会清楚运动组织的“大”只是算术意义上的,它们实际上更像小群体、社会网络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的交织网络。^⑨集体行动可能只有在这些群体最有禀赋或最有勇气的成员中才能产生,而他们之间的联系又造成一个参与者的行动带动另一个参与者的可能。这就使我在第八章中所说的“联系结构”(connective structures)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结一下将要在后几章详细论证的观点:斗争政治的产生,是在政治机遇扩展时;在它们显示了联盟的潜在可能时,以及它们揭示了对手的脆弱时。一旦斗争触动了它所根植的社会网络和联系结构,产生能持续与强大对手斗争的集体行动框架和有支持力的认同,斗争就明确转化为社会运动。运动采用熟悉的斗争形式,成为把外部机遇变成资源的焦点。总之,斗争的手法、社会网络和文化体系降低了人们参加集体行动的成本,使他们相信自己并不孤立,并使他们的要求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些因素合起来形成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使社会运动对

政治和社会变化具有历史性核心意义。

运动的动力

发动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力量与控制或支持集体行动的力量并不是一回事。这种困境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关。从内部来看,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来源于运动对它们无法控制的人们的刺激。这种力量的优点是,它能在不具备内化支持基础所必需的资源时让运动引起集体行动。不过,运动支持者的自主状态也会分散运动的力量,怂恿分裂,为背叛、竞争和镇压敞开大门。

从外部来看,引起运动并使其影响得到扩散的政治机遇,也影响着其他补充性的、竞争的或敌对的因素,这个事实又使运动受到影响。特别是当集体行动成功后,机遇造成更宽广的斗争周期,使斗争从运动积极分子扩散到反对者、一般利益群体和政党,并不可避免地扩散到政府。由于这种促使运动创生和扩散的动力,运动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运动无法控制的力量造成的结果。这就把我们引入第九章所述的斗争周期的概念。

斗争周期

当机遇扩大和政府挑战敏感的消息传开时,不仅活动积极分子,连普通民众也开始考验社会控制的限度。先前的挑战者和当权者之间的冲突,因为揭示了后者的弱点和前者的力量,甚至也使胆小的社会参与者被诱惑去与其中一方结盟。在机遇正普遍扩大的形势推动下,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出,政治知识快速增长。希尔和罗特希尔德写道:

当抗议和骚动在有长期冲突历史的群体中爆发时,它

们会刺激处于类似情况下的其他公民,使他们更多地思考他们自己的抱怨和大规模行动的背景。(Hill and Rothchild 1992:193)

在这样的时期里,先前的造反者所创造的机遇就为新的运动组织者提供了动机。甚至传统的利益群体也被反传统的集体行动所诱惑。挑战者和政府成员常常跨越正在改变的界限,结成联盟(Tilly 1978:ch. 2)。新的斗争形式得到尝试和传播,政治消息和不确定的传闻到处散播,各组织在一个新出现的紧密互动的“社会运动部门”中展开合作与竞争(Garner and Zald 1985)。

斗争周期中的扩散过程并不仅仅是一种“传染”,虽然发生了许多这样的传染,它也是利用已被其他群体的行动所证实的机遇的合理决定的结果:当群体的获益导致其他人寻求同样的结果时,当某人的利益被叛乱群体提出的要求损害时,当一个组织或机构的优势受到威胁并以集体行动作为回应时,扩散过程就出现了。

随着斗争周期的扩展,运动也给精英和反对群体创造了机遇。参与者与挑战者结盟,反对派精英提出了在先前看来是鲁莽的改革要求,政府力量的反应或是改革,或是镇压,或是两者结合。正在扩大的集体行动逻辑导致了制度政治领域内的结果,而那些开始斗争周期的挑战者,在制度政治领域内对结果的影响则越来越小。

在斗争的顶点,斗争周期引起革命。革命不是集体行动的单一形式,也不完全由大众的集体行动构成。革命中的集体行动,像在与它们相关的斗争周期中一样,迫使其他群体和机构参 24
与,为新的社会运动提供基础和框架,搅乱包围它们的旧制度和

网络,并从造反群体开始斗争过程时所采用的集体行动形式中,创造出新的制度和网络。

运动周期和革命的不同在于:在后者中会产生多种主权中心,把挑战者和政府成员之间的冲突变成权力之争(Tilly 1993)。这个本质的差别造成了一个“大”革命研究产业,革命通常只是被互相比较。这种对大革命的专门化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把革命和较小的突发事件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变小,从而使人不可能从斗争周期的动力中分离出导致革命发生和失败的因素,我在第九章对此作了讨论(参见 Goldstone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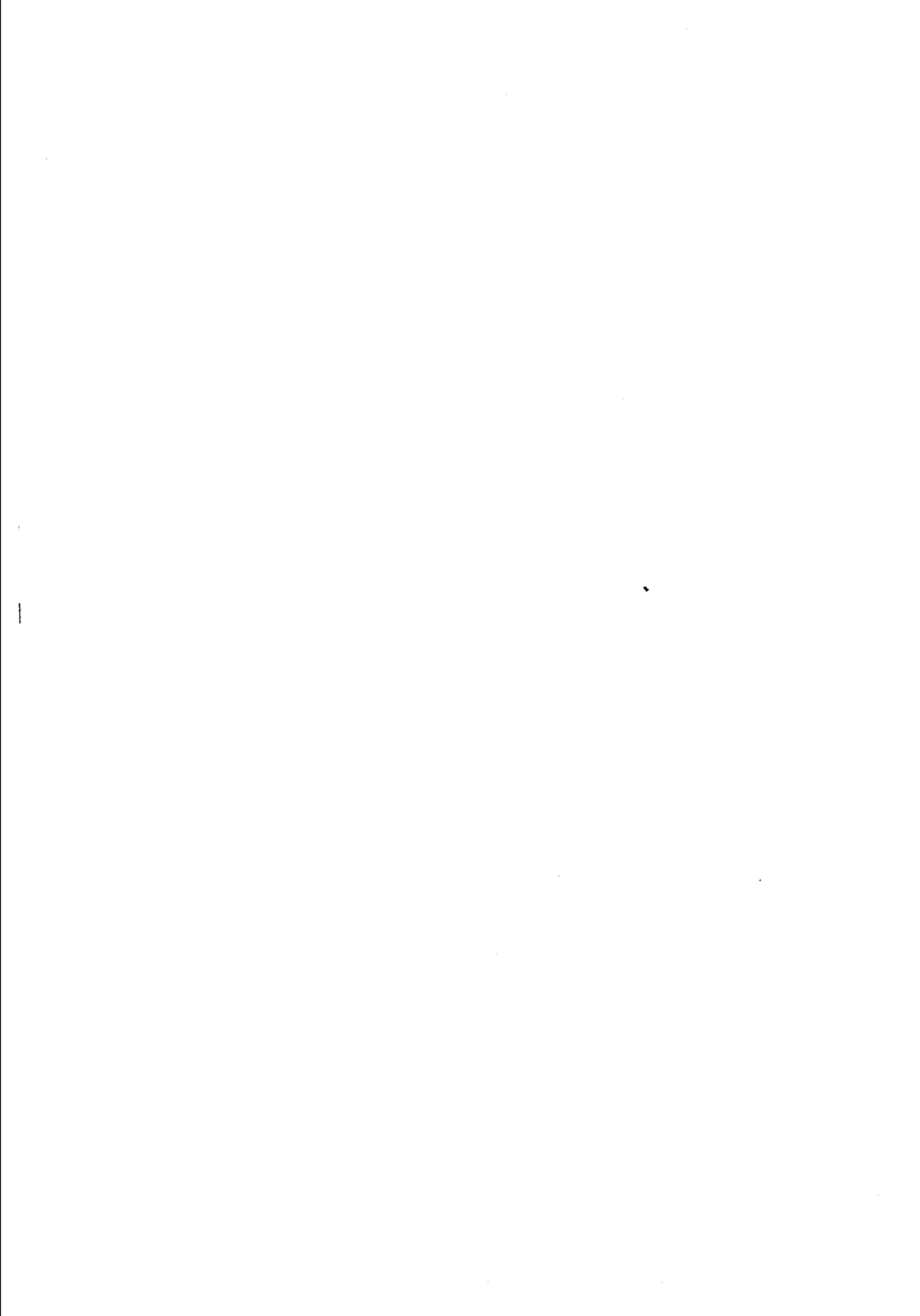
运动结果

这些关于抗议周期内的互动的观点表明,考察个别社会运动的结果本身不会特别富有成效。在一般的斗争周期中,制定政策的精英并不对任何单个群体或运动的要求作出反应,只对动荡的程度及精英和舆论群体的要求作出反应,而精英和舆论群体的要求与他们宣称要代表的人的要求,仅仅部分相符。至于社会运动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虽然运动通常把自己看作处于制度之外并与制度对立的,集体行动却把它们置于复杂的政策网络中,并因此使其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除此以外,运动试图按照对更广泛的社会来说是可理解的意义框架,来表达和阐明其要求。运动采用从现有斗争手法中抽取的集体行动形式,逐步形成各种类型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常常又模仿它们所反对的组织。

我们开始研究社会运动时,可以把它看作个别社会参与者和他们的对手之间孤立的冲突。但特别在我们考察运动的结果时,我们却很快碰到了较复杂而不太容易对付的政治网络。正

是通过由挑战者、运动、盟友和敌人所制造和利用的政治机遇，主要的斗争周期才得以开始。斗争周期反过来又为精英和对抗的精英创造了机遇，于是，从大街上开始的就在政府的大厅里或在军队的刺刀下得以解决。社会变革的主要催化剂——运动，尤其是运动浪潮——就成为争取权力的民族斗争的一个部分。让我们从考察这种斗争怎样首次在西方现代史上造成民族社会运动开始吧。

25



第一部分

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

二

模式化集体行动

18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法国旧政权的崩溃,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案件开始在巴黎受审^①,其中包括最臭名昭著的克利罗案。在这个案件中,一个女仆因拒绝主人的求爱,被指控偷盗并被拖上法庭。结果(对不起狄更斯了)不仅女仆被判定胜诉,反廷臣和放荡雇主的大众愤怒浪潮也席卷巴黎。正如18世纪后期人们所熟知的情形,愤怒的人群洗劫了那个女仆雇主的住宅,把他的财物扔到街上,并差一点要了他本人的命。一位当时的评论者这样描述了人们的愤怒情绪:

多可怕的暴力!多可怕的骚动!愤怒的群众挤满街头,奋力用斧子拆毁蒂伯特的房子,并威胁要付之一炬,他们愤怒地诅咒着蒂伯特一家,差点没宰了他们来泄恨。(Lusebrink 1983:375—376)

这一事件使腐败的气氛笼罩着旧政权,而它的形式和修辞在欧洲历史上却是司空见惯的。

六十年后,在1848年2月的一天,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从家里动身去议会。当时议会正处于巴黎革命的混乱中,托克

维尔一路上看到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设置街垒,不少市民在默默地观望。“这些街垒,”他说道:

被少量的一些人熟练地构筑着。他们都很卖力,不像怕被当场捉住的罪犯,倒像要又快又好地完成工作的好工人。哪里也见不到我曾在 1830 年目睹的那种火热的动乱景象:整个城市让我想起一口巨大的正在沸腾的大锅。

29 (Tocqueville 1987:39)

实际上,1848 年 2 月后的几个月里,欧洲出现了许多这种“火热的动乱景象”和“沸腾的大锅”。而在 19 世纪中叶,法国人则正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平静地构筑街垒,并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些街垒。^②这种规律性表明,自六十年前袭击蒂伯特住宅事件后,大众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上述两件事的差异远不只是规模大小上的。拆毁房屋长期以来一直是用来对付税收官、妓院老板和粮商的惯常做法。^③这类做法集中发生于坏人作恶的地点,并局限于对被认定的作恶者的直接攻击。相比之下,设置街垒则是我所谓“模式化”的东西。一旦人们认识了它的战略优势,它就可以被用于各种目的,把具有不同目标的人团结起来,并被扩散到与政府的各种类型的对立中。^④

18 世纪 80 年代,虽然人们会夺取成船的粮食,袭击税收官,烧毁税收登记簿,报复作恶者和违反社会准则的人,但是他们还不了解诸如大规模游行、罢工或城市起义这类为达到共同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但到 1848 年革命结束时,请愿、公众集会、游行和设置街垒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惯例,被不同的社会参与者联合体用于各种目的。在审视这些新的斗争手法形式及其与民

族社会运动诞生的关系之前,让我们先看看斗争手法的概念和它是怎样在早期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

斗争手法

1995年,查尔斯·蒂利完成了他对集体行动三十多年的研究^⑤,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英国大众斗争,1758—1834》(1995b)。在这本书中,蒂利把“斗争手法”(repertoire of contention)定义为“人们为追求共同利益而一起行动的方法”(p.41)。^⑥在另一本书中,蒂利把这个主题又深入一步,写道:“斗争手法这个词有助于描述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它确定了有限的一套学来的、共同拥有的、经过相当深思熟虑的挑选过程才被付诸行动的常规。”这种认识的局限制约了集体互动可利用的选择,并为后来的选择奠定了基础。人们在寻找战术优势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新的斗争形式,但他们只是在已确立的常规的边缘上小打小闹(1992:7)。

斗争手法同时也是一个结构上和文化上的概念,不仅包括人们在和他人冲突时的行动,还包括人们所知道的行动办法和别人对他们行动的期望。假如18世纪法国的挑战者试着进行静坐示威的话,那么他们的攻击对象可能不知道如何回应,因为那些人不会像当今骚动的受害者那样,了解静坐示威的含义。亚瑟·斯廷奇康贝写道:“斗争手法的要素同时是……群体成员 30 的技能和群体的文化形式。”(Stinchcombe 1987:1248)

斗争手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只是极其缓慢地变化。根本的变化取决于利益、机遇和组织的重大变动,而这些因素又依次与国家和资本主义中的变化大体联系在一起。重大变动不仅是民族国家为发起战争和榨取税收而对社会进行渗透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造成满怀怨愤和拥有集体行动资源的人员大

量集中的结果。这些斗争手法的变化虽然有结构基础,却出现在重大的政治分水岭,即我在第九章所说的“斗争周期”中。^⑦

新的“斗争手法”与18世纪克利罗案中的斗争形式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退回到19世纪中叶前的西欧和北美的奇特地带,”蒂利写道,“我们很快会发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天地。”(1983:463)旧的斗争手法是地方性的、二分的和特殊的:

它是地方性的,因为它所涉及的利益和互动往往集中于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它是二分的,因为普通民众在着手解决当地问题和身边事务时,为达到他们的目的会采取令人难忘的直接行动,而在着手解决国家问题和事务时,他们却反复地向当地的保护人和当权者提出诉求……它是特殊的,因为具体的行动惯例随群体、问题和地方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Tilly 1995b:45)

斗争常常利用大量嘲讽性的象征符号、宗教仪式和大众文化,在公众庆典上爆发。参加者一般以合法社团群体和共同体的成员或代表的身份出现,常常会聚在作恶者的住所和作恶的地点(Tilly 1983:464)。

新的斗争手法并没有一出现就遍地开花,而旧的集体行动方式也没有从此消失。新的斗争形式最显著的胜利产生在游行、罢工、集会、公众会议和类似的互动形式流行之后。与早先的斗争形式相比,新的斗争形式具有世界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

它们是世界性的,涉及的利益和问题经常跨越许多地区,或是影响各种权力中心(它们的行动触及许多地方)。

它们是模式化的,很容易从一个背景或环境向另一个背景或环境转移……它们是自主的,从提出要求者自己的公开行动开始,而且在提出要求者和全国重要权力中心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Tilly 1995b:46)

蒂利在他 1983 年发表的文章里,用图表的形式总结了新旧斗争手法的不同之处,这里复制如下,图 2.1: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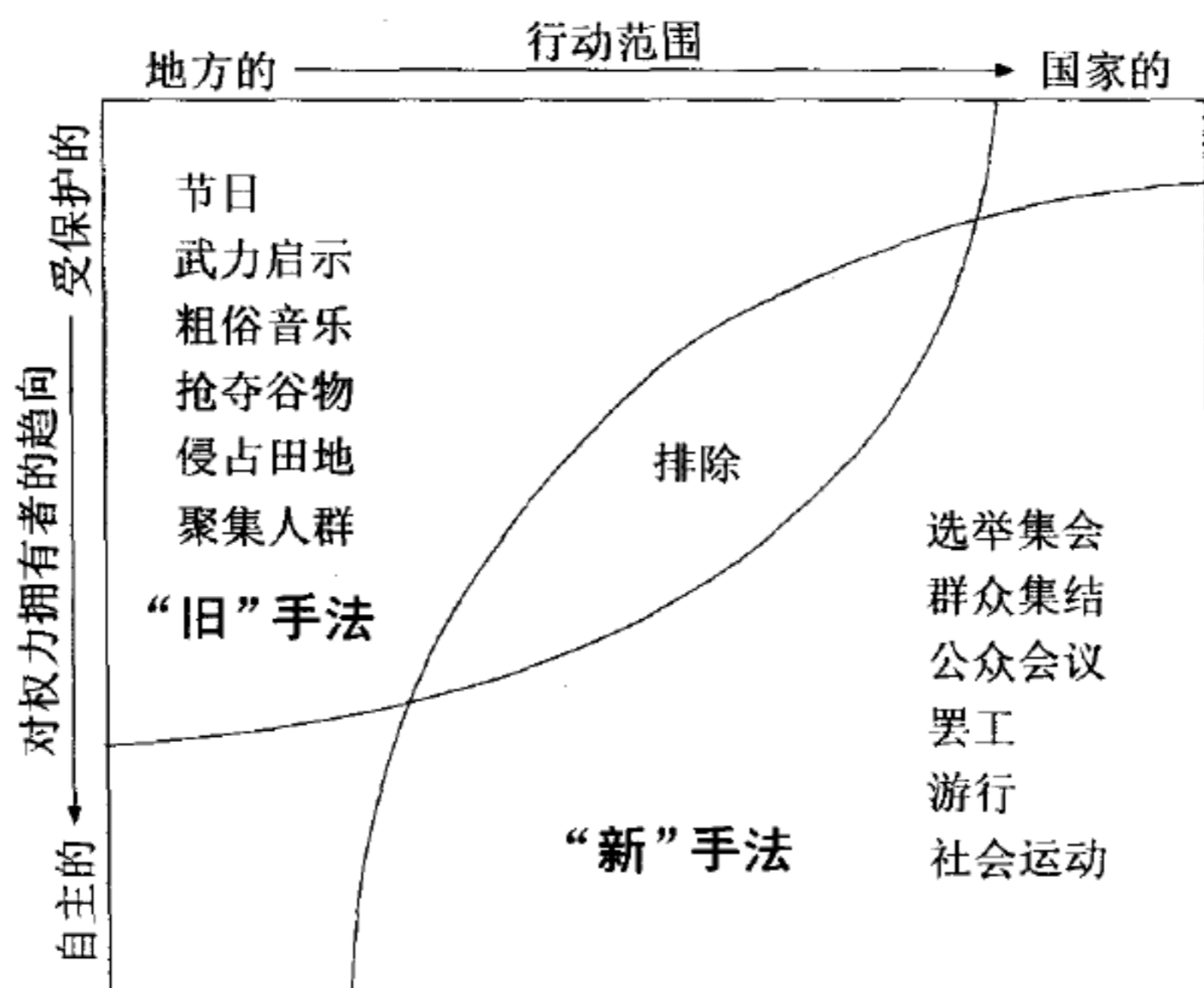


图 2.1 西欧和北美的“旧”和“新”斗争手法(资料来源:查尔斯·蒂利,“撇开选举、调查或社会运动谈你的看法”,《公众舆论季刊》第 47 期,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 1983 年版权所有)

斗争手法的概念暗示它或多或少是普遍的^⑧。不过,新旧

斗争手法的普遍程度却不相等。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对磨坊主和谷物商的攻击中,在骚动和宗教冲突中,民众所采取的行动形式,直接与其目标的本质和运用它们的行动者的怨愤联系在一起。这里存在着一个它们与现代斗争手法的重要差别:正是由于旧形式缺少普遍性,才阻碍了更广泛的大量利益和行动群体的产生;而正是由于新形式具有较普遍的性质,才使社会运动具有共同的文化和行为基础。^⑨问题在于,斗争手法的变化和社会运动的诞生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将在审视一些早期现代欧洲典型的传统斗争形式之后,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传统的斗争手法

在伟大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罗克看来,集体行动是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他在描写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时说道:“农民起义看起来与领主制密不可分,就像罢工与大资本家企业密不可分一样。”(Bloch 1931:175)他看到,人们所采用的集体行动方式,与他们那些出自同他人冲突之结构的要求的实质普遍一致。

布罗克的定理有两个相关点:一,挑战者和被挑战者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二,集体行动的形式与挑战者的怨愤和被挑战者的权力紧密相连。但同样的逻辑又使谁和谁可以并肩行动受到限制,并使集体行动的特殊形式可以被运用的广度受到限制。如果农民起义针对的是地主,那么参加起义的农民就只能与当地乡村网络中同样对该地主忿忿不平的人联合起来,因此,他们行动的形式来源于封建社会的社团结构。

布罗克的观点,对于他非常了解的等级社会而言,是正确的。在等级社会里,集体行动形式之所以与造成它们的矛盾紧密相联,原因在于糟糕的通信条件和普遍文盲的情况使它们不受外界的影响,并被融入社团和公共群体中。于是,当新教徒在

天主教地区建造教堂时,天主教社团就会将其拆毁,或者附带把里面的教士一起烧死(Davis 1973);当磨坊主在闹饥荒期间把谷物卖到外地时,人们就会夺走谷物,以平价销售(Tilly 1975a);当掌权者对当地一个公民的惨死负有责任时,葬礼就会变成送葬骚乱(Tamason 1980)。传统的斗争手法是割裂的,直接指向其对象,并产生于社会的团体结构。

只有当集体行动的领导人拥有团体结构外的组织或制度资源(如教堂)时,或当集体行动与宗教战争或王朝矛盾(如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机遇相一致时,它们才会像特·布雷克所研究的那样(te Brake 1998),成为更广泛的对抗的一部分,继而引起民族的甚至国际的冲突。它们大多突然爆发,像星星点点迅速燃尽或熄灭的火花。大多数情况下,就像蒂利最近提出的那样,“那时的集体对抗一再包含的是当地人和当地问题,而不是全国范围组织起来的计划和政党”(1995a:19)。

直到18世纪晚期,在充斥历史的四种最普遍的大众反叛类型中,乡土观念、直接行动和排他主义始终结合在一起。在由粮食、信仰、土地和人员死亡而引起的冲突中,普通民众都采用直接的、地方性的、根据他们的要求产生的集体行动惯例,试着去纠正时弊或报复对手。

需求粮食

定期的粮食骚动和抢谷风潮大概是历史上最常见的斗争源泉,它们都与饥荒和粮价上涨一同发生。饥荒虽然是自然因素的结果,却总带来物价上涨、囤积居奇和投机买卖之风,使抗议者有了令他们愤恨并要与之拼命的具体对象:一般是商人和中间人,犹太人和新教徒,很少是贵族和王孙。所以,给全体大众提供稳定的、负担得起的谷物来源,就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

问题。^⑩

几个世纪以来,即使在国内外市场正取代地方谷物销售的时候,因饥荒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形式仍然是单一的和直接的,并依赖于传统的默契。E. P. 汤普森写道:“穷人的记录表明……正是某个磨坊主、某个商人和那些囤积居奇的农场主,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和骚动。”(1971:98)甚至在 1789 年革命期间,抢粮斗争形式也没有多少变化,虽然它们有时也被出于更大目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所利用。

最古老的粮食骚动形式是蒂利所说的“惩罚行动,即一群人对一个被指控扣留粮食或囤积居奇的人进行人身和财产攻击”(1975a:386)。第二种变体形式是阻止粮食从当地运出去,它“实现了这样一个信念:在剩余的粮食运出本镇之前,必须按适当的价格先使当地人得到供给”(p. 387)。第三种形式是价格骚动,在城镇地区较为典型,并随着 18 世纪城市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普及。

抢谷风潮是跟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惯例之后的,这个惯例被汤普森形象地描述为“通过暴动集体磋商”(1971)。抢谷风潮并不像历史学家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主要源于纯粹的饥饿和愤怒(Beloff 1963),而是源于人们“相信有人在非法剥夺他们根据其道德和政治权利应该获得的粮食”(Thompson 1966:389)。这种斗争虽然也是有组织的,却很少具有形成持续运动所需要的那种共同目标或团结。它们的局限性反映了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关系。蒂利写道:“粮食骚动因为规模小、没有领导者和仅靠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来实施,极少会统一成较大的叛乱。”(1975a:443)更广泛的社会运动要等到 1789 年才会出现,那时“对地方上的掌权者和商人的无能和/或罪恶的普遍抱怨已呈现出政治的色彩”(Tilly 1975a:448)。

伸张信仰

近代欧洲早期的男男女女并不仅仅因为需要粮食而发出抗议。在大多著名时期里,宗教信仰和宗教矛盾才是引起最激烈的斗争事件的原因。在基督诞生一千年之后的若干世纪里,天主教会内部不断形成反天主教的异端派。其中一些靠单个领导者的感召力而兴起的地方性宗派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另一些则像宣讲不同的三位一体理论的卡特里派,曾风行一时,一度 34 控制法国南部地区,直到宗教战争将其彻底根除;后来的宗教团体,如反叛法王亨利第四及路易十三的“克洛堪”*,还有反叛法王路易十四的“卡米扎尔”**,终于开始发动类似社会运动的斗争(Berce 1990;Tilly 1986:174—178)。

由于现存的教会组织形式为异端宗派的反叛提供了攻击的目标和借鉴模式,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发起的集体行动,常常野蛮地戏仿其对手的做法。在攻击天主教徒时,法国新教徒就故意模仿天主教的仪式,而天主教徒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击。^①这类宗教冲突无疑比现代阶级冲突更为猛烈和残酷,幸亏流血事件缓解了仇恨,可恶的图谋遭到了镇压,所以没有产生持久的新斗争手法。^②宗教叛乱只有在宗教激情与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企图或地方政府间的矛盾结合在一起时,才可能获得发动现代社会运动的工具。

* 译注:“克洛堪”(Croquants)意思是“鼠类”,是农民对税吏和贵族的蔑称。1593—1596年,法国西南部各省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者以“打鼠”为口号,攻打贵族的庄园,严惩税吏和包税商,所以历史上称这次起义为“克洛堪”起义。1636—1637年,克洛堪起义再次在法国西部和南部兴起。

** 译注:“卡米扎尔”(Camisards)意即“短衫党”,1701—1704年法国爆发的卡米扎尔起义是胡格诺教徒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

随着新教圣徒的出现,现代宗教运动诞生了。这个新教圣徒实际是第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因为迈克尔·沃尔泽已经证明(Walzer 1971:ch. 1),他是现代运动斗士的先驱,他不仅对他的事业深信不疑,还把转变灵魂的任务变成了一种职业。最初的“通信会社”是通过信使、密码和仪式联系在一起 的宗教团体。而直到那时,宗教运动仍包括对犹太人、新教徒、天主教徒和异教徒的人身攻击以及卡米扎尔零星的地方性反抗。

要求土地

农民起义在现代历史早期几乎与粮食骚动和宗教冲突一样普遍。传统农民依靠他们对土地、水或草料的习惯权利生存,他们最容易在这些权利被剥夺或被滥用时造反。他们通常以指控地主破坏古老习俗和篡改合约的农民集体的名义,声明自己的权利。甚至现代的“土地斗争”还经常回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侵占事实。^⑬

争夺土地的反叛形式往往遵从着一种围绕无地或地少者的需要形成的仪式,即挥舞着干草叉和长柄镰刀或挂着十字架或圣母雕像的农民,将到镇上的广场集合,然后行进到被侵占的土地上,“占领”那片土地。这样的突发事件像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而没有公共的领导或组织。而一旦土地占领结束,当地群体很少有办法围绕更广泛的主题组织起来,并几乎从不和城镇贫民一起建立共同的事业。^⑭明显的例外,如由令人惊讶地现代的集会组织发动的 16 世纪晚期的克洛堪运动(Bercé 1990:ch. 2),并不是为了谋求土地,而是为了反对宗教战争留下的抢劫团伙(Bercé 1990:72—75)。因此,这样的起义烽火燃得快也熄得快。

围绕死亡进行动员

把死亡当作集体行动的起因可能有些令人惊讶。其实,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生者对死亡特别是惨死的反应,才是集体抗议的起因。死亡能触动人们强烈的情感因素,并使除悲伤和同情之外没有多少其他共同点的人走到一起。死亡为公众集会提供了合法的理由,它是官方不敢贸然冲进人群或取缔公众集会的极少数场合之一。

死亡总是和一种制度化的集体行动形式送葬联系在一起,它使人们因为葬礼和同情而聚会在一起。在禁止合法集会的高压体制下,送葬游行常常是开始抗议的惟一时机。如果一个朋友或亲戚的死亡被看作是一场暴行,葬礼就会变成混乱的场所。如果一个公众人物违反社会的道德法则,他会在一个模拟的葬礼中被象征性地杀死。

同样的逻辑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死亡很少是持续的社会运动的起因。因为死亡的时刻是短暂的,葬礼所提供的仪式性场合很快就结束了。只有在19世纪,在由其他目的造成的社会运动的背景下,葬礼才开始成为反权威的持续动员场合(Tamason 1980:15—31)。^⑮

在所有由于需求粮食、伸张信仰、要求土地和围绕死亡进行动员四个因素造成的集体行动中,斗争都是激烈的、直接的、短暂的、特别的和地方性的。除了在宗教冲突中跨地区的机构和共同的信仰促进了更广泛的联合与更大的合作,这些斗争形式中的行动参与者很少超越地方的或部门的利益,或很少持续地反对权威或精英。

18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并不是因为缺少组织才没有能形成社会运动。实际上,像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所表明的

那样,一旦他们被唤醒,或有了机会,他们是完全可以有力地组织起来的。粮食骚动者或送葬游行者也不是“非政治的”:前者造反并不仅仅因为饥荒,而是因为事实证明当权者忽略了他们的传统权利,后者则具有高度的政治机敏,能利用合法的仪式来表达他们的怨愤。

制约斗争向社会运动转变的主要因素在于:集体行动的形式和目标仅局限于人们眼前的要求、直接的目标及地方和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一切将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期间发生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巩固、道路和印刷信息的扩展以及私人协会的发展。

模式化手法

把集体行动形式置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布罗克定理,非常适用于他所研究的等级社会,却不能同样适用于18世纪新兴的欧洲和北美社会。新的斗争手法在欧洲和北美产生出来,它们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是自主的而不是依赖传统仪式或时机的,是模式化的而不是特殊的。新手法以几个重要的对抗惯例为核心,可以适应许多不同的情况,其各要素可以在集体行动战役中结合起来。一旦被采用和被了解,新手法可以扩散到其他参与者中,并用来为挑战者的联合服务,使那些互不相识的分散的人群有可能在对当权者的持续挑战中结合起来,形成现代社会运动。

当然,过去继承下来的形式,如闹剧、小夜曲、彩饰和袭击敌人住所等,并没有因新手法而出现而消失。随着新手法传播和别人如何运用新手法的信息的传播,人们的集体行动能力逐步增强,就连较古老的形式也被赋予更全面的意义,并和较新的形式结合起来,加以传播。来自18世纪大西洋两岸世界的三个

例子将说明新手法是如何开始被使用的。

美国：从烧毁肖像到联合抵制

北美殖民地居民把集体行动的旧手法从欧洲带到了新大陆。18世纪60年代早期，当 they 和母国的矛盾愈演愈烈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是传统的。1765年，当英国试图向他们强加一种更难以负担的新印花税时，波士顿人的本能反应是：把被选派分发印花税的人的肖像挂在后来所谓的自由之树上。“晚上，一大群人展示肖像，铲平一座被认为将成为印花税务署的小建筑，然后烧毁肖像，”历史学家保利娜·迈尔写道，“同时一支较小的分队又袭击了印花税务员的家。”(Maier 1972:54)

这种骚动采用了从母国继承过来的形式，很有感染力，迅速传遍殖民地。人们模拟审判印花税和印花税务员，为自由上演“葬礼”闹剧，并用使人强烈联想到传统英国人做法的惯例展示肖像(Maier 1972:54—55)。伴随这些行动的，常常是严重的骚乱。但到9月时，由于传来乔治·格林维尔(George Grenville)的内阁在伦敦倒台的消息，针对个人的暴力和印花税政策争议的浪潮很快平息下来(p.61)。

不过，同一时期也出现了更有组织和更普遍的非暴力活动形式——联合抵制。^⑩殖民地商人首先通过“禁止进口”协议反 37
对1764年的糖税法案，号召削减从英国进口奢侈品的数量，特别是在葬礼上穿戴的传统丧服和手套。“这些新的努力，”迈尔写道，“在1765年9月[印花税法案之争中]被系统化，此后，禁止进口协会又在其他商业中心成立。”(1972:74)联合抵制成为殖民地反叛居民的基本惯例，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每次当英国人要强加更严格的控制时，都会被采用。对美国人来说，“禁止进口可以有效替代国内的暴力行为”。迈尔注意到：“反抗可

以从大街上撤到家用纺车边。”(p. 75)一位《波士顿公报》记者问道,如果停止服丧能导致英国大臣下台,“只要全面而普遍地执行这个计划,我们有什么不能指望的呢?”(p. 75)

此后,禁止进口和联合抵制成为美国人反叛的模式化武器,被最引人注目地应用在有关波士顿港倾茶事件的争论中。^{①7}这种战略的有效性在英国这边也一样:1791年,英国反奴隶制协会为了废除奴隶贸易,也采用联合抵制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糖的做法,向议会施加压力(Drescher 1987:78—79)。这样,联合抵制已经从英帝国边缘对新税收的地方性反应,迁移到了英帝国的中心,同时其他斗争形式也同样在英国得到了发展。

英国:大规模的请愿活动^{①8}

请愿是个人向庇护者或议会寻求纠错的一种古老形式,因此,它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非常合法,几乎没有斗争性。而随着18世纪早期英国经济的发展,请愿甚至蔓延到宣称受货物税膨胀损害的行业(Brewer 1989:233)。到18世纪80年代初,向议会请愿仍然更多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公众行为,“联系着的是特别受损害的党派或受益人的要求”(Drescher 1987:76)。当首次反奴隶制大请愿在1788年流行起来时,一个牙买加糖业游说团代表的行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废奴主义者既没有被奴隶制伤害,也不会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获得个人利益;他们有什么权利为废除奴隶制请愿呢(Drescher 1987:76—77)?

从1770年到1792年的二十多年里,请愿活动从要求纠错以维护个人利益的手段,转变为以一般道德要求的名义来寻求公正的公众行为。早期的请愿活动只是由成群的请愿者发起的单独行动,而到18世纪90年代,请愿活动则定期在公众集会上发起,并在延展的运动中与联合抵制、报纸宣传和政治游说相

伴随。

虽然,威尔克斯*等人早先也曾出于政治目的而请愿,例如,他们在1780年戈登**暴乱发生之前,就发起过政治请愿。但是,促使请愿活动变成一个模式化手段的,却是在熙熙攘攘的曼彻斯特发起的反奴隶制请愿活动。曼彻斯特的产业工人首先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通过请愿要求撤消政府的税收计划,接着又在几年之后反对与爱尔兰的关税联盟的请愿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Drescher 1987:69)。这些请愿虽然只与贸易问题有关,却创立了专门一套技巧,从而为更广泛的政策问题或道义内容问题“打开了热情的闸门”(Drescher 1987:69)。曼彻斯特的商人虽然很自信,也很富有,但在议会中却没有代表,他们把从为自己的利益而请愿的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延伸到了全国性的道义行动中。

随着请愿次数和每次请愿中联合签名人数的急剧上升,废奴活动蓬勃兴起。更重要的是,曼彻斯特人还结合请愿活动,利用英国密集的地方报纸网络,在各主要报纸市场进行宣传,导致全国各地纷纷向议会请愿(Drescher 1987:70—72)。1792年,新的废奴活动使请愿次数翻了五倍,据德累谢尔说,“有史以来为一个问题或在一个阶段向议会发起的请愿从没有如此之多”(Drescher 1987:80)。

到18世纪90年代,大规模请愿活动已经广为传播。先是激进分子要求扩大选举权和反对政府因畏惧雅各宾主义而禁止言论自由(Goodwin 1979)的请愿;接着是鼓吹选举改革者的请

* 译注:John Wilkes, 1727—1797,英国政治改革家,因发表攻击乔治三世的文章和支持美国殖民地开拓者的权利而著名。

** 译注:George Gordon, 1751—1793,英国造反者,1780年他在伦敦煽动了反天主教暴乱,要求废除1778年的天主教徒解救法案。

愿。和废奴主义者一样,改革团体也利用地方报纸配合各地协会的努力,把联合签名请愿和政治游说相结合。到19世纪30年代,宪章运动者又把进行文明的大规模请愿与在公共场所集体示威相结合,在向议会提交“人民请愿”的同时,他们还在1848年4月发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⑩这样,请愿已不再是依附者向庇护者的请求,也不再是游说团为减免其成员的税赋而提出的请求,而变成了要求重大政策变革的集体行动的模式化形式。

法国:城市起义

斗争手法的创新并不局限于英美世界,尽管那里的人们比欧洲大陆上的人们更容易摆脱传统惯例。甚至在法国革命以前,城市起义的斗争手法就已在法国开始形成。虽然1789年7月14日,巴黎爆发了最激烈的城市起义,但有趣的是,城市起义的原型却起源于外省。^⑪

1788年6月,人们因为不满国王用新的国家朝臣系统取代三级会议的企图,同时又对当地工匠的穷困感到义愤,开始在格勒诺布尔的市场上产生骚动,结果导致“瓦片之战”(Day of the 39 Tiles)。这可能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世俗的城市起义,它预示了一年以后巴士底起义的发生。和在波士顿的情况一样,起初,格勒诺布尔人采用的行动形式也是常见的、直接的和暴力的,他们袭击市场上的建筑和官员,并把大量房顶上的瓦片像下雨一般投向派来镇压骚乱的部队。但是,不久他们就建立了城市领导阶层,在维济尔城堡非法集会,发表重要宣言,向国王施加压力,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⑫

在格勒诺布尔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类似于现代社会运动的某些先兆。在与精英和当权者的一系列斗争冲突中,人们采取

了各种集体行动的形式。在更广泛的权利之主张下,人们在维济尔城堡会议上形成了组织,提出了上层阶级谈判代表、中等阶级作家和职员、工匠、手套织工以及妇女的要求。用一些参与者的话来说,主要的要求是“恢复我们的地方官和基本公民权利,重建能单独使我们制定真正法律的条件”(Schama 1989:279)。

维济尔城堡会议上详细阐述的权利概念,远远超出了参与者的特别要求。它除了使社会行动者广泛联盟的要求获得尊严和统一,还确立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以“法律和人民”的名义擅自举行的会议,可以要求与政府达成一种超越议会特权或经济救助的契约关系(Egret 1977:177)。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时,联合抵制、大规模请愿活动、城市起义和其他一些现代集体行动形式已经出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是世界性的、模式化的,源于参与者自主的要求和对抗。它们既受到运动网络的推动,又有助于建立运动网络。这些运动网络在和当权者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往往根据普遍的要求发起和扩散斗争。正如我们从托克维尔在1848年观察到的设置街垒的情形中所看到的那样,在19世纪改变大众政治的社会运动中,模式化斗争手法、运动组织和广泛的集体行动框架汇合到了一起。

设置街垒的社会意义

为建立人民主权而发动的武装起义,是19世纪新的斗争手法最引人注目和令人敬畏的表现,它以设置街垒为标志,用街垒作为武装起义的主要工具(Traugott 1995)。最初出现在巴黎的街垒,是邻里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夜盗而拉的过街链条。1588年以后,当人们把大桶(法国大酒桶)里填满泥土或铺路石来取代

链条加强防御时,街垒这个名词本身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②

- 40 一开始,特劳戈特写道,街垒“是一个小规模社区成员合作的产物,常常被用来对付委派下来的权威代表”(Traugott 1990: 3)。到1830年革命时,街垒开始作为进攻性的战略要点,出现在巴黎的街道上,主要以地方为基础吸纳朋友和邻居。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当二月起义发生时,街垒又吸引了巴黎附近的“国际主义者”(Traugott 1990:8—9)。到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街垒虽然很容易被远程大炮击毁,却仍然具有团结一致的象征性作用(Gould 1995:164)。^③

与游行示威和罢工一样,街垒也有其内部和外部的逻辑。当防御者和敌军开战时,他们会作为同志互相了解,形成战斗者、建设者和补给者的分工,建立起同志关系网,使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团结起来。特劳戈特写道:

从街垒上,在反抗法国波旁王朝和奥尔良派君主专制的斗争中,造就了整整一代革命者。这些人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斗争中成熟,又目睹自己的政治抱负被一场引来路易·拿破仑统治的政变粉碎。(1990:3)

法国并不比它的邻国领先多少,由于1848年春起义烽火传遍欧洲,街垒就作为革命活动最典型的模式化形式而出现。从1847年2月到1849年上半年,马德里、里斯本、墨西哥、米兰、柏林、维也纳等相隔甚远的地方都出现了街垒(Godechot 1971; Soule and Tarrow 1991)。人们设置街垒的目的,在维也纳是要求制度改革,在西西里是要求独立于那不勒斯,在米兰和威尼斯是要求结束奥地利的统治,在波河流域的小城镇是要求与皮埃蒙特统一。总之,街垒在1848年革命中的传播,比一个人乘车

从巴黎到米兰还快。正如急于参加祖国革命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在回国后给皮亚韦写信所说：“你猜，当我听到米兰革命的消息时，我是否还想待在巴黎？我尽可能迅速地离开了巴黎，可当我回到意大利时，却只赶上看到那些令人称奇的街垒！”^④

小变化和历史性转变

本章所描述的这类事件是产生新政治文化的熔炉（Swell 1990, 1996），许多后来的斗争手法上的变化，都是在占领巴士底或巴黎二月起义这样重大的事件中首次出现的，而它们的基础却形成于日常斗争实践中：例如，大规模请愿产生于英国平凡的商业实践，街垒开始只是巴黎邻里防盗的手段，城市起义在成为巴士底革命工具以前，最初只在格勒诺布尔被用于要求工作。从大众政治斗争手法的角度来看，重大事件常常是不明显地产生于政治体中的结构变化的顶峰。^⑤ 41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从传统斗争手法到新斗争手法的变化。旧手法一直是地方性的、直接的和以社团为基础的，新手法则是全国性的、灵活的和以特别为斗争而建立的协会的自主形式为基础的。前者中的谷物抢夺、宗教冲突、土地战争和送葬游行等形式，不仅彼此割裂，而且也与精英政治割裂。而有了后者，工人、农民、工匠、职员、作家、律师和贵族就有可能在同一面旗帜下前进，对抗同样的敌人。这些变化使即将到来的民族社会运动成为可能。

这种新发现的运动中的力量，对现代政治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如果挑战者能在短期内推翻权威施加在他们头上的压迫，那么在较长时期内，新手法将能增加普通民众挑战统治者的力量优势，迫使统治者创造比骑兵冲锋或炮击更高明的社

会控制手段。这些年来,部分新手法成了制度政治的组成要素,罢工成了集体磋商的制度;游行被纳入既使其受到控制,又使其与犯罪活动相区别的法律主体中;静坐示威和构筑据点得到远比一般过错更宽大的处理。

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为什么偏偏开始于它们实际发生的那一刻呢?可以断定,全国性大事件在提供集体行动和未来集体意识的模式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但这样的事件都是暂时的,通常只局限于个别的国家;到19世纪初,新的斗争手法正越来越举世皆知,并得到广泛实践。虽然特定的事件在我们所确认的变化上留下了烙印,我们还是必须透过事件的表象,找到

42 大众政治中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

三 出版和结社

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在 18 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运动开始大量出现。社会运动的内容与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其中主要的变化是:商业出版媒体和社团及社会化活动新模式的发展。虽然这些变化本身并没有造成新的怨愤和矛盾,却使提出诉求的方法得到传播,而这些方法又促使普通民众把自己看作较大群体的一部分,并和比自己强的人平等。

虽然 15 世纪已出现书籍的印刷出版,但在很长时期里,书籍都用拉丁文撰写,主要论述宗教问题,普通民众是读不到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书籍在传播信息方面不重要——毕竟最早的政治宣传册就是关于新教改革的宗教书籍。民众能读到的出版物只有在文化普及和印刷品价格下降之后才出现,而它们一旦出现,就使大众化报纸、油印歌本和小册子,在同样的纸页上,不仅传播统治者和贵族的形象,还传播资本家、平民、技工、商人、城市居民和乡村名人的形象。

于是,避开了等级社会严格的团体界限的新社团形式,首先在教会和商业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后来又在阅读俱乐部、改革群体和抱有道德目标的废奴社团中得到采用。人们和敌手之间的

潜在矛盾被逐渐转移到宣传册大战、粗俗歌曲、污秽讽刺漫画和出版物上。如果出版物可以不雅地描绘法国王后的身体^①，如果贵族和平民可以在相同的咖啡店和读书俱乐部中会面，那么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和各阶级成员联合起来发动集体行动的日子还会远吗？

- 43 在欧洲过去的历史上，社团的团结一致和面对面的交流，常常孕育出斗争事件；而宗教矛盾也会造成战争和革命，为农民起义和抗税斗争提供机遇。但是，从18世纪起，新的社团形式、把中心和边缘联系在一起的定期交流、出版和文化的普及又带来世俗的变化。出版和结社相结合，使广泛分布于各个城镇和地区的人们，终于有可能了解彼此的行动，在社会运动中，可以跨越巨大的社会和地理障碍联合起来。

印刷革命^②

在欧美，文化的普及是大众政治兴起的重要决定因素。^③没有阅读能力的潜在造反者，除了能获得一些口头传递的消息外，很难了解其他有同样主张者的行动。^④但约翰·马尔科夫发现，在与法国革命伴生的斗争形式中，只有抗税斗争是乡下文化人特别典型的斗争形式(Markoff 1997:383)。随着报纸和小册子的阅读者扩散到先前很少有人阅读的社会部门，对于社会运动的传播，有读写能力本身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书籍拥有量的增加重要(Chartier 1991:69)。

人们对读物需求的增加，既是商业印刷生产和传播的变化的结果之一，也是其发展的原因之一(Chartier 1991:70—76; Darnton 1989)。一个会在教区登记簿上签名的农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自信去声明自己的权利，而一个投资购买昂贵印刷设备的人，则一定有为更多读者提供新闻的商业动机，并最终在富

人圈外找到其读者。结果在商业出版物的读者中,渐渐形成看不见的对话群体。^⑤在海牙、洛桑和费城等地,专门印刷书籍、报刊、小册子和漫画的人,发现在出版业大有作为,有利可图。

到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开发新出版市场的动力,它使追求利润的印刷商和手抄书经销商区分开来”,而且“倾向于反对精英主义,支持民主和非正统思想”。^⑥1760年后,法国书商开始开办阅览室,“使读者能花较少的钱广泛阅读,还能稳当地读到禁书”(Chartier 1991:70)。如果说阅读促进了商业,那么反之亦然:在美国,戈登·伍德注意到,“人们学习读写的最强烈动机是想做生意,这甚至超过了理解《圣经》的需要”(Wood 1991:313)。

在印刷业中,把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是法国境外开办的法文报刊。一方面,这些针对法国市场的秘密 44 出版物给法国周边小国增加了财源;另一方面,它们又使印刷商和出版商可以自由地制造颠覆性极强而不可能在法国本土发表的书籍。主办人的“中立”与资本主义一样具有颠覆性。为了牟利,他们对宗教信条或王朝利益的要求漠不关心(Eisenstein 1986:196)。^⑦

在新出现的出版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托马斯·潘恩——一位不成功的英国税吏。1774年,他带着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他写给费城著名印刷商罗伯特·艾肯的推荐信,在费城下了船。虽然他的思想不是特别新颖,甚至算不上激进^⑧,但他却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因为他在两次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还因为他具有非凡的出版才能。^⑨

潘恩到达的是一个差不多被印刷纸覆盖的国家。^⑩除了近四十家报纸,那里还有大幅印刷品、演讲稿和布道词节选,最重要的还有小册子。正是通过小册子的形式,印刷的民主含意才

真正显现出来。“因为小册子极其灵活、易于制作且便宜,在美洲殖民地有印刷机、知识分子理想和政治兴趣的地方,都会印小册子。”(Bailyn 1967:4)当潘恩到达殖民地时,小册子大战已经成为常见的政治风景之一。^①

印刷物读者群

大众出版市场的扩张,引起一个资本主义竞争过程。编辑和出版者为给自己的报刊争取新读者,制造了无形的印刷物读者群。“通过给编辑写信和其他办法,”埃森斯坦写道,“期刊出版社开创了一种新式的公众讨论会”,以帮助人们形成诸如法国革命前夕的公众舆论那样的东西(Eisenstein 1986:196—197)。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只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例,它把出版者和读者、知识分子和世俗群众、首都和外省的人联系到了一起。英国的《文坛现状》和皮尔·拜尔的《新文坛》这类杂志,“把通信联络线伸向彼此分隔的订户,并向读者传递一种进步运动的新意识”(Eisenstein 1986:196)。

于是,围绕书籍和印刷品的阅读和交换,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在法国,像贝桑松这样的外省城市也建立起图书馆和读书俱乐部,甚至连圣阿穆尔这样的小镇的居民都请求官方许可:“租一间房间让他们会面,阅读公报和报纸,尽情享受掷骰子的游戏。”而在保守的弗朗什孔泰,牧师则积极筹划分发宗教出版物,反对世俗化(Vernus 1989:127)。

如果说书籍是第一批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的话,那么报纸则是书籍最具颠覆性的扩充——就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写的那样,是“在巨大范围内销售的一本书……一种畅销品”(Anderson 1991:34—35)。如果一个人可以和其他成千上万不相识的人一起,在同一天读到关于同一重大事件的同一条新闻,那么他和他

们就成为同一个无形读者群的一部分；如果报纸上描述国王和精英举止的语言，与谈论读报纸的商人和贸易者的行为的语言一样，那就意味着统治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报纸不是从上而下强制散发的，而是水平流通的；“在那些政府命令发布者不得不拼命与之竞争的主编、漫画家、新闻代理人、专栏作家……讽刺家、演说家和广告人的喧嚣中”，安德森后来在另一处写道，报纸“表达了多种声音”（1991:31,34—35）。

报纸最初创建于首都，后来传播到各地，为人们报道大都市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英格兰，唐纳德·雷德写道：“地方报纸能帮助伦敦城外的人了解议会和伦敦的政治，它们的版面上登载的主要不是地方新闻，而是从伦敦报纸上，特别是从反对派的活跃期刊上抄来的新闻和评论。”（Read 1964:19）这样，到18世纪60年代，地方读者都很好地受到了反对派政治的教导。这一点也有助于说明民众在18世纪70年代支持威尔克斯的原因，以及他们十年后对废奴运动迅速作出反应的原因。

地方报纸一般很难与首都报纸竞争，即使在革命时期也是如此。“从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起，”1790年《诺曼底日报》上写道，“我们就希望每天能出一期自己的报纸，但我们发现自己不可能和首都报纸持续竞争下去。”（Marseille and Margairez 1989:10）地方报纸与首都报纸的竞争结果是，地方报纸不再简单地复制首都传来的消息，而成为报告地方新闻和表达地方对首都形势看法的工具。

其实，革命事件为新报刊的创建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法国的三级会议运动就导致出版高潮兴起。据国家图书馆目录记载，1789年仅巴黎就出版了184家期刊，1790年又扩大到335家（Popkin 1989:150）。1848年欧洲革命也在国际范围内发生同样的影响，不仅促使巴黎产生200家新报刊，还在德国掀起报

刊出版高潮,许多报纸甚至发行到美国那么远的地方。在意大利,仅佛罗伦萨登记注册的期刊就有 100 家。^⑫

报纸传播了运动的思想,运动则扩大了出版的市场,因为人们总试图参与其他地方正发生的事,哪怕只是通过想像产生共鸣而已。报纸常在它的大标题上宣布自己是运动的代言人。20 世纪初,爪哇创办了一本叫做《运动中的世界》的杂志,随后就出现了《运动中的伊斯兰》、《运动中的工人》和《运动中的人民》等报刊(Anderson 1990:32)。通过出版,在墨西拿、华沙、圣彼得堡和北京等相隔万里之地,人们不仅可以想像自己是意大利人、波兰人、俄国人及北京人,还可以想像自己是雅各宾派、无套裤汉、激进分子、共产党人,并把他们的当地对手想像成封建主、食利者、贵族和资本家。

与其说大众报刊使造反变得崇高,不如说大众报刊使造反变得普遍。1773 年,如果费城人在纽约报纸上读到北方正在酝酿叛乱的消息,那么叛乱很可能就在这个基督教教友派殖民地发生(Ryerson 1978:43—44);如果诺福克市民读到上千名曼彻斯特人为反对奴隶制而联名请愿的消息,那么在诺福克让奴隶贩子不受指责就成为无法忍受的事(Drescher 1982);如果有人从本国报纸上得知他国人民的起义推翻了统治者,那么推翻统治者在任何地方都会成为可能。就像安德森写到法国革命时所说的那样:“它一旦发生,就进入了报纸堆积的记忆中……这种经历被上百万印刷词汇塑造成报上的一个‘概念’,并在恰当的时候,变成一种思想模式。”(Anderson 1991:80)

结社和运动网络

虽然人们总是聚集在宗教和世俗的群体中,但是直到 18 世纪晚期,社团组织和公众组织才在欧洲社会占主导。正如小威

廉·斯威尔针对法国而主张的,这些组织建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既定的公众特权,而不是要求获得新的权利和利益(Sewell 1980,1986)。因此,社团和公共联结非但没有使人们为了新兴的或暂时的利益团结起来,反而使人们由于强调社团认同和差别而分裂成孤立的群体。总之,这些社团关系因为局限于纯粹的市民、商业行会会员和教士中,没有能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即使人们真的为斗争目的而聚集在群体中,他们的关系仍然大多以地区和个人的接近程度为基础。虽然16和17世纪的宗教矛盾曾使欧洲出现上百个战斗群体,其中却没有几个成为持久的社团,而这远不止因为各教会反对独立社团。在法国,克洛堪运动虽然通过非常接近现代集会的方法,把群众组织了起来,却仍然局限于地方关系,其组织者从没有能构建一场更广泛的运动(Bercé 1990);在英格兰,现代烟火节的起源,声名狼藉的“黑火药阴谋”*,是由天主教亲友网络组织的,其中大多数人都住在英格兰中部相邻地区。^⑬由于他们与周围其他社团没有联系,所以竟会以为炸毁议会将引发反对新教政体的普遍起义。

18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社团,则可以帮助职业群体免受国家扩张的侵害,并促使立法对它们有利。在商业至上的英格兰,这样的一些群体就产生于特许权税膨胀的刺激下,如最早在1697年成立的皮革贸易协会,1717年成立的制革工人协会, 47 1760年成立的玻璃工协会和啤酒制造者协会。同时,“间接税的征收,”约翰·布鲁尔写道,“又促进了跨地方和地区界限的组织的出现。”(Brewer 1989:233)

* 译注:1605年,盖伊·福克斯等人计划在议会正式开幕时炸死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他们的计划泄露,盖伊·福克斯在11月5日被逮捕并被处死,而这一天却成了英国传统的烟火节。

到 18 世纪中叶,一种丰富多样的社团生活正在欧洲和北美形成。政府官员渐渐依靠它们获取信息,而它们反过来也与大臣和议会成员发展关系,以增加他们获得有利待遇的机会(Brewer 1989:232—234)。然而,社团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如此狭隘的范围内。

结社的模式化

英格兰远在欧洲大陆国家之前,拥有了从早期的商业和宗教模式中产生的新式社团。18 世纪 80 年代,反奴隶制的鼓动首先在非国教宗派中出现,后来又扩散到曼彻斯特的工业利益集团(Drescher 1987:61—63);约克郡协会则采用了商业游说团先前曾使用过的通信委员会形式(Read 1964);奥康内尔*的天主教协会吸收游说团的捐献策略,要求其成员每年为解放事业捐一便士;议会改革者也学习天主教的成功经验,用捐款资助政治联盟在议会中提出改革法案(Tilly 1982)。到 1832 年,有特殊目标的社团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形式化形式。

英格兰的美洲殖民地也领先于别的大城市,通过地方委员会网络发起了反印花税运动。随着 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加强,殖民地兴起大量新式委员会和社团,它们都不再仅局限于商人和贸易人士范围。例如,1772 年,费城机修工成立的“爱国者协会”,被伍德描述为宾夕法尼亚州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非宗教公众压力集团(1991:244)。有人随后效仿它,于 1773 年在纽约和马萨诸塞州成立了类似社团,并因此促成 1774 年大陆联盟的形成。^⑭待到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枪响时,由社团、信使和密探共同构成的全国联系网络终于在殖民地形成。^⑮

* 译注:O'Connell, 1775—1847,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

如同在英格兰,宗教作为社团发展的摇篮,在北美也是如此,甚至更加显著。独立战争以前,圣公会在美洲殖民地的力量十分微弱,教会在地方社区的世俗功能不强(Moore 1994)。后来,人们就把从祈祷会上学到的和为停止安息日工作而采取的社团常规和形式,应用于道德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第二次大觉醒”^{*}时期好战的福音派教会的组织形式,就反映了这一点。历史学家保罗·E. 约翰逊在考察新兴城市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的社会结构时,发现到 1830 年,它已拥有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宗教社团网(Johnson 1978)。

在罗彻斯特,有趣的并不是这座伊利运河上的新城镇有许多多的教堂,毕竟,教堂作为新英格兰社团的组织母体已存在了兩百年。不同寻常的是,为了世俗的目的,这里的人们竟跨越 48 宗派界限,轻而易举地组成有特殊目标的社团。^{①⑥}这种联盟将有助于 19 世纪末的道德改革运动。从福音派教会社团的严峻考验中,将产生出反共济会制度、严守安息日、禁酒、信仰复兴等运动和最革命的产物——废奴主义运动。^{①⑦}妇女作为美国大众运动新的参与者,最初也在教会群体中组织起来,后来转向了禁酒、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运动(Cott 1977)。

运动网络

事实上,集体行动潜在的核心与其说是正式的社团组织,不如说是存在于它们中心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它们之间的非正式联系结构。这一点在法国比在美国更确切,因为源于法国革命

* 译注:18 世纪末叶,美国教会陷入低潮,无数圣徒为此迫切祷告。从 1792 年起,神在新英格兰区开始了属灵复兴,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到了 1800 年复兴之火遍及全国,不仅改变了此后数十年美国教会的情形,也在校园中点燃了学生献身的热忱。

的勒沙普利耶法典,从立法上限制了国内组织的联合。根据旧的政治制度,规范贸易和限制执业的商会和公司始终是合法团体,而工人的合作社和手工业行会则是非法团体。后来,革命对商会进行了清理,但工人的联合仍然被视为非法,只有在19世纪30年代,工人的联合才暂时获得合法形式,而1834年后又再次遭受镇压。这使工人最后不得不通过秘密网络组织起来,直到1848年(Swell 1986)。^⑬

在瓦尔这类农业地区,情况就是如此。和英国的咖啡屋一样,19世纪40年代中叶发展起来的廉价工人宿舍,也是男人和朋友可以聚在一起喝酒的地方。在那里,既不用担心有外人会偷听,也不用缴纳酒税。法国工人模仿上层男子社交圈形成的类似社团的若干非正式小群体,虽然从来算不上正式的结社系统,却有很多共同点,足以使它们在机会到来时成为集体行动的核心。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可以阅读共和党的报纸,形成团结的意识,并从偶尔来拜访的旅行者那里获得一些信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官方原本并不禁止宿舍聚会,后来终于开始担心宿舍聚会可能成为造反集体行动的潜在策源地。“对普罗旺斯的下等人来说,”莫里斯·奥古隆总结道,“使自己成为宿舍的一员,就如同学习阅读、获得新知、改变自我和争取独立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Agulhon 1982:150)

诸如同宿舍伙伴这样的社交人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非正式关系网络在传播集体行动新模式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颠覆性作用。英格兰的潘恩分子、激进分子和改革分子;美洲殖民地的辉格党人和爱国者;法国的自由党人、共和党人和山岳派成员;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和互济会会员:他们都曾以合法身份利用过由商业、宗教和改革群体所发展出来的结社手段,而在遭到遣散或镇压时,又重新退回到非正式关系网中。

非正式关系网与正式的社团相比,不太容易被警察渗透,不太容易引起分裂。这在政府对结社越来越警惕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它们可以在朋友和家族关系网内存在和发展,在遭到镇压时“隐匿”起来,而在非常时期或有机会时,又重新活跃起来。^⑩总之,它们很难被镇压或控制,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私宅或小餐馆后面与他的朋友喝酒,谁能指责他呢?

印刷物读者群和结社

如果说出版和结社是社会运动发展中互为补充的两条途径,那么它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像埃森斯坦所注意到的那样,19世纪晚期的读书俱乐部和通信会社并没有非常固定的成员,而非正式的聚会,就根本谈不上有固定的成员。不过,《百科全书》和其他类似期刊的读者,都感到彼此有一种共同的身份。^⑪其实,通过订阅同样的报刊,他们和虽不相识却有类似观点的人已经结合在一个无形的团体中。由于这个团体的规模只能凭想像,所以很容易被夸大,特别是报刊出版者完全有理由将它夸大。

到大革命时期,出版和结社的交织已很明显。“超过了我们通常所意识到的程度,”埃森斯坦写道,“法国1788—1789年的事件,取决于政府对出版言论控制的废除和结社的自由。”同时,政府为了召集三级会议,不得不使巴黎的俱乐部合法化,并从监狱里释放了许多书商和出版人,结果造成勒斐伏尔所说的“令当代人吃惊的小册子狂潮”^⑫,导致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而为的公众舆论活动随之而起。

在出版和结社结合方面,英国的历史既更加温和,也更加先进。到18世纪晚期,英国的改革社团越来越善于利用报纸发表他们的观点,就像从伦敦发给谢菲尔德通信会社的一个战略指

示所写的那样：

如果不列颠岛上的每个(改革)团体都发起一次请愿,那么我们最终就会发展起来。因为只要请愿能迫使上院成员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发表在不同报纸上的审议结果,就会极自然地唤醒民众对我们所认定的目标的关注。(Read 1964:45)

在美洲,出版和结社的结合尤为突出。例如,在印花税法案之争中,据保利娜·迈尔说,康涅狄格州的“自由之子”曾“指示各地方群体‘在《新伦敦公报》上公布他们的会议记录’”。因为波士顿、罗得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出版人都是“自由之子”的活跃分子,所以即使在1766年“自由之子”解散很久之后,“这些报纸和其他类似的报纸……仍然是公众讨论的论坛”(Maier 1972:90—91)。

通过社会联盟扩散

19世纪的精英都固执于社会阶级,最初是与法国革命有关,法国革命如果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根本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Furet 1981);后来又与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有关;最后则与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失败有关,据说这一失败是由美国工人移民中种族划分胜过阶级划分的事实导致的。在所有上述三种情况中,阶级都成为分析的重点,社会运动的结果随之而定。

卡尔·马克思第一个宣称19世纪社会运动以阶级为基础,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越来越社会化的生产方式,结果造成工人阶级的同质性,使工人为工作而竞争的倾向被抵消。当知识分子和工人共同努力时,他们就在“脱离”他们原来所属

的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标志(Tucker 1978:481)。如果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中那样,不同的阶级结成联盟的话,那只是发展的中期结果,历史将很快使之被淘汰(Tucker 1978:604—605)。

可是,造成这一章和上一章所述的社会运动的原因,实际上既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同质的工业社会,也不是此前的等级社会。像英国的废奴运动、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的大革命这样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出版、结社、报纸、小册子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所形成的松散联系,使一定程度的跨阶级和团体互相配合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而这被认为是具有“强联系”的社会阶级很少能做到的。

作为分析的基本元素,在解释社会运动时,社会阶级其实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概念,特别在社会迅速变化时期。想想早期的英国产业工人:他们并不容易同他们的工匠和技工先辈相区别。当他们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的大众运动中与工匠和技工结合时,他们的一致要么被当作偶然的,像黑夜中的航船,要么被看成是“衰落的”社会形态——工匠和技工——被吸收到他们“上升的”后继者队伍中。

以阶级为中心会导致在社会运动各种常常有分歧的部门中,以出版和结社为纽带的阶级之间的联盟的重要程度模糊不清。但是,正是通过运动组织内部的信息扩散和结盟,运动所提出的要求才得以协调,集体行动才可能在用阶级隐喻来宣传的 51 具有不同社会利益和认同的各社会群体中产生。直到今天,通过阶级和联盟来传播斗争仍然是社会运动中的一个主要方法(Meyer and Rochon 1997)。

弱联系和强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像“工人阶级”这种同质群体的强联系,对于发动社会运动不重要。在工厂或煤矿这类机构中,阶级是战斗的社会运动赖以产生的初步团结的基础。问题是,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时,阶级的同质性却是少见的,而且这种同质性可能有碍团结;运动要获得成功,需要的是相互依存的不同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强大的非正式联合组织(Marwell and Oliver 1993)。虽然阶级团结是发起罢工的一种工具,但在我们需要用来创造民族社会运动的与当权者的持续互动中,它却不太重要,甚至可能会起反作用。

结论

在彼此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人们中,初级联合和面对面的接触为社会运动创造了团结的氛围。而出版、结社和结盟运动则在更多的人中建立起联系结构,并使运动向新的人群扩散。它们就这样促使松散的、常常是暂时的社会联盟形成,并以此处理引起共鸣的或相似的问题,形成广阔的运动周期。

由于早期集体行动浪潮的范围比较狭窄,历史学家很容易指出其发源地和参与者。因此,地理学家安德鲁·查尔斯沃斯描绘了1548年至1900年间的英国骚乱,准确地确定了它们的社会参与者和爆发的地理位置(Charlesworth 1983)。这些冲突大多数涉及特殊的社会人群,他们居住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向当权者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要求。他们的地方或社团联系,使他们既有信心,也有交流手段,可以同时攻击他人,或以一连串快速袭击的方式发起进攻。但这种地方或社团联系的力量,也限制了他们向别的地方扩散斗争,或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结成联盟。

在18世纪的某个时候,我们开始看到集体行动提出了更多

的要求,发生在更广的地域,能坚持更长的时间。保利娜·迈尔在18世纪60年代美洲跨阶级和跨殖民地传播的抗税斗争中发现了这一点(1972:69,87);西摩·德累谢尔在英格兰的反奴隶制宣传鼓动中也察觉了这一点(Drescher 1987:69,87);特德·马格丹在法国1851年起义中的城乡互动和中下层阶级互动中,同样看到了这一点(Margadant 1979:chs. 7—8)。正是出版和结社,特别是这两者的结合,才使以广泛联盟为基础、针对上层精英和当权者提出要求的持续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从而造就了民族社会运动。

但民族运动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出版和结社所提供的“推动力”,它们还需要共同目标的牵引,需要使其主张有个可以聚焦的中心点。在与民族国家的扩张和巩固的联系中,在对民族国家的要求和动机所做的反应中,它们找到了这些动力。不过,尽管在法国革命前和拿破仑时期,民族国家的发展在法国达到了顶点,英国的海外帝国却显示出民族国家发展的局限。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社会运动如何在高潮和低谷中,围绕民族国家这个轴心发展起来。

四

国家创建和社会运动

民族国家今天是如此重要的一个舆论动员中心,以致我们常常忘记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西欧专制政权出现以前,几乎不存在真正的民族国家。“一方面,”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国家的形成与文明》中写道:

国王们被迫把他们部分领土上的权力授予他人,因为那时的军事、经济和交通情况使他们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代表中央权力的诸侯根本不受履行义务或效忠君主的誓言的制约,一旦他们和中央统治者的相对权力地位变得对他们有利,就会宣布他们统治的地区独立。(Elias 1994: 276—277)

在这种制度下,斗争连续不断,主要基于领土问题,并根据国王是暂时占优势还是正经受危机,变换它们的发展方向。

约从 15 世纪起,这种模式开始瓦解。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国王终于有力量雇请雇佣军,修建道路以部署军队,并雇用文职官员去收税、实施法规和压制地方贵族。在国王能大体确保

贵族和上升市民间力量平衡的地方,国王强化“王国机器”,结果就像在法国那样,形成专制君主制国家(Elias 1994:ch.2);在国王被迫与贵族最终还有自负的商人分享权力的地方,结果就像在英国或低地国家那样,形成立宪君主制或部分君主制国家;在国王根本没能获得领土主权的地方,结果就像在现代晚期以前的意大利或日耳曼语地区那样,形成一系列松散的联邦制国家。 54

在整个这一时期里,斗争政治从没有停止过,并且它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从骑士与部下之间或多或少连续不断的领土之争,转向了战争和相对和平的交替出现,还有关于土地、宗教、粮食和赋税的大众政治的爆发。15—17世纪,特别在战争和革命给普通民众带来政治机遇时,大众政治在普通民众、地方统治者和主张民族权利者三方之间得到发展。“在整个欧洲,”韦恩·特·布雷克写道:

在混合君主制国家中,通常由于反对君主的战争征税,或因16世纪那种君主对文化(如宗教)主权的野心,而在部分地区引起的革命性挑战,为其他地方的大众政治参与者创造了机遇。(te Brake 1997:12)

这些事件从民族政治的角度以及居于它们中心的叙事史来看,只是议会制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小插曲。但每个重大的政治变革事件,都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政治机遇,使他们不是联合地方统治者反对要求民族权利者,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反对地方寡头政治的王侯相连。他们的斗争通常以失败告终,却影响了最终出现的民族国家的类型。布雷克总结道:“普通民众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地介入最终的议会制民主国家的创建,恰是因为自现代纪元之初,他们就是政治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1997:14)

今天,普通民众仍然是政治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随着国家形式的演变,他们出现在斗争政治中的形式和持续性发生了变化,或集中于民选领导人,或集中于立宪议会,或两者兼而有之。而重大的变化都发生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的创建仅仅在19世纪才开始,而是说,从那个时期起,暗示着民族公民权和认同形式形成的民族国家开始巩固。^①

第一个将上述集体行动变化的含义理论化的,是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他在《美国的民主》与《旧政权和法国革命》等书中指出,国家创建方式的不同造成社会运动的机遇结构不同。中央集权国家(如法国)通过消灭中间团体和削弱地方自主权来扩展自身,这就阻碍了公共机构的政治参与,并意味着一旦发生对抗,情况必将异常激烈,甚至可能造成专制统治。

相比之下,在民间团体和地方自治政府力量较强而中央力量较弱的国家(如美国),政治参与是经常的和广泛的,这就使冲突分散,使民主繁荣。托克维尔暗示,国家创建为集体行动创造了普通民众可以利用的机遇结构。他的这个观点将为我们考察国家创建与民族社会运动兴起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合适的出发点。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托克维尔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在农民早已摆脱封建制的法国爆发,而不是在其他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爆发?(1955:x)他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在法国,国家的扩张使贵族和其他社团群体失去了积极作用,沦为社会寄生虫。由于社会取消了中间团体,政府和社会之间缺乏缓冲,法国人变成了“图谋狭隘的个人主义而不顾公共利益的利己主义者”

(p. xiii),从而产生了嫉妒的平等主义、零星的不受控制的动员以及最后的革命——“一种野蛮而可怕的自然力,一个舞着红色爪牙的新怪物。”(p. 3)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经过十几年的恐怖和混乱,结果形成了一个比旧政权更绝对的专制统治。^②这个专制统治成为旧政权的翻版,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它在激进的国家中留下了自己的传统,迫使矛盾上升为危险的周期性对抗。

托克维尔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如此着迷,以致忽视了公民权同时也在塑造之中(参见 Schama 1989),而且像法国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那样的中间团体,也在推动公民权的形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托克维尔之后的所有体制论者看来,中央集权剥夺了公民在其文明社会里的基础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把不满引向积极互动和限制贪欲社会中的争斗来说,却是必要的。^③没有这种力量,斗争——乃至民主——将直接造成破坏。

哪里才能找到这种力量呢?杰克逊时期的美国从国家和社会两方面,向托克维尔展示了一个强国家和弱社会的镜像,令他在自己的祖国感到失望。在美国,根本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来限制社团生活和繁荣的公民政治。可以肯定,美国从没有托克维尔曾为其在法国的消逝而感到遗憾的那种传统团体,但美国的教会、利益群体和地方立法机构却与其有着类似的作用,为美国人反对国家扩张提供了自助和缓冲(Tocqueville 1954: ch. 16)。由于美国的弱政府和社团的繁荣,美国的民主可以避免在无政府主义平等论和国家主义专制论的两极间左右摇摆,而不像法国那样深受其害。

如果托克维尔对失去中间团体的法国的描述,夸大了社会分化和国家力量,那么他对杰克逊时期的美国的生动描述,则低估了那里的国家创建和斗争之间的关系。其一,他对南北战争

前的美国所作的田园式描述,掩盖了社团和斗争政治之间的关系。其二,他简单地误以为没有政府是早期美国不同于欧洲的特点。^④

先说第二点,虽然 19 世纪的美国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却并不是没有政府。联邦党人为了他们的目的,建成了在一个在 18 世纪晚期行之有效的政府,实现了巩固财政、减轻债务、经营外交和扩张西部的任务(Bright 1984:121—122)。虽然托克维尔在他的旅行中发现的确实是一个弱政府,但那并不是美国人天生热爱自由的结果,而是扩张中的南北两大区域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实体之间政治对峙的结果(pp. 121,134)。弱政府是美国历史造就的特性,而不是美国人性格造就的特性。查尔斯·布赖特发现:“联邦政策最无用的时期,与政党动员最彻底的时期,以及选举胜利的希望最小的时期相一致。”(p. 136)

美国的斗争又怎么样呢?托克维尔从那个毁了他的家和他的阶级的红色“恐怖”透镜中,看到了斗争,却没有在美国发现这类事情,也没有看到什么社会运动。^⑤其实,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初的美国充满了斗争!18 世纪 70 年代对英国统治的破坏和民众军队的兴起、革命后的地方叛乱和镇压所需的军队、对 1812 年战争的普遍反对和支持、导致杰克逊当选总统的边疆动员、在大片新开辟的领土上燃烧的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激情——这些事件都贯穿在托克维尔认为他在穿越美国的旅行中所看到的多元体制中。

1832 年,美国社会运动的重心仍然在地方,这既与托克维尔的范式相符合,又与他在法国哀叹的民族起义形成对比。不过,像在其他联邦体系中一样,地方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社会运动活动(Wisler and Giugni 1996)。甚至在工业化以前,美国就曾有过一场生气勃勃的带有强烈潘恩式共和主义倾向的城市工

人运动(Bridges 1986; Tarrow 1998b; Wilentz 1984)。地方性和全国性运动早就和全国性争取权力的斗争一起,以一种粗糙的辩证法,不断培养集体行动的能力,为禁酒运动和废奴运动奠定基础,并间接地为世界上第一次女权运动奠定基础。以破坏国家政策制订为开端的地域冲突,最后也在美国历史上以最猛烈的斗争事件告终,而这一事件又将把美国政府变成一个现代利维坦(Bensel 1990)。因此,美国可能是权力分散的地方,却不是没有斗争的地方!

57

在政府集权、社团和集体行动方面,中央集权的法国和地方分权的美国存在着不同。但是,两国的国家创建都为正在出现的运动创造了机遇结构,而且普通民众的运动也有助于塑造每个国家的未来政府。就此而言,在两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民族国家的扩张和巩固推动了社会运动的产生,而普通民众的斗争又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在英、法、美三国的国家巩固阶段,国家创建是如何为斗争政治提供机会的。

国家创建和斗争

甚至在1789年革命以前,民族国家就已在比法国平静的地方,不断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以便在公民间及公民和统治者间建立联系。为此,扩张中的国家必须发动战争、修建道路、建立通信网络、扩充军队和制造武器。但这些改善要获得资金,政府再也不能仅依靠对农民的压榨,而必须依靠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则反过来又要求政府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供应粮食,使社团合法化,并让公民获得从军、缴税和启动工业车轮所必需的技能。

这些创建国家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支持动员,而完全相反。但它们提供了交流的手段,使舆论得到动员,还创造了一类精于公共事务的人,使并非总愿意交税的公民必须交纳财政税。此外,负责维护社会秩序政府必须规范各群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必须为社团创造一个合法体系,同时采取比军队或警察的棍棒更微妙的社会调控机制。通过这些努力,政府不仅渗透进社会,还形成一套标准的职责和特性,作为现代公民权的基础。在国家这个母体中,民众不仅可以对国家的扩张提出争议,还可以凭借国家力量,提出反对他人的要求。

我们可以在选举权的扩大和因此成为必要的公众集会合法化的过程中,发现最明显的事例。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不希望看到工人在辖区游行,或农民在乡村广场转来转去地示威;但即使在受到限制的选举活动中,随选举活动而出现的聚会和酒会,都为“不受欢迎的”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把保护伞,并使集体行动的斗争形式得到隐匿。即使没有选举,雷蒙德·格鲁写道,所有的国家“都鼓励更方便的全国通信和最低限度的普及教育,像出于不可抗拒的命令……一旦公民权成为由国家登记的关于出生或誓约的正式问题,即使具体的标准可以改动,它也始终保持不变”(Grew 1984:94)。

发动战争、征收赋税和供应食物这三项基本政策,是扩张中的国家为保证并扩大其权力而开展的活动的一部分。当它们作为对公民的压力和向外渗透的努力开始实施时,每项政策都造成新的通信渠道、更有组织的公民网络以及可使普通民众在其范围内提出要求和组织起来的统一的认知框架。在开明君主制的英国、专制的法国和殖民地美国这样相去甚远的国家中,这些政策也成为构建运动的领域,而运动,或对运动的恐惧,则塑造了民族国家。

英国的战争和运动

最不寻常的变化是由战争和殖民造成的,不仅因为战争和殖民需要税收,并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还因为它们使人们被有组织地动员起来,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战争动员事务原本很有限,若不是统治者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募集大规模的常备军,超出其贵族统率的领导能力,也超出雇佣兵可以满足的数目。实际上,军队的规模在18世纪成几何级数地增长^⑥,而把他们推上战场所需要的财政和后勤支持,也以同样的比例增长。军队从主要是多民族的雇佣军集合,变成了国民军队。^⑦全国动员的水平虽然远不及20世纪,却足以引起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混乱,有时甚至是革命(Skocpol 1979)。

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殖民和战争是英国政府最积极的活动,它们促进了政党制度和动员机遇的形成。虽然在北美战争早期,英国公众对政府的支持有所上升,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公众却由于失望、财政紧张和担心法国入侵而试图不断动员舆论反对政府。其最初的表现是,上层精英领导了集中于伦敦的运动。18世纪60年代,政府反对派由于缺少政治组织的新原则(Brewer 1976:ch. 5),后来就以经济改革为基础,鼓励对大臣进行广泛的连续攻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尔克斯提出了著名的请求,把战争和议会改革联系在一起:“北美殖民地战争,”他主张,“在这个真正至关重要的时期,是调整我们的代议制管理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Christie 1982:65)

尽管伦敦的政治是点燃这场运动的火花,大多数反对派却来自英国各地,如贸易受殖民地对英国货联合抵制及后来北美殖民地港口封锁严重打击的约克郡。在那里,牧师克里斯托夫·怀韦尔(Christopher Wyvill)领导约克郡协会,根据结合了经济

改革和议会改革要求的纲领,开始活动,试图建立全国性的郡联盟网络。^⑧后来,这个协会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在约克郡得到了59 9000 人的签名,并选举成立了一个通信委员会。

正如我们早就看到的那样,在1779年的英格兰,成立委员会进行请愿并不新奇。新奇的是,约克郡的委员会旨在为改革向政府长期施加压力(Read 1964:13)。此外,怀韦尔还打算“为促进他的政治计划加入约克郡机关”(Christie 1982:76)。他的联系人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威斯敏斯特郡和格洛斯特郡也效仿他,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难怪保守党政府谴责他们企图仿效“煽动叛变的”的北美大陆会议。

1780年6月的戈登暴动,终于导致政府对非议会所能控制的协会采取反动措施,使约克郡和其他运动的分支在战争后期逐渐消失(Read 1964:14—16)。后来,法国革命中出现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英国的制度又因此受到威胁,反动势力被进一步加强(Goodwin 1979)。而在雅各宾派和潘恩派鼓动者被镇压后,要求经济改革和议会改革的运动,以及孕育了改革运动的战争,在英格兰牢固地奠定了未来社会运动的模式。查尔斯·蒂利写道:“战争造就了国家,而国家又造就了战争。”(1975b:42)战争还为社会运动造就了空间和诱因。

法国的粮食供应

人们不仅可以在战争期间,也可以围绕更日常的民族国家活动,把集体的要求系统化。欧洲国家的一个传统职能是,控制粮食的供应和价格。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既要征税,又要保证人们的生活和公共秩序。过去,发生争斗的主要原因是市民试图控制他们的物资供应地。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国家的扩张和市场的国际化,民族国家开始负责保证粮食供应,如有差错,必

须承担责任。

实际上,粮食供应从没有完全脱离过公众的控制。例如,坚持在公共场合进行粮食交易和粮食称量,这既是确保税收的方法,也是确保粮食质量和价格的最低标准的方法(Kaplan 1984: 27—31)。社区、领地、教会和国家曾经全都参与粮食供给的控制,然而,“只有国家明确获得了长期干预粮食供应的更大权力”(Tilly 1975a:436),因为国家将最终受到饥荒和由此引发的民众斗争的威胁。

和许多别的方面一样,粮食供应和防止混乱之间的关系在法国君主统治下最为明显。根据一个18世纪行政官的记述,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是保证人民的生活,否则无论是法律还是武力都无法控制他们”。^⑨确实,保证人民生活已经被看作是家长制君主政体的主要责任。因为“有什么事比父亲喂饱自己的孩子更严肃呢?”(Kaplan 1984:24)。

虽然粮食之争常常发生,使人们感到自己的生存权受到威胁,这种情况却仅仅被归纳为“国家开始保证那些最依赖它们和/或正在威胁它们的人的基本生活”。这些人,最显然不过,包括军人、政府行政官员和首都市民(Tilly 1975a:393)。由于这三种人在18世纪迅速增多,所以生存危机和粮食叛乱在那个世纪此起彼伏并不是偶然的。最突出的是在1789年前后,由于重农主义思想的传播,出现了开放谷物价格的建议,这和盛行的保证城市(特别是巴黎的)基本生活这种家长制政策发生了抵触。

巴黎的粮食供应被看作是国家的一项特殊责任,不仅因为巴黎人口众多,还因为据信(结果也确实如此)巴黎人有足够的能力推翻政府。因此政府把确保供应巴黎的粮食数量及进入首都的谷物和面粉的质量作为自己的职责。^⑩在饥荒时期,最深刻的矛盾就产生于巴黎官方和为之提供谷物的地方社区之间,他

们都竞相拥有粮食。“为生存展开的社区间最激烈的斗争，”卡普兰写道，“是地方集镇与贪婪的首都之间的对抗。”(1984:39)

对抗包括武力对抗和法律对抗两种形式。在粮食短缺时期，一方面消费者会阻止粮食出口，并要求食品“合理定价”；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可能不准巴黎的供应商参与地方贸易，造成市场上长期不能及时供应，同时征用送往巴黎的货物，制订供应和储备的秘密方案(Kaplan 1984:39)，结果导致接二连三的起义，“以维护被强烈感觉到的大众的生存权”(p. 39)。

1789年革命，尽管是由更广泛的关于税收和议会权力的矛盾引发的，却也表明民族国家在粮食冲突中陷得有多深。巴士底狱被攻破的消息传出后，接着又发生了市镇起义，由于“两苏面包”^{*}的要求，起义在某些地方变得很激进(Lefebvre 1967: 125)。就连执政时怕被其左翼包围的雅各宾派，也发现限定食品的最高价格是最合宜的举措，并派革命军到各省搜索粮食。总之，从一系列地方性的短暂的供应冲突中，可以看出，粮食供应是革命蔓延的关键。它一直是1848年以前历次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的征税

所有现代国家政策的共同性质是，具有增加国家收入以支持国家的其他活动的的能力。结果财政问题，如加布里埃尔·阿丹特所述：

- 61 就会在诸如西欧农奴解放、东欧农民征服、独立战争(葡萄牙和美国)、革命、代议制政府的创立等社会巨变的初

* 译注：苏是18世纪时法国的一种硬币，币值很小。

期出现。(Ardant 1975:167)

现代国家的发展不断受到反抗越来越重的税务负担的挑战。法国人对盐税和意大利人对关税的憎恨,曾造成持续多年的叛乱。在法国,国王把收税的权力卖给租税“包收人”,这种措施既使人们更加怨愤,也使他们更容易攻击收税人。抗税叛乱此起彼伏,在边缘地区比在中心地区更普遍,但根本不局限于下层阶级,法国国王和外省议会间的关系史就表明了这一点。

但只有在18世纪晚期,抗税叛乱才具备发展成全国性运动的足够广泛的基础和良好的组织。当时,如果国家出现新的财政问题,那是因为它们的扩张野心需要一定程度税务普及的支持,而税务普及却与它们对教会和土地贵族的依附相矛盾。由于贵族在军事领域、教士在精神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为国家尽了力,所以他们很少或根本不交税。统治者若要耍弄平等税务负担的把戏,其前景必然是失去他的这个或那个主要联盟支持力量(Ardant 1975:213)。

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强国的区别在于,它从未试图进行税收体制的根本改革。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贸易的扩张(其中大部分是由英国人和英国船进行的贸易),使其能通过特许权税给政府带来大量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因为英国的权力中心是土地所有者占大部分议席的议会(Ardant 1975:207),它对议会精英的财富——土地的征税——依赖程度相对较轻^①,而对贸易的征税则较重,尤其是对与殖民地的贸易的征税。北美殖民地所谓的“反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一度使征税的压力达到了顶点,因为这场战争远比英国从前经历的任何一次战争更昂贵。英国议会选择让殖民地自己支付,而不是在英国提高税收,其理由是北美的战争是为殖民者的利益而发起的,费用应该由他们

自己支付(Ardant 1975:204)。

但这种财政政策是鲁莽的。因为美洲殖民者位于大洋的另一头,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和母国一样依靠混合税收。^⑫新的帝国财政政策不仅唐突,还难于实现,并威胁着在没有大批陆军的情况下作为帝国间接统治工具的殖民地政治体制的独立自主^⑬,因为英国人为了推行其新的财政政策,将不得不收回他们给殖民地的大量自治权。

议会的顽固有个根本的原因:殖民者拒绝资助据信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这其实不亚于挑战英国政府的扩张。达特默思勋爵(Lord Dartmouth)说,议会是“天生与国家最高权力紧密相连的机构”(Maier 1972:233),如果议会在殖民地问题上受到挑战,政府将在国内或爱尔兰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历史上第一场重大的殖民地革命,实际上是对国家创建作出的反应,它表明了国家创建的局限,并显示了塑造国家的运动的力量。

国家作为斗争对象和调解人

发动战争、供给城市和征收赋税一类活动,激发了新的更持久的集体行动事件。随着民族国家活动的扩张和向社会的渗透,斗争的对象从个体的地方行动者,转向全国的决策中心。民族国家不仅使集体行动的对象集中于中央,还不知不觉地为通过国家干预来反对非国家对手提供了支柱。

正如我们从查尔斯·蒂利近期对英国的研究中所获悉的那样,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期,主要斗争形式的对象是磨坊主、粮食经销商、地方乡绅、社团成员和不重要的国家执法人员,如关卡管理员和税务员。而从18世纪晚期开始,蒂利发现,除了1789年至1807年间的短暂变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集体挑战趋向,其对象不再是个体的和地方的,而转向以公众集会的形式

挑战议会。到 19 世纪 30 年代,议会已经成为英国东南部约 30% 的斗争性集会的抗议目标(Tilly 1995a:36)。

国家创建不仅使国家政府成为公民提出要求的对象,还导致对公民活动更广泛的认知和政治构造。税收、行政法令和户口调查类目的标准化,都促进了原本敌对或互不关心的群体间的联合。而把市民分成随意确定的群体,例如:某种税务的纳税人,某个城市、郡或行政区的居民,某个年代应征的士兵,这就造成新的社会认同,或者为更广泛的联合奠定了基础。^⑭

我们可以从征税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中,看到这种综合作用。由于税收从对不同阶层公民的不同税务的聚集,转为由中央办公机构收缴的简单的国民税,抗税叛乱将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地区联合起来。征兵也有类似的作用——特别当对征兵的抵制与意识形态上或宗教上的理由联系在一起时。法国革命后爆发的温迪暴动(Vendée Rebellion)就是一个例证,但它只是这一系列运动的开端,直到最近,这类运动才以由抵制征兵导致全民动员的反越战运动结束(Tilly 1964:ch. 13)。

这些变化的结果是:第一,斗争中出现的暴力事件急剧减少 63 (Tilly 1995a:35)。第二,在有组织的团体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斗争形式,它们比以前的斗争形式更完整。如英国的产业工人行动、美国的宗教运动和法国的共和主义运动。第三,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不得不考虑大众的意向,尽管要准备在对大众的意向失控时进行镇压。19 世纪国家发展最典型的两个领域是:选举权的扩大和职业警察的增长,两者都联系着对大众斗争的恐惧。

美国:投票和没有街垒

有关 19 世纪美国工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由于在美国产业工人阶级诞生前,美国的公民权革命已取得了胜利,结果美国工

人先于欧洲工人,早就在他们的社区获得了选举权。这不仅意味着工人的集体行动受到选举权的引导,还意味着未来工人的政治参与将会有地域导向。因为从最开始起,大部分工人阶级都是城市居民,所以工人的集体行动受到了城市政治的指导,在城市政治中,活跃的城市政治领导集团可以利用工人的选举权,为工人提供进入上层社会集团的途径。

这些制度上的因素导致美国工人阶级与大约在同一时期出现的西欧工人阶级不同(参看 Aminzade 1993)。1830年,虽然美国工人和他们的英国兄弟共享技工共和主义,以相似的方式认识到工业制度的来临,并使用着相同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语言(Bridges 1986:158),但是,美国工人在早已实行选举制的国家进行选举这一事实,“改变了新兴工人阶级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而斗争的舞台”(Bridges 1986:161)。正如艾米·布里奇斯总结的那样,“绝对的人数、对联盟的寻求、地理上的分散或集中以及选举的策略,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61)。

此后,以职业为基础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和在地区范围内寻求工人选票的城市政治领导集团,分摊了滋养美国工业机器的一波又一波移民融入(Katznelson 1981:45—72)。“阶级”作为一个组织的范畴,虽然远未在美国的工厂中消失,却必须在选举中,与通过选举政治和党派相结合的“地域”和“种族”,争夺工人的忠诚。革命解决造成的长期制度倾向,为后代工人参政创造(并塑造)了政治机遇。

镇压与公民权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结构中的长期变化都能为斗争创造机
64 遇,其实许多变化都是有意为压制斗争而设计的。因为一旦始

终在集体要求的基础上结合的思想被广泛传播,民族国家就会由于害怕造反而加强警察机关,并通过立法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这决不是偶然的。例如,自从失去控制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引发彼得卢大屠杀事件后,英国创建了职业警察部队。^⑮后来,当劳工争端上升,特别在19世纪末形成大规模工人罢工时,英国警察力量再次得到极大巩固。^⑯镇压实际上始终紧跟着大众政治的步伐。

在法国,令当权者不断谋划新秩序策略的原因,主要在于害怕叛乱,而不是害怕罢工。每次革命风波(1830,1848和1870—1871)后,当权者会再次企图禁止集体行动,又是限制结社,又是备战城市暴动。不过,两者表面上虽然很严厉,最后却在不可动摇的公民权和公民社会的压力下发生改变。

关于结社,虽然“法国的法律和行政实践都禁止在(资产阶级)社团中讨论政治”,历史学家卡罗尔·哈里森写道,但这并没有阻止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加入社团(Harrison 1996:45)。尽管政府确实有权调查那些被认为危险的社团,但新的或修正过的社团形式还会在每次政治机遇出现时冒出来,并凭借它们的灵活和表面上的单纯来规避当权者。^⑰

但是,在镇压城市起义方面,警察还是取得了胜利。1830年和1848年革命期间,曾出现街垒,那是因为当时城市起义者和当权者的技术力量相当。而到1848年6月,巴黎的街垒就再也无法抵抗军队决定性的火力攻势,大部分被摧毁(Gould 1995; Traugott 1995a)。到第二帝国统治时期,豪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对巴黎的改造,终于宣告了作为防御性斗争工具的街垒的末日。因为豪斯曼把巴黎老区纷乱拥挤的街巷,改成了今天的林荫大道,使大炮很容易摧毁未来出现的街垒。

不过,街垒的衰败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即促使工人阶级战

斗分子开发出新的斗争手段——主要是罢工和公众游行示威，它们对共和秩序的威胁很小，因此更难镇压。到19世纪晚期，法学和警务常规都导致这两个新的斗争形式制度化，最终甚至出现“纠察”，游行者基本同意自己进行控制(Bruneteaux 1996)。于是，典型的20世纪大众政治的手段，就从长期同样激烈的反抗和镇压之间的辩证法中产生了。

这个经验可被概括为：当运动学会利用全国通信手段和巩固的国家时，政府不得不接受他们所忌恨的集体行动形式，尽管他们早先曾拒绝承认其合法性。英国统治者曾谴责支持威尔克斯的请愿是颠覆行为，并把约克郡协会和北美大陆会议相提并论，最终却被迫确认大规模的请愿和结社的合法性。虽然在普法战争时期出现了反动，但到19世纪初，非官方社团在英格兰已非常普遍，以致旅店老板惯常把它们资金和文件锁在盒子里(Morris 1983:95—118)。及至19世纪30年代，提出集体目标的非官方组织已成为政治风景常见的部分(Tilly 1982)。

然而，我们并不能认为社会运动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即使是在开明的英国。因为一旦革命在欧洲大陆爆发，甚至像英国那样温和的改革运动，也会被惊恐的统治者疑作煽动叛乱。于是，书籍和宣传册被审查，激进组织被取缔，连温和的社团也失去了会员。“这种疑惑和由此而产生的不明智的政策结果，”马尔科姆·托米斯和彼得·霍尔特评论道，“常常是在先前从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地方造成革命。”他们总结道，政府“自身促成和加强了那种他们想要避免的危险”(Thomis and Holt 1977:2)。

到19世纪后半期，运动和它们的破坏潜力实际上导致民族国家扩大选举权，承认群众社团的合法性，赋予公民参政以新的形式。在真实的意义上，由于实际发生和担心发生的运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大致对立统一，公民权出现了。从独立战争后美

国的选举权改革,到英国 19 世纪 40 年代的工厂立法,再到德意志帝国关于失业和健康问题的改革,以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工厂巡察员制度的创立,国家改革不是为了直接响应社会运动,就是为了试图取代社会运动的发展。布赖特和哈丁指出:“斗争过程既界定了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制度相对的国家,又不断改造国家本身。”(Bright and Harding 1984:4)

结论

下面概括一下本章和前两章。斗争政治是人类社会的特点,只要有社会矛盾,就会有斗争政治。也就是说,斗争政治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产生之初。斗争活动通常直接地、局部地和狭隘地表达了普通民众的要求,它回应眼前的怨愤,袭击对手,但几乎从不在其他群体或政治显要中寻求盟友。结果产生一连串突发事件——很少有组织性而且通常是短暂的——它们之间间隔着消极时期。

在 19 世纪的某个时候,西欧和北美形成了一些新的更普遍的集体行动手法。这些新手法与直接向对手表达人们眼前怨愤的旧手法不同,是全国性的、自主的和模式化的:它可以被各种各样的社会参与者用于代表许多不同的要求,并作为他们之间的桥梁去加强他们的影响,反映出更广泛、更主动的要求。甚至如请愿这样继承下来的形式,也渐渐从个人向上级寻求怜悯或群体向当权者游说的手段,变成大规模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

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很难从主要由叛乱镇压者编撰的历史记录中找到。而如同我们在第三章所见,是出版和结社这两个重要资源促进了早期的运动。出版和结社都是资本主义的表现,却又都超出资本家的利益范畴,推动了社会运动的传播。商业出版不仅传播了信息,使潜在活动分子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和

共同的不满,还使他们感觉自己与精英的地位平等,因而对他们来说,采取行动反对精英不再不可想像。非官方的社团反映出团结力量的存在,它们促使新社团不断形成,并把地方群体与运动网络联系在一起。而运动网络则可以挑战民族国家或世界帝国。有时是有意构成,但更多是偶然和暂时形成的社会联盟,也凭借其总体纲领与反对精英和敌手的集体行动相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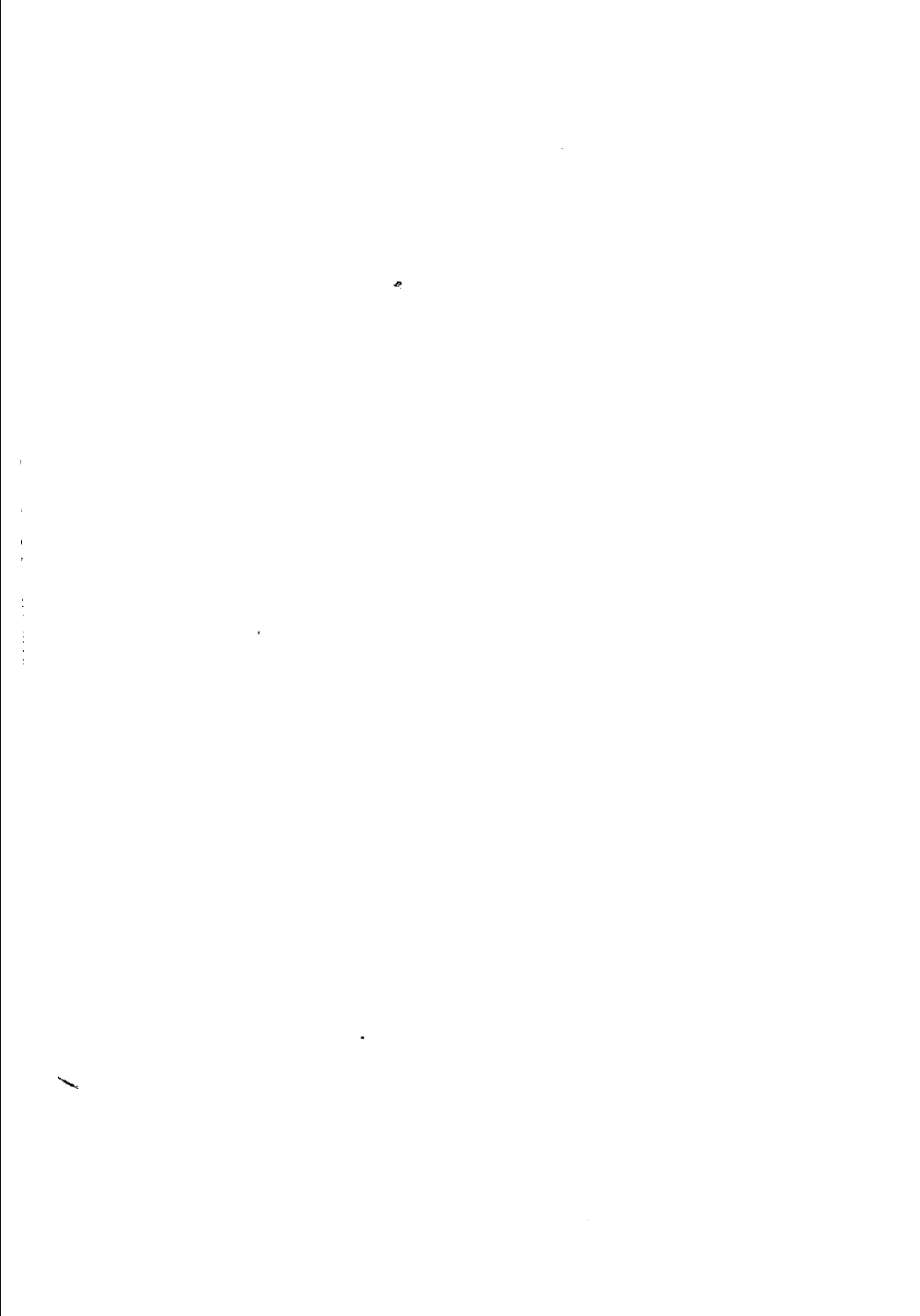
尽管新的运动通常针对的是社会中的某些群体,他们的行动框架却越来越多地是由民族国家为集体行动提供的机遇。通过发动战争、供应城市和征集赋税,以及修建道路和规范社团,国家成为被要求的对象和竞争群体解决争端的场所。即使在没有什么政治途径的地方,扩张中的国家的标准化和统一的雄心,也为资源较差的人模仿和改造精英的策略创造了机遇。

于是,我们看到了斗争政治的历史情况——这种斗争政治是在制度边缘构成的,从没有真正被制度上的精英所接受。然而,由于斗争政治和公民权形成之间的历史关系,它从没有能完全被镇压而不危及民主本身。这就意味着斗争政治围绕制度政治的轴心形成,随政治上的机遇和限制的变化规律而起伏,我们将

67 将在第五章中看到这一点。

第二部分

从斗争到社会运动



五 政治机遇和限制

普通民众何时会为了要求自己的权利而冒着生命危险涌上街头？自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这一直是观察家和惊恐的社会精英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早期的学者对暴徒的极端行为和工业化过程中的混乱无序感到非常愤慨，他们把斗争政治视为群众心理、社会反常和贫困的表现。但即使只对现代历史匆匆瞥上一眼，都不难发现：斗争政治的爆发不是来源于人们所遭受的贫穷或社会解体。因为这些先决条件比他们所支持的运动更长久。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真正的差别在于：人们所经历的机遇类型和水平、他们的自由行动受限制的程度及他们所感受到的对自身利益和价值的威胁的不同。

在本章中，我认为：与斗争紧密相联的更多的是集体行动的机遇，而不是人们所遇到的持久的社会或经济因素，而且斗争同样也受到集体行动的制约因素的限制。当人们有客观可行的办法不再服从命令并找到合适的机遇来实施这些办法时，斗争就会加剧。当人们面临无法承受的损失或正义感受到触动时，斗争也会加剧。一旦制度性的途径敞开，精英的意见分裂，盟友唾手可得，国家镇压力衰退，挑战者就有机会提出他们的要求。如果机遇和人们感到不采取行动将蒙受的高度损失相结合，那么

它就会引发斗争政治事件。

当然,必须把变化的机遇和更稳定的结构因素放在一起看,如国家及其常常采用的镇压方式的强弱等(Kriesi et al. 1995)。此外,客观机遇并不一定导致持续的社会运动。因为社会运动
71 过程需要挑战者用已知的斗争手法,动态地构造他们的运动宗旨,获得或创建统一的动员结构(见第六、七、八章)。而通过显示盟友和暴露敌手的弱点,机遇为运动的形成传递了重要信息。

不仅如此,通过交流他们的行动信息,运动一旦形成,就会为其支持者、其他人、政党和精英创造机遇。而要做到这一点,运动一般会扩散集体行动并展示联盟的可能,为类似的运动和反运动创造政治空间,为精英和响应运动的第三党制造动机。那些抓住政治机遇以回应政治开放的挑战者,就成为社会运动和斗争过程的催化剂,他们甚至有时催生出革命和民主进步。

相对于机遇来说,威胁也是合理的因素,如果消极无为的后果不可怕的话,那么很少会有挑战者甘冒生命和肢体损伤的危险去积极行动。威胁既容易造成阴郁的不满,也容易造成集体行动;只有当威胁伴随着可察觉的行动机遇,并被视为可能不可逆转(如果不是停止的话)时,挑战者才会冒险,尽管其结果常常是英勇的失败(Golden 1997)。^①

为什么机遇很重要?

在当代社会运动的理论化过程中,政治机遇和许多其他概念一样,可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的重大动荡。实际上,西欧和美国都有许多人对现代社会的变化如何扩大斗争动机很感兴趣。在西欧,根据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提出的主要范式,强调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所造成的创造新“生活空间”的强烈欲望;在美国,有人则认为,在那些富裕得能考虑物

质以外利益的人中,引发新社会运动的原因在于:美国增长了财富和它所滋养的“后物质”倾向(Habermas 1981; Inglehart 1977, 1990)。

法兰克福学派采用了一种社会运动的文化视角,而“后物质主义”鼓吹者则利用了经常被描述为“合理选择”的个人主义范式。两种观点都有助于理解动员的问题,但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在某个历史时期支持运动,为什么一些普遍繁荣且文化相对均衡的西方国家会在20世纪60年代比其他国家经历更持久的斗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潜在的社会结构和动员潜能是如何转化为行动的。^②在这样一个转化过程中,政治机遇和限制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20世纪30年代不同西方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不同动员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人在繁荣时期比在萧条时期更容易进行罢工。^③工人的斗争逻辑很清楚:繁荣时期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导致紧缺的劳动力市场岗位竞争减弱。工人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便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或改善工作条件。结果,当失业人员储备减少、雇主深为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而苦恼时,罢工的频率就随着商业周期的曲线上升;而当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时,罢工的频率则随着商业周期的曲线下降。^④

然而,20世纪30年代萧条时期,在欧洲和美国却兴起了许多社会运动。我们本来指望经济危机和普遍失业能抑制斗争,可在一些西方国家里,产业工人对被解雇和被削减工资的反应却是罢工、游行和占领工厂,而不像另一些国家的产业工人那样懦弱无为或甘于受压制。例如,英国工人在大萧条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尽折磨,德国工人遭到纳粹的无情镇压,而美国和法国工人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斗争以应对危机。

那么,我们怎样解释高压之下的法国和美国产业工人不断

造反而德国和英国工人却默默承受他们的命运呢？我认为，答案在于不同工人阶级团体周围的机遇和限制不同。20世纪30年代罢工浪潮之所以在法国和美国而不是在德国或英国兴起，是因为法国1936年新上台了改革政府，美国政府1933年也有意改革政治和经济关系，并不太愿意支持对劳工的镇压。也就是说，恰恰是法国人民阵线和美国新政带来的政治机遇和对劳工镇压的放松，而不是工人的不满或他们的资源扩展，促使这些国家的工人鼓起了造反的勇气。

回到当前，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者在许多不同情况下，都能抓住并转化政治机遇。我们首先来阐明促使运动形成的机遇因素，接着再证明它们是如何与三个主要的国家因素——国家力量、主导战略和压制力——相互交织的。但在开始这种分析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变化的机遇和限制这个概念可以怎样被用来理解近年来斗争的主要转折点和前苏联民主运动的兴起。

前苏联的自由化和斗争

20世纪80年代晚期，斗争政治竟兴起于世界上最不大可能发生斗争政治的地方——高度中央集权和受警察与政党控制的前苏联。政治学家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已经评述了这场以和平示威、罢工和抗议游行方式为主，有时也采用暴力手段的斗争政治的兴起。图5.1揭示了贝辛格对苏联最后几年73的事件分析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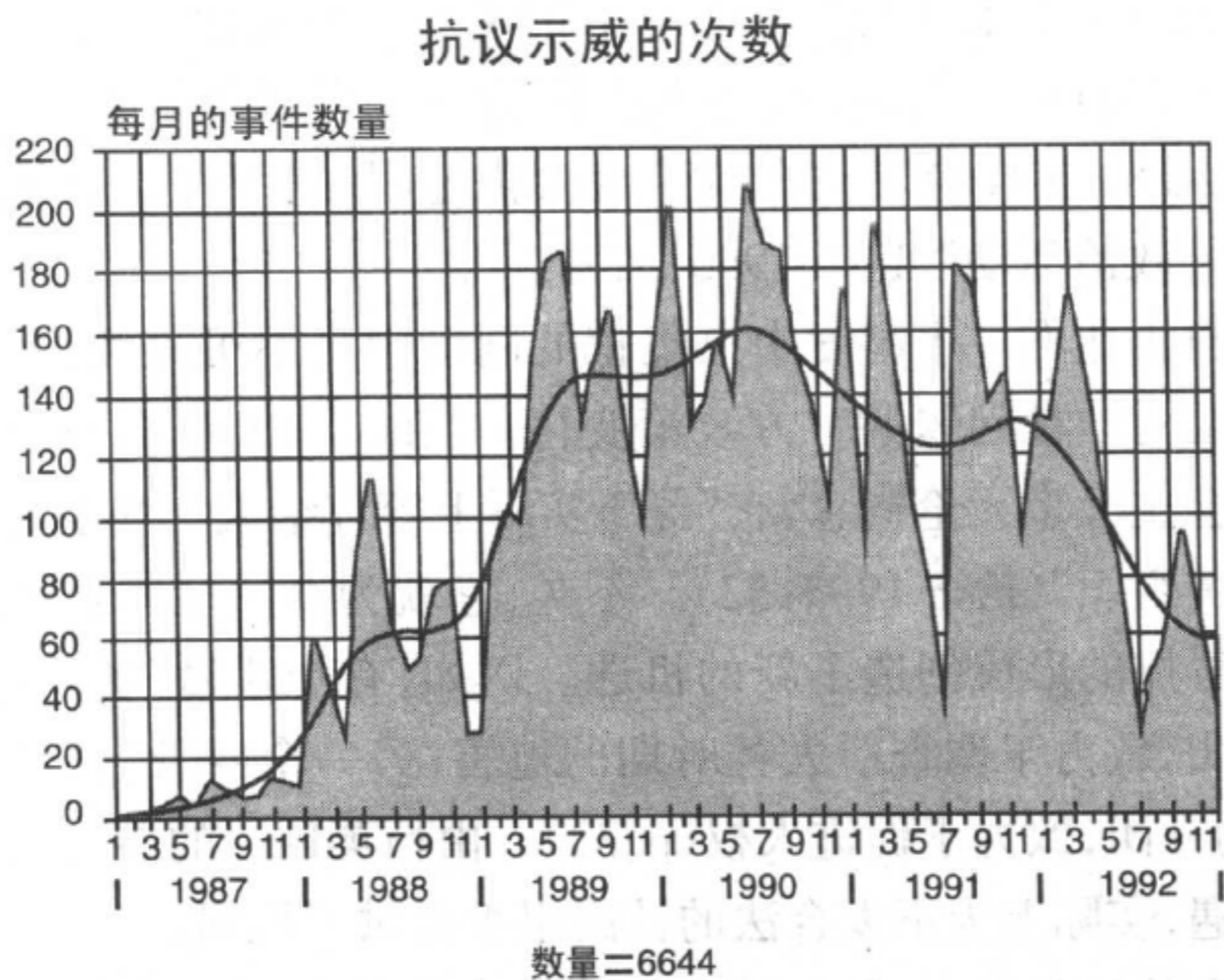


图 5.1 前苏联 1987—1992 年间游行示威的抗议动员
(资料来源: M. 贝辛格, “过渡社会的事件分析: 前苏联的抗议动员”, 见 D. 鲁希特、R. 库普曼斯和 F. 奈德哈特编, 《异议行为: 当代民主政治中的抗议研究》, 柏林: 西格玛, 1998)

这样突如其来的政治斗争浪潮,是怎样经过对政治参与的多年镇压和严格控制之后,在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和警察控制下的政权中发展起来的呢?正如托克维尔写到的那样,人们伺机而动,“对一个糟糕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莫过于它试图弥补过失之时”(1955:176—177)。托克维尔写的是法国旧政权的崩溃,假如他能多活两百年的话,他可能也会把他的理论运用于苏联。苏联和 18 世纪 80 年代的法国一样,作为一个陷入腐败和麻痹、不能再与更有活力的市场调节社会相竞争的世界强国 (Bunce 1984—1985; 参见 Skocpol 1979), 它企图从内部对自身

进行改革。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确信,他的国家如果不对自身进行改革,将无法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存在下去。20世纪80年代晚期,“产生了自由化过程,它引爆了有组织的政府外政治活动”(Fish 1995:32)。

自由化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中是不可避免的,它始于上层对结社问题的官方政策变化。当时,有人提出一个适度的社会主义多元论概念,它“等于实际上容许结成一些小的非国家公民组织”(Fish 1995:32)。不久,它就为合法社团促进更多独立群体的形成创造了新的机遇。例如,有个叫做“备忘运动”的社团,致力于调查斯大林时期的迫害;另一个叫做“公民的尊严”的社团,致力于促进人权(p. 32)。由精英创造的参与政治的新机遇,实际上为不太合法的社团组织提供了机遇。

在某种程度上,戈尔巴乔夫对自由化的期望是建立在鼓励更公开的讨论(公开化)的思想基础上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阶层的革新,他的计划将受到官方阻挠或消极怠惰的妨碍,他可能完全丧失权力。结果他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大抵是形式主义的选举,变成“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尽管不完全公开和竞争的全民选举”(Fish 1995:35—36)。虽然选举规则为苏共控制的代表保留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却给少数独立选出的个人提供了合法保护。“可能在这个极其重大的时刻,”史蒂文·费什写道,“选票造成了人们从不知道的最接近于真正竞选活动的东西。”(Fish 1995:35)

但是改革者很少,并且没有组织:因为缺少内部的资源,他们只拥有微弱的联系和极少的相互信任,很快又分裂成若干相互竞争的宗派和政党(Fish 1995:35ff.)。他们主要得益于外部支持,例如当莫斯科共产党委员会书记叶利钦非正式地同意召开被称为“改革的社会倡议”的政治讨论群体会议时,他们的意

见就得到了赞同(Fish 1995:32)。外部支持还来自1989年举行罢工的库兹巴斯和顿巴斯煤矿工人,以及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特别是他解除红军干预的威胁)而引发民主运动浪潮的东欧(Fish 1995:39—41)。这些“盟友”的作用既是有意的,又是无意的,给苏联的叛乱者增加了无穷的信心,使他们相信真正的改革是可能的。

这种可能性随着共产党高层的分裂变得似乎越来越可信。一方面1989年11月最高苏维埃正在通过一项草拟法案,准许开放媒体和私人出版合法化;另一方面,流行的电视节目“观点”(Vzgliad)却被取消,特别警察部队继续镇压公众示威。这些矛盾之处开始揭示“政治多元论和政体的国家主义和垄断主义本质之间……深刻而系统的紧张关系”(Fish 1995:40—41)。这种矛盾在1990年初随着共产党内部的改革运动进一步加深,“民主论坛”的成员要求在党内有更系统的改革规划,并号召建立西方式议会民主(pp.41—42)。而相应地,党的保守分子则形成了在公众中寻求支持的傀儡组织(p.40)。

75

1990年开始后,伴随自由化的发展,国家镇压力减弱,甚至连镇压的意愿都不再一致。而由于先前高层内的斗争导致高层的分化,这种情况日益严重。国家镇压力减弱的一个令人吃惊的表现是,允许矿工罢工和承认罢工产生的独立工会;另一个表现则是接受城市里的大规模示威(Fish 1995:45)。虽然镇压还在这里或那里继续,但因为戈尔巴乔夫需要选举来更新政治阶层,所以大众的讨论和辩论被合法化。对于各共和国州、城市和区的委员会来说,1990年的选举甚至比1989年的选举更糟糕,“是许多俄国城市进行大规模公众示威的时刻”(Fish 1995:43)。

这些选举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和示威,造成许多新党派和运

动的形成。费什总结道：

中央和党可以阻止、妨碍和压制它们；却甚至不再能假装发起、创造和说服它们……传播普遍民主运动的自发社会组织的混杂集合已经使它们的力量显现出来……而它们这么做就是开始把自己推向死亡。(1995:51)

不过,广泛斗争的出现本身并不构成社会运动。没有人际纽带网络或集体认同,这些组织既不能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也不能获得组织上的力量,去制造持久的社会运动。到1992年,由于意识形态和地区的分裂,政权解体,而随着它的解体,挑战者也分化了,先前的一个政府官员叶利钦登上了权力的顶点。可见,1989—1991年的挑战者为那些在原有体制内愿意并能够利用机会的人创造了机遇。

上面对前苏联政治斗争的出现所作的极其简要的叙述,不仅说明政治机遇在把动员的潜能转化为行动方面的重要性,还有助于我们缩小它的概念和识别它的许多关键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包括:(1)开放新的社会行动者参与政治的通道。(2)政体内政治重新调整的迹象。(3)有影响的盟友的出现。(4)高层内部出现的分裂。(5)国家镇压力减弱或镇压意志的不一致。在下一节,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些因素。

机遇的各方面

我所说的政治机遇的概念指的是:通过影响人们对成功或失败76 失败的期望,始终如一地——但不必是正式地或永久地——为集体行动创造动机的政治环境因素(Gamson and Meyer 1996)。

政治机遇传统论的作者与经常被人混为一谈的资源动员理论家相比,强调的是群体外部资源的动员。^⑤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强调造反者所看到的机遇因素——因为未经历过的结构变化,除间接的影响外,几乎不能被指望去影响人们的行为。

政治机遇有时集中于某些特殊的团体而规避其他团体,就像前述 20 世纪 30 年代工人的事例所显示的那样,反抗的机遇有时在某些地区或城市比在另一些地区或城市多 (Agnew 1997:iv)。除了这些不同之外,运动出现的原因是:动员的条件已在一般政治组织中得到发展,就像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美国的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利用了普遍扩大的机遇结构那样。尽管一些运动部门特别容易受机遇变化的影响,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和平运动 (Meyer 1990),但更经常的情况却是,给某些部门发出信号的机遇,对其他部门也同样适用。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大多数活动分子只把注意力集中于“运动”。

其实,政治机遇可能不会让所有潜在的挑战者立刻明显感觉出来。但这个概念的好处之一就是,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动员如何从非常不满和有强大资源做后盾的人,向那些较少不满、较少有资源可以依靠的人传播。通过挑战高层精英和权威,“早期的造反者”暴露了对手的软弱,并使其面临更弱的参与者的攻击。同样,在机遇减少时,后来的群体因为缺少持续斗争的内部资源,也比较容易瓦解。这就意味着——虽然“结构”一词常常被用来描述政治机遇的特征^⑥——大多数机遇和限制是形势上的,不能长期弥补文化上、意识形态上和组织资源上的弱点。

增加的通道

在机遇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有理性的人一般不会攻击有良好防备的对手。但一旦部分获得参与政治的通道,人们就会具

有进攻的动机。不过,是否拥有完整政治权利的人更容易从事斗争呢?彼得·艾辛格主张,抗议者和政治机遇的关系呈现出一条曲线:完全能和完全不能进入政治通道的人都不会提出极度严重的抗议。受托克维尔的启示,艾辛格写道,抗议最容易产生于“以公开和不公开因素相混为特征的体制中”(Eisinger 1973: 15)。^⑦

政治通道的扩大最容易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皮文和克洛沃德曾表明 20 世纪 50 年代“团结的南方”组织的瓦解如何为黑人选举人带来了新机遇(Piven and Cloward 1977)。1992 年,这种情景竟又重现于美国——当时获胜希望极小的罗斯·佩罗斯为其总统竞选创造了一场运动。同样,1994 年的意大利竞选也导致媒体巨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一场新的运动。新的挑战者常常会形成于选举的保护伞下。

选举在民主体制中是常规事务,通常由体制化的政党控制,这些政党会通过一些规章来维护其独占代表权。最容易引发斗争的是新近开放政治通道的非民主体制中的竞选,就像苏联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同一时期,在捷克斯洛伐克,学生报刊和信息中心的出现,使布拉格的学生有了一个地方可以彼此联络,并确保政治行动可以被容忍(van Praag 1992);在前南斯拉夫,未来的民族主义者早就准备通过给予他们更多体制资源的宪法改革,对后苏联时期加以利用(Bunce, 即出)。参与政治的现有渠道越狭窄,每次新的开放就越容易产生新的斗争机遇。

变化的联盟

在苏联,鼓励斗争的第二个因素是政治联盟的不稳定。在多元主义体系下,这可以最集中地通过选举的不稳定来衡量。特别是当联盟建立在新的联合基础上时,政府和反对派不确定

的命运造成了支持者的不确定,促使挑战者试图运用边缘力量,甚至可能导致精英为了竞争,向政体之外寻求支持。

选举联盟在开放机遇上的重要性,还可以从美国民权运动中看出来。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南方民主党内的种族“排他主义者”因向共和党转变而使其力量减弱,但民主党内“非排他主义者”的人数却不断增长(Valley 1993)。因为南方白人的选票减少,黑人选民又向压迫轻一些的城市转移,越来越迫使民主党去寻求黑人选民的支持。最后,肯尼迪政府由于极微弱的选票差额,被迫从谨慎地迟疑不决转为抓住争取民权的主动权。

政治不稳定不仅能在完全成熟的民主国家鼓动斗争,而且很容易使获得机遇的农民反叛权威。这就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调查秘鲁土地占有历史时的发现(Hobsbawm 197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意大利南方部分地区大农场主土地的农民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地主虐待的憎恨古已有之,使他们把怨愤转为土地斗争行动的,却是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崩溃、倾向改革的美国占领军的出现和变化的党派联盟(Bevilacqua 1980; Tarrow 1967)。在稍稍不太民主的政权中,由于缺少日常的竞争,任何政治不稳定的迹象都会成为斗争的信号和源泉。 78

分裂的精英

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当苏联共产党中出现改革派时,高层领导内部的矛盾也促进了斗争的爆发。高层精英的分化不仅为缺少资源的团体进行集体行动提供了刺激;它们还促使部分缺少权力的精英分子成为“民众的领袖”。

分裂的高层精英为正在形成的运动提供了资源,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旧政权下的法国,拉斐特和米拉波就与

自己所属的阶级决裂,而与下层教士及第三等级的人联合起来。两百年后,高层精英内部的分裂在中欧东部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戈尔巴乔夫警告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红军不再出面保卫他们之后。造反群体把这一点看作是组织起来的信号,而许多上层领导则把这一点看作是脱党变节的诱因。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班牙和巴西先后从独裁转向民主,在这个过程中精英的分化也很重要,温和派和强硬派的划分造成了反抗运动可以利用的机遇(Bermeo 1997;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19)。

有影响的盟友

在前苏联斗争政治出现的过程中,显而易见的政治机遇的第四个方面是,共产党高层精英中存在着挑战者有影响的盟友。当挑战者有盟友成为他们法庭上的支持者、反镇压的保证人或可以接受的谈判代表时,他们就会被鼓动去开展集体行动。从叶利钦对他们明显的支持中,从矿工和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独立行动中,苏联的挑战者获得了开展集体行动的信心和范例。

在威廉·盖姆森关于美国国内斗争的著作中(1990),也有历史证据表明,在民主体制下存在着类似的发展过程。威廉·盖姆森的研究揭示了运动的成功与有影响的盟友的存在间的关系。在他所研究的53个“冲突群体”中,是否存在政治盟友与这些群体是否成功密切相关(1990:64—66)。克雷格·詹金斯和查尔斯·佩罗在对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农场工人运动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对比:60年代联合的农场工人的优势在于有外部的支持者,而他们40年代的前辈则没有(Jenkins and Perrow 1977)。同样,在意大利形成漫长的“五月滑坡”(Sliding May)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中出现社会党,它一度自命为那些被关

在政治大门外的人的保护者(Tarrow, 1989a)。

挑战者在代议制体制中特别重要的盟友是一些政党,而左翼党派一般比中间党派或保守党派对挑战者更有利。在左派内部,“新左派”政党,如欧洲绿党,与更易于接受以地理分布为基础的运动的老左派相比,对“生活空间”运动更有热情(Kriesi et al. 1995:ch. 3)。右翼党派为基督教联盟这样的新宗教运动和经济利益集团所动摇,而新宗教运动可能具有更重要的边缘力量,因为它们有能力超越社会经济界限吸引选民。

事实证明,在新运动很少能获得内部资源的非民主体制中,拥有颇具影响的盟友尤为重要。例如,在中美洲,农民运动就得益于虔诚的工人、工会组织者、革命游击队、政党活动分子和新闻工作者的存在(Brockett 1991:258)。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波兰,天主教会曾帮助培育抵抗力量,并保护活动积极分子免受惩罚(Osa 1995)。特别在独裁和高压环境下,体制内的盟友是其他缺少资源的行动者可以依靠的一种外部资源。

镇压和支持

根据查尔斯·蒂利的定义,“镇压是一个群体提高其对手集体行动代价的任何行动;减少集体行动代价的行动则是支持的一种方式。”(1978:100)现代国家的发展形成了镇压大众政治的强大工具,但是,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那样,国家发展的一些方面实际上也促进了运动的兴起。

与要求不高的群体相比,要求根本改变并使高层受到威胁的运动更容易遭到镇压(Gamson 1990:ch. 4)。同样显然的是,独裁国家镇压社会运动,代议制国家支持社会运动。不过,虽然代议制国家的一些特征让人容易接受运动,镇压运动的国家也有一些方面促进了某些斗争形式。关于镇压和支持我们后面还

有很多要讲。

变化的政治机遇和限制的上述各个方面,在不同的体制下表现的方式不同,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一般单独地,有时也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例如,高层精英的分裂和政治联盟一起诱使造反群体,甚或政府,寻求局外人的支持。当一小部分高层精英与政府外的挑战者结盟时,政体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者就在主要的斗争过程中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变化都必须放在机遇和限制更稳定方面的语境中来看。

国家和机遇

上述政治机遇的五个方面被列为机遇上的变化,但还有机遇—限制更稳定的方面制约着斗争政治。第一组要素以“国家力量”这个概念为中心;第二组要素涉及国家对挑战者的主要战略;第三组要素与镇压和社会控制问题有关。

政府力量和主要战略

是不是政府力量强的国家会自动不理睬运动,而政府力量弱的国家必须承受运动的侵扰?从政府力量的角度论证的最普遍的形式如下:具备任其自由支配的有效政策手段的中央集权政府,把集体行动者吸引到政治体制的最高阶层,而与之相反,非中央集权政府却在根本上提供了大量的斗争靶子。^⑧政府力量强的国家也更有能力去贯彻它们决定支持的政策:如果政策对挑战者的主张有利,挑战者将转向常规的表达方式;如果政策对挑战者的主张持否定意见,暴力或冲突就随之而起。^⑨

因为非中央集权的体制鼓励批评和参与,它经常把最具挑战的因素从大众政治中“处理”掉,就像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

发生种族骚动后所做的那样(Lipsky and Olson 1976)。联邦制度由于为政治参与提供了许多可供选择的手段,特别鼓励运动把它们斗争转入体制内(Tarrow 1998c)。安·玛丽·塞斯曼斯基在关于美国禁酒运动的研究中,就揭示了运动领导人如何策略地从联邦体系的各个层次间的活动和提出宪法修正案,转向地方组织活动(Syzmanski 1997)。这种策略的灵活性和“方法的选择”,在较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是不大可能的。

政府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同是造成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和美国的学生运动不同的主要根源。前者 1968 年初爆发后,很快扩散,不久即迅速转入政治领域,引起一场威胁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动乱(见第十章);后者却形成较漫长和分散的一系列美国校园抗议活动,其思想在新左派的各种分支中传播(Tarrow 1989a)。

同样,政府力量的不同也与中欧东部各国革命步伐和时机的不同有关。波兰因为从没有完全斯大林主义化,所以在 1980 年的团结工会罢工中,产生了最早的也是最重大的社会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则因为自 1968 年后一直屈从于无情的斯大林分子的统治,所以成为最后一个反叛者。波兰的超前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滞后显然都与这两国社会主义政府各自的力量有关。

81

| 政府主要战略 | 政府力量 | |
|--------|------|----|
| | 弱 | 强 |
| 包容 | 美国 | 瑞典 |
| 排斥 | 意大利 | 法国 |

表 5.2 政府力量和主要战略——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斗争政治的组织原则(资料来源:H. 克瑞埃西、R. 库普曼斯、J. W. 杜伊文达克和 M. G. 吉尼,《西欧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学》,明

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5，p. 37)

在独裁主义背景下，虽然镇压在大多数情况下粉碎了反抗力量，但是权力的集中却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不寻常的优势——一旦这个体制被削弱，就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战场和集中的攻击目标。这是造成1989年后中欧东部国家社会主义迅速崩溃的一个原因。在权力集中和情况相同的地方，一旦机遇出现，就像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那样，构造和组织一场社会运动就会很容易。瓦莱丽·邦斯写到，在这种体制中，弱者的“许多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武器(Bunce 1991:6)。

政府力量的概念如果单单只是集体行动的指南，未免有些呆板和无力。事实上，一些国家，不管其政府强弱，都有一套对付挑战者的主要战略，它是包容的，被用于回应和接纳挑战者的要求(用威廉·盖姆森的术语来说，就是“先发制人”)，并帮助他们进入政体(Gamson 1990: ch. 2)；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一套“排斥”战略。汉斯皮特·克瑞埃西和他的合作者看到，“主要战略”在不同的国家里存在系统性的差别(1995:40—44)。

主要的政府战略和政府力量有趣地交织在一起。汉斯皮特·克瑞埃西及其伙伴在对欧洲四国的抗议事件的研究中发现，瑞士(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采取“包容”战略的政府力量“薄弱”的国家)的群众动员水平较高，但暴力和冲突的水平较低；法国(汉斯皮特·克瑞埃西及其伙伴把它作为一个采取“排斥”战略的政府力量“强大”的国家的典型)的群众动员水平较低，但武装冲突的抗议水平较高，是另一个极端的典型(1995:49)。^⑩另外两个例子是：对挑战者采取更“包容”的战略的社会民主力量强大的瑞典(Kitschelt 1986)，和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一直对左派采取排斥战略的政府力量较弱的意大利。上述国家的政府力

量性质和主要战略的交叉在图 5.2 的分类研究中表现得很清楚。

然而,尽管克瑞埃西的上述分类研究十分有用,我们必须谨防将它过分公式化。由于实际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政府力量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斗争预报因子。此外,“强”和“弱”作为相关评价,对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次来说是不同的。安·玛丽·塞斯曼斯基研究的禁酒活动分子就觉得美国政府太强大,难以打垮,因而转向“全局考虑,渐进行动”的战略。那么,美国政府到底是“强”还是“弱”呢?这取决于它在哪一点 82 受到攻击。例如,彼得·艾辛格发现,在“未改革的”市长—市政委员会管理的城市,城市抗议远比在改革过的市政委员会—市经理管理的城市更普遍(1973)。

同样,我们对于“主要战略”的概念也必须十分谨慎。例如,美国政府在与中产阶级公民抗议有关的问题上,一般采取“包容”的战略,而在财产权受攻击时,则一般采取非常“排斥”的战略。这种战略差别导致美国政府只对那些提出有限目标的群体,即麦卡锡和沃尔夫逊研究的所谓舆论运动的群体,敞开大门(McCarthy and Wolfson 1992),而对那些挑战资本或国家安全的群体则设置障碍加以反对。

此外,政府力量和主要战略都是政治因素的外衍物,随战争、选举、政党联盟和公众舆论变化而变化。由统一的大多数人或有力的领导人控制的“强”政府,在大多数人发生分化或反对力量增长后,可能变得“弱”;原本对工商企业很有信心的强大政府,在通货膨胀上升和资本流向国外时,会被削弱。如果出现一个新的集体行动者,像 20 世纪 70 年代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那样,那么显然“强”政府会像伊朗的国王那样迅速消亡。

政治高层精英的分化很容易被曲解为政府结构上的脆弱。

例如,直到南北战争时期,地区分化的美国上层精英还在限制美国政府的发展。在南北战争削弱了南方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之后,政府则变得强大多了,用理查德·本塞尔的话说,成了一个“北方佬的利维坦”(Bensel 1990)。相反地,就像1997年希拉克总统所认识到的那样,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强”法国政府,后来却在他那些不如他有魅力并且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追随者的统治下削弱了。

镇压的方式

镇压不是会挫败集体行动,就是会增加组织和动员舆论所付出的代价(Tilly 1978:100—102)。虽然镇压是较为残酷和恐怖的,但有证据表明,从长远来看,增加组织和动员的代价较为有效。例如,史蒂文·巴肯在对比了利用法庭来阻止民权活动和利用警察镇压民权活动的南方城市之后,发现前者比后者更能长久地抵制种族隔离(Barkan 1984)。与此类似,在麦卡锡时代,美国保守派发现,增加共产党内成员的牺牲比禁止罢工或示威更容易。

但是抑制集体行动的前提条件并不总是轻易就能达成的。由于增加集体行动组织的代价是不可选择的,第一道障碍就是财政和管理上的费用。其次,镇压集体行动组织会使有建设意义的批评者和政权反对者一起被压制,阻碍信息的向上流通。最后,对于普遍遭挫败的组织而言,一旦集体行动爆发,人们知道同类的其他人上了街,就会使集体行动从涓涓细流变成滚滚洪流(Kuran 1991)。

把抗议者和潜在抗议者关进监狱,一直是镇压斗争的主要措施。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是鲁尔占领区的公民,然后是甘地,再后来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创造了非暴

力反抗。结果使监狱被塞得满满的,但抗议者却得到了民众的同情,这种方法因而成为很有效的向政府施压的方式(Ackerman and Kruegler 1994; Sharp 1973)。从那时起,非暴力反抗就成为斗争武器库中主要的政治武器(见第六章)。

为了应对 20 世纪 60 年代越来越成功的非暴力抗议活动,美国和欧洲的警察和法院开始把从前被视为威胁国内秩序的活动形式合法化。于是,像静坐这样最初几乎普遍被处以监禁的活动形式,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作为一种言论形式越来越多地被政府接受,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群体和自由群体中扩散,后来又随着反堕胎运动发展壮大,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传给了集体行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Staggenborg 1991)。

其实,政府对非暴力斗争的宽容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相对无风险的途径,使群众可以大规模集会,让他们感觉到在根据自己的信念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另一方面,它也剥夺了组织者有力的义愤武器。与那些组织示威者召开研讨会,并保护他们言论自由的看似通情达理的公众权威人士相比,那些把真诚的年轻人投入监狱的凶暴而任性的警察,更容易挑起人们的反抗动员(della Porta and Reiter 1997)。

由于在代议制下很容易组织舆论和找到合法途径来表达意见,许多运动开始求助于选举。其动态过程是这样的:运动根据其要求组织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政府允许甚至支持它继续表达自己的意愿;运动参与人数的增加直接影响着选举进入政府的候选人;由此,运动组织为了影响政府的政策转变成一个政党或进入一个政党。

这种逻辑导致美国妇女运动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与民主党形成永久的联盟(Costain and Costain 1987),并造成 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极左分子的分裂,使其中一部分人从对抗转向

组成新左派政党(della Porta 1995; Tarrow 1989a)。它最成功的例子是,选举战略在北欧部分地区造就了绿党,并使其迅速成为议会政治游戏的一部分。在瑞士,采用直接的民主制度也似乎缓和了社会运动行动,使人们在其他方面受损的情况下,支持温和的运动(Kriesi and Wisler 1996)。

镇压的悖论

84 专制国家不鼓励大众政治,这一点在它们的定义中就已十分明确。但它们对运动的成功镇压却造成集体行动的激进化,促使反对者建立更加有效的组织。由于温和的反对者已不再关注政治,激进者占据了中心舞台。要知道,既不是在民主制的英国,也不是在共和制的法国,而是在专制的俄国以及半立宪制的意大利和西班牙,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向了恐怖主义。我们都清楚,正是沙皇俄国的专制氛围导致了俄国的封闭和社会民主的激进化(Bonnell 1983)。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高压政府都能同样有效阻塞住斗争机遇。例如,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反法西斯组织就在天主教运动中凭借法西斯—梵蒂冈协约的合法保护,组织了抵抗活动(Webster 1960:chs. 10,11);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波兰,甚至在军事管制期间,由波兰团结工会作者撰写的书籍和文章仍然继续公开发表(Laba 1990:155)。

系统地镇压集体行动造成的一个荒谬结果是,甚至使一般行动也染上了政治色彩。1848年米兰墙上涂写的“V. E. R. D. I.”,不仅代表了民族主义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名字,同时也是标语“Vittorio Emmanuele Re d' Italia”(Victor Emmanuel,意大利之王)的首字母缩写。20世纪80年代莫斯科墙上的涂鸦,对于任何识字的俄国人来说,表明了俄国

社会的疏异程度(Bushnell 1990)。^①

就像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所做的研究发现的那样,在稍微放松一点的专制国家中,即使人们如何脱帽致敬,如何互相致辞,也暗示着不同意见(Scott 1985: ch. 7)。这些“隐藏的转述”很少会产生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但由于它们都没有跨越从埋怨到反抗的界限,它们能以一种很难压制的方式破坏舆论。高压政府一般打击传统的和对抗的集体行动,不去管不显眼的动员,而这种动员却暗示着团结,当机遇来临时,这种团结就会成为有利的斗争资源。

在专制国家系统地镇压斗争时,由于缺乏表达公众意见的适当渠道,就连温和的反对者也成为政权的敌人,迫使他们在可以进行改革的条件下,提出推翻政权的主张。马克思在1843年曾论到相对自由的法国君主制和专制的普鲁士政府的区别,他写道:“在法国,部分的解放是全部解放的基础;在德国,全部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1967:262—263)当镇压针对着受威胁群体的集体存亡时,这个说法尤为正确。

威胁和机遇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集体行动的机遇和限制。这些可以察觉的变化,能诱导那些本可以待在家的人投身代价高昂、易受打击并很可能十分危险的集体行动。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我们知之甚少的在逻辑上似乎会刺激斗争的变量:不同的群体和个人所经历的利益、价值有时甚至是生存方面的威胁。 85

我们最好先从下列这点开始讨论:把斗争看作集体行动问题,并认为那些考虑斗争的人面临着一系列的损失和阻碍。从简单的资源动员角度来看,最有可能投入斗争的大概是那些最

不会有多少损失的人,因为他们拥有最多的资源。但是,如果从谁试图抓住外界机遇的角度来看,最有可能投入斗争的却是那些有最大损失的人,因为他们要是不斗争就会面临最大的威胁。

例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然违抗其政府维护奥斯陆和平协议的誓言,于1997年初宣布把犹太人居留地向耶路撒冷附近扩张。这一举措威胁着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可避免地激怒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和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当局。巴勒斯坦人抗议的一个主要动机就在于,他们在以色列“编造的事实”的压制下,面临窒息而死的威胁。实际上,可以这样说,内塔尼亚胡令人愤慨的举措给巴勒斯坦人民的普遍反抗提供了机遇,这种反抗根本不是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政府本身所能唤起的。

斯坦福大学已故心理学家阿摩司·图夫斯基在他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提出了一种对威胁引发斗争的重要性的理论(参见 Quatrone and Tversky 1988)。阿摩司·图夫斯基和他的合作者认为,个体对于预期的获利和受损的反应不同。他们宣称,个体会采用情境中偶然的的不同决定性直观推断方法,“个体对待冒险的看法取决于结果是被感觉为获利还是受损,这与参照点有关”(p. 722)。

图夫斯基的认识后来被杰弗里·贝雷基坎运用到了集体行动理论中,他认为获利和受损对于引发斗争有着不同的潜在影响,而潜在的损失——或者说威胁——要比获利的希望更能激发人(Berejikan 1992),虽然目前还没有哪个领域的研究能够被用来验证这个假说,但贝雷基坎以大量的历史事例对此进行了诠释,以支持他的论点。特别是他认为,“革命的集体行动”最有可能由“受损的威胁”引发。他写道:“经历了社会结构转变的农民,比如,因为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变导致他们越来越无力抵抗生

存危机,只能从一个利益受损者而不是中立者的角度出发,做出有利于他们现状的抉择。”(p. 653)

对于贝雷基坎的观点,我们要提出三点警告。首先,根据经验来看,有许多相当明显的斗争事例,大多数旁观者都承认,是由那些并非站在自己的立场或位子上寻求自身利益的人,在没有受到直接利益威胁的情况下发起的。例如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中,大多数前往南方支持运动的北方白人并没有面临生命或财产的威胁。相反,由于参加斗争,他们实际上增加了自己所承担的风险(McAdam, 1986)。

86

其次,“获利”和“受损”(如在贝雷基坎的术语中,个人的“参照点”)是否能被客观地界定和评说,这一点并不清楚。一个占据地主土地的农民,因为他占据的是其他人的土地,他便是在寻求获利吗?或者因为他可能声称这片有争议的土地是地主从他祖父那儿偷来的,他便是在挽回损失吗?如果我们不能明显区分获利的前景和受损的威胁,我们的分析将受到那些其所受损失的声明并不能从表面价值上来考虑的集体行动者的支配。

最后,对于害怕受损比希望获利引起的斗争更多这一观点,最强有力的反驳是:图夫斯基的理论假设的是个人动机而不是集体行动动机。当我们转向第十一章所写到的近来的跨国运动时,我们将注意到许多人受到的是非观念因素的动员,这种是非观念因素代表的是迪特·鲁希特所说的“长远问题”,即与个人的得失几乎没有关系的问题(Rucht 1998a)。

图夫斯基的理论最重要的隐含意义并不在于解释个人行为,而在于贝雷基坎所说的“通过革命组织来构造斗争”。如果被统治的人民采取行动,更多的是因为害怕受损而不是希望获利,“那么革命组织的首要任务便是采纳一种世界观,它能有效

地向每个农民传达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现存的社会结构比在某个‘正常’的过去时期更不合理”(Berejikian 1992:653)。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这些斗争构造的问题。

制造和扩散机遇

斗争的集体行动与传统的社会参与形式不同,它向其他人证明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并为那些确实资源贫乏的群体提供了机遇。这些机遇本是缺少资源的他们无法获得的,它产生在“早期的起义者”向社会精英提出要求之时,因为那些社会精英可以被不太胆大并缺少资源的人所利用。此外,集体行动能暴露对手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在它的对手没有受到挑战时并不明显。它还能揭示体系内外意想不到的或先前较为被动的联盟。最后,它还能消除公开的制度障碍,由此使其他人的要求不断涌现。

一旦特殊群体在体系的一部分中为了某类目标而发起集体行动时,该群体和它的对手之间的交锋,将能提供集体行动的范例、主要理论体系和可以产生新机遇的动员结构。这些次生效应有三种普遍形式:扩大一个群体本身及其他相关群体的机遇,运动和反运动间的辩证法,以及为社会上层精英和权威创造

87 机遇。

扩展其他人的机遇

斗争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也为抗议群体之外的其他人扩展机遇。抗议群体将重大问题列入议程,让其他人确认并证明集体行动的效用,使其他人可以加以仿效和创新。例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美国民权运动扩展了权利理论,使之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主要理论体系”(Hamilton

1986)。总之,集体行动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了民众的要求,并给其他人指明了道路。

机遇的扩展不仅影响了运动的“联盟系统”,同时也影响了它事实上和潜在的对手。运动如果冒犯有影响的群体,就会引发反向运动(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运动如果采用暴力,就会招来暴力的镇压;运动如果产生极端形式的政策要求,就会被那些以更容易接受的形式提出同等要求的群体所挫败;运动的成功如果在增强动员的背景下威胁到另一个群体,就会导致代价过高和反向抗议。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极左派和极右派互相激发,以致20世纪70年代双方都产生恐怖主义活动(della Porta and Tarrow 1986)。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美国反堕胎运动中的要选择派和要生命派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显示了运动为对手创造机遇的过程。首先,20世纪70年代初最高法院颁布的允许妇女享有堕胎权的法令,刺激了天主教徒和原教旨主义新教徒,使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堕胎诊所。后来,这个要生命派的运动变得非常活跃,甚至成为20世纪80年代击败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主要力量之一(Mansbridge 1986)。最终,要生命派的一个叫做“手术搭救”的分支,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用了过于激进的直接战术,又激起了通常合法的要选择派力量的反向动员活动(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

为精英创造机遇

最后,抗议者们还在正反两个方面为精英创造了政治机遇:从反面说,他们的活动为上层精英的镇压提供了依据;从正面说,政客们可以抓住由挑战者创造的机遇,宣布自己为民众的领袖。我们将在第十章中看到,在法国五月革命中,最持久的成果

大概是受抗议者影响极小的教育改革。抗议者本身很少有能力强影响精英的政策优先权,这既因为他们的抗议一般只采取表达的方式,也因为精英不大可能被说服,去做出并不对他们有利的政策改变。只有当政体之外的挑战,为精英在政体内推进他们的政策和事业提供政治动机时,改革才最有可能发生(见第88十章)。

政治机遇论并不为左派或右派、运动党或保守党所独有。对于民权运动,保守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自由的肯尼迪政府的反应基本相同,原因很简单,因为两者都关注竞选改组,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种族主义外交政策的伤害(Piven and Cloward 1997:ch. 4)。

政党和利益集团何时最有可能利用社会运动所创造的机遇呢?好像主要在一个系统受到一连串运动的挑战时,而不是在个别运动组织发起很容易被镇压或被孤立的挑战时。也就是说,当政治机遇在挑战者、精英以及当权者中造成普遍对抗时,改良主义者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就像第九章所研究的斗争周期中的情况那样。

机遇的减弱

机遇的开放为那些缺乏内部资源的人们提供了外部资源:先前的壁垒打开了,原来不可能的联盟成为可能,政治重组似乎又能给新的群体带来权力。但是,这些机遇都来自外部,而且它们能轻而易举地将起初的挑战者转变为同盟者和对手,乃至精英和掌权者,所以政治机遇是反复无常的朋友。结果是改革的大门迅速关闭,或是具有不同目标的挑战者被允许稳步进入已被先前的造反者砸烂的政府大门。

因此,1989年东欧剧变,很多人以为会给世界上被剥夺自

由的部分地区带去民主,却只造成很少几个有效的民主国家、若干个新式共产主义国家和许多迅速被民族矛盾所瓦解的国家。即便在迅速被吸纳进稳定的西方民主的东德,民主的公民论坛也被既定的政党扫除到一边,尽管它曾导致1989年德国的统一,而先前共产党的后继者却仍然保持为一支选举力量。由于运动所造成的政治变化也加速了其自身的瓦解,运动很快烟消云散。

政治机遇的变化性质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社会运动的形成中不重要。1917年布尔什维克上台是政治机遇的结果;1989年前苏联和中欧东部的集体行动是戈尔巴乔夫提供的政治机遇刺激的结果。如果机遇由挑战者转向同盟者,由运动转向反向运动,由政体外部转向政体内部的精英和政党,那么要使斗争转变为持久的社会运动,必须具备某种更持久的东西。具体来说,把斗争的可能性转变为持久的社会运动还必须有另外三种资源:人 89
们为获得支持并把他们的愿望强加给对手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使其行动显得有尊严而合理的集体行动理论体系;使最初的挑战者得到增援并使中央和基层相联系的动员结构。这些都是下面三章将分析的运动的力量。 90

六 斗争行动

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权，似乎最后一个受到社会运动的破坏。深谋远虑的列宁主义者米洛舍维奇，早在1989年以前就已很快觉察到中欧东部政治风云的变幻。他通过煽动一场与克罗地亚的战争，通过让他的代理人——波斯尼亚塞族人向脆弱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共和国发动进攻，破坏了南斯拉夫统一的成果。当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恐怖引起西方国家反响时，米洛舍维奇又与美国人和西欧人达成妥协，把他的波斯尼亚支持者抛在政治风云中摇摆。^①

只要米洛舍维奇还控制着军队和媒体，他的政治地位就不容置疑，而随着波斯尼亚战争的代价越来越明了，他的地位削弱了。尽管如此，凭着无情的狡诈、对报界的继续控制和先前的国家机器剩余力量的支持，直到1996年11月，米洛舍维奇似乎一直牢牢地掌握着大权。这时，先前分裂的反对党为1996年的地方选举提出了一份联合名单，并在包括首都在内的十四个地方的选举中获胜，而政府却宣布他们的选举不合法。

政府不承认反对党参选结果的策略，只有在下列三种条件下才能行之有效：其一，它得到了可靠的威慑力量的支持；其二，媒体还在国家控制之下；其三，国外没有人关注。而这些条件实

实际上在这个策略被采用时都已不复存在,尽管每天街上都部署了警察,军队(可能还在为米洛舍维奇从波斯尼亚撤出而懊恼)也还驻守着边界线。如果官方媒体拒绝公开反对党的选举胜利或策略,私人广播和电视以及外国媒体将不仅填补空白,还会走得更远。最后,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以潜在的贸易制裁相威胁,发现反对党联合体确实在十四个城市都获得了选举胜利(《世界报》,1997年2月13日,p.2)。

这就是一个以选举胜利被窃取为开端,持续了三个月,直到 91 反对党的胜利被确认为止的斗争政治周期的背景。从1996年11月19日起,到塞尔维亚议会最终于1997年2月中旬承认反对党胜利,反对党联合体发动了夜间斗争活动,打破了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平衡,引起了国际电视观众的密切关注,以致严重削弱了米洛舍维奇和他的政权。同时,贝尔格莱德的大学生每天也组织独立的抵抗活动。虽然他们激烈的言辞使他们疏远了反对党联合体的好斗分子,他们实际上却和来自不同方向的挑战者一起,促进了与现存政权的对抗(Garton Ash 1997)。

巴尔干是否为此再次爆发暴力冲突呢?一些抗议者确实因此转向暴力。先是抗议者把鸡蛋扔向政府新闻机构,指责它们拒绝播报有关抗议活动的新闻;接着便是警察为了把反对者逐出街道向示威游行发动进攻,打伤一名领导人(《世界报》,1997年2月13日,p.2),从而引起暴力对抗。不过,从一开始,活动的中心事件就是每晚经过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和平游行。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示威者游行、唱歌、吹口哨、听演讲,一会儿质问警察,一会儿与警察交好,并上法院向米洛舍维奇施加压力。南斯拉夫自1989年后陷于半独裁统治,在这种形势下,抗议游行作为两百年斗争政治的传承和实际西方宪政的一部分,具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根据路透社的新闻报道而

绘成的图 6.1 粗略显示了参加贝尔格莱德游行示威的人数和时间。^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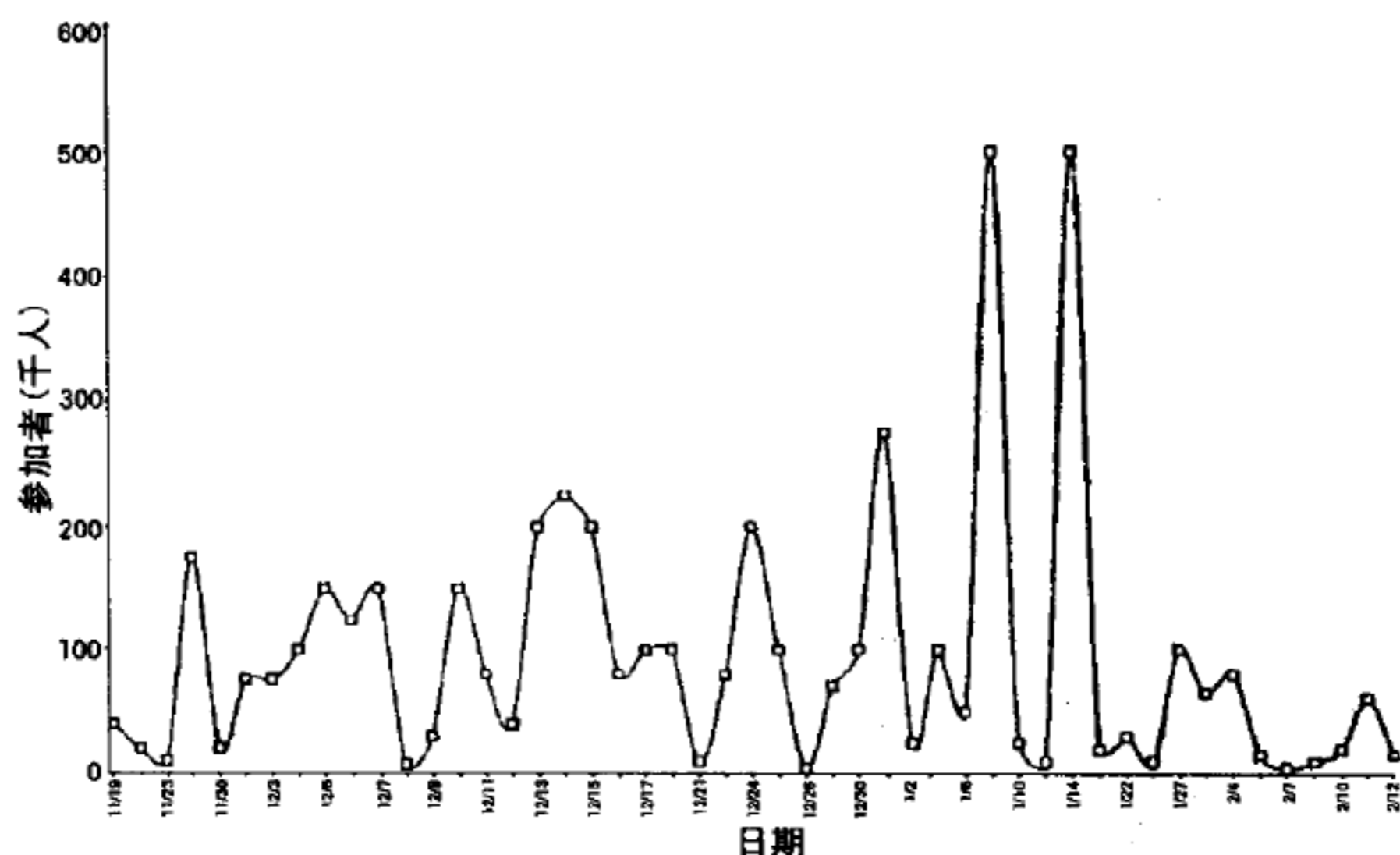


图 6.1 1996 年 11 月 19 日至 1997 年 2 月 12 日贝尔格莱德抗议事件的参与情况(资料来源:路透社新闻。注:图中的数据仅代表路透社提供的对实际参加抗议人数的估计)

92

贝尔格莱德民众的力量不仅表现在游行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抗议者的坚定性和他们的创造性相辅相成,结果“政权遭到了鸡蛋的‘扫射’、口哨的吹打、锅碗的抨击和小丑的嘲笑”。(Vejvoda 1997:2)当警察只准普通行人在贝尔格莱德商业区的街道上行走时,数千人就带着他们的宠物上街溜达,装做在干正经事的样子;当政府控制下的媒体拒绝公开抗议行动时,游行者每晚就吹着口哨列队走过新闻总部,并与国际媒体接触;当新年除夕到来时,30 万示威者又把他们的抗议活动变成了街头晚会;当选美比赛决出胜者时,获胜的小姐竟称与示威者对峙的一

名警察为“最可爱的警官”，并向他递上一束花。因为有数千市民夜间在严寒中游行、谈笑和歌唱这种奇观，世人才不会让塞尔维亚听天由命。

塞尔维亚的经历证明了本章后面将分析的公众斗争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暴力冲突，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也是最直接的方面；第二，有组织的公众游行，它代表了当今斗争政治的主要类型——传统的集体行动；第三，创造性的破坏，它存在于常规和斗争之间易变的临界线上。虽然暴力、破坏和传统的反抗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它们有一条共同的线：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公开的表演。

斗争政治的表演

查尔斯·蒂利在他写的有关英法的著作和其他理论文章中(1983, 1984b), 集中讨论了人们为表达他们的要求, 在特定时间和场合下所采用的典型的斗争手法。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斗争手法这个概念有助于把斗争政治置于一个宽阔的历史和比较体系中来研究, 但是迄今为止, 对抗议的研究大多还局限于量的方面: 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被采用的频率; 一种斗争形式被另一种形式取代的条件; 斗争形式与工业化和国家创建的联系, 以及与饥饿、失业和战争过程的联系; 什么人代表性地采用了什么活动形式对付谁。^③ 近来在计算机化的文本分析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使学者们很容易把斗争手法的研究归结为数字, 并对它们进行长期研究(Franzosi 1989), 却难于把它们看作是具有感情和文化内涵的公开表演。

93

不过, 是否所有的斗争政治变体都是同样表演性的呢? 我在第二章中所说的“旧”手法, 如狂欢, 就有表演的成分(Le Roy

Ladourie 1980)。宗教战争中对圣像和雕像的破坏也是一种表演行为,只要它对天国的观众有利(Davis 1973)。而地方性的、褊狭的和直接的斗争形式的主要目标在于向对手直接提出要求,或向他们报复。只有在现代世界,当公众舆论和民族国家开始在提出要求者和他们的对象之间进行调停时,斗争才变成为有利于第三方的真正的表演行为。

这在法国革命中就已很明显。那时,服装的样式和公开行为都变得具有政治色彩(见第七章)。19世纪,随着政治性游行、公众示威和工人罢工的发展,公众行为的仪式化倾向得到增强。而只有在我们这个世纪,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还有国家和第三党派在决定抗议结果方面作用的增长,斗争政治的表演才变得常规化和专业化。甚至一些暴力形式——最基本的斗争政治形式——也显露出表演因素。

暴力的挑战

无论在当代新闻报道还是历史记录中,暴力都是集体行动最明显的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暴力既制造新闻,又关系到那些以维持秩序为职责的人。暴力对大多数人还有一种不正常的吸引力,这些人在被暴力排斥的同时,又被暴力所吸引。最后,暴力是小群体不用进行大量协调和控制而最容易发起的一种集体行动。抗议游行的组织者尚需要努力工作,集合起一批追随者,而暴力煽动者却只需要砖头、棍棒或铁链,去把窗户砸破或击打受害者头部。他们的团结只是一小伙人的团结。

集体行动的传统形式集中于暴力或暴力威胁,其原因在于:暴力是孤立无知的愤怒的人们最容易采用的集体行动形式。此外,较大的运动也故意用暴力来联合支持者,把对手非人化,从而显示运动的威力。希特勒的纳粹党人攻击共产党人和犹太

人,他们的目的就不仅在于争夺权力,还在于建立一种以男子气和力量为基础的集体身份认同。

考虑到发动暴力有多么容易,人们不免感到惊讶:它在当代民主国家中,比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其他集体行动形式罕见得多(della Porta 1995:216)。这种变化是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产生开始的,因为民族国家压制了个人的暴力,并控制了组织化的暴力。我们在蒂利对英国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已经看到这种变化的征兆:英国人从18世纪中叶的争斗和焚烧草垛,转向19世纪在历史记录上占主导地位的请愿和示威活动(1995a, 1995b)。及至我们这个世纪,这一点也可以从政府当权者越来越多地接受非暴力抵抗的事实中极其清楚地看出来。

相互作用的暴力

虽然暴力常常被视为心理或社会机能失调的表现,它还可以更好地被理解为抗议者的战术和控制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查尔斯·蒂利写道,现代欧洲的记录显示了一种大致的分工:“人员的屠杀和伤害主要由镇压部队造成,物品的破坏主要由部队试图控制的反抗群体造成。”(1978:177)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所以德拉·波塔根据她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暴力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抗议手法的自动调整涉及示威者和警察这两个主要参与者之间的战术调整。”(1995:211)

然而,抗议的“正常化”并不经常扩展到非民主国家。在沙皇俄国那样的国家里,首先形成的是恐怖主义,主要原因在于:抗议者缺少参与政治的合法途径,被迫转向以暴力作为惟一表达方式的秘密渠道。而即使在民主国家中,极端群体的孤立,它们与警察的冲突,也常常使它们没有其他抗议方法,只有依靠暴力(della Porta 1995)。

有时,暴力对某些群体而言,或者在某些奉行仪式主义的群体的相互作用中,变得习以为常。在法国南部,那些种植葡萄酿酒的人,为了维护自己所酿酒的价格,极力排斥进口酒,在斗争中始终采用暴力手段,以致对他们来说,往路上洒葡萄酒和侵占政府办公室,已成为一种常规的抗议形式(Mann 1990);在北爱尔兰,新教徒故意在天主教邻接区内进行“奥林奇派”(“Orange”)游行,这种挑衅行动立刻激起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响。于是,新教统一党人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变得司空见惯。

暴力还能促使斗争和联盟系统两极分化。它使挑战者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场混淆不清的盟友、敌人和旁观者的多边赛,转化为一场两极赛,人们不得不选择加入一方参赛,从而导致盟友分道扬镳,国家镇压机器迅速开始运转。^④暴力威胁虽是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但在潜在盟友感到畏惧、高层精英以维护社会安定的名义重组、治安部队学会应对时,它却会成为一种障碍。贝尔格莱德夜间游行的组织者之所以恳求他们的支持者不要卷入暴力,主要是为了限制这种两极分化,不给当权者提供镇压的借口。

在是否采用暴力的问题上,运动一次又一次地造成分裂。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间的斗争,就是由是否需要处决国王的纷争引起的。结果反对杀死国王的吉伦特派不久就步国王的后尘,被送上了断头台;在欧洲左派中,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就前者的暴力和后者的官僚进行了争论。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社会运动中,随着冲突的加剧,最重要的左派学生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解体,并随之出现了秘密的“气象人”暗杀组织(della Porta 1995:212)。

虽然暴力能触动人心，它在运动的形成中却有一个严重的局限，就是会抑制和吓跑同情者。只要集体行动背后有可能存在暴力，那么就总是变化无常，集体行动者就可以给对手造成一种心理压力。而在暴力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地方，它却会给当权者以镇压的借口(Eisinger 1973)，并把非暴力的集体行动同情者吓走。在这种情形下，活动组织者往往陷入与当权者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中，以致在现代社会中根本不可能获胜。所以，在民主国家中，形成当代斗争手法的所有模式化集体行动形式实际上都是非暴力的，或更具体地，它们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传统斗争形式和破坏。

破坏和抗议的不稳定

破坏是挑战群体极典型的表现。从18世纪进攻作恶者的房子和袭击磨坊主的存粮，到19世纪构筑街垒，直至本世纪静坐抗议和静坐罢工，破坏的方式多种多样。破坏的最直接方式，只不过是暴力威胁：“如果你不生产粮食和货币，”挑战者说，“或不停止使用毁了我们生计的机器，你可能要承受肉体的损伤。”

然而，破坏在当代斗争形式中还有一种更间接的强制力。首先，它是决心开展运动的具体表现。通过在公共场所集体挑衅地坐、站着或行进，示威者显示了他们的同一性，加强了他们的团结。同时，破坏还阻碍了对手、旁观者或当权者的日常活动，迫使他们关注抗议者的要求。最终，破坏还扩大了冲突的范围。通过阻塞交通或中断公共事务，抗议者给旁观者带来不便，使法律和秩序陷入危险，还把当权者拖进私人冲突中。

不过，破坏不必威胁公共秩序。在美国，先发生的民权运动 96 和随后兴起的妇女运动，都教会美国人用个人手段去发展政治事业。实际上，对一组社会格局没有破坏性的东西，可能对另一

组社会格局具有高度破坏性。例如,美国女权运动的基本战场一直在家庭中——即使对于那些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温和妇女也是如此,而近期天主教教堂又成为另一个斗争场所,“女教徒们”在那里对等级制和父权制展开了广泛而具有高度破坏性的批评(Katzenstein 1998:ch. 6)。

典型的 19 世纪斗争形式是构筑街垒,20 世纪的破坏手法则增加了其特有的形式。除了在公共场所游行示威,还新添了非暴力直接行动手段和静坐示威——这可能是本世纪人们为丰富斗争手法所作的主要贡献。在像独立前的印度、美国南部和英格兰的格林汉姆公地这样相隔遥远的地方,非暴力直接行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抗议者的主要斗争手段(Ackerman and Kreugler 1994;Sharp 1973)。

有历史证据表明,非暴力活动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⑤不过,直到甘地和他的追随者在印度用非暴力活动来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和英国殖民统治之后,非暴力活动的实践才首次由甘地正式将它理论化(Ackerman and Kreugler 1994:ch. 5)。尽管甘地的运动战术是和平的,他却很清楚运动的目标是破坏性的。为了在印度发动 1930—1931 年的非暴力活动,他写信给英国的总督:“这不是通过争论来说服的事,它自身已变成一种游行示威力量。”(引自 Sharp 1973:85)

虽然非暴力直接行动起初只是一个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手段,后来却完全模式化,作为一种战术选择手段,传播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运动中,甚至扩散到它还没有被正式理论化的地方(Ackerman and Kreugler 1994:xxi)。非暴力直接行动在美国的民权运动、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和学生运动、欧美的和平与环境运动、菲律宾的反马科斯政权斗争,以及泰国和缅甸的反军事统治斗争中,都得到了运用。特别是它在美国反

堕胎运动中的运用,尤其显著地证实了它从一种运动向其他不同运动扩散的能力。这个抛弃了新左派的大多数文化和意识形态包袱的运动,采取的战术是堵塞堕胎诊所入口,并在积极分子们被警察制服时实行非暴力抵抗。^⑥

但是,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由于非暴力抗议很可能遭到严厉镇压,反对派运动就变得越来越擅长发动无干扰的、象征性的、和平的破坏方式,在表明斗争的同时,避免镇压。当纳粹的占领导致街头游行在丹麦变得危险时,丹麦人就组织社区民谣歌唱大会、徒步旅行和佩戴国家标志的活动。^⑦在前苏联和中欧东部国家社会主义远未解体以前,政权反对派已经形成了相当多的斗争手法,包括象征性行为、消极抵抗和在墙上乱涂乱画等 97 (Bushnell 1990),以避免暴力或任何暴力的暗示。市民合法参与政治的通道越封闭,他们对反抗的象征性方式就越敏感。

破坏的力量

破坏性斗争形式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们散布不确定的事,给弱小的行动者提供对抗强大对手的方法,所以它们是社会运动最强大的武器。而当我们分析现代集体行动的周期时,我们发现,破坏性方式并不是最普遍的(Tarrow 1989a: ch. 4)。支持破坏需要依靠高水平的参与、当权者的失衡及对暴力和常规手段诱惑的抵制,而在上述三个方面,破坏性斗争的方式虽然有力,却不稳定。

第一,像我们将在第八章里看到的那样,除非有正式的组织投入运动,人们对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很难在长时期里保持不变。事实上,运动一般不喜欢正式组织参与,并很少能控制正式组织,即使真的控制了运动组织,也常使它们远离破坏方式。20世纪60年代,皮文和克洛沃德在他们对“全国福利权利组织”

的研究中,就发现了这一点。该组织领导曾决心大量发展其成员队伍,结果却因此丧失了破坏性运动力量的源泉(Piven and Cloward 1977:ch. 5)。

第二,通过破坏,运动企图使当权者失衡,而当权者失衡的情况很少能长时期地持续下去,尤其在警察态度坚定和上层精英团结时。最终每个新发明的战术都被警察的新战术化解。在缺少暴力的情况下,组织者很快无计可施,无法继续挑战当权者,鼓励支持者,并吸引公众的兴趣。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设计和完善的警察实践使抗议成了常规,消除了大部分抗议可能造成的伤害。

第三,面对坚定的警察和统一的政府,社会运动中通常占大多数的不太积极的参与者,倾向于悄悄回归个人生活,把战场留给最积极的人去负责。但积极分子更可能选择暴力,而不是和当权者保持一种不确定的关系。结果破坏就把运动分裂为倾向暴力的少数积极分子和倾向常规手段的大多数温和分子,从而使破坏本身成为一种不稳定的斗争方式。

常规的集体行动

人们最容易采用他们惯于使用的集体行动形式,这一点极好地解释了常规形式比其他形式流行的原因。^⑧大多数现代斗争形式已经成为被普遍认识 and 理解的斗争手法的一部分。经过一个类似于拉塞尔·哈丁所说的“常规合约”(Hardin 1982)的过程的协调,它们至少涉及运动参与者固有期望的战略调整(Schelling 1960:71)。同时,因为它们需要的投入较少,涉及的风险小,所以能吸引大量的参与者。这正是罢工和游行一类常规斗争形式的主要吸引力所在。

罢工和游行

历史上以破坏性对抗开始的斗争形式,是怎样模式化乃至常规化的呢?罢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在英语中,“罢工”这个词最早好像起源于18世纪,指水手“击打”船帆以示不愿工作的行为(Linebaugh and Rediker 1990:240)。与此同时,它也出现在许多欧洲语言中,说明它的起源可能不止一个(Tilly 1978:159)。

虽然罢工现在都与工业有关,却产生于工业化之前,并常常涉及各种社会行动者,但其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无产者”。^⑨罢工不同于和领主制紧密相连的农民起义,当它被创造出来时,没有和任何特定的职业相连。因为罢工能获胜逐渐广为人知,罢工便从熟练工人扩散到非熟练工人,从大工厂扩散到小公司,从拒绝劳动扩散到拒绝生产,从工业扩散到农业再到公共服务业。今天,罢工已成为集体谈判机制的实际组成部分,并在挑战者和反对者双方中,拥有自己的法理、仪式和期望。

罢工作为工人向资方施加压力的手段逐步发展,在19世纪还成为阶级团结的力量源泉。这一点既反映在不断增长的跨行业和跨地理界限的默契支持上(Aminzade 1981:81—82),也反映在罢工为加强团结而变得越来越仪式化上。罢工者举着旗帜,吹着号角,喊着口号,唱着团结的赞歌,在工厂周围游行,引导他们的工友加入他们的队伍。有时,也通过把拒绝罢工的工人“逐出工人圈层”来达到团结的目标。

罢工可以和其他斗争形式,如占领工厂、游行、工业破坏、请愿和合法活动等结合起来使用:通过集会组织发动工人,选举罢工委员会;特别富于战斗精神的部分组织者将试着引来其他工人;纠察员堵住工厂大门,不准原料运进来。罢工者为了取得群体的团结,在罢工中可能从工厂游行到工人阶级居住区,如果极

其成功的话,会使商人关闭店门,家庭妇女也出来加入游行队伍。从自发地停止工作开始,罢工成为工人建立和表示团结、显示他们的挑战、寻求内部支持,并在力量增强的形势下(即使只是暂时的)与对手解决分歧的主要手段。

和罢工一样,游行也是以破坏性的直接行动开始、最终被制度化的斗争形式。它主要来源于宗教上的列队行进仪式,似乎随挑战者从一个目标转向另一个目标,要么去袭击对手,要么去陈述要求,逐步发展起来。^⑩

当游行者提出世俗的要求时,游行就和宗教队列行进截然不同了,但它的标志仍类似于宗教圣像。在历史上,公众游行是与民主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它首次以完全现代化的形式出现于1848年革命的民主阶段^⑪,因为当时新的法兰西共和国领袖们不能否决人民呈递请愿的权利(Favre 1990:16)。此后,在公共场所和平游行就成为法国各种各样运动引人注目的标准形式。到19世纪末,游行已变成各个社团和群众党派公开自己的要求和证明自己力量的主要手段。

游行不像罢工那样,需要利用某种关系来阻止劳动或扣留产品以吸引支持者,它可以迅速地从—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并联合起许多社会参与者。它可以被人们用来为了某个主张而挑战对手,表现某个群体的存在或与其与另一个群体的团结,或用于庆祝胜利,或用于哀悼领袖的逝世。游行因而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模式。

由于游行和罢工一样被合法化了,所以它们生成了一种法理和文化(Champagne 1996; Hubrecht 1990)。组织者为了不让游行者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游行司礼官(Cardon and Huertin 1991:199),形成重复的一系列路线、口号

和标志,并有一种正规的行进秩序。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派系倾向于不同的行进路线,所以一个群体的政治色彩常常可以从行进路线上来测定。最终甚至连没有参加游行的人——新闻界、维持秩序的军队、旁观者和对手——都成为游行活动的一部分(Favre 1990:18—32)。

专制国家几乎总是把游行当作潜在的暴乱,结果导致对和平抗议者的野蛮镇压,有时甚至引起革命,就像1905年1月在俄国那样。而法治国家已经把游行当作正常的甚至有益的实践,游行得到警察的保护乃至引导,这样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在华盛顿市,在罗马和巴黎,警察还就如何最好地举行游行活动给游行组织者提出友好建议(della Porta, Fillieule, and Rieter 1998; McCarthy and McPhail 1998)。这样,抗议游行就从难驾驭的一地到另一地的抗议者运动,转变成了平民政治主要的非选举表达方式。

100

斗争手法变化的路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手法有了许多变化,有的源于前几章所描述的环境变化,如出版和结社、国家创建和工业化;有的源于某些特别的斗争形式的内部演变和制度化;有的源于新运动的发明及运动的特别组织和主张。我们可以在四个主要范畴内描绘斗争手法变化的路线:破坏性斗争形式的制度化、继承形式边缘上的革新、与警察和其他参与者的战术互动,以及范式性变化。

斗争的制度化

我们先前已看到,罢工和游行怎样变成了现存斗争手法的一部分,而这种制度化的模式几乎到处一样:运动破坏阶段的骚

动渐渐消退,而警察对运动的控制却越来越熟练,结果运动战术被制度化,并企图通过谈判和妥协,为他们的支持者争取具体的利益——这条路线经常成功,其代价就是使运动转向一个政党或利益群体。

有时,政治参与者还学会避免使用招致镇压的破坏方式,并将这类破坏方式淘汰。例如,在1851年爆发的反对路易·拿破仑政变的起义中,法国的蒙塔格纳人就放弃了他们曾用过的“武装游行”破坏方式。^⑫有时,由于当权者学会了宽容或助长斗争形式的使用,对立形式本身被制度化。为了赢得支持者要求的或当权者提出的让步,运动领导人往往会从对抗转向合作。尤其当一个政治盟友上台之后,这种情况特别明显。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非的民主运动中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Klandermans, Roefs, and Olivier 1998)。

米歇尔斯之后的观察家在社会运动中所发现的常见目标转移模式,也与上述战术变化相同。不过,选择了体制化道路的团体都能得到补偿。普通百姓更可能以他们了解的集体行动形式参加斗争,而不会冒直接行动可能带来变化无常和潜在暴力之险。警察更可能冲向拿着棍棒和挥舞着铁链的示威者,而不是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一旦运动所选择的行动方式被定形为常规,它就变成了传统手法中众所周知并预料得到的一个部分。正如卡夫卡在他最有预见性的一个故事中写的那样:“豹子闯进寺庙,将献祭的大水罐喝干,这种事反复发生多次后,就可以提前预测,从而变成仪式的一个部分。”(Kafka 1937:92—93)

边缘上的革新

即使在继承下来的集体行动形式中,也有越来越多的革新和自发变化。例如,利用游行的标准程式,游行者可以装扮起

来,挥舞着干草叉或者活动扳手行进,以示自己的战斗性(Lumley 1990:224),或者还可以带着象征他们斗争目标的道具行进。女权主义者装扮成女巫,以嘲笑被男性对手固定化的传统女性陈规(Costain 1992:49);和平主义者戴上骷髅面具,以象征他们对核屠杀的恐惧;反对严厉的移民入境法的巴黎人,拎着纸板手提箱游行,以把他们的抗议和纳粹的驱逐相联系;反对对儿童实施性犯罪活动的抗议者,像1996年在比利时所做的那样,穿着白色的服装游行,以示受害者的纯洁。

从短期来看,通过给集体行动的常规形式添加戏剧化的、狂欢的或残暴和威胁的成分,边缘上的革新可能只是使集体行动的常规形式变得生动一些而已。而从长期来看,革新可以被定形为全新的形式。例如,20世纪90年代法国卡车司机用卡车封锁道路,似乎和20世纪60年代学生封锁大学建筑差不多,却产生了更严重的破坏性作用。

战术互动

集体行动形式的革新常常产生于抗议者和其对手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在工业关系史上一目了然:当雇主用把工人关在厂外的战术来打击罢工时,工人发明了静坐罢工,并新增了占领工厂的斗争手法(Spriano 1975)。到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时期,占领工厂已成为常规,拥有其独特的仪式、角色和活动(Tartakowsky 1996:56—57)。为了保护罢工的合法性,并保护工厂免遭可能的破坏性占领,关闭工厂最终在许多国家被宣布为非法,而占领工厂的斗争形式却仍然得到运用。

在美国民权运动和试图镇压它的南方警察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相互作用过程。道格·麦克亚当根据一份对运动活动的详细分析测定,每当运动领导人面临参与者不多或反抗不力的

危机时,运动将通过有选择和有创造性地使用自己的手段,智胜对手并增加参与者,把集体行动的阈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83)。所以,新的斗争形式经常出现于国家的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的辩证中。

范式性变化

102 由于斗争手法经历了长期而缓慢的历史演变,用“范式性”变化这个术语来描述人们表现其主张的方式,可能有些令人惊奇。实际上,尽管需要使集体行动在文化预期中生根,“范式性”变化还是很罕见。但是,它确实发生过,这可以从本章和前几章的例子中推断出来。18世纪斗争形式从呆板到灵活转变,19世纪罢工和游行的发明,20世纪非暴力抵抗形式的形成:如果在人们提要求的方式和当权者回应的方式上没有重大的突破,这些现象就无法解释。

当一种新形式被“发现”时,它对新形势的适应性立刻明显表现出来,它会被广泛使用,迅速传播,给人一种取得巨大突破的印象。例如,1989年东欧民主化运动迅速扩散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发现:许多公民有同样的感觉,普通的公共表达方法可能是允许的,并可以成功(Kuran 1991; Lohmann 1994)。

突破传统手法的一个关键在于佐尔伯格所谓的“疯狂时刻”,即抗议过程的高峰,那时“一切都是可能的”,“手段和表达之间的障碍崩溃了”,“政治打破了它的限制,侵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政治动物不知怎么地超越了他们的命运”(Zolberg 1972:183)。^⑬1968年5月的法国就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当时出现了新的社会参与者和价值体系;人们在危险中发明了新的集体行动形式,并对它们进行了实验;即使斗争过程在幻灭和反唇相讥中结束后,一些创新仍然保留下来,尽管只是以简化了许多

的形式。

1968年后,法国街头游行倾向中的变化,就是这样一种创新。在五月事件发生前,游行是大众政党和工会领导下的大规模有序活动,是为了普遍的计划和要求而发起的固定斗争形式。密集的游行队伍排着队伍行进,非常严肃,近乎有着军事纪律。而1968年后,街头游行已远不是什么有序的活动,它夹杂了各种游戏符号、古怪的装束和流行歌曲演唱,并且不是因为过去那种广泛的议题,而只是因为个别问题而频频出现(Ernst 1997; Filieule 1997:194—195)。它甚至经常成为家人和朋友外出的场合,以致很可能像被防暴警察包围那样,被街上卖热狗的商贩团团围住,并很可能使身穿绿色制服的环卫工人,而不是把汽车砸得翻转过来的人,尾随其后。典型的变化,用佐尔伯格的话说,“像一股洪流,冲散了许多泥土,却也在它的余波里留下了冲积的沉淀”(1972:206)。

多种形式的运动

社会运动并不局限于特殊的活动类型,而得采用各种活动形式,无论是单独的,还是结合起来的的活动形式。这种灵活性使它们能在集体行动的联合战斗中,把它们的要求和参与者的广泛联合结合起来,并把它们的中心转移到政治活动内外。^⑭19世纪的社会运动就已经如此。历史学家杰克·布洛克在描述美国禁酒运动时写到,运动成员“引导调查、祈祷和歌唱,进入酒吧、公共散步场所和游行队伍中,并参加会议和集会……请愿,周旋于候选人中,拉选票,选举和密切注意选举投票”(Blocker 1989: xiv)。

当代运动的战术更加灵活,在把法国和德国的生态运动相比较后,迪特·鲁希特发现,两国中反对使用核武器者,一度都使

用了有表现力的或工具性的、对抗的、暴力的或常规的集体行动形式,把人们团结在战斗、冲突和斗争中(Rucht 1990)。美国妇女运动也具有同样的灵活性,当里根政府上台时,“运动群体从在政府机构内部做工作……转向更集中于选举事件和上升的政治抗议”(Costain 1992;126—127)。他们的活动包括“在教堂召开讨论法律变革的茶话会,以及到州立法机构的无数次往返”、“反听证”和“畅所欲言”(Stagenborg 1991:29,44)。总之,现代社会运动是一个包括多种形式的现象,涉及范围从有形地和象征性地攻击统治体制的抗议,到在常规政治领域内展开运动的抗议。

结论

集体行动根据斗争手法的不同,呈现出三种基本类型:暴力型、破坏型和常规型。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挑战、不确定和团结的特性。第一种暴力型的斗争形式最容易发起,但在正常情况下,它仅局限于没有多少资源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企图强求破坏,并甘愿冒着被镇压的危险;常规型斗争形式则与之相反,其优点在于:它是建立在为人们所理解、为高层精英所接受甚至推动的程序之上的。这即使它在斗争手法中占多数,又使它易于被制度化,缺少鼓动性;第三种破坏型的斗争形式至少能在一段时期内冲破常规,震动旁观者,使高层精英感到困惑。它是斗争手法中大多数创新的来源,也是运动中的力量来源,但它不稳定,并容易产生暴力或被变成常规。

生态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这类运动,在抗议中把挑战、团结和变化相结合,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成功地得到持续的支持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已知的、被广为理解的模式化斗争手法作为基础。由于它们的领袖

在这些基本模式的基础上,有技巧有创造性地进行革新,导致其抗议行为能招来更多的追随者、吸引第三方的注意和挑战对手,从而使它们很好地适应了变化。

104

但是,即使有大量抗议事件出现,这些事件本身却并不构成运动。像马里奥·迪亚尼写的那样,除非这些事件被支持者和对手之类的人看作是更广泛的运动的一部分,不管有多么戏剧化,它们将保持孤立,而不会累积(Diani 1995:3)。挑战者必须以吸引追随者的方式,在社会网络的基础上,设计他们的要求,还必须通过机遇和限制的周期变化,让联系结构用关于现实、“我们”、“他们”和根本目标的共同界定,把他们彼此联系起来。这些就是用来建构和维持社会运动的主要“内在”力量所在,我们下面将对此进行集中讨论。

105

七 构造斗争

在法国革命的第五年，格勒诺布尔的革命行政权委员写道：

因为公民选择特殊的服饰而对他们进行侮辱、挑衅或威吓，这是有违宪法章程的。服饰应该由品位和规矩来决定；永远不要厌恶惬意的简单性……抛弃那些战斗的标志，那些作为敌军制服的反叛装束吧。^①

看来，这位委员是了解象征符号的。在他写这些话的那十年间，法国人以新的服饰、节日、问候、公共建设工程和纪念碑的形式为核心，为重塑政治文化开展了第一次系统化尝试。^②随着革命的传播，革命标志也得到传播。简朴的服饰表现出共和党人与贵族的差异（Hunt 1984:75—76），革命支持者必然挑战大胆招摇过市的衣着华丽者，所以连国王也得在头上扣一顶佛里吉亚软帽，直到他因逃往瓦雷讷的计划失败而被砍头为止（Schama 1989:603—604）。

从俄国共产党人简单的束腰军装，到意大利法西斯高官身上的闪光饰品，再到印度民族主义者简单的咔叽布衣服和拉美游击战士肮脏的胡子，每场现代社会运动都努力采用象征主义

动员手段。因为社会运动企图取消“使现状合法化的主流信仰体系,代之以标新立异的动员信仰体系,去支持寻求变革的集体行动”(Gamson, Fireman, and Rytina 1982:15),所以运动领袖为了争取支持和区分敌我,纷纷提出反叛的象征符号。

但在社会运动的象征政治中,存在着一个悖论:既要发展有活力的象征符号,使之产生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引起变革;又要 106 为扎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者提供他们熟悉的象征符号。这对于有大量文盲参加的法国革命来说,简直难以想像,加上书报特别是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与运动宗旨对抗的信息的干扰,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他们的公开行动越来越多地采用“表演”形式,原因之一就是社会运动要和娱乐界、新闻界、其他运动及政府垄断舆论的企图相竞争。社会运动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在新旧象征符号间斡旋,因为对于旧的继承下来的象征符号,人们会由于太熟悉而反应迟钝;对于新的令人激动的象征符号,人们会由于太陌生而不能领会其意义。

这个难点给分析家和社会运动实践者带来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意义是“构建出来的”。^③但是,在把斗争转化为运动的过程中,符号构成与潜在的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运动是否一般从变化中的利益和冲突领域开始,对文化材料进行利用和修正,以使其成为针对运动支持者的传统?或运动是否都像某些后结构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用凭空捏造的符号来构造集体行动?

第二,社会运动的预期主体如何阐释挑战者展示的象征符号?知识分子可以为运动预期接受者解释象征性材料,但是我们能确保普通人能同样地“解读”这些材料吗?特别是,我们怎么能根据被消除声音的社会主体来推断符号交流接受方的情感

作用力呢？

第三,在讨论社会运动时,我们经常听到“认同政治”这个术语,意即以集体认同的名义展开斗争。可是,这些认同是像那些旧服饰一样被继承下来用于斗争的(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本质先于存在”),还是为了斗争的目的而拼凑起来的呢?没有多少人拥有单一的、一致的认同,大多数人的认同都经过了改造和合并,被重新分类,与政治挂钩,插入了新内容,抛弃了旧属性(Tilly 1997a:ch.7),运动怎样从如此多变的材料中编织出创立完全统一的群众运动所需要的团结和动力呢?

这些问题的实质,对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来说,是极其基本的。^④如果运动与其对手之间的斗争只是认知上的和象征性的,那么社会运动就会被理解为不过是象征符号的信息发布中心,不是反复利用继承的符号意义,就是编织新的符号意义。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运动和当权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解读为一种文本关系——对立修辞之间的一种对抗;如果意义是从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和政治互动中构造出来的,那么我们必须问,运动宗旨的“文本”又如何涉及竞争中的利益和冲突语境(Glenn 1997;Kertzer 1998:175)及被运动吸引者的情感呢?引起本章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则是:在斗争过程中象征性话语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政治文化到战略构造

在过去的十年中,文化历史学家、文化社会学家和政治人类学家为了研究革命变化,又回到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上。乔治·摩西作为一位重要的先行者,重建了19世纪德国民族的神话世界。他在《大众的民族化》(1975)一书中,受雅各宾派对法国革命象征符号的操纵方法的启示,从法国转向德国,将所有大众政

治的传统视为一种戏剧形式。这种形式固定在仪式中,内在地是反议会的,导致人民及其领袖之间形成一种直接的关系(p. 2)。

但如果意义是由修辞手法来“确定”的,那么,为了给将来的动员提供意义,是否只要建立一种话语就够了?即使像我们假设的那样,社会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它的象征符号,其信息又怎样长期跨越不同空间,在不同的社会对象中被接收和理解呢?它会不会像《圣经》一样以其独创的形式得到应用呢?它是否必须根据当地选民的文化成见来重写呢?或者它是否将由运动发起者有选择地与当地文化标志结合起来使用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对它的修改和借用将有助于我们回答最后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主题的变奏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独特理论,对工人阶级在与集中资本不可避免的冲突中的主要作用寄予了厚望,但没有论述动因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结合了历史认识论,所以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必然形态,只是需要等待大众达到利用成熟历史条件的地步。这就诱使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去创建他们的组织,并等待资本主义矛盾愈演愈烈。

对某些人来说,等待的时间太漫长了,因此,为了抓住资本主义瓦解的时机,建立组织武装开始优先于加快资本主义进程(Michels 1962)。在等待中,适应现状的调整,例如,对工团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接纳(Roth 1963),对农民社团条件的适应(Tarrow 1967),或对中产阶级支持的寻求(Hellman 1975),都侵蚀了革命的热忱。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东欧时为止。在东 108

欧,面对专制政府和不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列宁借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并用清醒的党的领导取代无产阶级的主要作用,把党作为运动的“首脑”,而将工人作为运动的“主干”。结果俄国的形势和列宁的创造性构想就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体系,使其从一种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变成了一种由精英领导的组织和动员理论。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它对工人阶级的念念不忘已没有多少紧迫性。因为在世界上以农民为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无产阶级的条件下,人们又该怎样发动革命呢?当运动传播到农村地区并渗进农民的末世论时(Hobsbawm 1959),当先锋战略碰到比沙皇俄国更有伸缩性的市民社会时(Gramsci 1971),就连列宁的先锋思想也开始面临挑战。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起义中遭到蒋介石的沉重打击(Perry 1993),以工人为中心的战略和先锋战略因此成了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体——“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既没有简单回归马克思的工人中心论,也没有彻底否定列宁主义先锋组织,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形成了以农村为根据地、以来源于农民的先锋队为领导的殖民地人民打击寄生城市的斗争理论。毛泽东还以中国文化象征符号为核心,动员了一批追随者,使运动在反对外国侵略军方面比反对国内资本家和地主方面更为有效(Johnson 1962)。

上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例子说明,运动的象征符号变化,既非直接来源于文化,也非由意识形态随意捏造,而是在运动的各种变化背景下战略互动的结果。集体行动的符号既不能

简单地解读,以为与人们所处的斗争条件无关;也不能看作是本土文化在政治战略上的简单投射。运动发起者将从潜在的文化符号库中,选出他们希望能在他们要吸引的群体的文化理解中,传达他们自己的信仰和渴望以及他们的斗争形势的符号(Laitin 1988)。我们需要一个与社会运动互动本质相适合的概念,把主题与背景相联,把文化的基本原理与斗争符号学相联。一群当代学者就在集体行动“框架”思想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集体行动框架

伯特·克兰德曼斯在他对集体行动框架概念的综合分析中写道:“把社会问题转入集体行动,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社会行动者、媒体和社会成员共同阐释、定义和重新定义形势的过程。”(Klandermans 1997:44)在一系列重要文献中,社会学家戴维·斯诺和他的合作者采用了厄文·戈夫曼(Goffman 1974)的集体行动构造概念,认为存在一种特别的认知理解范畴,即集体行动框架,它与社会运动为行动建构意义的过程有关。^⑤用斯诺和班福特的话说,集体行动框架是一个

阐释图式,它能通过在人们目前或过去的环境中,有选择地强调和解析目标、形势、事件、经验和行动序列,来简化和浓缩“那个社会”。(Snow and Benford 1992:137)

集体行动框架是一种突出的策略,它“不是强调和增加一种社会状况的严重和不公,就是把先前被看作不幸而能谅解的事情重新定义为不公正和不道德”(Snow and Benford 1992:137)。社会运动非常认真地致力于“命名”不平、使它们相互联系和构建更大的意义框架的工作,它要构建的意义框架将与群体的文

化倾向产生共鸣,并能向掌权者和其他人传递一个相同的信息(p. 136)。

但是,运动的发起者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文化符号来改编意义框架,否则,他们只能反映社会价值观念,而不能通过挑战它们。列宁和毛泽东都使他们的运动理论框架与特定背景下的活动相适应,在目标群体的文化与他们自己倡导的价值和目标之间的交叉点上,形成了他们的运动理论框架。这就是斯诺和他的同事所说的“框架调整”(1986)。他们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中,描述了四种调整过程,由此运动将形成与现存文化有关的宗旨。前三种过程只是在符号上增加些创新,通过“框架连接”、“框架放大”和“框架延伸”,使运动把现存文化框架和一个特定问题或困难联系起来,澄清和鼓励有关特别问题的框架,并扩大一个运动的基本构架范围,使其能包容更广泛的利益或观点(pp. 467—476)。第四种过程——“框架转化”则是最有挑战性的策略。它是寻求真正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中最重要构造方法(p. 474)。

框架调整过程并非总是简单的、明确的或没有争议的。首先,运动的领导者要与其他运动、媒介和政府争夺文化霸权,而他们的对手都拥有可任意支配的无比强大的文化资源。其次,过分适应其社会文化的运动会丧失抵抗力,并疏远最富战斗性的支持者。因为哪个社会占主导的价值会不支持现有权力格局呢?第三,普通民众通常有他们自己对事件的“解读”,往往不同
110 于其领导者所提出的看法,而吸收了精英对他们的失败的解释。为了破除这种思维习惯成分,常常有必要在认知动员上做出相当大的努力(McAdam 1982)。为此,人们常利用两种呼吁的力量。

不公正和情感

有人围绕威廉·盖姆森所说的“不公正系统”，建立了斗争政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话语模式(Gamson 1992a:68,73)。小巴灵顿·莫尔以同样不平的口气写道：“任何反压迫的运动都得给现有疾苦提出新的诊治和补救，由此使疾苦受到道义上的谴责。”(Moore 1978:88)同样，道格·麦克亚当也说道，“集体行动爆发前，人们必定把他们的境遇集体地定义为不公正的”(1982:51)。盖姆森则总结道，“焦点是造成满腹怒火和坚定意志的义愤”(1992b:32)。

但是，往往很难让胆怯的人们相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受的侮辱并非命中注定，他们可以将其归结于某种原因，而且他们可以采取集体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可察觉的不平等会激起不同的情绪——愤世嫉俗、茫然的嘲弄和屈从。”(Gamson 1992b:32)斗争可能针对不平，确定一批支持者，确定一个敌人。但威廉·盖姆森写道，“如果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私下采取不同的解释，那么斗争力量就嫌不足。潜在的挑战者必须公开分享一种不公正框架，以使之被集体利用。”(1992a:73)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是：在确认不公、归罪他人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整个框架中记录不公。

大多数斗争构造“工作”是认知上的和可估价的——就是说，它识别不满，并在与其他重大不满相对照的背景下，将其转化为更广泛的要求。但是构造工作不应该变为毫无结果的理论家的空想；不利用或创造情感的力量，就不可能完成把要求变成行动的重要转化。维尔塔·泰勒写道，情感是“清楚表达文化观念、结构性不平等和个人行动之间联系的场所”(Taylor 1995:227)。她还写道，“可以说，把社会运动与主流体制相区分的，恰是情感所提供的‘能量’。”(p.232)

与绝望、屈从和羞愧这类情感相比,热爱、忠诚和尊敬显然更有动员力。有些情感,如愤怒,就很有“活力”,并很可能激起抵抗;而屈从或沮丧则很“没有活力”,并很可能出现在运动遣散阶段。^⑥未来的运动方向将围绕斗争高潮形成的情感支点展开。运动发起者在很长时间里,将通过讨论、例行公事和在不公正发生的场所或过去赢得胜利的场所举行集会,尽力再现这些情感支点。^⑦

宗教作为一个非常可靠的情感源泉,成为一个不断出现的社会运动构造源泉。它为运动领导者提供了一套他们可以获得和借用的现成符号、仪式和团结(Smith 1996)。民族主义也一样,没有纯粹机械的阶级辩证隐喻,却有更多情感上的潜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拿有许多民族主义纪念碑与很少有社会阶级纪念物相比,不无嘲讽地问道,是否有人能想像“一个无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坟墓”? (Anderson 1991:10)

使人们承认社会运动中的情感力量的,不是最近的其他运动,而是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受人欢迎的学术著作充满了对促使人们参与妇女运动的强烈情感的描述”(Taylor 1995:26—27)。维尔塔·泰勒写道,“研究妇女运动的学者们指出,女权主义者相互作用的特征,一方面是爱与关怀,另一方面则是愤怒、痛苦和仇恨。”(p. 229)^⑧

社会学家阿里·霍切斯希尔德指出,特定的群体形成了“情感文化”(Hochschild 1990),而许多运动就建立在故意培养的仇恨或愤怒的基础上。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长期而折磨人的斗争,只能被看作是故意在煽动彼此仇恨,否则很难理解;波斯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人故意糟蹋穆斯林妇女,其目的不仅是要让他们自己的士兵变得麻木不仁,还要侮辱他们的受害者(Eisenstein 1996:167);就连种族自豪,一种由20世纪60年

代美国“黑人力量运动”的分支所培养的情感,也包含形式化的口头暴力表现(Gitlin 1995:ch. 1);在保护艾滋病者权益联合会运动中,动员和愤怒之间的联系则可能最为明显。“愤怒,”一位领导者写道,“是创造出来的东西;保护艾滋病者权益联合会就是制造愤怒的机器。”(引自 Ernst 1997:3)

旨在动员群众在斗争背景下摆脱顺从和采取行动的那些框架和情感就是建立集体行动文化的基础。为了在包括国家、社会对立者、好战分子和目标群体在内的所有平行社会行动者中操纵自如,运动领导人从文化宝库中选取的符号将与有行动导向的信仰结合。最重要的是,为了把消极顺从转为积极行动,集体行动文化被赋予了一种情感效价。

舆论动员和媒体设计

集体行动的象征符号可以通过两种主要方法来确定:从长远看,它们将通过舆论形成和动员的毛细作用进入人们的意识; 112
从短期看,它们将通过由集体行动本身产生的转变,让人们铭记它们。第一组过程显现于运动同文化和媒体的独立来源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中,第二组过程则需要注意斗争过程本身中的表演成分。

伯特·克兰德曼斯在 198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舆论形成和舆论动员作了重要区分。舆论形成源于社会系统和亚文化中无计划的意义汇集,而且它的产生不受任何人的直接控制。克兰德曼斯写道,在这些网络和亚文化内部,“社会对比过程导致对形势的集体定义”(1988:175)。这些集体定义通常隐藏在官方文化的背后——例如,直到 1989 年,在东欧国家公民正式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事实背后,就隐藏着完全与之疏远的意识

(Kuran 1991)。而在西方社会中,汤姆·罗尚则看到运动表达过程的两个步骤:一是由“关键团体”来进行的舆论形成过程,没有必然的运动使命;二是明显的运动动员过程,它的目标来源于批评产生的“文化举动”(Rochon 1998)。

舆论形成造成对形势的集体定义,但仅此而已。它既不能造成集体行动,也不能为那些希望领导人民开展社会运动者提供行动线索。要发起集体行动,必须展开舆论动员(Klandermans 1988:183—191)。舆论动员由故意在部分人群中传播一个社会行动者的观点构成(p. 175),运动组织就产生于那些试图进行舆论动员的社会行动者中(p. 184)。在舆论动员过程中,运动组织与其他组织、教会、政府、媒体和广泛传播的文化偏见相互竞争,但这种相互竞争常常是不平等的,就像下面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

舆论服装

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准备反击,人们为此在美国华盛顿及西海岸组织了多次和平示威(《纽约时报》,1991年12月27日,p. 17)。在这些示威活动中,许多物理象征都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反战运动以来所保持的对抗性亚文化,而在公众舆论普遍支持美国总统开战政策的大气候下,示威者用以表示反对的主要符号却是爱国主义的,就像《今日国家时报》(*Now National Times*)为其读者概括的那样:

113 有美国国旗,有黄丝带,还有关切的父母、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及朋友,他们懂得:支持我们的中东部队的最好办法是将他们活着带回家。(1991年3—4月号,p. 1)

在这次抗议运动中发生了什么？肯定不是对美国梦所传承下来的象征符号的机械模仿，运动领导人采取的自觉策略是，拓展当权者和反抗者双方认同的符号的反抗意义。这种尝试虽然巧妙，但是面对受欢迎的总统对所谓希特勒式恶棍所发动的正义战争所得到的普遍支持，这些一致认同的象征符号却没有一点影响。因为舆论服装不会动员人们与形成它的制度相对抗。

看来人们很难构建真正的对立符号，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可能运动领导者一般希望不超出政治舆论的界限，并且实际上大多数美国和平示威者都这么想。第二，国家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致敌对信息也得根据舆论来设计。第三，也是与当今社会交往结构更直接有关的一点是：希望与更多公众交流的运动，要么得有“实行”抗议的内部资源（Glenn 1997；Meyer and Gamson 1995），要么得利用媒体来抗议。而媒体对它们所选择和传播的符号，远非持中立态度。

媒体设计和运动策略^⑨

1966年秋，在比利时，随着一连串可怕的谋杀花季少女案被曝光，警察的无能、冷漠，可能甚至还有对恋童癖活动的参与，也被披露出来。成千上万名说佛兰芝语或法语的比利时人，在几乎没有事先计划或协调的情况下，由受害者的父母带领着，身穿代表受害者纯洁的白色服装，在布鲁塞尔街头举行了游行和集会（Rihoux 1997）。几个月后，为了找出高层的腐败和传播运动信息，受害者父母的支持者又发表了一篇题为“白色游行”的通讯。

20世纪50年代，当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研究“早期的”反叛时，人们常把象征性仪式的使用归因于运动“先于政治的”性质（Hobsbawm 1959：p. 2；ch. 9）。而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功能，

则生动地强化了视觉象征符号的作用。使用视觉象征符号的一个原因是有助于构建集体认同,另一个原因则是把运动的悲喜、残暴或游戏情绪投射给旁观者和对手(Lumley 1990:223),大众媒体恰是发挥这两个作用的基本途径。

广播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法国政府广播电台忠实地报道了1968年5月发生的事件,使全国各地的人获悉关于游行、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消息,促使运动迅速传播开来;冷战期间,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Radio Free Europe)也在向东欧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东欧国家的反对派学会如何把新闻稿投向这些媒体之后。而电视,因为具有以浓缩的视觉形象概括复杂形势的独特功能,则造成了运动战术上的革命。

这一革命的程度首先显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基尔布维茨和谢勒尔写到,民权运动“之所以是电视头条反复播出的新闻题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视觉成分”(Kielbowicz and Scherer 1986:83),运动的出现与电视现场直播同时发生,这在三方面促进了运动:首先,电视引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北方观众,对长期被忽视的怨愤的重视;第二,运动的和平目标与警察的凶暴之间的对照被真实地呈现出来;第三,电视成为运动中的人员进行交流的媒介。电视通过直观地展现人们如何在快餐馆静坐示威,如何为民权举行和平游行,以及如何应对警察和消防水龙头的攻击,促进了运动进展信息的传播。

电视影响的第二个主要实验场是学生运动。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同时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学生使用了许多相同的标语和活动形式(McAdam and Rucht 1993),这在部分意义上是电视影响的结果。两位研究媒体对社会运动影响的学者总结道,“对于那些自身经历与电视上的情形类似的观众来说,这种媒体

的关注可以用来培养集体意识,为社会运动奠定基础。”(Kielbowicz and Scherer 1986:81)

电视影响突出的第三阶段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政治宗教通过大众传媒变得普及。在伊朗和美国这样大相径庭的国家中,宗教人物开始熟练运用媒体来传播他们的政治宗旨。在伊朗,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利用广播和磁带,传播他们反对西方国家批评伊朗政府的言论;在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则利用诸如街区教堂的讲坛或橄榄球场之类的不同渠道来传播他们的宗旨。^⑩

媒体为舆论形成提供了一个扩散的源泉,这是运动本身无法轻易办到的。新的信息,主要是阐释运动的新方法,常常首先出现在公众领域,后来才产生出运动发起者的集体行动框架。例如,威廉·盖姆森在研究美国新闻界 20 世纪 50 年代和 80 年代对两次核事故的报道时,就发现,记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88)。

115

运动一旦形成,就会利用同情它的记者的报道(Gitlin 1980:26)。不过,更多情况下,媒体会选择以特定的方式叙述新闻,这样有利于销售报纸或吸引读者。因此,1997 年在比利时发生的反对雷诺公司关闭一家工厂的罢工中,当大批的法国和西班牙雷诺公司工人跨边境抗议布鲁塞尔决定时,给这场反抗贴上“欧洲罢工”标签的就是新闻界(Imig and Tarrow 1997)。新闻界的动机主要是想以有新闻价值的方式为国际读者叙述新闻,而不只是同情罢工工人。

这个故事突出了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问题:媒体在报道运动事件时,并不是保持中立的旁观者。虽然媒体可能不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Molotch 1979:75),但它们肯定不会为社会运动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媒体报道新闻至少是为了做生意,它们

只有报道读者或观众感兴趣的东西,或编辑认为读者或观众会感兴趣的东西,才能有生意。

媒体报道运动的方式一般受传媒行业结构的影响。正如基尔布维茨和谢勒尔写到的那样,运动受媒体对戏剧性的、有看头的事件的喜好影响,受记者对官方消息的信赖影响,受新闻周期或规律的影响,受记者的职业价值观念或倾向的影响,还受媒体环境——主要是竞争程度——的影响(Kielbowicz and Scherer 1986:75)。结果,运动组织借用媒体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就受到了限制。

在对运动行动的洞察方面,媒体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媒体越来越表现出的一种“情绪”是公共生活是腐败的,这种观点使读者或观众为此感到轻松,他们终于有理由怠惰或不接受动员;^①另一方面,媒体对发起运动的戏剧性活动的兴趣很快消退,除非它们改变或增强常规。当抗议逐步升级时,媒体虽会继续提供报道,但很快就转向优先报道暴力或奇异的东西。

媒体倾向于关注什么能“制造”新闻。这就强化了常在反抗过程中出现的从破坏向暴力的转变(Gans 1979:169)。与无论多壮观的沿街和平游行相比,一名学生在和平反战抗议中向警察队伍扔一块石头,或者异装癖者身穿华丽的异性服装为争取同性恋权利而游行,具有更高的新闻价值。这样,媒体“使在任何活动积极分子群体中发现的战斗倾向更明显”(Kielbowicz and Scherer 1986:86),在本可能和平的运动中,为形成破坏或暴力提供了刺激。^②

建构斗争

虽然现存的文化框架和媒体作用都制约了运动的形成,但新的运动还是不断涌现。它们中最成功的运动超越了其社会文

化体系,并在某些情况下造成了革命。这种成功之所以能实现,既不是因为舆论动员,也不是因为媒体设计,而是因为斗争过程本身。美国民权运动的例子显示了继承的文化框架与斗争过程中的战略选择相结合的斗争方式。

美国——重构权利

美国人总是非常自然地用权利这个概念来表达自己的要求,不管是少数派的、妇女的、同性恋者的和动物的权利,还是未出生者的权利,这一点十分显著。^⑬对美国黑人而言,权利常常在破坏中得到尊重。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主要依赖于这个观点呢?为什么“权利”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的斗争过程中,又成为许多其他运动部门的“主要理论”呢?(Snow and Benford 1992)

第一,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造成的结果:从平等的受教育权概念开始,最早的运动场所是在法院。美国黑人确信社会制度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但他们并没有自动想起权利这一习惯用语。在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出现以前,寻求合法权利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战术。正如查尔斯·汉密尔顿所写的那样,这种背景“造就了一批拥护宪法的律师骨干,他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权斗争焦点”(Hamilton 1986:244)。

权利成为民权核心框架的第二个原因是战略性的:平等机会是以传统美国政治话语为基础的,介于运动主要内部支持者、南方黑人中产阶级和那些从外部支持运动的开明白人“良心构成者”之间的有用桥梁。对黑人中产阶级来说,平等机会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对白人开明分子来说,美国人给权利赋予的价值与他们对美国黑人平等权利的否定之间的矛盾,最让他们感到不快。权利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扩大先前法庭上的成功,又可以

把白人开明分子和黑人中产阶级联系起来,由此形成运动的核心。

但是,民权运动的“权利”概念是否只是传统的美国舆论服装呢?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这一运动要等到60年代才爆发,它又怎样会获得如此大的成绩呢?答案是,权利只有在变化中的机遇结构内与一种创新的活动形式相结合时,才成为运动的主要集体行动。

- 117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伴随着最适度的平等机会权利框架,产生了一种具有高度戏剧性和对抗性的抗议实践,即非暴力直接行动。如果说权利理论有说服力地弥补了传统上处于附属地位的南方黑人和他们的开明白人支持者之间的隔阂,那么非暴力直接行动则把黑人中产阶级的消极无为转变成了行动主义。运动领导人详细阐明了存在于他们最传统的机构黑人教堂内的富于战斗性的静默,而不是去反对在警察暴力之下冒险造反的理论。正是非暴力抵抗活动,而不是继承下来的权利修辞,把文化静默带进了活动。

从一开始起,权利框架的转变就是交互式的。两类关键的社会行动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类是在没有严厉实行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立法)的城市中长大的一代大学生,另一类是那些让自己在电视上的行为使运动获利的白人权力结构代理人。当穿着整洁套装和端庄服饰的学生静坐、游行、示威、歌唱和祈祷时,警察却用暴力对付非暴力,用作战的警犬来对付和平的鸽子。白人掌权者的行为越凶暴和不人道,学生战术的道德优势就越显著,运动的计划就越合理。继承下来的权利修辞正是在斗争的过程中,才被转换成新的更广泛的集体行动框架。

民权运动的经验是,造反的象征符号不像过时的服装那样,被从文化储藏室里翻出来展示于公众面前,其新的意义也不是

凭空捏造的。造反的服装是在与对手和精英的对抗中,由继承的和新造的材料混合起来编进集体行动框架的。一旦形成,就不再只为造就它们的运动所有,而像在第六章中所描述的集体行动的模式化形式一样,也可以让别人使用。正如斯诺和班福特所指出的,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框架一旦在普遍混乱的背景下被阐明,就会成为“主要的框架”(1992)。以民权运动为例,作为开创性的民权运动构造工作的结果,“我们开始看到其他群体的政治性的增强,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环境保护者、老人、孩子、残疾人和同性恋者都组织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Hamilton 1986:246)。

框架和身份认同

“文化具有与比较政治相关的两个特征,它们既彼此不同,又彼此联系。”马克·霍华德·罗斯写道:

首先,文化是人们用来处理日常世界的意义系统……
其次,文化是影响人们对很多事情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的
社会和政治认同的基础。(Ross 1988:42) 118

至此,我们主要讨论了文化的第一个涵义;潜藏在表层之下的问题是:现存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制约和激活运动的呢?新的认同又是如何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呢?^①我们可以以集体认同为核心,从四个简要方面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概括。

第一,正如我们先前在讨论宗教在构造斗争中的重要性时所见到的那样,“天生的”或继承的认同通常是社会运动集合体的基础。但是运动常常努力改变这些认同的内涵,例如: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力图把犹太人在东欧的那种城市的、经商的、

懦弱的形象,转换为农村的、能生产的、有勇气的新形象;美国黑人则在一个把浅色皮肤视为地位标志的社会中,努力创造一种新的更积极的黑人形象。

第二,社会运动要求大家团结起来集体一致地采取行动,而围绕大家的主张来创造或获得身份认同就是这么做的方法之一。因此,女权主义者认同的是妇女有史以来一直受压迫的命运;环保主义者以最博爱者的代表身份出现;收入不错的有技术的“工人贵族”以受苦的无产阶级身份存在。有时这种虚构的说法造成了蒂利所谓的“核心参与者之间持久联系的特征”。但是,他的结论却是,“大多数社会运动还是远比它们的神秘外表更偶然和易变”(Tilly 1997a:133)。

第三,这种“分类的”认同要求常常是运动表面的虚饰,目的是为了使其成员与其他成员相区别,而其战斗分子的团结常常建立在更密切和特殊的群体基础之上,就像玛丽·卡赞斯坦在美国天主教妇女中发现的“话语团体”(Katzenstein 1995)、瑞克·芬塔西亚在其研究的工人中发现的车间团结(Fantasia 1988),还有保罗·利希特曼在美国地方社区中发现的个性化社区建筑(Lichtermen 1996)。

第四,以集体认同的牢固纽带为核心开展运动,不管这种认同是继承的还是自创的,都会为组织工作减轻很多负担,但却不能用来做动员工作。因为动员工作依赖于认同构造,以便促成集体行动、联盟和互动。事实上,认同政治通常产生的都是孤立的、宗派的和分裂的运动,不能增加成员,扩大影响,与可能的同盟者协商。这正是托德·吉特林在《共同理想的黄昏》(1995)一书中,对当代美国的“认同政治”所做的尖锐批评,而他在过去的阶级政治中却没有发现这样的缺点。

排外与软弱之间的联系同样也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在

缺乏战斗力的运动中以及抗议周期的末期,我们经常可以发现, 119 好战分子把他们的集体认同壁垒越筑越高,用越来越狭隘的身份界定来界定自己,并把联盟作为一种“背叛”行为加以拒绝。用吉特林的尖刻的格言来说,缺乏战斗力的运动经常是“当右派占领白宫时它们还在向英语系推进”(1995:ch. 5)。

最后,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是永恒不变的,或渗不进外部影响的。就像运动的斗争手法、计划和情感效价演变一样,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对政治机遇和制约、策略需要和可取的文化资源中的变化做出的反应,就像我们将从这最后一个例子中看到的那样。

波兰的天主教徒和工人

罗曼·拉巴在其对 1980—1981 年间的波兰团结工会所作的最新分析中,描述了在后来变成团结工会的运动的宣传中,所发现的深奥的宗教象征符号(Laba 1990:ch. 7)。拉巴复制了一幅漫画,画的是列赫·瓦文萨在工人的欢迎仪式上举着拳头,一旁是罗马教皇在举手问候(p. 141)。他还复制了一张格但斯克(旧称但泽)造船厂罢工的标语,上面画了一个荆棘王冠,让人记起过去工厂冲突中的牺牲者(p. 150)。造反密谋从没有如此严重地依赖于继承下来的舆论符号。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波兰见证了许多天主教仪式在政治上的用法,从发生在琴斯托霍瓦的富于斗争性的黑色圣母像游行开始,到波兰主教在社会主义波兰举行盛大弥撒为止(Kubik 1994:ch. 5;Osa 1995)。不过,从一开始,团结工会运动与其说是大规模的天主教徒运动,不如说是产业工人运动,目标是寻求建立自由工会并利用天主教符号来动员舆论(Laba 1990:ch. 8)。1980 年格但斯克工人的指导策略就是利用宗教意象,让人

回想起先前的罢工浪潮并从中汲取力量。因为早在1970年12月,工人们曾袭击格但斯克的共产党总部,好几名工人为此被军队打死(Garton Ash 1984:12—13;Laba 1990:ch. 2)。①所以,提摩西·加顿·阿希写道,“烈士们的神话在民族意识肥沃的深层土壤中滋生了”(Garton Ash 1984:12)。

一些象征符号周期性地出现,成为用来树立团结和构造新要求的资源。早在1970年12月,受苦受难的波兰和饱受折磨的无产阶级融合的形象就出现在了格迪纳和格但斯克等地的罢工运动中。1971年,在“五·一”游行中,格但斯克工人举着横幅,要求立碑纪念一年前的罢工牺牲者(Laba 1990:126)。1977年,后来组建波罗的海自由工会和青年波兰组织的群体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p. 136)。列宁造船厂的电工掌握了1980年夏格但斯克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也着了魔似的,把追认牺牲者的荣耀作为一种责任。列赫·瓦文萨于1979年在列宁造船厂的游行中首次声名远扬。他躲过政府的拘捕来到游行队伍中,“突然出场”,要求建立一座纪念碑来向1970年的牺牲者表示敬意。他说,“明年每个人都要同时回到同一个地方”,并且“每个人都要带一块石头”。如果当权者拒绝立纪念碑,那么他们将用口袋里的石头自己造纪念碑(Garton Ash 1984:31)。

纪念1970年牺牲者的问题,后来造成了1980年7月工人占领列宁造船厂的事件。当时,一个受人爱戴的自由工会战斗分子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为了纪念1970年的受害者,跑到当地一个墓地,找到些残留的蜡烛,点燃起来,却因此遭到工厂管理部的解雇,这无异于给工人本已不满的情绪火上浇油。8月14日黎明,趁工厂保卫不备,一群自由工会战斗分子带着要求让瓦伦第诺维茨复职和固定上涨1000兹罗提工资的标语,在造船厂四周张贴,并开始在厂内游行,一路上

有许多支持者加入,由此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导致团结工会成立,并一度战胜政府(Garton Ash 1984:39)。

构造全面斗争

当1980年波兰工人运动在波罗的海地区爆发时,围绕运动出现的天主教象征符号表明,象征符号必须能引起文化上的共鸣,才能激发群众的情绪。这样的符号几十年来在天主教的波兰其实并不难得,但像在美国民权运动中一样,把工人运动引向最激进阶段的,并不是传统象征符号,而是新创造的符号,它出现在斗争过程中,为陷人与强大对手较量之中的好战分子的战略意图服务。

格但斯克的罢工者和他们的外部支持者的最大成功,不是他们能借用本质先于存在论者的天主教虔诚象征符号,而是他们能通过对天主教因素和工人利益因素的象征调和,在不同工厂和部门的工人间建立团结。正因为如此,政府向部分工人而不是所有工人在工资上作出让步的策略遭到了失败。事实上,“团结”符号是斗争的产物。正如团结符号的设计者后来写的那样:

我看到了团结是怎样在人民中出现的,社会运动是怎样诞生的。我选择用“团结”[Solidarność]这个词,是因为它最好地描述了发生在人民身上的事。这个设想是由类似人挨着人的密集人群而产生的,也是(列宁造船厂)大门前聚集的人群的特点(引自 Laba 1990:133)。

121

结论

从民权运动和格但斯克工人运动的事例中,我们能学到什

么与集体行动中符号的力量相关的东西呢？

首先，文化符号不会自动成为动员符号，而需要具体的媒介把它们转入斗争框架。南方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由于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具有扩大权利的本领，经过十年的司法决策和非暴力抵抗实践，获得了力量。同样，团结工会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的领导人把他们被屠杀的同志在宗教上的象征与其罢工要求结合起来，在各个工厂的工人间建立了团结。

第二，继承下来的政治文化，在波兰和美国，都很少能决定哪些符号能或哪些符号不能使集体行动获得尊严和活力。美国的人权和波兰的天主教已经存在了几个世代，却都没有显著地帮助美国黑人或波兰工人摆脱压迫。象征符号只有与根植于文化母体内的新理论相结合，才会产生爆炸性的集体行动框架。而这种结合则取决于斗争的参与者、他们的对手和集体行动的机遇。

最后，恰恰是在斗争中，人们才发现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引起他们分裂的东西，并学会在构造他们的要求时，以前者为中心，掩盖后者。他们常常失败，但在他们成功时，就会产生团结工会这样的运动。拉巴在他的《团结工会之根》一书中写道：

团结工会通常只是被当作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其象征性只是 19 世纪战前传统的继续。这样的分析忽视了团结工会的创新性——罢工期间主要象征符号的创新程度，主要象征符号和仪式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提升和转换的程度。（1990:28）

122

八 动员结构和斗争政治

社会运动不仅要依靠构造,还得把人们集合到战场上,形成联盟,对抗敌手,并确保其在动员高潮的兴奋状态消退后仍有前景。这就把我们引向运动召集的第三种资源——动员组织。自从社会运动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变革力量后,对于组织在斗争能力方面的作用,旁观者和活动分子都感到困惑。一些理论家辩称:如果没有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反叛只会停留在“原始阶段”,并会很快分崩离析(Hobsbawm 1959);另一些理论家则相信,组织机构的领导者非但不能鼓励人们行动,还可能剥夺群众的主要力量——破坏力(Piven and Cloward 1977)。^①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政治铁律”就给这种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个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会改变其最初的目标,而与常规结合,以致最终接受现存体制的游戏规则(Michels 1962)。

很显然,一些在特殊情况下通过某些组织来工作的斗争领导者,确实把斗争转入了运动,并继续与对手对抗,而另一些人则不然。同样显然的是,一些运动出现时并没有正式的领导,领导常常是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或者来自于那些向它们提供资

源的同类群体。我们该如何解释组织作用的多样性呢？

之所以会产生对组织作用的困惑,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经常未能区分运动组织的三个不同方面。运动组织最主要的意思是“正式的等级组织”——扎尔德和麦卡锡把它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或正式的组织,它把对社会运动或对抗运动的优先选择作为自己的目标,并试图推行这些目标”(Zald and McCarthy 1987: 20)。运动组织的第二个意思是:“即将与对手接触的集体行动组织。”这种组织包括挑战者的暂时集合、非正式社会网络、正式部门、俱乐部乃至军事化小组。它们要么由正式的组织或组织联盟控制,要么便没有特别的人控制,使社会基层的关系网络成为运动新成员最主要的来源。

运动组织的第三个意思是指联系结构,它联系着领导和其追随者、中心和边缘以及运动的不同部门,使运动组织间能够相互合作和相互联合,使运动即使在缺乏正式组织的情况下也能继续存在(Diani 1995)。只有当这种联系结构被内化为运动组织的一部分,而且集体行动也受到领导者的控制时,社会运动才与单独的组织相关。更常见的情况是,正式的组织只是不完全地反映了运动的非正式联系网络。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即使运动能达到斗争的顶峰,通常也会消退或分散精力。

运动组织者的问题是:创造一些组织模式,使它们既能足够有力地构造与对手的持续对抗,又能足够灵活地使人们和社会网络互相联系的非正式关系集合起来,共同斗争。本章的论点是,最有效的组织形式部分立足于自发的、根植于一定背景中的地方团体,这些团体一般通过联系结构连接在一起,并由正式组织来协调。下面就从19世纪欧洲斗争史上选些例子,来证明上述运动组织的三个方面在现代社会运动史上的重要性。

一个失败和两个非解决方案

1851年12月2日凌晨,忠诚于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法国国民议会,发动了史称“雾月十八”的军事政变。^②在巴黎,数百名共和党人被围捕,他们的抵抗很快被镇压下去。而在法国南部和西部,由于蒙塔格纳共和党人松散的关系网络的崛起,政变后那里爆发了一场武装起义。特德·马格丹写道:“这些外省的造反,在一百多个公社组织里宣布了革命的任务。他们不仅控制了整个法国行政区,还控制了十二个郡县首府,并在三十个不同的地方与政府军队或宪兵发生激烈冲突。”(Margadant 1979:vii)但是,到12月10日,它们却已经被政府军队打得落荒而逃,其组织很快瓦解,他们爱用的集体行动形式——武装示威游行——也被武装军队粉碎。

1851年的起义在许多细节上看上去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初级反抗”(1959),属于十分常见的模式:令人气愤的消息,不管是真的还是想像的,传到了村子里;饱受困苦生活折磨并因 124 受虐待而愤愤不平的村民,听到警钟后聚集起来,准备好武器;凭着人多势众,加上领导者的言辞煽动,他们在一些中心地区与政府对抗,却被有优势的军队摧毁;结果幸存者回到农场,抚平创伤,等待机会,以备他日东山再起。

不过,1851年的起义既不是“乡下”的,也不是初级的。它是来自城镇的共和党人与乡下农民和工人联合发动的(Margadant 1979:29),其主题也是全国性和政治性的,而不是地方的和狭隘的。^③它还表明,在那些团结起来反抗当权者的许多社会群体、城乡单位、农民和手工业者、领袖和追随者之间,有一种重要的行动和信念上的互相依赖。从许多方面来说,它实际是一场现代社会运动。

那么,这场运动是有组织的吗?这得看我们所说的组织的

含义。在最高阶层中,存在着一些零星的牢固的共和党人的组织,它们由参加过1848年革命并在共和国右倾时保持活力的中产阶级领导人领导。在基层,存在着袭击市镇厅、与军队交战和号召其他村庄采取行动的集体行动核心组织。这些组织不是农村流氓随意的集合,而源自稳定的农村社会和家庭网络——其中许多网络根植于当地的工人宿舍和饮酒俱乐部(Agulhon 1982),而最无力的恰是连接共和党领导者和地方单位的联系结构。

这些联系结构最初以城乡商业联系为基础,1848年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它们在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中变成政治联系结构(Margadant 1979:115—116),足以有效地发起斗争。但一旦地方武装团体公开亮相,“落后的通信和管理对策就限制了区域协同作战的程度”(pp. 232—233)。地方领导人更可能对别处的成功起义做出反应,而不大理睬看不见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命令。运动的主要缺陷就在于:缺少稳定而值得信赖的联系结构去连接运动的中心和边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转向了欧洲斗争的下一个阶段。

社会民主的解决方案

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数十年里,工业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社会行动者出现了,他们自然地形成一种新的组织,从根本上引导工厂里的集体行动,并在最高层和一系列组织相联系。掌管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党并与工会、合作社、互助保险系统甚至娱乐中心联合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组织者和知识分子。上述散乱的组织,在工人阶级政党发展得最好的形式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中,给人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国中之国”的印象。

125 不过,在中央集权化的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组织和基层工人

关系网络之间,并不存在一套自然的或社会的联系结构。在一些国家,如法国,有工团主义倾向的工人和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如此巨大,以致形成了对抗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怀着特有的决心,着手使最高层与基层的关系正式化和持久化。他们打算创造一个单独的有组织的统治集团,却使最高政权惊恐到暂时禁止集会的地步,使运动的自发性和活力受损,不能面对20世纪初出现的威胁。最后的结局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投票赞成战争贷款,对20世纪30年代的反纳粹主义斗争毫无防备。

当然远不会缺乏一个正式的联系结构:社会民主党把他们的成员封闭进一个永久同盟组织中,这个同盟组织通过地区联盟,从地方机构发展到了中央委员会和国家行政机构。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人都必须遵守纪律,为促进运动目标而定期组织集体行动。这样,工人运动逐渐从分散的起义团体和秘密社团网络,变成巨大的正式中央集权组织。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望所在,所以它的组织形式在中欧、北欧和东欧国家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模仿。^④

中欧工人阶级运动在工会、合作社和受欢迎的政府部门保护下,形成了上述组织模式,米歇尔斯在构想他的“铁律”时,想到的也是这些情况。他主张,在这种组织里,组织者冒着运动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危险,专心致力于组织的存亡,胜过致力于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所以,如果运动的战斗性在下层阶级的请求得以实现后逐渐消失,应该没有人会感到惊讶。一群竞争者根本不会惊讶。

无政府主义的对抗模式

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构造“国中之国”之时,美国和欧洲其

他国家有人正在发展不同的组织形式,对之进行挑战。其中,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在各方面都和社会民主党相对立。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把用正式组织中的工人名义来接管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无政府主义者却怀疑政治,寻求从根本上消灭国家,他们把社会民主作为“专制主义”加以摒弃,并谴责它的领导人是民主事业的叛徒。

126 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向政党发展,他们自发的组织模式是由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提供的。蒲鲁东的理论是,民主地组织起来并在自愿结成的同盟中有松散联系的工人协会网络,将最终取代国家和资本主义。^⑤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像自己的对手一样,缺少一种组织模板,在地方经济和政治情况相似的欧洲不同部分,形成了不同的形式。^⑥

在经济最落后和政治组织最不发达的东欧和南欧,无政府主义形成了大规模的运动。俄国的民粹主义分子首先猛烈冲击沙皇的权力结构,以为自己的精神和勇气能够激发起他们相信潜藏在农民身上的反叛力量。然而,农民对此即使不反对,却反应漠然。结果,长期监禁和撰写阴郁回忆录就成为许多民粹主义分子的命运。他们残存的梦想先是被转入恐怖主义群体网络中,后又被转入社会革命党中。而尽管社会革命党是1918年立宪会议中出现的最大党派,却不能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相比。

无政府主义在意大利又遇到另一种结局。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警察和当局的追捕下,把自己封闭在密室,在里面秘密制定乌托邦计划和策划颠覆国家。丹尼尔·格林写道:

乌托邦的理论无拘无束,结合了不成熟的预期和对黄

金时代满怀眷恋的召唤……无政府主义者与世隔绝,在很小的秘密团体中组织起来,采取直接行动,他们的秘密组织往往很容易渗透进警察的密探。(Guerin 1970:74)

正如大罢工的梦想使法国的革命者受到鼓动一样,抱着国家就是和其统治者绑在一起的错误观念,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暴力行动。但是,爆炸浪潮只能使所有左派受到怀疑,并使他们自己更加孤立。在社会民主阶层把运动转变为政党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对暴力行动的迷恋和对组织的反感使他们转变为一种派别。

重现的对立

我们在社会民主和无政府主义中,看到了制度化和破坏之间的对立,这是欧洲历史上特有的现象,在现代社会运动史上,仍不断重现。在欧洲和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中,它就再次复活过。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大多数美国民权运动都已高度制度化(Piven and Cloward 1977:ch. 4)。从塞尔玛大街开始,争取民权的斗争转移到议会大厅乃至受政府和基金会赞助的街区社群组织,并很快受到了一般政治游戏规则制约(ch. 5)。即使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之后的骚动,也没有让民权运动组织偏离它们的制度化道路。

在欧洲和美国的新左派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制度化转变。它们都始于抗议周期的高潮,而且大规模破坏性活动方式一直 127 在抗议过程中占主导。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静坐示威和焚烧征兵卡开始,许多美国反越战人士却加入美国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兴起的公共利益群体与和平游说团体。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组织者,他们则从反抗警察和组织城市贫民开始,

建立起政治组织,并参加到工会和共产党中(Lang, Irvin, and Tarrow 1989)。

然而,正如无政府主义在与社会民主的竞争中衡量自身的进展一样,20世纪60年代较坚定的美国活动积极分子,有不少人对其前辈的制度化策略抱批判态度,他们分化组成激进组织,对组织化资本主义核心展开了斗争。在西欧,部分新左派也批评“通过制度化缓慢推进”的形式,并在自己的战斗性和对手的控制之间划分了一条明显的界限。一些人像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前辈一样,最终退到密室里,策划发动武装斗争(della Porta 1990;1995:ch.8);另一些人则与和政党相连的工会竞争,积极争取工人的支持。于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间的对立在新左派的庇护下得以重演。

在等级制和破坏之间

19世纪形成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并非只有社会民主和无政府主义两种,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也不是社会运动组织形式的全部。在社会民主党人从组织内部内化运动、无政府主义者抛弃组织直接行动的地方,为反对奴隶制、禁酒、推动妇女参政和支持代表农民土地利益的人民党,美国公民运动以非正式的联系结构为基础,建立了灵活的组织,使运动无论在高潮还是低潮都保持活力。许多松散的庞大组织,在美国联邦制结构的帮助下,在基层使选民协调一致,而不是企图将他们纳入到组织中。这样,它们就得以存在于日常生活结构如教堂中,并根据政治情况动员或遣散支持者。普通公民因此可以在“自由空间”中,掌握更中央化的组织原本试图垄断的地方主动权,并以“自由空间”为基础形成运动(Evans and Boyte 1992)。

运动的联系结构涵盖热心公益的男女们的非正式交往、教

会、共济会、农民合作社以及诸如人民党等政治活动。从好战分子之间非正式的交流、巡回演讲、祈祷会，到报纸杂志及州联邦和政党，协调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大多数是非正式的，或自我维持的，很少甚至不需要集中管理资源来支撑。

随着运动潮流的发展变化，正规组织呈现出周期性起伏跌宕，反映出运动激情的变化。在运动陷入困境或士气低落时，它们便退回到与朋友、亲戚和教友之间的潜在关系中（Rupp and Talor 1987）。它们可以利用现存的社会网络，迅速动员支持者，并通过已确立的制度给国家施加压力。而一旦改革完成或动员减弱，活动积极分子就消失在教堂或旅馆之类“暂缓结构”中。等新一轮斗争出现时，他们又重新利用非正式交往来恢复老关系（Blocker 1989；Buechler 1986）。在某种程度上，运动内部的激进主义为未来创造了关系网和联系结构。

虽然 19 世纪欧洲的合作社比他们美国兄弟的组织更持久，仿效的却是同样的模式。从左派开始，根据社会基督教的教义，天主教世俗信徒在教会的许可下采用了合作社的形式。由于协作和互助社团的公开作用是非政治的，尤其在半民主体制的国家，如意大利和德国，它们很难被抑制。相反，它们还可以支持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并在运动低潮时帮助左派保持联系，使他们在政治机遇出现时重获新生。

打破铁律

在西欧和美国，松散的协作组织预示着一种民主的权力分散运动模式的出现，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和西欧人已把这种模式理论化（Evans and Boyte 1992；Rosenthal and Schwartz 1990）。卢瑟·格拉奇和弗吉尼亚·海因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根据这种组织，推断出一种“权力分散的部门化网状”

群体模式。格拉奇和海因认为,所谓权力分散是指缺少单独的领导和没有正式的成员;所谓部门化,是指运动“由许多根本独立的地方群体或单元组成,而且这些地方群体可以结合起来形成更大的结构或分化为更小的单位”(Gerlach and Hine 1970: 41);所谓网状,是指一个如网状的联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单元或节点,不是通过任何中心点,而是通过相互交错的一系列个人关系和其他群体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pp. 34—35)。

权力分散的运动不仅在动员间歇期预备了“暂缓结构”,还为自发的政治参与创造了空间,有助于使人们保持对运动的投入。此外,它们还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经验。像埃文斯和波伊特所主张的那样,在成功的民主运动中心,存在着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能够学会一种新的自我尊重、一种更深入更自信的集体认同、公共技巧以及合作与公民美德的价值”(Evans and Boyte 1992: 17—18)。

在许多方面,由民权运动成立的最新部门,尤其是种族平等
129 代表大会(CORE)和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SNCC),派到南方去的活动积极分子小组,实际是权力分散组织的原型。而同样非正式的权力分散组织形式还重现于西欧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中,这些运动重拾其美国前辈在组织上的许多议题(Calhoun 1995; d'Anieri, Ernst, and Kier 1990),坚持用权力分散的优点来反对中央集权化党派官僚对权力的垄断,造成各种各样组织上的革新。如果它们夸大其运动的“新意”,那不过是每一轮新运动浪潮的惯例。

权力分散的部门化网状组织模式,后来被美国的社区组织者延伸到美国城市分裂母体的实际活动中。社区活动组织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个体成员组织、联盟组织和以教会为基础的组织(McCarthy and Castelli 1994)。最先将它们理论化的是

绍尔·阿林斯基(1971)和哈利·波伊特(1980)等活动积极分子。^⑦权利分散还成为从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中演化出来的许多妇女组织的口号(Ferree and Martin 1995)。

西欧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像迪亚尼研究的意大利环保组织那样的正式群体,也在发展非正式联系(Diani 1995)。在法国,为了同与工会联盟相联系的大政党竞争,还形成了激进的“协调组织”。在德国,地方社区组织不仅提供服务,还给地方当局施加压力,同新一代美国社区组织者的实践几乎没有两样。

权力分散的暴政

然而,这里所描述的松散组织模式也有其自身的不足。虽然它们能鼓励基层自主,使活动积极分子受运动参与气氛的鼓舞,却也允许——实际上是鼓励——协作性与连续性的缺失。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和平运动期间,当格林汉姆公地和平营的妇女把英军扣留海湾数月时,她们出于对内部民主的信仰,展开了一场关于是否允许男同志在那里过夜的难堪争斗(Rochon 1988:82)。同样,在朱迪思·赫尔曼研究的意大利妇女组织中,个人至上变成了一种“暴政”,使正式决议难以形成,使早期加入者遭到排斥(Hellman 1987:195—196)。

这些群体也不总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通过教堂、合作社或工会等“暂缓结构”来支撑自己。一些群体变成半政府性质的社会协助群体,接受地方政府给予的资金,使自身的活动常规化;许多群体则消失在私人生活里,把它们的价值转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作为组织松散的自然结果,还有一些群体分成了几个部分(Meyer 1990);再有一些群体最终与各种绿党组织合并,一边继续否认它们的制度化性质,一边建立正式组织,为政府职位提

名候选人。

130 欧洲社会民主则通过把工人阶级吸纳到永久的组织中,试图解决协调问题;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引人注目地打击当权者,试图鼓动大规模的叛乱;而社区基础上的运动由于不需要特殊的组织努力来维持其长时间和跨空间的活动,则变得欣欣向荣。但是,它们的弱点是基层的自主有时会排斥中央和边缘之间强有力的联系纽带,使得领导者很难实行连贯的策略。

组织革新

20世纪60年代是组织革新的转折点,不仅因为这十年产生了起起落落的新运动浪潮,而且因为这段时间见证了运动组织内部革新的发展。这种发展显示了与以往学者的发现大为不同的变化动态。运动同时还产生于世界上普遍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变化中,这些变化为运动提供了扩大的新资源,使组织者可以利用它们来工作。

外部资源

最重要的外部发展是大众传媒的扩展和利用,尤其是电视的发展和利用。从民权运动示威者勇敢地面对警犬和高压水管,到新左派公开焚烧征兵卡,再到男女同性恋活动分子的公开“露面”,电视对戏剧化视觉形象的偏好,使它成为运动组织者培养和利用的工具。如果运动组织者能通过电视把他们的信息传递给成千上万的人,鼓励一些人效仿他们,让大多数人同情他们的主张,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创造一场运动,而无需承担建立和维持大规模组织的花费。

第二组变化的中心在于战后繁荣时代年轻人的金钱、空闲时间和专门知识的不断增长(McCarthy and Zald 1973; 1977)。

不仅整个西方人们可支配的家庭收入大幅上升,而且年轻人在20世纪60年代已成为消费品的目标市场和新青年文化的中心(McAdam 1988:13—19)。在欧洲和美国,大批年轻人进入大学校园,在那里拥有更多空闲时间,比过去的年轻人接触到更多的思潮。撇开别的什么影响不谈,这至少造成许多“良心构成者”(Marx and Useem 1971),为少数派的运动提供人员和技能的帮助,并使其他许多人能够献身于“与其关系不大的问题”(Rucht 1996)。

第三组外部变化是,一些运动从基金会和地方政府,甚至有时从商业和民间团体那里获得财政和管理支持(Jenkins and Eckert 1986; McCarthy and Zald 1973)。^⑧特别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第三世界“非政府组织”来说,美国和西欧的基金会、联合国和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是它们主要的资金来源(Keck and Sikkink 1998a, 1998b; Smith, Chatfield, and Pagnucco 1997)。 131

内部革新

运动组织者并不是这些外部变化的被动受益者。他们像更为传统的政治和利益集团一样,很快就利用了通信和资金筹措方面同样的进步——起初用油印机,后来改为电脑化邮寄清单,最近又改用传真机、摄像机以及因特网。由于这些变化及其他一些变化,运动组织者们现在可以跨越广大的地区,发动和协调集体行动,与其他党派、利益集团和政府竞争。

运动组织还学会利用对名人和专业人士的吸引,借助诸如摇滚歌星、乡村歌手和电影明星等名人的名声和才智,开展运动活动(Meyer and Gamson 1995);借助诸如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权威和专业知识,支持生态运动、反核武器运动及和平运动(Nelkin 1975)。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妇女和同性恋运动越来

越依赖女性主义者或同性恋律师的专业化服务,因为这些人给他们的活动涂上了合法色彩(d'Emilio 1992:192; Mansbridge 1986)。

对于过去大的群众政党和运动来说,职业化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米歇尔斯曾为社会民主党的职业化而焦虑不已,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化,它不再依靠庞大的官僚组织,因为组织和交流技巧已在运动积极分子中扩散。这种技巧的广泛拥有,不仅使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资源成为可能,还使运动组织变得规模小而专业化^⑨,并把运动活动扩散到广阔的社会中。

社会资本不足?

虽然财富和大众传播工具使运动组织者获得新的资源和新的机会,它们也剥夺了运动稳定的基层参与者,而战前的运动能依靠的就是这些参与者。晚上看电视和周末外出度假的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么有兴趣参加会议和星期天的示威游行(Allardt 1962)。一些运动,如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运动,却仍然试图在80年代维持其刻板的组织,结果参与活动变得越来越拘泥于形式,以致很快便使维持的代价比放弃的代价更大(Hellman 1988)。

132 社会运动组织是否在遭遇社会资本的不足? 罗伯特·普特南在一系列并不直接以运动为重点的著作中觉察到,美国社会中的社会参与水平在下降(Putnam 1995)。^⑩ 普特南发现,电视闯入个人生活同美国人退出集体行动及与他人互动的趋势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在法国,也可以注意到同样的趋势,传统的自发组织部门失去了它们的会员及其积极参与,尽管法国具有相当悠久的战斗传统(Ion 1997)。

不过,“社会资本”下降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远没有对自发协会的影响严重。因为后者依赖于稳定的人员参与、协会内的持续活动以及选择性刺激的分配。当今运动组织的主要活动只是定期迅速组织大规模游行,受过训练的战斗分子小队的小规模破坏活动,以及吸引公众注意的媒体活动。它们都不需要成员参与日常工作,而取决于集合群众采取短暂而常常激动人心的行动的能力。

考虑一下最成功的新型美国社会运动组织之一——“守信者”(Promise Keepers),它创造了一批反性别平等,尤其是家庭内部性别平等的支持者(Conason, Ross, and Cokorinos 1996),并能在足球场集合成千上万的男人,举行类似宗教复兴运动的集会,而它仅仅由一个很小的全国性群体来管理,这个群体与许多意见相同的群体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组织联合,在基层通过其所谓的活动“小群体”来运转。

跨越国界,同样运作灵活、费用低廉而高度专业化的组织,可以从玛格丽特·凯克和凯瑟琳·斯金克所研究的“跨国问题网络”中看到(参见第十一章)。无论是人权、环境、妇女权利还是土著民族权利,只要聚焦其中一类问题,跨国网络可以形成许多微弱的组织,就一个单独的问题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因为它们与某些特定国家的捐助机构、基金会和活动团体都有联系。

这样,一种新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国际模式似乎正在出现:它是小规模职业化领导阶层的结合,有广泛的但主要是被动的群众支持,以及非个人的网络式联系结构。在这个模式中,组织成员通过信件、传真或电子邮件与领导者进行交流,参加为数不多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参加由战斗骨干领导发起的小规模的短暂示威性罢工。绿色和平组织当然就是这种模式的原型,它宣称有几百万成员,但实际上却把它的作用局限于资金

捐助活动上,靠一小部分职业的战斗骨干迷茫地进行引人注目的开拓。^⑩

133 为了不必建立庞大组织就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基础,许多运动赋予地方组织以“特权”,让它们使用全国性组织的名称,而保持独立,并依靠自己在联合活动中的经济贡献和合作获得自己的名声(McCarthy and Wolfson 1992)。这种特权使一个较小的全国性保护组织能够协调更广泛基础上的活动,而不用消耗稀缺的资源来维持大规模群众团体的正式联合组织。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解除核武器委员会就是这种“赋予特权”的组织最显著的成功范例(Maguire 1990)。

除了赋予特权,当代许多运动还利用联盟组织和协会的资源,即使这些联盟组织和协会基本不是为开展集体行动而建立的。这样,它们就能运用更稳定的组织的基础结构,暂时动员那些对长期活动不感兴趣的人。教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荷兰的和平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和黑人礼拜堂在美国南方所扮演的角色,都表明运动组织从大量不以运动为基础的机构获取资源(Klandermans 1997:ch. 6; Morris 1984)。

运动通常形成于社会体制内部,利用其结构和意识形态在异议者的网络中扩大联系,并运用它们那些被表面理解的意识形态来抵抗其官方负载者(Zald and Berger 1978)。天主教会由于具有散漫的结构和正式的教条,长期以来为新兴的异端运动提供了庇护所。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基督教的“基层社区”在信仰天主教的欧洲(Tarrow 1988)和拉丁美洲(Levine 1990)得到了发展。最近,一场性别平等的运动也已经在历史上最消极的美国教会部门女修道院中间展开(Katzenstein 1998)。

行动和联盟

如果说这里所描述的较新和较灵活的外部化运动组织有一个主要的弱点的话,那就是它们缺少不变的基层活动分子骨干。这一点正是它们和同类群体结盟的原因之一,它们试图通过围绕特定问题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和场所召集大量人马,弥补其支持者基础的不足。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反战联盟、80年代赞成人工流产合法化的运动以及和平运动,都使协调行动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即使在60年代以前,和平运动由于人少势弱,也通过协调行动来优化组织技术(Kleidman 1992)。到70年代,汤姆·罗尚写到,在欧洲和美国,“其中许多组织都是现存组织的联盟,这些组织共同利用了动员的新潜力”(Rochon 1988:79)。^⑫到80年代,联合行动成了美国核冻结运动的主要战略(Meyer and Rochon 1997)。

环境组织经常联合一些力量给当局施压,或组织“地球日”,或开展绿色旅游。虽然其中许多组织之间都有很深的思想意识形态差异,例如,传统的保守群体和激进的环境保护者之间的差异,但是活动积极分子之间的非正式交往却弥补了他们思想上的裂痕。即使在意大利,虽然天主教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组织间曾存在很深的隔阂,马里奥·迪亚尼还是发现,不同环境组织成员之间的非正式交往有助于在各组织成员之间发展共同的集体认同(Diani 1995)。 134

由于通过联盟组织来进行联合行动的实践如此普遍,于尔根·格尔哈茨和迪特·鲁希特发明了一个新词——“中间动员”(mesomoblization)来形容它(1992)。他们研究的柏林两场运动都具有一定的组织灵活性,使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多元主义得以繁荣。它们发起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使每一个群体都有机会加强其特殊利益,而不会在一大堆人群中不知所措。但

在活动结束时,却没有留下一个永久组织。

类似的由联合组织发起的活动,近年来也已经出现在美国和法国政治中。在法国,1997年的一场反法西斯民族战线活动,显示了一种快速合作和解散的模式,类似于格尔哈茨和鲁希特在德国发现的模式。^⑬1993年在华盛顿市,美国同性恋男女在联合组织的松散领导下,以要求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反对歧视为名,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抗活动中不同组织成员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能最终在不同运动组织成员中形成更广的社会网络和首要的集体认同(Diani 1995)。

组织的扩散和分化

我们在当今的社会运动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模式,这使我们必须更仔细地去看组织变化的动力。随着社会民主组织从小的基层骨干群体成长为大的群众组织,并巩固为制度化的联盟和政党,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铁律”虽然有助于他理解世纪之交的社会民主组织的变化动态,却既不能解释完全不同的无政府主义逻辑,也不能解释19世纪美国基层群体的特征,以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米歇尔斯只想到一种组织模式——一种努力使运动的联合组织成为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大组织的一部分,并从基础上控制集中行动的模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运动组织的频谱绝非如此简单,战后世界的变化使得这种图景变得更加复杂。为了适应复杂的变化,汉斯皮特·克瑞埃西根据他研究的西欧广泛的“新”社会运动,列出了更多的组织类型排列(Kriesi 1996)。根据克瑞埃西的观念,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支持者在行动上的直接参与和导致他们向当局要求权利的定向。不过,这只是

有运动导向的组织的一种类型,克瑞埃西还提出了其他三种类型,在支持者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斗争、其活动针对的基本对象是当局还是社会内部问题这两个方面,各社会运动组织有所不同,由此造成运动相关组织的四元类型,参见图 8.1。

参与的模式

| 定向 | 直接的 | 间接的 |
|------|----------|--------|
| 支持者 | 自主公司、合作社 | 妇女自助群体 |
| 公共当局 | 绿党 | 社会运动组织 |

表 8.1 运动相关组织的类型(资料来源:汉斯皮特·克瑞埃西,“政治语境中的新社会运动的组织结构”,《社会运动的比较观点》,第 153 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6 年)

克瑞埃西的分类使我们可以研究不同类型的运动相关组织,而不用把任何一类归入未加说明的范畴。例如,维尔塔·泰勒所研究的妇女自助组织就不是以当局为基本定向的,而是像社会运动组织一样,涉及支持者的直接参与,并以共同目标为核心建立舆论(Taylor and Van Willigen 1996)。相反地,由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发展演变而来的欧洲绿党和美国公共利益集团,却不再直接参与行动,而是转向公共当局,对促使它们产生的运动目标有许多共识。最后,20 世纪 60 年代后在西德发展起来的所谓自主部门,既不涉及支持者的直接参与,也不涉及以当局为基本定向,而是为有助于保留远离市场逻辑的“自由空间”提供服务。

除了有助于我们思考比一般社会运动研究包含范围更广的运动相关组织外,克瑞埃西的分类还有另外两个用途。首先,它

提出了一种在社会运动部门内部追踪组织扩散的方法,因为它所指的许多组织都是由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运动组织的主干演变而来的。第二,它有助于理解当今相对弱小而不持久的运动组织如何在短时间内动员对大型示威的支持:如果传统社会运动组织内的好战分子和其他这类组织中的激进分子保持非正式联系,他们就会在政治时机成熟或威胁出现时,依靠这种联系发动游行。格尔哈茨和鲁希特的“中间动员”不仅从社会运动组织联盟汲取力量,还从社会运动组织和其他形式的运动导向群体间的联盟和友好关系中汲取力量。

这种观点还提出了许多方法,使运动好战分子不必撤回或放弃他们的目标,就能部分“退出”激进主义,站到不太苛求的立场。通过参加自助群体、为服务机构做工作和支持借助联系结构与最初的运动总部相联系的政党和利益群体,活动积极分子可以和运动组织内的老伙伴保持联系,在非常时期和有机会时,仍然可以作为动员的力量,使激进主义的火种保存到将来。

结论

运动组织不存在一种单一模式。异质和相互依赖比同质和纪律更能刺激集体行动。欧洲工人阶级在很长的时期里对突然降临的危机毫无斗争准备,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把他们团结在群众政党和工会中。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在短期内孤立于假设的群众基础,以致最后无法提供基础结构,只能把反向模式作为组织上的斗争手段。上述经验教训的变化和结合导致当代临时小组、专业运动群体、权力分散组织和联盟活动的革新。它们最为成功的原因在于非正式联系结构在正式运动组织内部及之间的作用。

这样的运动不会瞬间形成,也不会轻易地永久保持下去。

等级性运动组织的困境在于,当它们把自己的基础永远内在化时,它们就失去了破坏的能力。而当它们背道而驰时,它们又缺少维持与同盟、当局和支持者的持久互动的基础结构。这就表明,在正式组织和自治组织之间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只有通过强大的非正式的非等级性联系结构,才能维持这种平衡。

此外,前三章中所讨论的运动中的其他力量,也需要保持同样的平衡。在第五章中,我们看到了在机会扩大和限制减少的背景下的运动形式,而在为他人和对手制造机遇时,运动也可能造成使其自身无关或受压制的条件。

同样的,在第六章中我们看到,叛乱运动的特征在于破坏而不是暴力或斗争。仅依靠破坏性集体行动的运动可能与警察发生冲突,并退化为暴力骚乱;采用常规活动形式的运动可能因为选举而受损,并由于活动积极分子的背叛而衰败下去。

137

第七章以平行的方式展示了集体行动框架也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平衡之上的,这个平衡存在于继承的被动心理状态和有行动导向的不常见的新因素之间。仅依靠验证性文化象征符号的运动失去反叛的能力,而提出激进的新“框架转变”的运动,也会由于对目标的陌生而失去支持。运动停留在制度化和孤立化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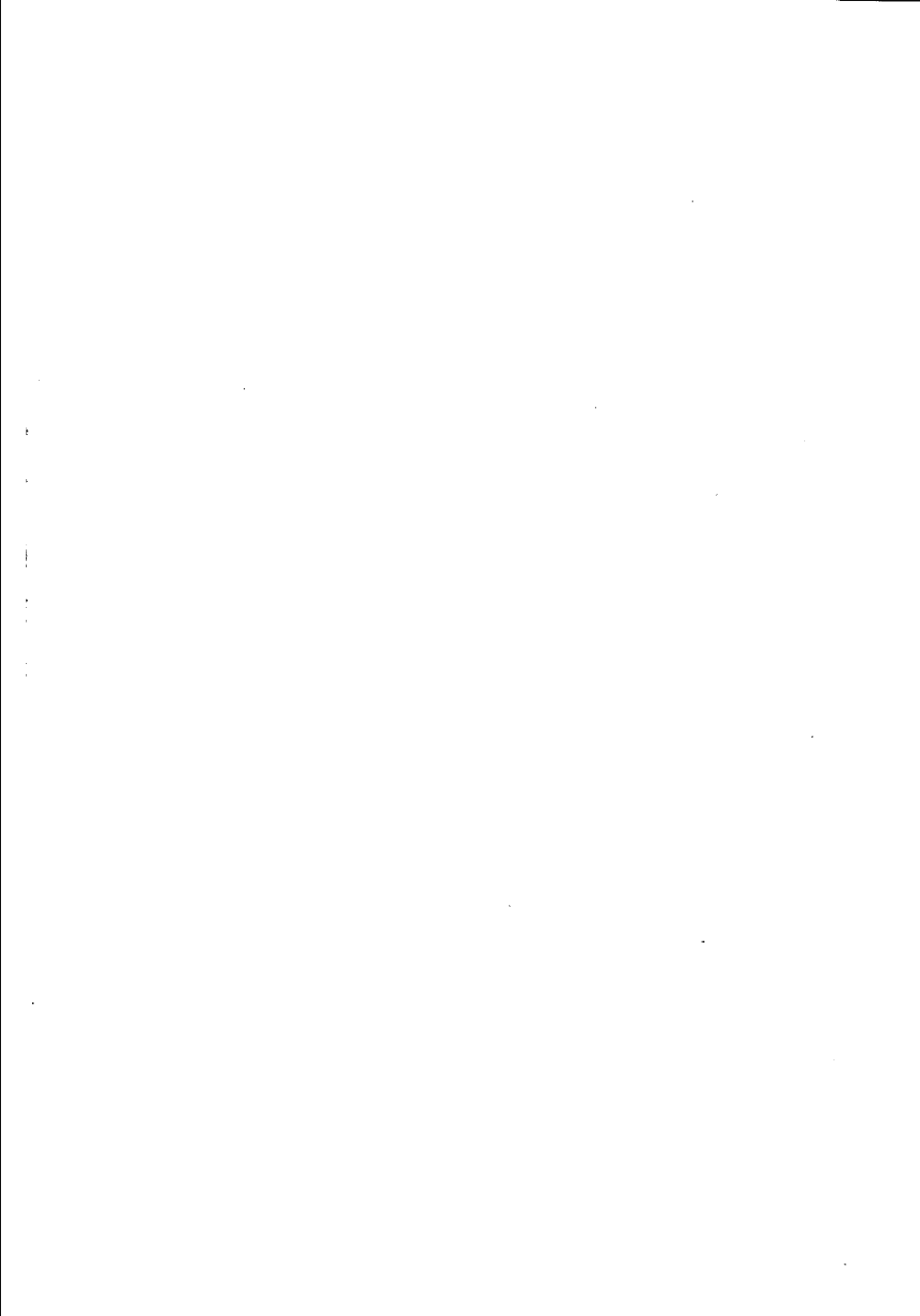
第七章还探讨了集体身份认同在运动形成和维持中的重要性。集体身份认同,不管是作为绝对的身份认同继承下来的,还是在与对手冲突过程中形成的,都在运动形成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尽管它包含了孤立、宗派主义和“共同理想的黄昏”的种子(Gitlin 1995)。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运动注定是不稳定的,最终将消失呢?孤立地看,社会运动在维持与对手的对抗、保持广大的支持基础和包容分裂倾向方面所经历的困难,确实表明了这样的结果。

但是,运动很少孤立地出现,它们一般成群地出现,其主要的成功出现在扩大的斗争周期的螺旋上升期。在我们开始分析运动138 的结果之时,让我们转向讨论这些斗争周期吧。

第三部分

运动的动力



九 斗争周期

斗争要求不管起因如何,都是由政治机遇和限制转化为行动的。人们一般用可行的已知斗争手法,发展集体行动框架和集体认同,并围绕社会网络和组织建立动员结构,由此造成社会运动。虽然斗争的机遇和限制为挑战者提供了动员的诱因,社会运动的基础却是它们文化上、组织上和实践中的资源。

不过,斗争和运动形成的两阶段形象忽略了下列三点。第一,它把社会运动当作完全是自动形成、提出要求和发展变化的。第二,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机遇和限制的变化不随集体行动的发起而终止。第三,它没有考虑当权者,他们不会在挑战者对抗他们的统治时,空坐在一边:他们对斗争出现的反应或强或弱,或有选择性或有普遍性,或聪明或愚蠢,构成了一种影响其他挑战者的互动模式。

这些额外因素,胜过充斥大多数斗争政治理论的个别运动,引起了范围更广的斗争浪潮。它们结合起来,决定了斗争是否将像罗马焰火筒那样,爆发出四射的火光,或发展成一个斗争周期,甚至形成革命。本章就致力于认识斗争扩大为一般周期的时间和经过。

周期性问题的一个特殊方面涉及斗争周期和革命周期之间

的差别(Glodstone 1997)。虽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探讨革命,但这种差别将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单独一个斗争周期的原动力是否能用来描述所有的斗争浪潮?或革命周期是否需要单独分析,因为它远不同于其他斗争周期?或它们是否要求我们用类比或视路线而定的方法,把它们与其他类型的周期进行比较?^①

我们对周期的论述很少专注于历史周期的规律性、先后顺序和发生次数,虽然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问题。我们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周期内部的概念和要素,然后描述斗争扩大为普遍战斗浪潮的四组过程,最后探讨标志斗争周期衰退的三组相关作用——衰竭和分化、镇压和促进、激进化和体制化。作为第一个重大国际斗争周期范例的1848年欧洲革命,和作为20世纪60年代重大国际斗争周期范例的新左派运动,都证明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本章还将对社会运动周期、革命周期和民主化三者之间的类比进行简短反省,并以此作为全文的结束。

斗争周期的定义和要素

我用“斗争周期”这个短语指称与社会体制对立的矛盾深化阶段:集体行动从动员较好向动员较差的部门迅速扩散;斗争形式上出现快速革新;新的或转变了的集体行动框架被创造出来;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社会参与相结合;信息流关系增强;挑战者和当权者相互作用。如此广泛传播的斗争为挑战者创造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使他们不仅至少可以暂时占据优势,还可以克服自身资源基础薄弱的短处。它要求国家能设计明确的回应战略,或抑制斗争,或促进斗争,或两者兼顾。它产生的一般结果远大于那些互不相连的事件集合造成的总结果。

斗争周期之间和斗争周期内

看看社会科学家对斗争周期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悖论。尽管已经认识到斗争周期对于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学者们还是更倾向于关注个人、运动以及运动组织,而不是在大部分现代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主要斗争浪潮。就连研究革命的学者也常常忽视革命与其他形式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除 Goldstone 1997:2),部分原因在于:存在一种把革命看成若干事件而不是一系列活动的倾向(Goldstone 1991)。一旦我们把革命理解为一系列活动,革命和斗争周期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就会一清二楚。

但是,如果斗争周期是我宣称的那种社会和政治变迁的主要分水岭,为什么我们对这些历史时期的研究如此之少呢?原因之一是运动组织比主要斗争浪潮更易于追踪,更愿意对研究者公开自己,甚至研究者中很多人都来自运动组织。斗争周期常常从体制内部开始,然后在普通人中扩散为对抗,使学者们看到集体行动一些缺少教益的方面——聚众、暴徒和武装暴动。当斗争周期最终在镇压和幻灭中结束后,不少人倾向抑郁的看法。“所有的动物在交媾后都很悲哀。”佐尔伯格用这句古老的谚语反映了斗争浪潮之后的失望(Zolberg 1972:205—206)。

导致斗争周期被忽视的原因之二是,它们对体制化政治没有明确的区分。研究“集体行为”的学者把他们的课题与体制内的行为相区别,而暴动常常始于体制内部,甚至有组织的运动也很快卷入政治活动中,在其中与各利益群体、联盟、政党以及治安部队互相作用(Burstein 1998)。要完成斗争周期,我们的描述必须涵盖体制的和非体制的冲突,这就要求经常关注体制的政治科学家与研究社会运动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

有三个主要学者群体认为,所有制度都贯穿于斗争周期的

动力中,他们是:把文化上的变化看作是政治和社会变化源泉的文化理论家(Brand 1990; Rochon 1998),探寻政治或经济变化规则性周期的政治历史学家和历史经济学家(Hirschman 1982),以及把集体行动的变化看作是国家和资本主义变化结果的社会理论家(Elias 1994)。第一类学者强调斗争周期的全球性,第二类学者强调斗争周期的规律性,第三类学者强调斗争周期源于结构变化的布局。以上观点都很有用,但它们主要只研究了斗争浪潮之间的发展,而很少停下来研究为培养和转化运动提供客观条件的斗争周期本身的结构和动力。

在这样的时期里,组织和当局、运动和利益群体、政体成员和挑战者互相作用、冲突与合作。斗争周期的动态发展就是它们互相作用的结果。帕姆·奥利弗写道:“通过创造活动机会、改变物质条件、变更群体的社会组织、改变信仰或增长知识,活动可以影响其他活动发生的可能。”(Oliver 1989:2)这些活动造成不确定性和信息交流,为新的行动者打开了通道,并破坏了基于现有支持的分析。这就使政体支持者可以调整他们的风帆,使反对派重新考虑有关利益和联盟的分析。结果更多地取决于斗争的普遍结构和社会精英、对手和潜在盟友对它的反应,而不是力量之间的平衡和任何对立双方的资源。因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斗争周期往往开始非常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下面我将简要介绍斗争周期动员阶段的主要因素,以帮助

143 我们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

动员阶段

一旦政治机遇对占优势的“早期造反者”敞开大门,使这些人的主张引起另一些重要人物的共鸣,导致迥然各异的活动者结成现实的明确联盟,造成或加强社会精英的不稳定,冲突的普

遍化就开始进入斗争周期。如果政府拒绝这些早期造反者的主张,上述同时发生的事件和联合就会加剧,从而在为更广泛的斗争减少限制和提供机会的同时,鼓励它们被其他可能提出权利要求者同化。^②

引起一个斗争周期的最初主张往往是狭隘的和与特定群体有关的,它们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它们证明政府面对斗争是不堪一击的,并向其他人显示:他们把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的时机已成熟。第二,它们“挑战其他竞争者的利益,要么因为一个群体的利益分配会减少另一个群体将获得的利益,要么因为这些要求直接损害了既定群体的利益”(Tilly 1993:13)。第三,它们通过阐明主要框架表明挑战者中的趋同。

尽管斗争周期没有一个不变的发生频率,也不能同等扩展到所有的人,近来历史上这样的时期却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③,包括:冲突加剧,斗争广泛扩散到不同部门和地域,斗争手法扩展,新组织出现,旧组织得到认可,形成使不同群体的活动互相联系的新的“主要框架”,挑战者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增强,政府的特殊反应在决定斗争周期的发展方向上发挥了重要的轴心作用。

冲突和扩散

斗争周期以冲突加剧为特征,不仅包括劳资关系的冲突,还包括街上的冲突、乡村和学校的冲突。各种斗争的数量在这种时期比此前此后的典型情况都有所提高。特殊群体在社会抗议浪潮的先锋(如矿工、学生)中再次正式出现,常常有一些群体(如农民、小工厂工人、白领工人)在斗争过程的高峰加入到他们之中,而这些新加入群体的造反倾向并不广为人知。

斗争周期有各种各样的扩散途径,有些是从大城市向周边

乡村扩散,有些是从周边向中央扩散。它们常常从重工业区沿着河谷,或通过其他重要交通路线,向邻近的轻工业区和农业区扩散。它们在同种族或民族群体成员中扩散,因为这些人“被灌输的”身份认同会受到新的机遇和威胁的刺激,就像20世纪90年代早期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那样。广泛传播的斗争带来不稳定和恐慌,它所造成的功能交流的中断使现存的关系,如民族、宗教或其他形式互相认同的群体、托拉斯、合作社等的关系,变得更加突出。

这种时期最特别的不是所有群体同时朝相同方向“揭竿而起”(它们很少如此),也不是特殊人口群体一次次以相同的方式活动,而是早期造反者展开的集体行动的示范影响,在通常较沉默、资源较少的群体中引起各种各样的扩散、延伸、仿效和感应作用。

如果仅仅把扩散看成集体行动对那些向相同对手提出相同要求的类似群体的“感染”,那是一种误解。斗争周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集体行动倾向从发起者向无关群体和对手的扩散。无关群体会响应成功挑战的示范影响,或至少避免镇压;对手则会制造对抗运动,这是他们对斗争攻击的经常性反应(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因此,种族民族主义或“差异”宣言之类的运动就传播开来——不是因为人们喜欢模仿他人的行为,而是因为一种种族身份认同的动员,会引起另一些担心自己生存或利益受威胁者的反应。

斗争手法和框架

斗争周期是锻造新式社会抗议武器的熔炉。1848年法国革命中远超出邻近街区范围的构筑街垒活动、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法国人民阵线和美国新政中的静坐罢工及

1968年到1972年间的“直接行动”表明,在动员周期早期的不确定和繁荣状态下,革新加快,新的斗争形式因此形成并传播开来。

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我们在第六章斗争手法部分中看到的革新趋势的加速,而由于斗争周期引出了各种各样新的社会行动者,较平稳时期难以出现的聚合与互动就成为可能。于是,在第六章里我们看到,各种社会行动者在街头一同露面,尽管他们有些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塞尔维亚人对选举欺骗的抗议却富有创造性和活力。20世纪60年代后期意大利的斗争周期中,也结合了学生的热情和工人阶级的纪律,创造了一种从工厂扩散到大学的全新斗争形式——拒付租金和拒付公共事业开支(Tarrow 1989a)。

当然,并非所有斗争普遍化时期出现的革新,都能在斗争周期结束后保留下来。一些革新在看起来一切都可能发生而且世界也将改变时,直接和斗争高潮连在一起(Zolberg 1972);另一些革新取决于高水平的斗争参与和斗争周期特有的信息流动,在动员衰减和信息源转向其他主题时,便不复存在;还有一些革新是治安部队在街上遭遇意想不到的大批挑战者而暂时瘫痪的结果,在治安部队重组时,那些在斗争周期高潮看似牢不可破的战术就会很容易被粉碎。 145

斗争周期以同样的逻辑产生了新的或转换的象征符号、意义框架和显示集体行动的合理与尊严的意识形态。这些“主要框架”典型地产生于造反群体中,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改变美国传统“权利”概念的方式(见第七章)。斗争周期是创造、检验和改进产生于重要群体中的新文化观念的熔炉(参见Rochon 1998),这些新文化观念以更普及而较少有战斗性的形式渗透到文化中,成为未来运动象征符号的来源。

新旧运动组织

斗争周期几乎从来没有落入单独一个组织的控制之中,自发活动形式的出现标志着斗争周期高潮的到来,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斗争周期的发展方向和结果也都是由先前的组织传统和新组织起来的运动共同形成的。“旧”组织在斗争周期中并不一定要让位给新组织:许多现存组织,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在人权运动高潮就采用了其对手激进的策略,并把它的话语调整到更明确、更积极的公开立场中。

虽然较老的组织很快还会恢复较传统的活动形式,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就是这样,产生于激烈斗争时期的组织却可能会继续采用新的活动形式,因为斗争是这些组织建立在自己和其追随者之间的桥梁。这就是斗争不会因为某一个组织的要求得到满足或希望彻底破灭而停止的原因之一。斗争是各组织开始获得支持的方式,各组织得利用斗争维持自己并与其他组织展开竞争。

增加了的信息和互动

最后,在斗争增强的时期,信息流动更快,政治关注加强,各挑战群体之间及挑战群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频率和强度也不断升级。社会精英之间的冲突扩大为社会群体间更深的分化,新的权力中心形成,即使只是临时的、短暂的,却使造反者相信:他们在促进着旧制度的瓦解,并在挑战者和一些原有制度的拥护者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有时很奇异的联合。

这些联合有时形成新统治联盟的基础,但是,更多的时候它们却转向分裂,因为运动的一些分支希望寻求更激进的变化,另
146 一些分支又努力想使它们获得的利益制度化,而温和派由于越

来越怕动荡,也将丢弃从前的盟友。大批反政府和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行动者建立松散的联盟,这些联盟一旦得到有影响力的组织和明确的主要框架的支持,就可以使整个社会两极分化,由此把我们引向运动遣散的动力。

遣散阶段

革命周期的早期研究者,如克莱恩·布瑞顿(Brinton 1965)假设了一套连续的发展进程,很像生物进化或疾病发展所特有的那种进程。我们现在知道,对于这些线性发展模式来说,围绕着广泛传播的斗争的主要活动,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因素,这有助于比较不同的革命,更不用说还会让我们理解斗争周期更广阔的领域。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外部社会行动者会介入,改变权力的内部平衡,并使斗争周期突然结束。

或许是为了反对这个线性发展的斗争周期的设想,一些革命研究者忽视了斗争周期赖以发展的本质活动,不是聚焦导致革命的经常性条件(Skocpol 1979, 1994; Wickham-Crowley 1992),就是退回到往往充满关于革命作用和意外事件的证据的历史叙事中。这类研究至多只是对较短时期和浓缩事件的理论化叙述(Sewell 1996),或根据一系列个人经历进行一般叙述,很难发现一个理论化的叙述能解释:为什么斗争过程不可动摇地向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必然消亡?

我们没有足够有力的理论让自己去描绘所有斗争周期中反复出现的动力因素。如果有的话,它可能会使不同类型的斗争显得乏味,并且没有多少用处。我们所能做的是,提出一系列似乎只有在斗争周期的巅峰时刻才出现的因果作用,如在大多数事例中出现的三组作用:力量衰竭和分化,制度化和暴力,镇压和促进。

力量衰竭和两极分化

动员减弱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可能就是力量衰竭。尽管上街示威、游行和进行暴力抵抗一开始的确令人兴奋,可随着运动组织性的提高,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分化,它们也隐含着危险、个人代价,最终还有厌倦和理想的幻灭,结果参与者减少了。如果政治当局和治安部队能明智地等待时机,这种结局就会得到助长。

但是,参与者的减少对运动的所有部门来说并不均等。那些在挑战边缘没有充足的理由支持运动的人,最有可能脱离运
147 动;那些接近运动核心有充足理由支持运动的人,则最有可能坚持到底。根据一般规则,前者的行为较温和,他们脱离运动后,极端主义的制动闸就被消除了;与之相反,后者较激进,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暴力对抗。由于运动的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参与者脱离运动的比率不等,运动从温和要求到激进要求、从和平抗议到暴力抗议的平衡随之转变。

参与减弱的不均等使运动领导层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意识到众多的参与者是他们的力量所在,所以可能会接受更多温和的要求,并试图向对手妥协,以此来回应参与者的减少。相反,他们要保住好战分子的支持,又可能会试图通过提出激进主张和强化斗争,使运动之火不灭。无论哪种情况,不同程度支持的减弱都导致了向当局妥协者和继续抗争者之间的分化。

在不同的历史周期中,派系分化的形式不同。例如,18世纪80年代以大规模温和请愿开始的荷兰爱国运动同盟,就导致地方市民委员会网络和民兵的形成(te Brake 1997:6)。由于惧怕骚乱的恐怖,“原来由希望破灭的精英与大众政治的活动分子结成的联盟开始瓦解”。结果造成原来的爱国者同盟两极分化,

而形成一个实质反革命的联盟与之抗衡,革命因此在荷兰消失。就像特·布雷克总结的那样:“那些留在爱国者同盟中的人开始意识到,地方政治领域内表面舆论的崩溃,要求他们采用有力的革命行动去实现他们的目标。”^④

暴力与制度化

荷兰爱国者的分裂,主要是目标上的分歧。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化,则往往采用暴力冲突的形式。当温和派领导人为了维持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使其战略制度化时,激进派的对手为了争取好战者的支持和防止运动倒退,会采用对抗的策略。前者反对暴力,而后者常常使用暴力,有时还为了证明对敌人使用暴力是正当的,而把暴力提升到较高的政治形式。

这种冲突的一个很好的历史范例是法国革命中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间的斗争。它始于是是否要处决国王的争论,后来由于雅各宾派要求处死国王,持反对观点的吉伦特派不久就跟着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在英国的宪章派中,也存在着武力作用与道义作用相比哪个更有效的长期争论。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欧洲左翼中,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就前者的暴力和后者的温和有很多争论。 148

在最近几十年里,运动在暴力问题上已经形成了类似的两极分化。即使在以和平方式为主的美国民权运动中,运动较老的温和一翼和与之挑战以争夺领导权的年轻煽动者之间的争论,还是关于暴力和智慧的争论:到底是要奋力争取激进的经济利益,还是要扩大20世纪60年代早期获得的政治权利?运动的每个阶段都会导致运动新旧分支的争论越来越多。随着原来破坏性政治形式的毁灭和运动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群众运动逐渐让位于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运动就此崩溃。这里,我们必须引

入第三个要素——政府的反应。

促进和镇压

尽管派系分化逐渐在大众运动组成要素内形成,却也会因不同的政府战略受到助长或阻碍。迅速屈从于造反者要求的政府会发现自己被取代,因为随着每个政权薄弱迹象的显现,造反者的要求不断升级。1989年东欧的情况就是这样,政权缺陷的暴露致使挑战者的要求从在国家社会主义内部进行改革,扩大到彻底清除国家社会主义。

相反地,无条件地拒绝挑战者的要求并以武力作后盾的政府,不是在镇压卓有成效的地方消灭反对势力,就是在镇压无效的地方引起革命分化。

不过,这些极端的镇压形式在当代的斗争周期中并不如在18和19世纪那么典型。当今更普遍的是有选择地支持和镇压一些群体的要求。例如杰克·戈德斯通指出,菲律宾、哥伦比亚和肯尼亚的统治者们都成功地把精英分子从农民和工人中分开^⑥(Goldstone 1997:20),通过与一系列反抗者代表进行谈判,政府鼓励克制并把温和派与其激进同盟者分开。

尤其在群众支持减弱和运动内部派系分化同时发生时,使
149 用这种促进和有选择地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不仅能促使激进分子采取更褊狭的组织形式和更具暴力的活动形式,还能鼓励温和分子退出运动。最终,部分人员的解散、派系的分化以及有选择地镇压和促进政策可能导致恐怖主义(della Porta 1995:ch. 6)。戈德斯通这样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斗争周期:

起初,政府对抗议反应过度,而镇压不足,没有效果,从而激起进一步的抗议。但是,随着政府越来越了解抗议,它

终于能通过适当的让步来分化抗议者。这就把运动中的温和派吸引到合法行动中,使寻求更大改变的激进派受挫。激进派于是用更极端的暴力回击,造成恐怖升级,最终反恐怖的结果是极端的激进派被镇压或转向地下。(1997:11—12)

即使没有恐怖主义,镇压也会促进极端主义。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就开始镇压潘恩派和激进群体,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亲法的和拥护共和政体的,是“致力于追求那些被较温和的领导人一贯拒绝的颠覆性秘密共和目标的英国激进主义的残余”(Goodwin 1979:416)。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动力。当时,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的反越战示威造成与警察的暴力冲突,群众运动崩溃,留下“一大堆与单一问题有关的较小运动”,“失败的革命者(在其中)制造炸弹,把对自由的幻想变成了残忍的不起作用的恐怖主义爆炸”(Miller 1987:317)。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有政治控制力,能沉着地采取有选择地镇压和促进的政策。特别对专制政权而言,这一点尤为显然。因为专制政权的高层精英可能感到,哪怕只对温和主张有一点退让,也会引起更具威胁性的主张滚滚而来。即使在较多元化的政权内,由于担心有产者群体中发生骚乱,政府的反应会更全面,斗争浪潮会受到全球性的镇压。这样的一个周期说明了在政权削弱和挑战者临时掌权时,存在着外部干预的危险。

第一个现代斗争周期^⑦

1848年冬季和春季,整个欧洲都爆发了起义。起义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大陆的一些地方前几年粮食歉收,尽管在另外一些

地方,粮食收成自 1846 年灾荒后一直在好转。^⑧在一些国家,民众骚动的导火索则是选举权之争,尽管选举权的范围在另一些国家已经扩大,更有一些国家的选举权问题是在动乱发生后才形成的。最后,一些国家里重大斗争的根源在于宗教和种族的分歧,尽管在另外一些国家根本不存在明显的社群冲突。

虽然 1848 年初的起义有各种各样的起因,却从一开始就作为大陆的一桩大事吸引了旁观者。恩格斯从英格兰回到德国,为德国的起义奉献了相当多的才智;马志尼设法赶回罗马,在那里帮助促进罗马共和国的终结;加里波第则从拉丁美洲回到意大利,发动起义。尽管革命激情首先充满了瑞士和意大利,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影响仍然到处都很突出。

这场革命主要针对的是政治权利,但是随着这场新的革命积聚起巨大的力量,社会问题开始和政治代表权问题交织在一起。托克维尔在其 1847 年为温和的反对派制订的计划中,已经预见到政治要求的扩大。“时机就要来了,”他预言道,“这个国家将再次分裂为两大党派,很快将展开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政治斗争,财产将成为主要的争夺点。”(1987:12—13)

托克维尔言过其实了,1848 年革命还不是后来的社会革命,马克思早已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⑩最初几个星期的兴奋骚动过后,议会自由分子、中产阶级民主分子和畏惧阶级斗争的君主立宪分子害怕了,开始从玩弄改革把戏回到支持反动。经过一个在动员起来的大众面前撤退的时期之后,政府恢复了自控能力,召集起同盟者,将起义者扫除出了战场。

到 1848 年上半年为止,每个欧洲大国的政权都遭到威胁或颠覆。当时,人民游行、集会,组织会议和委员会,并构筑街垒。政府匆匆转向安全地带或赶紧改革来阻止进一步的反抗。雅克·戈德肖曾编制一份所有欧洲大国的大事年表(Godechot

1971), 提供了有关 1847—1849 年的信息, 图 9.1 结合从中采集的斗争性公众事件的数量, 说明了冲突和回应的戏剧化起伏。^①

戈德肖以时间为序的年表记载了从 1847 年 3 月第一次公开冲突开始起, 连续三十个月, 到 1849 年 8 月底为止的大事, 详尽概括了奥匈帝国、比利时、英国、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各邦、尼德兰、波兰、西班牙、瑞士的国家大事。其中一些事件非常富有斗争性和暴力性, 一些是正常的选举及立法行为, 一些是公共当局的行动, 还有一些是外国力量的干预。这份年表虽然只记录了事件的数量, 而不是持续的时间和参加的人数, 却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 19 世纪中叶欧洲斗争周期的图表。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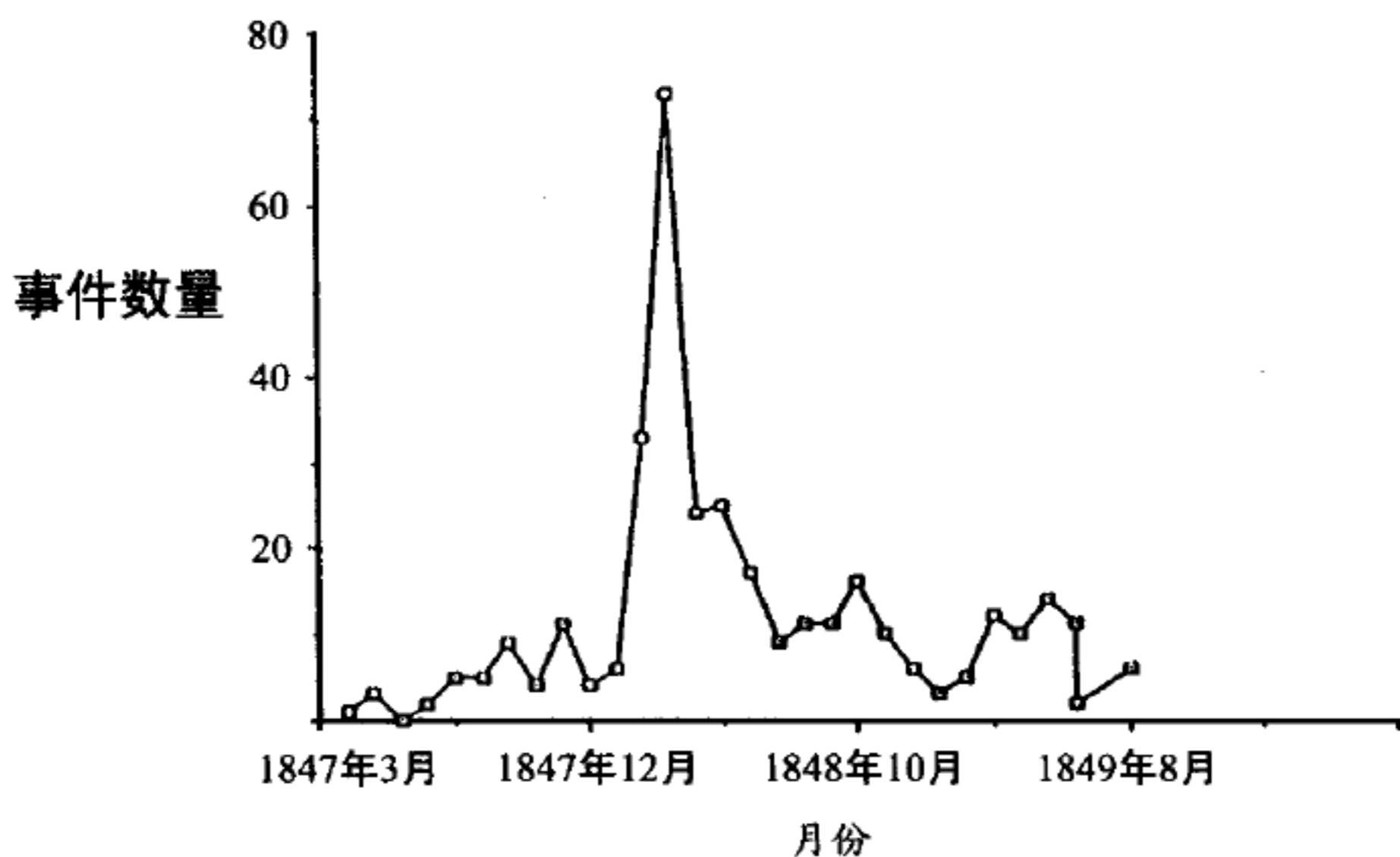


图 9.1 1848 年每月大事记, 1847 年 3 月—1849 年 8 月(资料来源: 萨拉·苏尔和西德尼·塔罗, “集体行动, 1847—1849: 集体行动手法的变化和发生地点”, 社会科学历史协会年会文选, 新奥尔良, 路易斯安那州, 1991 年)

创造机遇

虽然关于 1848 年革命最富戏剧性的回忆都源于巴黎,但事实上斗争周期却在此前一年左右开始于意大利。当时,满脑子改革思想的新教皇,在罗马及意大利南部引发了骚动浪潮;接着,比利时的自由主义政府宣誓就职;瑞典的自由主义新教行政区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天主教为主的农业行政区。法国一个历史学家艾丽·哈莱维(Elie Halevy)断言:“1848 年革命不是起源于巴黎的街垒,而是起源于瑞士的内战。”(转引自 Sigmann 1973:193)

就像在后来的很多斗争周期中一样,1848 年春天斗争高潮的标志是集体行动形式的扩大。1848 年集体行动的形式主要是公开集会、游行示威、构筑街垒和对别人的暴力行为。那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绅士们举行严肃的聚会和召开学术性的会议,共和主义者组织示威游行,工人和工匠修筑街垒,农民攻击地主和抢占林地。各种集体行动形式的同时出现使我们足以了解联盟的广泛。

街垒是各种起义的破坏性中心(Traugott 1990;1995)。街
152 垒最早于二月革命推翻君主时建于巴黎;后来,当社会主义工人拒绝承认他们所支持的共和派候选人在大选中失败时,又于 4 月建于鲁昂;当国民会议解散国家工厂时,街垒于 6 月重建;一年后当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的奇韦塔维基亚登陆为教皇复职时,街垒又一次被重建。总之,街垒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所有革命具有激进特色的地方。

抗议周期高潮的另一个标志是暴力事件的增加。1848 年春法国发生的攻击犹太人事件是种族冲突的预兆,而种族冲突则是革命向匈牙利和巴尔干推移的标志;德意志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也以许多攻击犹太人的事件为标志;匈牙利土地所有者

在摆脱维也纳统治后,很快却面临臣服的塞尔维亚人的起义,而不得不迅速镇压起义。如同在1989年革命后的南斯拉夫,在种族记忆的掩盖下,秩序的崩溃给雄心勃勃的当地社会精英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但是,革命产生了无休止的公众集会、学术会议和议会聚会。西西里岛的叛乱者在1848年1月占领帕勒莫后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成立了委员会来重建秩序,保证食品供给,保障财政安全,控制信息流通(Tilly, Tilly and Tilly 1975:130)。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在普鲁士国王于1847年6月解散州议会时有何反应呢?他们于9月在奥芬贝格、10月在奥本海默开会进行了讨论(Godechot 1971:199—200)。即使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1848年2月和3月革命事件也催生出会议和委员会。法兰克福“教授议会”算得上历时最长而成果最少的会议,它虽然最初受到纵容,最终却在革命威胁减弱后被普鲁士驱散。

1848年斗争手法中的第三个重要部分是游行示威。其实,游行示威正是在这一年才产生的(Favre 1990)。如果我们能假设戈德肖所说的“示威运动”(manifestation)与我们所说的“示威游行”(demonstration)类似^⑫,我们就会在戈德肖的大事年表中发现,从1847年7月到1848年6月的十二个月中,共有31次重大的示威游行。而在1848年2月至4月这一阶段,也就是动员的高潮,我们则可以发现示威游行最为频繁。就像在许多近来的斗争周期中一样,以和平方式占领公共场所、举行公共集会、构筑街垒和传统的攻击他人方式都是斗争周期激烈顶点的标志。

冲突在巴黎的扩大

1848年革命可能从欧洲边缘开始,但激进政治的中心却一直都在巴黎。巴黎的事件展示了冲突如何在制度范围内产生,又如何像一个扩大中的漩涡那样向外扩散。到19世纪40年代初,大多数中欧和西欧的政体,包括法国的政体,都拥有了半立
153 宪制的政府,为社会精英把辩论的焦点越来越多地放在选举权上提供了许多机会(Anderson and Anderson 1967:307—317)。

弄清奥尔良派统治面目的第一步,是看它对议会反对党提出的改革选举权要求的反应。它拒绝接受反对党的适度建议,把温和派推向共和派的怀抱。共和派为改革发动了几乎毫不掩饰的示威——“宴会”活动,把辩论从下议院带到了街上,从巴黎带到了外省。因为这些“宴会”都是由守法的反对派承办的,完全没有任何暴力,甚至在1848年也仍然如此,加上法国人都喜欢美食,所以政府对是否要镇压它们犹豫不决。结果,作为连接议会利益群体和非议会利益群体、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的桥梁,宴会运动经历了从受议会反对派控制转向受非议会鼓动者和记者联盟控制的危险阶段。

面对共和派的活动,温和派试图挽回,但为时已晚,主动权已被国民自卫队和城市贫民掌握(Tocqueville 1987:20)。温和派还没搞清楚出了什么事,街垒已经在巴黎的街头建起来,勤勉的司机在利用骚乱破坏铁路线,犹太人在东部省份遭到袭击,森林禁猎区被侵占,君主国的围墙在没有受到任何外部攻击之前已从内部开始瓦解。

斗争周期的衰退

当革命走出1848年春天的沸腾时期后,和平的示威游行和公共集会开始从戈德肖的大事年表中消失,而代之以“攻击”、

“冲突”、“分裂”、“干预”、“失败”之类的词语。他列举的最后一次公众示威游行发生于10月31日的柏林,要求的是工作。接下来,皇帝前一年春承认的改革也被取消。人们停止示威游行,并在受到部队攻击时开始用武装暴力进行还击。

街头的暴力转变部分是自发的,部分是对镇压的反应,促使早春时建立的革命联盟被破坏。马克思用一针见血的文字,描述了议会自由主义者及其后的共和派,如何为了保护财产的缘故,先后脱下支持新法兰西共和国的外衣,为路易·波拿巴先成为法兰西总统后成为国王开辟途径的全过程(1963a:42—43)。

戈德肖的大事年表中所记录的武装冲突渐渐扩大到国际范围。奥地利军队进攻意大利北部的自由主义者,法国干涉罗马,俄国军队为了帮助哈布斯堡王朝而进攻匈牙利人。到1848年底,出现了一幅近乎单调的武装斗争、外国干预和普遍集体行动瓦解的图景。军事力量在保守的反动作用和温和派退缩的支持下,把人们从春天带进了不满的严冬。 154

1848年革命就像很多其他抗议周期一样,在产生最大希望的地方留下了最苦涩的记忆。1848年的革命者开始时受到全欧洲激进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欢迎,可很快却因为“言辞空洞、神秘的理想主义……大量的幻想”(Sigmann 1973:10)而受到指责。在德意志,这一年很快被贴上了“疯狂之年”的标签,而英国驻巴黎的大使则写道,1848年几乎“使每个人都没有以前快乐,使每个国家都没有以前繁荣,使每个民族都没有以前自由,并使人们此后对自由的希望也变小了”(引自 Postgate 1955:266)。在意大利,甚至直到今天,“fare un quarantotto”这个短语仍然指制造混乱。在这种疯狂时刻的沉醉过后,“我们记得最多的是”,佐尔伯格写道,“政治狂热之后,接下来是资产阶级镇压,

或强有力的专制主义,有时是恐惧,但最终几乎总是回复到无聊”(Zolberg 1972:205)。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左派

1848 年革命中所发现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最近的斗争中看到,在罢工浪潮和一战后的革命运动时期中看到,如法国人民阵线、美国新政、1980 年始于波兰而 1991 年以苏联解体告终的东欧民主化斗争过程,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西欧和美国的激进运动。这里,我们将简要分析一下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运动,以此说明它们与早期斗争过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从 1968 年到 1972 年,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出现学生和工人运动的浪潮,最后几乎覆盖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直到最近的五年里,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系统数据来从数量上探究这个斗争周期,但是大量的定性研究和少数的定量研究毫无疑问地说明:欧洲社会当时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斗争周期。^⑬

特别有两场运动在 1968 年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其一是法国的“五月运动”,它虽历时短暂,却爆发力很强,几乎推翻自信的戴高乐政府;其二是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改革之春,它很快遭到苏联领导下的残酷军事镇压。大约与此同时,一场意大利马吉奥运动也使中小学和大学关闭,触发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五月滑坡”(Salvati 1981; Tarrow 1989a);德国的抗议浪潮则震动了德国自鸣得意的政治阶层(della Porta 1995)。

155 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民权运动中,以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的“愤怒的日子”为顶点的反越战骚动,使充满希望的岁月早已开始出现。^⑭和在欧洲一样,大学生成为运动的先锋,而在法国和意大利起关键催化作用的工人却不见了,60 年代初非常活跃的大多数美国年轻黑人也不见了,他们主要消失在作为

补充力量并参加了反越战运动的大学生人流之中。

运动在美国和西欧扩散得又快又广。运动的扩散部分依赖于民权运动中早已见过的“暂时行动小组”(McAdam 1988),并利用了新发现的廉价航空旅行工具和电视。航空旅行工具能迅速把成群的领导人聚集到正在酝酿冲突的地方,电视则能在没有强大群众组织的情况下,向全国报道冲突。在西欧,较小的社会规模,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都使运动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警察与巴黎大学学生的冲突只持续了几天,就使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关闭了(Schnapp and Vidal-Naquet 1998)。

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大西洋两岸共同的“主要框架”,在于道格·麦克亚当和迪特·鲁希特所谓的“运动观念的跨国扩散”(1993)。迅速传遍大西洋两岸的不仅是思想观念,还有静坐和妨碍议事进程的战术。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还远远称不上革命,它们却恰当地证明了蒂利所写的关于革命形势的跨国扩散。在一个通信发达的世界里,“一个大国的脆弱表现……暗示了在其他地方提出相似要求的可能性,并使人获得可传递的专业知识和学说”(1993:14)。

在欧洲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采用更分散的动员形式,把“老”左派延续下来的组织和新左派组织结合了起来(Isserman 1987)。在美国,民主社团的学生是最显而易见的“新左派”群体,而其他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带有社会民主色彩的人也很积极。在法国和意大利,学生们随“老”共产主义者和天主教左派分子学习政治学,创造了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运动。虽然“毛泽东思想”给这些运动带来了新的魅力,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人又回复了列宁主义的组织类型(Bobbio 1979; Tarrow 1989a)。

20世纪60年代运动的斗争手法也扩展得很快。学生们从马克思主义先辈们那里继承了固定的一套示威游行形式,又从民权运动中学到了非暴力抵抗战术和静坐示威形式,使斗争形式发生了转变。学生拒绝老左派的领导,也意味着拒绝和平战略。一半是为了显示他们与老一辈的不同,一半是为了吸引媒体、其他学生和当权者的注意。

在每个国家,明确要求的螺旋上升是从由具体利益冲突开始的对立中延伸出来的。随着抗议的扩散,挑战者联盟试图建立群众组织,扩大他们的政治要求。然而,在他们中较温和的分子转向制度化政党和协会时,好战分子却使其要求激进化,变成对当局的全面挑战(Lange, Irvin, and Tarrow 1989)。

这些运动的广度和快速扩散似乎威胁了既定的秩序,导致对抗运动的出现。对抗运动要求维护法律与秩序,有时也要求改革,但通常都要求采取更有效的控制形式。在欧洲和美国,斗争周期末期出现了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对立,制度化战术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方式的对立。像在1848年一样,以自由之春开始的运动在镇压和梦想破灭中收场。

革命的和非革命的斗争周期^⑮

即使是随意的读者也会注意到,我在前两个部分公正地论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斗争周期——1848年革命,以及今天很少被人称为革命的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如果不对革命的概念大大扩展的话。像这样把革命的和非革命的斗争周期合并在一起,实际是一种故意的挑衅:因为对革命的研究变得如此孤立,以致我们需要记住:革命只是斗争的类型之一。^⑯

像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那样,抗议周期和革命进程之间的相似处很多。要看到这些相似处,我们需要首先区分革命形势

和革命结果(Tilly 1993)。革命形势是指国家权力深刻分裂的时刻,而革命结果是指国家权力有效地转向新的行动者。一场成熟的革命应该是二者的结合。重大革命普遍分为下列几个阶段:革命形势——革命结果——新的革命形势——革命结果,如此这般下去,直到某些政治行动者巩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并镇压了下一轮挑战者为止。

根据事后的认识,我们会说,如果政府无力维持其基本功能,并且至少有两方在争夺控制权,那么革命就会发生(Tilly 1993)。^①从1917年2月俄国革命爆发的概貌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形势:沙皇政府由于战争失败,既失去了控制力,又失去了合法性。后来,反对派的力量因为前线的叛变而加强,因为城市食品供给的中断而削弱,又因为农民的不满而衰竭。这时,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加强人们对他们的支持,就提出了争取“面包、土地与和平”的主张。

由于上述条件中包含许多潜在革命形势,我们像在抗议周期的研究中一样,只能通过仔细研究把革命条件转向非革命结果的政治进程,追踪那些造成革命的斗争周期。而无论在运动周期还是革命中,由先前不占优势的行动者同时发起的一个成功挑战(1)宣告了当权者的不堪一击,(2)提供了一个提出有效要求的模式,(3)为其他挑战者分辨出可能的同盟者,(4)改变了现存的挑战者和当权者相互间的关系,(5)由此威胁了其他同现状有利害关系的政治行动者的利益,并使他们受到刺激。 157

这样的形势要转变成革命,其条件是:掌权的高层精英驳回所有对抗要求,而一些提出主权要求的挑战者又获得了权力,两者联合起来反对新的挑战者,巩固他们的地位。这个过程最终使动员起来的行动者分裂为当权者和局外人,使一些局外人被遣散,余者被推向越来越冒险的行动,直到镇压、合作和分裂结

束整个革命周期。

上面描述的三个动态过程,有助于我们从较普通的斗争周期中辨别革命结果。如果高层精英用盲目镇压和拒绝任何让步来回应挑战者联盟的广泛要求,愤怒和高度团结就会阻挡其分化的进程,并消除背叛。杰克·戈德斯通这样写道:

就革命运动来说,它开始可能只是为达成某个目标或看法而发起的运动,后来才发展为具有不同目标的不同群体的协作努力,并成为企图推翻政府的运动。它之所以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政府采取了绝对抵制的镇压姿态:政府严厉禁止或苛刻地限制运动行动,强烈反对所有与运动有关的人,并可能试图消灭运动和它的支持者。(Goldstone 1997:4)

政府的镇压可以有多种形式,并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府能正好有区别地对运动支持者集中实行它的镇压措施的地方,”戈德斯通继续写道,“镇压可能不是结束运动,就是使之转入地下。”而在镇压不集中、不一致和武断的地方,或在政府受到国内外压力限制的地方,“运动可能吸引支持者,同时使其目标和行动变得更加激进”(Goldstone 1997:5)。

运动的激进化也取决于反对派内部的关系,并遵循我们说过的三个动态过程。全面镇压会削弱温和派的地位(例如,因为它断绝了和解的可能,使叛变失去了作用或非常危险),而加强激进派的地位。暴力——即使是政府的暴力——和分化,会让激进派在革命联盟内部争取支持的竞争中占上风。同样,外在的攻击也会削弱温和派的地位,而加强那些准备镇压内部对抗的较坚定者地位,引发与前述同样的过程。我们可以在俄国革

命中再次极清晰地看到这点,因为列宁先消灭了临时政府,接着又消灭了与他竞争的社会革命党。

另一个过程帮助提出一条革命路线:高层精英或因为政府的残酷镇压和不灵活政策,或因为对反对派目标的同情,或因为两者兼而有之,叛变到反对派阵营。这是1989年东欧“革命”中重大的、在很大程度出人意外的方面,当时甚至警察也与令人敬畏的德国民主共和党结盟,阻止在莱比锡和西柏林攻击游行。

革命形势因而类似于新社会运动向现存政体挑战的开端。如果挑战成倍增长,使所有体制内现存的潜在行动者的支持受到威胁,导致政府选择镇压所有的反对派,不明智地把优势扔给政权最坚定的反对者,新社会运动挑战的开端就变成革命形势。社会运动、抗议周期和革命就像戈德斯通总结的那样:

既不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完全相同的现象,它们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分别从和缓到偏激。实际上,它们被认为是一类相关的现象,产生于相似背景下,却在抗议运动、政府反应、更广大的社会环境和政府文化评估与反抗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中,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渐发展和分化。(Goldstone 1997:24)

关于民主化的注解

相同的类比推理可能会帮助我们弄清斗争的运作过程和另一种结果——民主化。民主化主要以西班牙模式为基础,常被看作一个主要由高层精英发动和控制的过程(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它同革命周期的相同之处在于:受到不同人群支持的对立领导集团之间争夺统治权。民主化和革命周期一

样,也存在旧政权成员的叛变和武装力量的重要作用。但它的成功靠的是在旧的统治者和新的高层精英之间大量玩弄中立的把戏,而不大像成功的革命那样依靠暴力。

1989年发生在中欧东部的民主革命可用来提醒学者们:民主化不管多么和平,仍然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与运动周期和革命周期具有同种相似性。最近关于1989年东欧事件的著作(Fish 1995; Oberschall 1996; Zdravomyslova 1996)和关于南欧及拉丁美洲的著作(Bermeo 1997; Collier 1997, Tarrow 1995c),还有马尔科夫(1996)和佩格努科(1996)的理论著作,都开始挑战近来民主化的“精英交易”观点,而要把民主转变纳入斗争过程家族,我们还缺少理性手段和经验基础。

斗争周期的多种结局

从长远来看,自1848年革命而起的集体行动浪潮显示了这样一个抛物线:从制度上的冲突到满腔热情的斗争高峰,再到最终的崩溃,或——就成功的革命而言——新体制的巩固。集体行动在得到全民关注和政府响应后,即达到冲突高峰,其标志是那些试图把起义扩散到更广公众范围的活动组织者的出现。由于社会参与被引入到组织中,运动的一些部分具有了更多政治上的内在联系,卷入与当局含蓄的讨价还价中。随着斗争周期的松懈、衰竭和分化扩散,发起者也向高层精英和政党转移。

在这些斗争周期中,互动的多极化和当局反应的多样化使结局与开始相去甚远。集体行动从早期的发起者向后继者的扩散,政治机遇从早期的挑战者到他们的同盟者再到精英的转移,及政府关于该镇压谁和鼓励谁的不同抉择,在运动内部分化出激进派和保守派:它们在斗争周期中增加了互动的次数和种类,并仿效1848年革命,使其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例如,西欧各国政府经历了 1968 年抗议浪潮之后,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在法国,保守党联盟从根本上修正了 5 月引起学生抗议的教育制度,而取消了工人工资的增加;在西德,社会民主联盟取得政权,扩大了国家的福利体系,并与当时东德共产党一起推出东部策略;在意大利,中偏左政府的一系列变化,在工厂中为工人阶级确立了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颠覆,而政治制度却原封未动。抗议周期的结局从不像其开端那样统一,这就直接把我们带到运动结果的问题中。 160

十 争取改革

争取改革——竟然用这样奇怪的词汇来引导对社会运动结果的讨论！因为几乎没有运动仅仅是为了寻求改革，很多运动完全拒绝改革。运动积极分子一般要求根本的社会变化，要求承认新的身份认同，要求加入政体，要求摧毁敌人或推翻一种社会秩序——而很少要求“改革”。正如我们在前些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运动在一个普遍的斗争周期中达到顶点，其要求日益广泛，高层精英遭到围攻，迫使深刻的社会变化被提上日程。尽管如此，正如我在本章中所主张的那样，民主国家中用来处理民众要求的政治结构，总是迫使运动去经受一个常见的严峻考验，它将使运动很可能以改革周期为结局。

政策结果的模糊性

多年以来，社会运动分析家一直为我们不了解运动的政策结果而叹惜（Grugni, 1994; Gurr 1980; Marx and Wood 1975）。由于缺少有说服力的关于运动结果的信息，产生了许多关于运动结果的不同分类，几乎对此有多少种研究，就有多少种分类。其中威廉·盖姆森的系统分类是最著名的，也是最简单和最常用的。威廉·盖姆森在《社会抗议的策略》一书中，把挑战者分为获

得新优势的和获得认可的两种类型(Gamson 1990:ch. 1),由此产生了他熟悉的四重分类法,即以“全面响应”和失败为两极,中间再分出“同化”和“先占”(ch. 3);汤姆·罗尚和丹尼尔·马斯马米安提出了第三种运动结果——社会价值观的变化(1993);保罗·舒梅克确认了五种系统反应,包括从“进入反应”到“影响反应”(Schumaker 1975);保罗·伯斯坦和他的合作者在舒梅克 161 列举的五种系统反应后又加上了“结构影响”(Burstern 1991)。^①

部分问题在于:虽然我们有可能把运动结果和运动努力联系起来,却很难把特定的运动行为确定为造成特别运动结果的原因。人们关心运动结果的潜在原因,除了运动积极分子的意见,还有公众舆论、利益集团、党派和执行人的影响。正如保罗·伯斯坦在其关于争取平等雇用机会立法的分析中所写的那样,运动结果“作为社会变化的结果被接受,这些社会变化为公众意见所表明,在民权运动与妇女运动中结晶,被政治领袖转化为公共政策”(Burstern 1985:125)。

此外,运动或舆论的国际浪潮能产生这样的信念:有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地方性运动力量不足或缺乏之时。例如,在大体相同的历史时期,妇女选举权运动在各工业化社会取得成功,这其实更多的是跨国舆论浪潮的结果,而不是特定运动资源或战术的结果。环保主义与世界各地环保部门和组织的建立也是如此(Meyer et al. 1997)。

罢工和其他结果

在罢工结果中我们可能发现上述复杂情况的例外情形。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一些学者分析了工人暴力、环境变化、群体规模、运动持续时间和所提要求的本质对罢工结果的影响^②,得出了不完全一致的结论。但是,在像19世纪末的意大利、20

世纪中叶的美国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波兰这样相差很远的国家,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如下的发现:罢工可以有效地促使政府或雇主作出让步(Osa 1998)。此外,看起来“在解释暴力和运动结果方面,个别罢工的特点比环境变量更重要”(Giughi 1944:6)。

罢工多少有些特别:目标往往是一个雇主,要求也很明确,抗议持续时间很短,工人一般实行自治,而且组织良好。相比而言,在第九章中所描述的斗争周期背景中,运动很少如此统一,其要求往往也不清楚和不现实——可能更多地针对动员内部好战分子,而不是说服对手。对一些运动来说,“成功”的意思可能更多的是建立集体认同,而不是取得政策的成功(Melucci 1996, Pizzorno 1978)。

另外,精英在面对挑战者和结盟者之间、竞争者和选举人之间的多种关系时,对任何一场运动的要求都不会像对自己面临的全面冲突结构那样作出很多反应。在这样的对抗中,他们更可能介于人们向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之间,不逐一作答,并寻找为广大群众接受的解决办法来打败敌人,强制进行社会控制,并满足其同盟者和支持者的需要。

在 1968 年 5 月法国所遭受的大规模罢工浪潮中,这一点尤为突出。政府为了摆脱激进的学生运动,为了恢复经济,才对工人提出的要求作出让步。在全面危机过去之后,政府即紧缩通货,抹杀许多工人斗争的成果(Salvati 1981)。个别运动的挑战结果因此很难从普遍斗争周期中分离出来,尽管它们大多数都产生于斗争周期中。

政体内部同盟者的出现,对于形成有利于社会运动的政策结果特别重要(Jenkins and Perrow 1977; Lipsky 1968)。实际上,同盟者常常作为挑战者和掌权者之间主动的调解者,可能对

精英反应的影响比对运动本身的影响更大。政治程序在形成政策反应方面,使第三党派、利益集团以及运动同盟者和反对者得以发挥关键作用。正如爱德温·阿曼塔和他的合作者主张的那样,“政治背景在运动组织的影响和运动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之间居中调停,为可能的结果设定了范围”(Amenta 1992: 309)。

既然如此,那么哪些是帮助运动成功的因素呢?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即破坏的力量导致短期的成功。例如,回顾美国的福利改革连续浪潮,皮文和克洛沃德写道:“在不时发生因大量失业而导致公民骚乱的时期,救济安排得以启动或扩展”(Piven and Cloward 1993: xiii)。同样,蒂利们也根据他们对欧洲百年冲突的研究总结道,“没有那些(抗议)群体为战胜政府和其他群体的抵制而做好某些准备,就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权利。”(Tilly, Tilly, and Tilly, 1975: 184)

其他学者在解释运动的成功时,也已重点关注政治机遇的开放(Jenkins and Perrow 1977; Tarrow 1989a, 1989b)。特别是,新的社会行动者进入政体有助于将新的问题提上日程,并使权力平衡朝有利于老的行动者的方向倾斜。因此,西方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范围后,国内权力平衡就转向迅速通过福利立法、使罢工合法化和选举第一批工人上台的进步党。选举权运动之所以在某些地方失败——例如在瑞士,妇女选举权运动开展了几十年都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对立党派从没有发起可能刺激执政党采取行动的选举挑战”,而且精英封闭自守,而没有偏向谨慎建构的内部舆论(Banaszak 1996: 215—216)。^③

其他学者还指出,内部资源、组织和挑战者的策略是成功的关键。例如:它们的组织形式,不管是中央集权的还是权力分散的;它们的分化程度,不管其要求是影响深远的还是有限的;它 163

们是否有选择性动机来区分其支持者；它们是否使用暴力来反抗对手。^④这些学者已经聚焦于环境变量，如同盟者的数目、政治环境、运动的政治途径结构，以及运动是在危机时还是在更为平常时出现(Goldstone 1980)。^⑤还有一些学者指向了导致运动成功的挑战者的价值观和信仰(Banaszak 1996)。

但如果有这么多的变量可以用来解释运动的成功或失败，那么它们合在一起又会怎样呢？在盖姆森的多元分析数据中，斯蒂德利和弗莱发现，“按照相对重要的次序来排列，目标不可取代的本质、同盟者的数目、宗派分裂的缺失、专门而有限的目标，以及用法律来反对对手的愿望”，都与成功相关(Giugni 1994:4)。这些变量大部分被看作运动“内在的”变量；但斯蒂德利和弗莱的著作中论及的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周期性政治危机的作用(如 Goldstone, 1980; Snyder and Tilly 1972)表明，要使运动获得成功，必须把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组织的和政治的、结构的和战略的因素相结合。

社会运动在取得政策成功方面记录平平的最好解释是：很难发现此种聚合，机会在运动斗争周期中会从挑战者转移到上层精英，斗争周期一结束就会重新恢复“秩序”。如果运动确实取得成功，那常常只是达到了那些在法庭上代表运动的有影响的同盟者可以接受的条件。此外，即使斗争周期能产生临时的改革联盟，它们通常也很短暂、分歧很大，并在没人害怕混乱时依赖于暂时的机遇来提供永久的支持(Piven and Cloward 1971, 1977)。弗兰西斯·福克斯·皮文和理查德·克洛沃德在其富于雄辩的著作《穷人的运动：成功和失败的原因》(1977)中，对运动很少成功和政策结果频频逆转作了极好的论述。

但是，运动不会简单地消失，只在其后留下无精打采或镇压，而没有别的痕迹。它们具有间接而长期的影响，当初始的兴

奋和最终的失望过后,这种影响就会出现。特别当运动留下了持续的活动分子网络之后,它们会在旧的斗争周期结束和新的机遇来临时重组。运动有三种长期而间接的影响十分重要:它们对那些参加运动者和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它们的斗争对政治制度和实践的影响,它们对政治文化中的变化的贡献。

政治的是个人的

在抗议周期的兴奋过后,“我们记得最牢的是”,佐尔伯格写道,“政治狂热之后,接下来的是资产阶级镇压,或强有力的专制主义,有时是恐惧,但最终几乎总是回复到无聊”(Zolberg 1972: 164 205)。经济学家艾伯特·赫施曼走得更远,他用“反弹效应”来描绘那些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公众生活,之后又带着与其所付出的努力成正比的厌恶感回归个人生活者(Hirschman 1982: 80)。

在斗争周期中,早期的造反者经常看到运动朝他们从未想到的方向急速发展。美利坚共和国的两位创始人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在回顾他们那一代所做的工作时,远不算高兴。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共和国,“美国创造了一个巨大而松散的社会,它比存在过的任何社会更平等、更好,更多地受普通民众利益的支配”(Wood 1991: 348)。可是,杰斐逊却讨厌席卷整个美国的商业文化,他从来都不欣赏“他的民主和平等原则对商业文化的兴起所发挥的作用”(p. 367)。“一切,一切都结束了,”他逝世前写信给朋友说,“我们被单独留在新一代人之中,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p. 368)

杰斐逊的幻灭感不是源于激进主义本身,而是源于他对美国的远大设想和革命的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活动积极分子也是这样,他们的主张有多么不现

实,他们所体会的幻灭感就有多严重。在一些雄心不大的运动中,如盖姆森所研究的目标狭隘的运动(1990:ch. 4),或约翰·麦卡锡和马克·沃夫森所研究的“舆论运动”(1992),活动积极分子就不大可能永久地为一场抗议活动感到幻灭。

此外,幻灭也是当前失望和疲惫的结果,所以可能只是暂时的。通过从斗争中学到的技巧,通过把他们的信仰扩展到活动的新领域,通过保留运动中结成的友谊网络,激进主义会引起新的激进主义,对政治持更偏激的态度,更愿意加入其他运动。

运动作为一种锻炼过程

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者鲍勃·摩西(Bob Moses)为表达他对自由之夏的希望,于1964年在密西西比倡导一种“锻炼过程”。对许多运动积极分子而言,“在密西西比之夏的‘白热化’状态中……政治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组织力量”。从那以后,其他任何事情——关系、工作等——都以政治为组织中心(McAdam 1988:1867)。世界上其他的运动周期也导致了同样的军事和政治化的连生。在印度尼西亚,对二战后加入激进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来说:

165 政治怒潮不断咆哮,失去了控制。每个人,无论男女,都觉得自己不问政治或不讨论政治就无法真正地存在……政治! 政治! 与日本人占领时期的粮食一样重要。(引自Anderson 1990:38)

参加运动不仅仅是搞政治,还能使人在心理上更愿意承担政治风险,在政治上提供新技术和拓展视角。例如,一位自由之夏运动的志愿者描述了自己于1964年秋从密西西比回到加利

福尼亚大学的感受,她告诉道格·麦克亚当说:“自由之夏旨在提高你的觉悟;你感觉自己好像早就去过那里,并知道你将谈论什么。”(1988:166)另外一位志愿者则这样说:“每个人都听说过这个夏日工程,每个人都想问我它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是一位专家,一位在民权运动方面的速成专家。”(p. 170)许多早期自由之夏积极分子由于完全被政治化,在伯克利的自由演讲运动,后来的全国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和妇女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p. 203)。

经验丰富的民权活动尤其使后来的运动得到了强化。参加过民权运动的青年妇女从她们的经历中得知,她们的男性战友常常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是男性至上主义者,对妇女不屑一顾。她们的愤怒和她们在南方的运动中获得信心,是形成新的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Evans 1980:chs. 4 and 5)。前自由之夏妇女志愿者二十年后接受采访时,仍然比她们的男性战友更多地投身于当代社会运动,更倾向于参加政治组织(McAdam 1988:222)。

不过,20世纪60年代好战分子的叙述揭示的是一个杂乱的故事: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例如,一个成功的新奥尔良律师纳尔逊(Jack Nelson),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承接过一系列民权运动的案子,他用下面的文字对历史学家罗杰斯(Kim Rogers)描述了他的行为对他个人的影响:

我改变了我的生活。与试图用这个人或那个组织来改变世界不同,我可能从改变我的生活开始……你知道,我说,等等,我得改变一下。我真的改变了,然后一切就自然

而然地发生了。(1993:172)

然而,对所有回答罗杰斯提问的人而言,并非每件事都像纳尔逊说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她在新奥尔良采访了更激进更年轻的种族平等协会(CORE)和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的积极分子,他们都觉得运动后的年代令人失望。他们因为政治理想破灭而变得玩世不恭,“对通过政治程序进行有意义的变革不抱任何希望”,尽管他们对政治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内心却十分矛盾,“经常渴望他们过去的那种集体力量”(p. 174)。由于他们曾坚决地攻击白人的权力结构,与穷苦乡下黑人密切联系,他们这些种族平等协会和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在失败后,对运动结果的失望远胜于纳尔逊那种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人。

运动不仅使人们政治化,还使人们激进化。杰克·布洛克为19世纪美国的禁酒运动记下了这一点。禁酒运动以道义上的劝告开始,在这些战术失败后,转向了攻击性战术,并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要求(Blocker 1989:16)。最近的运动也是如此。麦克亚当比较了从自由之夏回来的志愿者和不去密西西比的申请者的态度,发现前者在意识形态上左倾,后者则一直比较温和;卡罗尔·麦肖恩比较了“热秋”(Hot Autumn)期间征募的意大利工厂组织者和他们同伴的态度,发现前者更强调人人平等,更倾向于以严格的阶级角度来看待劳资关系(Mershon 1990:311—315)。

先前的活动分子将照例抛弃他们的激进思想,转而用他们的才能去利用主流思想,这种主要由《大寒》一类电影引起的说法已经逐渐形成,并且有一些名人传记为证。可是,与此相反的证据也很多。例如,芬德里克和克劳斯在日本和美国的成人中

发现,激进态度的最佳预报因子是人们学生时代的激进主义(Fendrich and Krauss 1978:248)。在意大利也一样:比较一下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末运动的共产主义活动分子与他们党内没有运动经验的同志的态度,显然前者更能容忍抗议,并且对暴力也不那么严厉(Lange et al. 1989:34—36)。

关于运动参与效果的系统性发现来自法国和美国。已故的法国政治科学家安尼克·佩舍龙在分析法国20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参加者的政治态度时发现,在三大法国政治倾向支持者中,对两次阿尔及利亚战争抗议或五月事件的参与,强化了各个政治组织的独特态度(Percheron 1991:56—57)。同样,戴伦·歇卡特和简·布洛克在美国发现: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激进主义活动分子与非激进主义活动分子相差甚远——即使在控制抗议参与预测因素方面(Sherkat and Blocker 1997)^⑥。

孤立和遗憾

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美国和欧洲先前的活动分子中,存在许多难以理解的苦恼,佐尔伯格和赫施曼对此作了描述。不过,这可能更多的是生活道路改变和政治环境变迁的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逆转的结果。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文化让位于70年代的失望和80年代的个人至上论,许多活动分子 167 背叛了初衷,另一些人则将自己封闭在运动的亚文化之中。麦克亚当在20世纪70年代写道:“激进主义的亚文化慢慢地解体,使仍然活跃的志愿者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孤立。”(McAdam 1988:205)

过去的激进主义对活动分子的个人生活也造成了影响,并且其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例如,据麦克亚当推算,47%在那个夏季后结婚的自由之夏志愿者于1970年到1979年间离婚,而

要求不去密西西比的志愿者的离婚率则低于 30% (McAdam 1988:208)。对女志愿者来说,激进主义的个人代价高得不成比例(pp. 220—221)——不是因为她们喜欢独身生活,而是因为她们自己的独立和左倾使她们脱离了向右发展的政治文化。

在美国和意大利,20 世纪 60 年代的活动分子比没参加过运动者更多地改换工作和遭受失业,承受着职业不稳定的痛苦。麦克亚当采访过的许多自由之夏的活动分子,为了继续他们的运动实践,耽误了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直到萧条的 20 世纪 70 年代才寻求就业,并永远无法弥补失去的从业时间 (McAdam 1988:109—212)。先前意大利运动中左派团体“继续斗争”的领袖也是如此,许多人都如此。当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接受采访时,不少人仍在就业市场边缘挣扎。^⑦

西欧与美国不大一样的重要方面在于,西欧在美国活动分子所缺乏的左派群众政党或工会中,给予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许多成员一些职业出路。相比之下,先前的美国活动分子几乎不能在政党系统中为他们的激进主义找到出路,尤其在 1972 年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灾难性失败之后。至于工会,虽然一些活动分子成为基层组织者,但是美国工会所固有的保守主义与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长期衰落,使它成为激进主义微不足道的出路。

通过保持联系来保持信仰

对运动漠不关心或使之专业化,这样对立的两个极端都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运动最典型的结果。大多数人虽然重新回归私人生活,但仍继续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中十分活跃;还有些人从社会运动组织的直接行动转向与他们原来的运动目标有渊源关系的服务组织、自助团体、政党

和利益集团(见图 8.1);另外一些人则成为专业的运动积极分子。

上述发现在西欧和美国的许多研究中反复出现。在美国,麦克亚当所采访的从前的自由之夏志愿者约有一半至少还活跃于 20 年后的一个社会运动中;在意大利,被采访的前活动分子可能还活跃于意大利传统的左翼政党之一或绿党或社会运动中(Lange et al. 1989);在日本,芬德里克和克劳斯发现,过去的活动分子常活跃于一个左翼政党或运动中(Fendrich and Krauss 1978:245);在从前参加抗议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中,还有参加 1968 年法国学生运动并支持政党政治的人中,佩舍龙发现了一种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超出了相同政党的其他支持者的参与水平。 168

毫无疑问,个人的投入对保持激进主义非常重要。那些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仍然十分活跃的西欧和美国 60 年代的活动分子,常常扎根于从前的活动分子网络中,通过保持联系来保持信仰。缺乏这种关系网络的活动分子,不管是因为意识形态上还是组织上的原因,在 60 年代末之后,很少能保持活力(Gelb 1987:281)。此外,运动过后建立的网络常超出活动分子原来的社会运动组织成员的范围。马里奥·迪亚尼在研究意大利环保运动时发现,网络和身份认同一般超越了把它们最初社会化到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Diani 1995)。

抗议周期高潮激烈的政治化导致后来的幻灭,并在一代抗议者中造成许多人退出积极参与。但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大多数人从未深深卷入这一时期的运动。一些人因为激进主义的失败而痛苦,并转向乌托邦主义或暴力,如最后加入美国气象人地下组织或意大利红色旅的好战分子(della Porta 1995:ch. 6)。

但经历过 20 世纪 60 年代运动的大部分活动分子,都以被授权、被改造和保持与其他活动分子的非正式网络联系的形式重新出现。运动的一种“社会资本”就是那个斗争时期最经久的结果(Diani 1997)。德布拉·明科夫写道:

全国性社会运动组织在公民社会中,在通过提供一种集体行动的基层结构来制造社会资本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促进了起媒介作用的集体身份认同的发展,而集体认同可以使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成员联系起来,同时,它还形成了公共话语和争论。(Minkoff 1997:606)

失败的爆炸和成功的火花

如果个别运动的政策成功难以预测,如果运动积极分子常常在斗争周期最激动的时刻竭尽全力,那么运动的长远影响是什么呢?能否通过它们表现的激烈程度来预测它们最终的影响呢?或者是否能够通过逐步发展和世代再生来获得长远成功呢?为了说明这种对立,我将比较两场不同的运动。其一是 1968 年的法国学生运动,它的爆发是西方社会的奇迹,它和其劳动者同盟一起使第五共和国瘫痪。其二是美国的妇女运动,它开始得很缓慢,仅仅作为民权运动的支流而出现,并基本上在美国政治制度范围内运作。

法国学生^⑨

1968 年 5 月的法国,几乎就像研究重大抗议浪潮对政治影响的实验室。两位最敏锐的观察家论道:

虽然运动退却了,在选举结果中遭到了拒绝,但这个事

件却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传达了以必要的直接应对方式,持久地投身于法国政治舞台的可能。(Capdevielle and Mouriaux 1988:219)

1968年5月的抗议浪潮之后,接下来是一场重大的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定位法给予5月的学生们的第一个抨击对象——僵化的高等教育结构——当头一击,但是随着主动权从学生转向改革者,再转向教育利益集团以及保守的政治阶层,改革力度逐渐减小,最终失去了威力。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发生过程,就能大致看到机遇减少、改革随破坏的失败而重构、高层精英在斗争周期结束后重建立场的过程。

1968年初春,新建的南泰尔大学左翼学生,为反对专断的管理权威和更广泛的对象,以各种理由举行游行示威。5月初,他们在索邦大学校园里游行示威,遭到警方的暗算和政府的糊弄。当一群学生被拖到警车上时,巴黎的中产阶级分子被激怒了。随后,令人愤怒的消息传到法国其他地方,所有的大学和许多中学纷纷关闭。

不仅如此,随着运动的扩散,除了学生本来的自我激愤外,领导者又希望把他们的诉求扩大到更广的公众领域。于是,大学管理的具体问题就被变革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要求所取代,思想得到解放。在多方面论战的包围下,当权者采取了守势。当运动扩散到工人阶级时,政府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场潜在的革命。工人和学生的联合行动是偶尔发生的,但他们的真正联盟却给运动的每个部分带来一种工人或学生独自创造不了的力量。

政府要做的事是:第一,尽量不进行残酷镇压。事实上,1968年是法国在控制抗议方面发生永久转变的一年

(Bruneteaux 1996; Fillieule 1997)。第二,政府需要分开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学生盟友,恢复经济。蓬皮杜总理在撤消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后,即与工会商讨大幅增加工资,以便把学生孤立在学校堡垒中(Bridgford 1989)。最后,政府还用中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来吓唬人,通过戴高乐总统给军队的表态和总统支持者的大规模反示威游行,实现了这个目标。当左翼政党被迫宣布他们准备成立一个政府时,戴高乐总统终于获得他需要的机遇,解散国民会议,彻底击败反对派,使他的支持者及其盟友以绝对多数的优势重掌大权。

1968年6月大选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仍然有人反对政府,把5月突现的一大堆教育改革方面的要求,归结为一条重大的改革法案——定位法,任命左倾的埃德加·福尔(Edgar Faure)为新的教育部长,让他以大学的参与性、多学科性、自治性目标为中心,全权改造高等教育。^⑩如此大的变化,若没有一个重大政治变动的推动,是不可能被引入到法国死板的教育结构中的。

但定位法对学生运动来说是一种成功吗?运动没有直接造成重大影响,而是通过它们与更墨守成规的政治力量和高层精英的互动才造成重大影响。法国学生对大学改革并没有什么计划,到9月,他们的影响力已锐减,不仅因为工人阶级的工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且因为他们的团结被破坏了(Tarrow 1993b)。随着运动重心从街头转向政治领域,骚动的威胁日益减弱,学生的影响力直线下降。至此,一场重要的斗争,就像对美国种族危机的“处理”那样(Lipsky and Olson 1976),在政治上被处理为适度的改革。

美国妇女

学生是 1968 年法国斗争周期中最早的叛乱者,而如果有一场运动看起来取决于他人打开的机遇大门,那就是美国的妇女运动。它的许多创始人在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Evans 1980:chs. 3—7)中首次出现于政治舞台,另一些则是温和的年长妇女游说团(Rupp and Taylor 1987)和反越战运动的继承者。当这场新妇女运动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出现时,“许多观察家们”,安妮·科斯坦写道,认为“它是短暂的现象,模仿了黑人民权运动,却没有持续运动的能力”(Costain 1992:1)。

然而,妇女运动确实持续下来,并兴盛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因为许多原来的民权大跃进,姑且不论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已经枯萎。妇女运动发展的迹象不仅表现在个人态度上,也表现在组织上。因为越来越多的妇女宣布她们赞成女性主义,并且主要的妇女组织成员人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已达到 25 万人(Klein 1987)。即使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激进主义文化衰落时,妇女运动也变得更为强大,给予妇女“一种坚持其激进主义的途径和一个支持更全面的女性主义生活方式的组织”(McAdam 1988:202),导致被选人政府机构的妇女人数和国会通过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法案数有了惊人的增长(Costain 1992:10—11)。

不过,美国妇女运动从不像法国学生运动或其他 20 世纪 60 年代的对抗运动那样张扬。许多早期倡导者都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在传统政治和利益集团中默默无闻地工作;还有一些人是女性主义律师,她们在繁忙的事业之余从事运动工作;大部分人根本没有积极地组织起来,或是在以劳工、民权、家庭问题或公众健康为基本目标的组织中工作。此外,运动的进步以重大失败为标志,如 1983 年平等权利修正案失败;里根

和布什时期政府女性入选者的削减；1990年参议院对任命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批准。

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的迹象在公众领域随处可见。1965年至1975年间,与妇女的一般活动(Constrain 1992:9)和特别反抗运动(p. 19)有关的新闻报道都大幅增长。由于选举中出现“性别缺口”,政治家很快对妇女问题作出了回应(Freeman 1987:206—208)。1992年妇女运动达到高潮,许多妇女在1992年选举中被选进国会,同时一些妇女还被任命为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官员。这场在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庇护下诞生的运动,虽然开始发展缓慢,后来却稳步地变得越来越有力和越来越重要。

另外,如果运动活力的标记,像第七章至第九章所论述的那样,在于其“派生”新的“主要框架”和其他与运动相关组织的能力,那么美国妇女运动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南希·惠蒂尔写道:

(妇女)组成了被强暴危机处理中心、受虐待妇女庇护所、女性主义书店和妇女研究计划等组织,目的在于改善妇女目前的生活,并为将来更彻底的社会转变打下基础。(Whittier 1995:1;亦见 Meyer and Whittier 1994)

如何解释美国妇女运动的成功和法国学生运动的失败之间的显著差异呢?从本书第二部分研究的运动中的四种力量——斗争手法、集体行动框架、动员结构及政治机遇与制约之间平衡的变化来看,美国妇女尽管起步很慢,却远比法国学生更受支持。

首先,1968年法国学生采用了破坏的、夸张的、具有潜在暴

力的斗争手法,使支持者和反对者回想起法国历史上斗争最激烈的时刻,而美国妇女运动则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集体行动形式,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斗争形式,并主要偏向于常规的、话语性的和象征性的斗争形式。虽然偶尔的联合抵制、民主反抗和静坐标志了妇女运动的高潮,而真正使其被纳入美国文化主流的原因,却是它具有把常规的游行、示威、教育和游说活动与象征主义的文化挑战结合起来的特点。此外,在美国家庭和劳动群体的夹缝中,女性主义还把“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口号付诸行动(Evans 1980:ch.9)。

第二,两场运动的话语和象征符号的使用有很大差别。法国学生使用的象征性话语使他们脱离了普通法国公民的话语。“给思想以力量!”或“继续斗争!”,这些“有争议的认识”可能赢得新的支持者并引起人们对有争论性问题的热情,却不能在排队等汽油的消费者中,在领不到工资报酬的工人中,或在产品烂在去市场途中的农民中,引起共鸣。

相比而言,美国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它主要的成就则在于:它关注语言含义。它用的是“妇女”而不是“女孩”,“性别”而不是“性”,“伙伴”而不是“女友”,这些普通的词语上的变化在美国大众文化中传播很广,因为美国妇女认识到给事物“命名”对于改变事物大有帮助。在这些语言变化发生的同时,妇女在美国经济和市场上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语言变化对此则有很大促进。

第三点是组织网络的差别。虽然两者都与许多当代运动一样,致力于自治、权力分散和自发行为,但法国学生运动是通过迅速的扩散和固有的集体认同来传播,没有强有力的联系结构,结果在学生放假离校后迅速崩溃。等他们下学期回到学校时,只有最好战的学生才会对福尔计划下的大学选举提出质疑。

相反,美国妇女运动在基层和高层都形成了广泛的各种各样不断发展的联系结构,包括基层的非正式妇女群体组织及正式的全国性组织,如全国妇女组织(NOW)。^⑩20世纪60年代的“新”运动出现时,坚固的“妇女权利”网络(Rupp and Taylor 1987)早已存在。运动的新分支还特别强调非正式行为和个性化,这一点至今在这个运动的风格中仍十分突出,它促使妇女运动传入美国社会的许多领域(Katzenstein 1998)。

173 第四,至于政治机遇,我们前面已看到5月1日的运动如何给法国教育改革者提供了改革教育制度的政治手段,运动的积极性又如何随动荡威胁的消退而削减。因为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和控制了议会的议程,法国政府得以控制大学改革,并使大学改革的结果不再引起争论。最终,由于温和派的背弃,由于改革者失去了边缘力量,由于实行改革的方式是由保守的大多数人决定的,这次政治机遇很快就错过了。

美国妇女运动则远不是以动荡威胁为基础,而主要以再结盟为基础,花了很长时间才取得成果,最终形成美国政治的一大要素。美国政党体制的结构,特别是民主党的体制结构,对妇女运动的战略及其成功尤为关键(Costain 1992; Freeman 1987)。它赋予妇女一种在任何法国政党中都不具备的优势,即把民主党的讲台作为讨论女性主义问题的有效舞台。“我们已经在性别鸿沟上跨越了一大步,”一位妇女组织的游说者说,“见鬼,我们不想关闭这扇门……我们想把它开得更大。”(引自 Costain and Costain 1987:206)

结论^⑫

佐尔伯格(1972)在他那发人深省的文章中,对“疯狂的时刻”所下的结论是:它们在三方面形成了重大变化。第一,通过

“语言洪流”，包括紧张的学习经历，使首先在同行、宗派一类群体中形成的新思想成为更多公众的共同信仰；第二，在激烈的活动期间迅速形成新的关系网络；第三，从政策角度来看，斗争周期高潮不可逆转的目标经常被制度化(p. 206)。上述每一方面都暗示了斗争周期对政治文化的一种间接的和中介的，而不是直接的和即刻的影响。这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斗争周期的结局以观察其效果的原因，就像我们在美国妇女运动的情形中所看到的那样。

让我们先看看佐尔伯格设想的第一个变化——在更多的公众中出现新的信仰。正如新观点从创始者慢慢传向那些使之“普及”和通俗化的人一样，产生于斗争周期高潮的狂热中的新集体行动形式逐渐模式化，不仅继续被上述斗争者使用，而且在其优势普遍为人们所了解并被全社会习得时，成为其他人——甚至那些并不赞同创始人的目标或倾向的人——所使用的常规活动形式。

第二，在斗争周期高潮形成了向其他人传播新观点和战术的网络，促进了运动在不活动和反动时期的继续。道格·麦克亚当在前自由之夏的参与者身上发现的东西，也存在于1989年运动中心出现的捷克“77宪章”签名者身上。关于从前的活动分子在政治团体中扎根的程度，麦克亚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可能会有某种紧迫感，迫使自己积极行动，并对自己的激进主义作用抱更乐观的态度” 174

“运动”，佐尔伯格在文章最后指出，不像狂热分子希望的那样，“不会打破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差距”。但它们有时“会大大缩短两者之间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成功的奇迹” (Zolberg 1972:206)。至少在自由民主国家中，仅仅以一种有表现力的富于挑战的方式把一个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就可以围

绕这一点形成一种联合力量,并使这些问题在普遍文化体系内找到结合点。但这种情况并不直接或以线性方式发生。事实上,由于斗争的观点被普及和通俗化,抗议周期中早期的造反者可能在斗争中消失,他们的部分宗旨会被忽略或抛弃,但另一部分宗旨则升华为公众“常识”或个人文化。

斗争周期的作用是间接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可预测的。它们通过政治表皮下的毛细血管作用来工作,把乌托邦梦想、醉人的团结和斗争周期高潮的狂热言辞,与无情的社会变化步伐相联系。如果有人能打破传统的外壳,他们就能创造机遇,为那些用更制度化的方式追求更温和的目标并更有效地推进目标的人提供思想和行为模式,但很少有人能这样。斗争过程的狂热过后,剩下的是改革的残余。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样的周期起起落落。每次出现,都似乎要使世界变得天翻地覆。但一般来说,动员的损耗、运动部门间的分化、制度化与暴力间的划分,以及高层精英对斗争进行的有选择的鼓励和抑制,合起来导致了运动周期的结束。尽管在高潮时,运动的力量是惊人的,似乎不可逆转,最后却被政治程序侵蚀和吞没。

随着世界进入 21 世纪,很多情况又发生变化。运动更容易产生,传播速度也比以往快得多。1989 年之后的十年中,运动的激烈爆发已使一些人怀疑过去的斗争周期节奏被打破,我们正步入一个运动将造成持续混乱的历史阶段(Rosenau 1990)。我们今天是否正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或者本章和前一章所追踪的斗争周期的动力是否完全采用了新形式?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章和最后一章讨论。

十一 跨国斗争

1997年2月27日,境况不佳的法国雷诺汽车制造公司总裁路易斯·施韦策宣布,将关闭该公司在比利时维尔福德的一家工厂(《晚报》,1997年2月28日)。^①对于这个通告,比利时首相让-卢克·德黑尼第一个表示了愤怒,以致比利时佛兰德斯的报纸上出现了对法国“沙文主义”的谴责(《世界报》,1997年3月5日)。其实,法国政府至少在这个通告被宣布前六周就已获悉雷诺公司的计划,而且雷诺公司还希望,一旦维尔福德的工厂关闭,即利用欧盟的组织基金来扩大它在西班牙巴拉多利德的工厂。在弄清了这些事实之后,比利时人越发愤怒(《世界报》,1997年3月6日和8日)。欧洲议会也对这种被其部分成员称为“盎格鲁—撒克逊”调整的做法表示愤慨,就连一般不动声色的委员会主席雅克·桑特都称这项决定是“对欧洲信任关系的严重打击”,并怂恿雷诺汽车制造公司的比利时工人起诉公司违犯欧洲劳动法(《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3月10日)。于是,工会立刻把雷诺公司告上了比利时法庭,为保险起见,同时还向法国法院提起了诉讼。

雷诺计划激怒了比利时和欧盟的官员,但与维尔福德工人

的反应相比,官员的愤怒根本算不了什么。通告一宣布,工人们立刻占领工厂,“扣留”大量将装船外运的汽车,并开始一系列公开抗议,以致维尔福德几乎成为欧洲政治词典中的一个新术语——“欧洲罢工”的同义词。^②这些活动很快跨越国境,把一支维尔福德“突击队”带到法国,并促使法国雷诺公司工人前往比利时,与他们的比利时同事并肩战斗。^③当比利时工会在布鲁塞尔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时,法国左派领袖和法国雷诺工人代表团也加入其中。示威者烧毁施韦策的模拟像,还有他的一个巨大的在行纳粹礼的柳条像。比利时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韦里·派伦对示威的人群说:“这是愤怒和不平的信号,是团结起来反抗残暴的信号。”(Reuter's,1997年3月17日)

比利时的政治家、欧盟、法国和比利时的示威者联合向法国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令法国总理朱佩不得不作出反应。3月20日,他在电视上宣布,向每个工人支付80万法郎以解决工厂关闭造成的问题(《世界报》,1997年3月26日)。^④7月,法国新社会主义政府上台,法国和比利时的法庭都作出了有利于工人的裁决,工人们也同意接受雷诺公司提出的补偿建议(《世界报》,1997年6月6—7日)。但在维尔福德,人们并不欣喜。在工人投票决定接受工厂关闭那天,有一则海报写道:“在美国,他们有克林顿、乔尼·卡什(Johnny Cash)和斯蒂夫·旺德(Stevie Wonder),在比利时,我们有德黑尼,却没有现金(Cash)和奇迹(Wonder)。”(*L'Humanité*,1997年6月22日)

对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来说,像“欧洲罢工”这样的事件揭示了重要的问题。与社会运动理论常见的典型结果并列,出现了三个新方面:第一,冲突使一个国家的个体公民对立于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司;第二,在具有共同利益的不同国家社会行动者

之间存在着跨国合作；第三，人们利用一个超国家的制度和欧洲法律来提出他们的主张。

这是不是一个跨国社会运动呢？抑或是一个跨国运动的开始？比利时工人与在法国的同事利用国际法律和制度，采取了一致行动。可是，根据本研究的定义，他们的抗议是否是以共同目标和社会团结为基础的与高层精英、对手和当局持续互动的集体挑战呢？抑或更确切地说是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之间的简单政治交流事件呢？法国和欧盟的官员只是因法国公司采用“美国的”战术而感到心烦意乱吗？(Pizzorno, 1978)这是跨国斗争螺旋上升的一个阶段，还只不过是碰巧发生的普通跨国劳资冲突中的一桩小事？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不像西欧那样受超国家制度控制的地方，跨国运动的发展中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吗？我们是否可以把本研究中的理论，运用于算不上明确社会运动的跨国斗争呢？(Keck and Sikkink 1998b)“西方分析家，”约翰·麦卡锡写道，“越来越多地采用一套普遍的概念工具，去理解社会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我们能否运用这些概念去理解世界其他部分“试图影响非全国性、全国性和跨国性权威”的挑战者呢？(MaCarthy 1997:243)这些就是我在本章中提出的问题。

177

全球化和跨国社会运动

在魁北克北部、南美和印度乡村，当地团体和海外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了阻止建造水坝工程的运动；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地区，墨西哥和美国的环保组织和工人维权团体，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相互合作；在东欧，1989年以前，赫尔辛基协定使持不同政见的群体有了一个可以组织起来的国际框架；在公

海,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生态保护团体坚决反对各个公司和政府对环境的污染。这些事件不管有多少差别,都导致斗争政治扩大到跨国的范围。

学者们很快熟悉了这些事件,并常常根据其中一些轰动一时的事件来进行归纳,即使它们可能没有代表性。一些学者断定,跨国集体行动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Cerny 1995),而另一些学者则大谈“正在消亡的国家”(Rudolf 1997);一些学者想知道,这些运动是否是创造全球文明社会的步骤(Wapner 1995, 1996);另一些学者则在描述“跨国空间的多元性”(Rudolf 1997: 2);一些学者看到全球化“正在剥夺社团的权利”(Castells 1997),另一些学者则早已在谈论“全球社会”(Meyer, Boli, Thomas, and Ramirez 1996)。一位学者自信地写道:

运动正从相当有凝聚力的国内组织转向跨国网络,这些跨国网络上交织着由各个组织和较松弛的动员机构组成的高度碎片化和专门化的节点,它们通过新的通信技术联系在一起。(Garner 1994:431)

跨国政治在新世纪之交至关重要(Risse 1995)。然而,我们这一章的问题不是要去认识或颂扬这种重要性,而是要将短期的暂时跨国联系与长久的重大跨国联系相区分,并对形成跨国社会运动的机遇和限制进行评估。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了解它们对未来斗争政治的含意。

围绕跨国斗争的基本命题有三个假说。其一,世界经济正和同时发展的通信系统一起迅速全球化;其二,这些变化使跨国集体行动可能性越来越大;其三,跨国机构和跨国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正在形成一个类似于跨国文明社会的东西。让我们在转

向研究今天可以感知的跨国斗争周期之前,先回顾下列一些话题吧。

178

全球化的源头

根据最流行的跨国社会运动理论,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新经济霸主出现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开始发展。它最基本的方面,凯文·罗宾斯写道,是转向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所有经济要素——原材料、劳动力信息和交通、金融、销售和市场都在全球范围内一体化或相互依存。”(Robins 1995:345)

与很多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一样,罗宾斯对所谓全球经济的论证并不如他的声明有力。罗伯特·韦德在对过去和现在的国际投资、贸易和金融进行了仔细的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经济更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

在较重要的国民经济中,有80%以上的产品被用于国内消费,而且有80%以上的投资来源于国内投资者。公司都立足于国家调控体制下的民族大本营。(Wade 1996:61)

与过去的国际交易增多时期相比,当今经济变化发生“在一个近乎瞬间的基础上”,这个真正的当今世界经济新因素确实和罗宾斯指出的一样(Robins 1995:345)。这就把我们引入全球化话题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紧密相联的公共通信结构的出现。由于分散的私人通信技术为个人和团体提供了独立通信手段,如传真机、电子邮件和可携式摄像机等(Ganley 1992),这方面的发展不断加快。

随着世界市场和全球通信的扩张,北半球和西半球公民与南半球和东半球公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结果前者越来越世界主义化,后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不平等地位。这种认知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整合,明显地表现为南半球和东半球公民向北半球和西半球迁移,最终使全球城市成为人类社会的缩影,“在其中可以看到世界上贫富之间的对立和全球文化冲突的加深”(Castells 1994; Robins 1995:345)。不过,这也使西方环保主义者、人权主义者和女权倡导者的反向迁移成为可能,因为他们和第三世界的同类人说同样的语言,为着同样的目标而工作。为证明这种倾向,杰基·史密斯指出,慢慢增多的跨国组织现已把办公地点设在工业民主国家以外的地方(Smith 1997:49)。

179 这些结构变化还伴生出文化方面的变化,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上更统一的世界里,其中的年轻人穿着相似的衣服,听着相同的音乐,接受大体相同的学校教育(Meyer et al. 1992)。一种结果可能是“消灭造成误解的文化隔绝”;另一种结果是使“增加社会对抗和促进社会分裂”的差别感得到强化(O'Neil 1993:68);第三种结果是在全球不同地区之间制造一系列可察觉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第四种结果是使以前孤立地区的土著群体共同发现相似的问题(Brysk 1994; Yashar 1996)。像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人和北欧拉普人这样完全不同的群体,现在都建立了跨国联系。

随着经济和通信潮流的增长,还出现了制度上的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机构、政府、政府间交往和跨国交往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网络系统,把世界不同地区联系了起来(Meyer et al. 1997)。让我们与托马斯·里斯和凯思琳·斯金克一起思考国际人权政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权已经在国际政治制度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调整和详细解释。人权政治制度的发展集中于由地区格局做补充的联合国系统。(Risse and Sikkink 1997)

与这种正式的政治制度并存的,是一种被自己和他人归为受排斥一类的非正式国家“自由俱乐部”(p.4)。这些国际机构、政府和“俱乐部”是发展跨国关系的中枢,由此,我们将进入这个论题的第二部分——跨国集体行动。

跨国集体行动

罗宾斯在对急速增多的全球化理论文献的总结中,只是宣称全球化改变了国家经济范围;其他人却看到全球化正在改变民族国家的权力范围。在全球化时代中,这个论点还在延展,不仅斗争政治的典型迅速从一国传到另一国,引起扩散和模仿;而且人们的要求和冲突也是如此。由于机票很便宜,国界很容易穿过,所以运动的宣传者和他们在各地的支持者,可能在世界上传播像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那样不同的运动(Kane 1997)。“流散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利用传真机、电子邮件和从好心的赞助者那里募集的“慈善捐赠”等,轻易地把基金、武器和恐怖分子转移过边界,在他们的祖国发展他们的事业,而无需离开他们舒适的西方避难所。

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为了响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组织迅速激增。许多组织,如世界银行,已经成为社会抗议的目标(Kowaleski 1989; Walton 1989),而另一些组织,如联合国和欧盟则通过提供补助、会晤和磋商的机会,有意鼓励跨国的非政府群体。例如,欧盟负责环境、核安全和公

民保护的理事会就对代表几乎欧盟国家内所有环保协会的保护组织欧洲环境办公署给予了资助(Rucht 1997:202,206)。

在国际组织所做的决定对成员国具有完全或半完全约束力的地区,国际组织就可能为各成员国内部的挑战者提供制度上的机遇,使他们可以超越国家舞台,在国际层次上进行磋商、集体行动和对抗(Keck 1995)。这样的努力有些是双边的和自上而下的,即在某个特别的国内群体和某个特别的国际组织之间进行。但就像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那样,一些挑战者可以为另一些挑战者创造机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大批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已在每个重大国际机构周边滋生(Smith 1994,1997),像18和19世纪的民族国家一样,国际组织和机构为大量社会行动者提供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由此,我们将转向我所谓的跨国社会运动的“强论点”。

强跨国论

我根据许多资料总结出的强跨国社会运动论,来源于上述观察研究,其支持者提出了下列五点主张:

第一,在电视、传真机和电子邮件普及的时代,过去发动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国家政治机遇结构可能正让位于跨国政治机遇(Pagnucco and Atwood 1994:411)。

第二,民族国家可能正在失去约束和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部分是因为政府越来越无力向公民掩饰正在国外发生的事情,部分则是因为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削弱了政府应对全球经济趋势的能力(Badie 1997; Tilly 1991:1)。

第三,随着国家对全球经济力量控制的衰落,就像我们在维尔福德事件中看到的那样,个人和群体获得了发动跨国集体行动的新资源(Rosenau 1990)。它们与国内政治的动员理论家所

分析的资源类型没有什么不同(Keck and Sikkink 1998b; McCarthy 1997),只是它们还包括境外传播、与境外同仁的交流和越来越多地利用跨国通信和跨国机构的专门技术。

第四,由于经济全球化、文化普遍化和机构增生,“原则化的观念”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国际标准(Finnemore 1996),并被社会 181 化为国内认识(Price 1997; Risse and Sikkink 1997)。

第五,正在形成的新的跨国组织和运动网,产生于全球经济和随之而起的通信革命,受到国际组织和机构的网络结构的诱导,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弊端,并被国际标准所强化。

虽然杰基·史密斯用来鉴别跨国社会运动的参数比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所设定的更宽泛,她对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概述表明,这些组织增长的速度惊人。^⑤史密斯发现:“跨国社会运动部门相当大,各不相同,在最近几年发展迅猛——从 1983 年的三百多个增加到 1993 年的六百个左右。”(Smith 1997:47)她写道:“1993 年活跃的跨国社会运动组织有 65% 是 1970 年以后形成的。二十年来,它们的平均历史从长达三十三年下降到二十五年。”(p. 46)当世界进入 21 世纪后,斗争政治越来越可能跨国发展。但是,这种新现象到底有多新? 它的斗争性将有多强呢?

历史的经验

下面这个论点没有先前的论点有力,却更切合当今世界许多正在显现的趋势。在提出这个论点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有人宣称新技术和新通信形式正在创造一个跨国运动世界。在本研究过程中,甚至早在飞机、传真机和电子媒体出现以前,我们已经遇到了许多运动跨国传播的情形。

例如,像苏珊娜·鲁道夫提醒我们的那样,无论是从西向东,还是从东向西,跨政治界限的宗教流动历史都非常悠久(Rudolf 1997:2)。最生动的例子可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用刀剑把有组织的天主教传到了拉丁美洲。18世纪,美国革命、荷兰爱国者运动和法国革命彼此之间都有很强的联系。其后不久,在英国、美国和西欧的废奴运动倡导者中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第一次现代奴隶起义——海地奴隶起义——更是对法国革命的直接响应(Drescher 1987:ch.2)。

182 19世纪,正如我们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每场大大小小的革命都在其他国家激起了反响。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松散关系具体化为第二国际,其中各国政党都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并至少宣布将为同一个国际目标而工作。为了响应国际趋势,还兴起了欧洲罢工和抗议的热潮(Mikkleson 1996)。废奴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跨国支持者在反传统或反殖民政府的斗争中,也赢来转机,并取得一定进展(Hanagan 1998;Keck and Sikkink 1998a:ch.2)。

历史还告诉我们,跨国斗争有许多形式——并不是所有的跨国斗争都可以简单地归为社会运动。虽然大多数玛格丽特·凯克和凯思琳·斯金克研究的19世纪以来的活动,都建立在宗教基础上,有些活动,如肯尼亚的反对妇女割礼活动,只涉及传教士(Keck and Sikkink 1998a:66—72),另一些活动,如反对中国妇女缠足活动,也只涉及传教士和不信教的民族主义者(60—66),还有一些活动,如废奴活动,“主要是以相应的宗教组织作为互相联系的基础”(41—51)。在凯克和斯金克研究的例子中,只有妇女选举权运动涉及专门的国际运动组织(51—58)。

此外,尽管许多运动的最初动力来源于跨国倡导的扩散,它们却常常依赖世界霸权国家的力量,并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

方式生根。例如,英国就曾用它强大的海军阻止奴隶贸易。在运动成功的地方,运动造成差别越来越多的民族运动、政党和联盟。就像凯克和斯金克注意到的那样:“倡导活动发生在组织背景下;不仅必须在思想上引起共鸣,从而形成同盟,还必须在组织上战胜对手。”(1998 a:74)

以第二国际各国政党间的分歧为例,在共同的国际主义保护下,每个政党都受到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些民族文化在1914年成为分裂的积极力量,当时,几乎每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都支持其民族政府发动“资本主义战争”。约翰·麦卡锡指出:“民族政治机遇结构影响了跨国活动的变化可能性。”(MaCarthy 1997:256)

历史还怀疑这样的设想,即无需各种具体机制施加影响,国际标准就可以社会化为国内标准。用更抽象的表述来说,文明社会“生成”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和重新界定国家利益(Price 1997)。但是,尽管常常有具体的行动者对利益和身份认同进行新的界定,历史却没有提供多少由此转为国际标准的例子,更没有多少无需中介作用就将国际标准社会化为国内标准的例子。以废奴运动在世界上的传播为例,它和英国海军保护前英国殖民地的经济有很大关系,同样也和人权的“标准”有很大关系(Markoff 1996:ch. 2),就像玛格丽特·凯克写的那样,存在着“社会建构的局限”(Keck 1995:420—421)。

183

总之,历史不仅教会我们跨国斗争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还表明它有很多种形式,并在国内社会内进行不同的整合;它需要动力和机遇的特殊结合去发起和传递新的标准和身份认同。我们应该检查这些整合的形式和水准,考虑它们将导致的结果,判断哪一种形式将可能产生新的标准和身份认同,然后再下结论说,世界正在快速变成全球化的公民社会。

跨国斗争的分类

从这些简单的历史事例中得出的两个经验主义观察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当今世界跨国政治中的一团乱麻。首先,许多在当时看来是有组织的跨国现象,其实只是政治情况变化后就终结的活动的一部分。第二,许多跨国斗争的事例缺少坚实的国内社会网络基础。这两个观察结果成为分析的因素,交叉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和描述当今所见的各种跨国斗争。这种交叉在表 11.1 中以分类图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下面,我将给每一种形式作界定,并从社会运动和跨国政治文献中找出一些例子加以证明,然后再简要地推断它们的主要特点和动因。

在国内社会网络中的整合

| 时间框架 | 非整合的 | 整合的 |
|------|--------|--------|
| 暂时的 | 扩散 | 政治交流 |
| 持久的 | 跨国问题网络 | 跨国社会运动 |

表 11.1 跨国集体行动的分类

跨国社会运动

我所谓跨国社会运动,是指由紧密联系的跨国挑战者网络发起的与民族或非民族对手持久互动的斗争。它们的目标既可以是国际的也可以是民族的,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公共的,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在我们的界定中,重要的是挑战者本身既扎根于国内社会网络,又不只是因为暂时对世界有共同的想法,或通过非正式的或组织的纽带相互联系,它们的挑战在语言和行动上都颇具斗争性。这样的界定,既严密得足以排斥一些

跨国互动,又宽泛得足以包含表 11.1 所示的那些结合了国内社会结构中的斗争持续时间和整合情况的因素。

184

我们的界定虽然限制很严,却不至于使人找不到与之匹配的真实现象。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就是具有前面界定中所提的特点的跨国运动组织。它宣称有数百万成员,分布在许多国家,成员通过跨国组织以等级制方式联系在一起。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世界观,热衷于从事对抗造成环境污染或威胁到环境的政府和私人公司(Wapner 1995,1996)。绿色和平组织还制定了一个行动纲领,使其可以反对国界以外的工程项目和对手。例如,它反对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武器试验,反对壳牌石油公司在北海建造钻井平台的计划,反对法国和英国拖网渔船过度捕杀海洋生物(Imig and Tarrow 1996)。

第二个跨国运动是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和平运动,尽管它缺少单一的等级制组织(Rochon 1988)。第三个跨国运动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虽然从阿富汗的塔利班到伊朗民族主义者,再到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它看起来在世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形式。前者能够动员千百名游行示威者反对 80 年代早期的核导弹计划,后者则自 1979 年伊朗革命以来,对许多政府造成严重挑战和破坏。^⑥

一场持久的社会运动是几个社团内部的整合,有统一目标和组织,能够对各种对象展开斗争,这样的运动所必需的条件很难满足。绿色和平运动起源于一系列动机相似的国内运动,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目标;80 年代的和平运动回应了一个结合威胁和机遇的国际问题,即美国总统采取的增加政府军备政策似乎构成了对地球安全的威胁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跨国制度内部发展起来的,它在自己扎根的世界内拥有独立的宗教学校、清真寺和教派。但并不是非政府行动

者中一发生跨国互动,这些条件就能被复制,正如玛格丽特·凯克所发现的那样,“国际关注的时间毕竟很短”(Keck 1995: 421)。更普遍的是允许国内斗争迅速跨国境扩散的条件。

跨国扩散

我所谓的跨国扩散是指:从一个斗争中心到另一个斗争中心,运动思想、组织形式或对类似目标挑战的交流。这样的互动可以引起强大的运动,但不一定会造成在一个以上的社会中有强大联合组织的运动。因为它不受跨国界强大联合组织的控制,它为国内机遇和限制在新环境下影响挑战转变方式留下了空间(Ernst 1997)。作为一种跨国现象,扩散像在国内社会网络中一样,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

扩散可能是我们了解的最古老的跨国政治形式。我们最初在宗教改革中看到了它,那时,加尔文教“圣徒”、清教移民和流亡的天主教牧师,把宗教思想和斗争实践从一个国家带到了另一个国家。接着,我们又在美国和法国革命思想的扩散中看到了它,当时法国士兵从巴黎到欧洲其他地方的活动是扩散的一条重要渠道。到19世纪时,社会运动则很少依靠军队活动。我们在第九章中已看到,特定的集体行动形式,如构筑街垒和大规模示威游行,几乎在1848年革命所涉及的每个国家里都被采用过。到19世纪下半叶,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又在新世界从曼哈顿下东区到智利和阿根廷的地区,创建了工人运动。^⑦而每个渗透到本土根部并遇到了当地机遇结构的民族运动,一旦形成,就变得基本独立于其他运动。

当代集体行动比19世纪的运动扩散得更快,并且得到了世界经济国际化和大众通信的帮助。下面仅以从比斯开湾扩散到大浅滩直至北美近海大麻哈鱼渔场的一系列与“渔战”相关的策

略为例。1994年,捕捞金枪鱼的西班牙渔民扣押了一条法国拖捞船,指控英法渔民用不合规定的鱼网捕捞了超过份额的金枪鱼。作为回应,法国政府紧跟着也抓住一条西班牙船,以致西班牙人封锁了恩代港(Hendaye)。为此英、法、西三国间进行了若干复杂的谈判,后来靠欧盟的一个决定才解决了这场争端(Tarrow 1998a)。

六个月后,另一队西班牙渔民又成了新闻人物,这次是因为他们在加拿大渔民认为应该属于加拿大的大浅滩捕鱼。加拿大海军扣押了一条西班牙拖捞船,并把它拖到了圣约翰斯港,让渔港的居民嘲笑西班牙渔民并用西红柿砸他们(Tarrow 1998a)。直到欧盟派人代表西班牙人介入此事后,加拿大政府才解决了 186 问题。最后,在1997年,加拿大和美国水兵又陷入太平洋海岸的冲突。当时,一百多条加拿大大麻哈鱼捕捞船在鲁珀特王子港堵截一艘美国渡船,以报复美国水兵在公海抓走加拿大渔船(《纽约时报》,1997年7月23日;《多伦多环球与邮报》,1997年7月18日)。在相隔6000英里的范围内,相似的问题引发了相似的行动,并使五国的社会行动者和政府卷入国际斗争中。

“渔战”策略的扩散是断断续续互相仿效的结果。扩散同样可以在有目的者的控制下发生。1989年后中欧东部民族主义的传播,正如马克·贝辛格所表明的,不存在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思想自动传输,只是由运动主办者凭借已存在的或预期的机遇、利益和威胁,挑起一系列有预谋的事件,一些运动主办者已大权在握,另一些运动主办者则企图利用由共产主义衰落造成的真空状态掌权(Beissinger 1996)。

马克·贝辛格所研究的东欧民族主义,是由国际机遇引发造成的民族运动。跨国运动会是扩散的结果吗?克莱尔·埃恩斯特关于法国保护艾滋病者权益联合会的论述表明,答案是肯定

的。埃恩斯特谈到,由于和纽约保护艾滋病者权益联合会有过非正式联系,并开展了一些效仿活动,结果就产生了保护艾滋病者权益联合会巴黎分部的成立,以争取维护那里的艾滋病受害者的利益(Ernst 1997)。她在说明法国活动分子如何精密地仿效他们在纽约的朋友们的策略和口号之后,还分析了法国政治的特点,特别是要求用统一取代分歧的法国共和主义传统,如何影响了运动的结果(pp. 22—23)。

跨国政治交流

我用“跨国政治交流”来指称:在一个特殊政治结构中,具有共同利益或价值观的不同国家行动者相互间暂时的合作形式。它和跨国扩散一样,一般涉及各国有思想共鸣的行动者,而且每个行动者都既能从彼此的关系中有所得,也能对别人有所贡献。与跨国扩散不同的是,交流双方的参与者在使他们联合起来的事件发生前,各自在本国有稳定的生活,他们的互动实际是特殊的国家和国际危机的一个产物。

无需说,我们不该狭隘地或物质地来理解“得”和“失”这两个词。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北方环境保护组织,通过这一地区有经验的人类学家与巴西割胶工取得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以此为基础,与巴西割胶工代表结盟(Keck 1995: 415—416)。他们最初遇到的是由20世纪70年代末巴西东北部狂热的土地抢购带来的经济得失问题。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根据地的环境保护核心小组,把割胶工的困境与世界银行在巴西朗多尼亚州的一个项目联系起来,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促使巴西活动积极分子推动巴西政府为割胶工建立活动保护区。最后,迫于巴西国内工会和教会的联合压力,以及国际环保组织的压力,天平终于倾向割胶工。玛格丽特·凯克总结道:“在

阿克里州,运动中的外国环保主义者和割胶工代表最后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关系,使他们所有人的重要需求得到满足,并为他们提供重要资源。”(Keck 1995:415)

这种局面并不是永久的。虽然卷入其中的北方环境保护组织对自然环境和当地人民的权利有坚定的思想信念,但他们与割胶工的联盟却以特殊问题为核心,在这个特殊问题得到解决或变得不相干之后,行动就结束了。由于政治交流总是在问题基础上进行的,没有被置于一个长久的组织中,它并不比跨国集体行动扩散稳固。不过,它可以创造关系网络,并在特殊问题被解决之后,使这个关系网络保存下来。

跨国倡导网络

这让我们想起在环保、人权、妇女等领域的上百个联系全世界公民的非政府联盟组织和各国群众的关系网络。它们难道不能算作“跨国社会运动”吗?我的回答是,虽然它们是当今跨国政治发展最迅速的部分,把它们归入社会运动并不能促进我们的理解。更准确的划分似乎是像玛格丽特·凯克和凯思琳·斯金克那样,把它们归为“跨国倡导网络”的一部分。用凯克和斯金克的话说:“跨国倡导网络是由就某一问题在国际上展开工作,并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话语和密切的信息和服务交流联系起来的有关运动参与者组成的网络。”(Keck and Sikkink 1998a:2)他们接着说,这样的网络,“在以高价值内容和不确定信息为特征的问题领域最为普遍”(p. 2)。它涉及来自非政府的、政府的和政府间组织的参与者,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权、妇女权益和环境这类问题领域中(亦见 Keck and Sikkink 1998b)。

这些网络和社会运动有何不同?为什么它们经常会混淆?

部分的原因在于“网络”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其一是指联系结构；其二是作为社会运动和许多其他斗争政治基石的社会网络。根据第八章中“网络”这个词的所指，倡导网络是指跨国联系结构，而社会网络则是国内社会斗争政治的基础。尽管一
188 些学者越来越相信电子通信为各群体建立跨越广阔空间的社会网络提供了工具(Wellman and Gulia, 1998)，凯克和斯金克的倡导网络概念明显不同于社会运动研究者在国内社会运动基础上发现的使个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网络概念。^⑧

凯克和斯金克的倡导网络基本上以相互沟通为主要内容，它们“大多靠促进其形成的原则性思想或涵义的核心性来分辨”，并且“(这种组成成分的)关系核心在于信息交换”，“为了获得战胜远比它们强大的政府和组织的方法，它们有策略地调动信息”(Keck and Sikkink 1995:1)。还要加上一点，它们从对它们提出的社会规范感兴趣的国际机构和北方政府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并大受裨益(Risse and Sikkink 1997)。

倡导网络缺少绝对的基础、持久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会运动学者在国内社会网络中所发现的相似机遇和限制的影响。但是，它们已经大量参与到频繁的跨国交流中，并使世界其他地方的平等、人权和环境问题，引起北方政府、基金组织和公众利益集团的关注。“关心别人的事”正逐渐成为今日世界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为改变而沟通

与我们所知道的跨国社会运动相比，跨国倡议网络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呢？当然，由于它们经常依赖基金会的基金和北方政府的资助，所以缺少绿色和平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和平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等跨国运动那样的戏剧性、针对性

和广泛目标。但尽管跨国倡议网络从分析上看不同于社会运动,它们仍然是推动当今世界变化的强大力量,这至少有三个理由:首先,它们中有不少从历史和主题上说与社会运动相关;第二,考虑到当今世界许多地方非民主或半独裁的状况,它们为数百万人民提供了替代社会运动的第二好的也更安全的办法;第三,它们最重要的作用可能是:为把集体行动框架扩散到资源薄弱的国内行动者,并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社会运动,提供了一种机制。我们可以对上述每个论点进行详细阐述,并用无数例证给予支持。但是,因为玛格丽特·凯克和凯思琳·斯金克在他们最近写的《跨国活动分子》(1998a)一书中,已经做了这些工作,我们只要简单概述一下她们的论述。^⑨

189

网络征募的运动源泉

在人权、妇女权益和生态保护领域,跨国倡导网络虽然不同于社会运动,却吸收了一些在国内运动经验中积累了行动技巧和模式的支持者。这样的运动积极分子可能通过与来自他国的同类人的偶然接触,或通过参与西方国家的基金会或国际组织,加入到跨国网络中。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年龄渐长,这些人已不再热衷于激烈而危险的运动,转而参加较普通的活动。

这类活动包括定期召开的妇女活动积极分子国际会议,它们始于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为个人和基金会机构相互接触和交流思想经验提供了渠道。活动者常常被邀请到其他国家,虽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许多人越来越多地涉足这样的跨国网络,有时甚至与基层失去联系,不过却把非常需要的资源带到了他们能尽显才能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欧盟环境理事会的鼓励,通过同样的跨国交流和资助过程,最终形成了欧洲环境保护网络。拉塞尔·达尔顿对

“绿色网络”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对许多欧盟成员国而言,加入跨国的欧洲环境保护办公室,在欧洲范围内合作互助是非常重要的(Dalton 1994)。但这种外部的支持与合作源泉也有一些负面的含义:为了吸引比较温和的环境保护组织,它们会深化自身与较激进的生态运动的分歧,以扩展“绿色网络”联系,给予其参与者在国内政治中以力量。

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运动中。先前那些通过与基金会、北方政府及北方的“大姐”组织的联系加入跨国网络的好战者(大部分来自城市且受过良好教育),和那些为反对利用妇女、侮辱妇女和对妇女司法不公而坚决斗争的基层活动分子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没有强大的国内联系结构,南方妇女的运动就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这种分裂类似于其国际定向的输出和其国内经济之间的隔阂。

国内阻碍和跨国机遇

玛格丽特·凯克和凯思琳·斯金克写道:“倡导网络在以下情况下最为明显:国内表达权利要求的途径被阻断,或要求权利者的政治力量太薄弱以致没人听到他们的声音。”(Keck and 190 Sikkink 1998b)在这些情况下,大概只有通过国际或国外渠道才能合法地或安全地提出要求。活动积极分子试图通过改变渠道,召集较赞同他们的新参与者加入他们的事业,希望以此来调整对他们不利的国内力量平衡,这就是玛格丽特·凯克和凯思琳·斯金克所谓的“意外后果的影响”(1998a: 12—13),“倡导网络最常见的策略之一就是试图制造这种影响。”

玛格丽特·凯克和凯思琳·斯金克用拉丁美洲的人权和土著权利网络来证明政治途径选择的策略(1998a: 18)。他们认为,虽然稳定的国内组织有助于决定跨国政治的结果(Risse and

Schmitz, 1995), 但国内组织并不足以决定所有问题。就像我们在本书许多章节里所提到的国内运动, 更多的情况是“完全结合在一起, 有时甚至是跨国合作者不停地关注的政治机遇的偶然状态”(Keck and Sikkink, 1998b)。

国内运动的网络源泉

研究跨国运动的学者们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形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以致常常忘记跨国倡导网络的一个重要内涵——民族国家内新运动的社会化 (McAdam 1998; Risse and Sikkink 1997)。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 构建新的集体行动框架已成为运动工作的基本部分; 在这个方面, 跨国倡导网络与运动很相似, 都试图把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并使它们与本土文化认识产生共鸣 (Keck and Sikkink, 1998b)。但这么做有一个特殊问题: “与国内运动不同,” 玛格丽特·凯克和凯思琳·斯金克发现, “倡导网络的不同部分需要求助于许多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信仰体系、生活世界、传闻、神话和民间故事。”

结果就产生了两个危险因素: 第一, 寻找跨国的共同特点, 这些共同特点将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许多文化和传统的反响; 第二, 寻找各种各样产生于特定地方的问题, 这些问题将在活动积极分子使其与“他们的”文化相适应时, 在相同的跨国网络内部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试图在沙捞越这样不具备同类条件的地方重演巴西割胶工运动的成功, 就是前者的一个典型范例。“因为尽管那些使处境相差甚远的人们对社会问题产生同感的故事, 可以合理地被说成具有自己的生命”, 玛格丽特·凯克写道, 但是更重要的是, 巴西东北部的割胶工有牢固的工人组织传统、国内教会和工人组织的支持, 以及越来越民主化的政府所提供的特别政治机遇

(Keck 1995:420—421)。

191 另一方面,跨国网络如果没有总括的主题或组织,会因为不同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而分裂。20世纪80年代西欧和美国的和平运动显然就是这种情形:前者要求彻底解除核武器,而后者只要求“核冻结”(Meyer 1990)。难怪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跨国运动组织,一直严格控制其斗士所涉足的问题。

总之,在国内政治中,跨国激进主义的影响可能是跨国倡导网络最重要的作用。跨国倡导网络可以帮助资源贫乏的行动者,把当地的与引进的材料结合起来,构建新的国内运动。即使没有别的成就,它们至少有助于形成“想像的共性”,使那些原本孤立的活跃积极分子感到,他们是更广泛的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不相信的人可能会指出,创造“想像的共性”并不是什么新鲜主张。要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毋庸置疑,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战斗者为着一个想像的目标而奋斗,就因为他们坚信世界上还有千万个看不见的像他们一样的人正在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跨国倡导网络本质上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与过去的国际工人运动不同,并不拘泥于一种有目的的固定的社会运动;它们的地理流动性、松散的组织形式和交流途径,使它们有能力把活动和资源转移到它们最有可能成功的渠道中,并使他们能利用由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带给世界许多角落的共同文化构造因素。

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我们就不用聚焦一个全球公民社会的抽象概念,并把跨国激进主义的每个事件当作是它来临的证据。我们将把跨国网络看作一种外在行动者,能为形成中的国内运动提供资源和机遇,由此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些运动可

能在意识形态方面和财政方面与跨国合作者有关系；但除非我们根据经验注意国内政治斗争领域内所发生的事情，否则我们可能察觉不到跨国斗争的意义。

例如，当道格·伊米格和我开始调查围绕欧盟决议而形成的集体行动时，我们假设，有一条巧妙的界限把国内斗争和跨国斗争分开来，而且后者采取了在本章所讨论的斗争中已得到证明的跨国界形式(Imig 1996)。但即使只是简要罗列一下大量的欧洲集体行动也能表明，对欧盟决定不满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最有可能转向他们最熟悉的欧盟决定的执行机构——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欧洲人可能在国内矛盾结构内部形成欧洲化，而不是斗争的跨国化(Imig and Tarrow 1997)。

是否存在跨国动力？

关于策划跨国斗争的进展和过程的下一个研究目标是，更仔细地审视跨国发展的联结类型。看看它们是连续而有活力的呢，还是独特而不同的？是在跨国层次上还是在国内的层次上构成最持久的新现实？

首先，从拉美和其他地方土著权利运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扩散来看，在跨国倡导网络的帮助下，利用生态激进主义，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几乎同时出现了印第安人的组织。这可能与特殊的政治时机，即黛博拉·雅沙尔所说的“代议制民主与新自由派改革的同时出现”有关(Yashar 1996:87)。如果雅沙尔说得不错，那么在如此众多的国家内同时发生土著权利运动，并不是由于发生了任何像全球化这样重大的或世界体系性的事件，随着拉美政治斗争下一阶段的发展，它们可能会逐渐平息下来。

其次，从跨越当今世界并引起易接触计算机者关注的电子

邮件网络的扩展来看,电子邮件网络显然可以削减办事费用,跨国传输信息,就像在全球传播引人注目的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暴动信息那样。它们使易于接触计算机者能迅速与同类人取得联系,并形成一种不那么个性化的交流形式中所缺乏的参与感(Bob 1997)。但是,这种联系是否有望像罗杰·古尔德(Gould 1995)或马克·特劳戈特(Traugott 1995)所研究的巴黎附近发生的构筑街垒的活生生体验那样,形成集体信任的结晶?或是否有望像马里奥·迪亚尼(Diani 1995)所研究的意大利环保组织那样,在联合活动中形成跨组织的集体身份认同?任何感染过因特网病毒的人都能证明,虚拟的激进主义可能被作为现实世界中的激进主义的替代物,而非策动力。

另一方面,有些人所看到的那种建立跨国运动世界的趋势尚处于初始阶段,可能渐渐增强。虽然,像过去那样,一些跨国交流和扩散的形式可能最终导致真正的跨国运动;可是过去更常见的事实却是——这些过程也可能产生单独的民族运动或在冷漠和镇压面前崩溃。所以,我在本章的结尾没有下结论,而是指出了五个我们需要面对的关于跨国斗争动力的问题。

193 第一,全球通信新技术改变的是集体挑战扩散的方式,还只是这种信息传播的速度?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世界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运动时代之前,我们需要注意最近一些得益于电子通信的活动,以发现电子通信是增加了运动的力量,还是仅改变了构造运动信息的方式。

第二,当跨国链条的两端缺少完整的人际群体时,完整的社会运动还能延伸到各大洲吗?再进一步问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能否借助外国的资源来建立这种跨国群体?对此坚信不疑的人需要证明:客观的电脑空间网络或便宜的航空旅费不仅促成了新的民族运动,还使跨国纽带继续成为它们潜在的联系结

构的一部分。玛格丽特·凯克所提的关于割胶工运动的证据,就强调了工人在与跨国活动分子结盟之前,他们自身组织和机遇的优势(Keck 1995:420)。

第三,跨国交流的新形式,是否会像奥尼尔等作者所想的那样,变成“人民的力量”的善意形式(O'Neil 1993:ch. 4)? 或者变成安德森和其他人在“远距离民族主义”的潜力中所看到的暴力形式(Anderson 1992)? 20世纪90年代早期最强大的全球运动,不是由与土著民族运动相联系的善意的西方环保主义者和人权运动者促成的,而是由割破民歌手的喉咙和毒打不戴面纱出门的妇女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促成的。

第四,从这里描述的两种风行一时的跨国政治形式——扩散和政治交流——到两种更稳固的跨国政治形式,特别是朝着真正跨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种渐进的运动? 尽管跨国倡导网络将发展为统一的跨国运动,这一点看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它们实际上被看作许多从危险的国内运动世界中脱颖而出的活动积极分子的替代,这些活动积极分子把跨国激进主义作为动员的替代途径。

最后,在所有这一切中,民族国家有什么作用呢? 现代国家是在与社会运动有策略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必要时把组织的自主和机遇转让给社会运动,然后等运动衰落之后或变得太危险时,再重新宣布其对领土的行政权。为什么面对跨国扩散、交流、倡导网络甚至是社会运动时,今日的国家不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样竭力反对国内运动而显得步步退让了呢?

一些国家今天所扮演的跨国角色是它们在过去很少能扮演的:和平而公开地代表国内运动或他国群体,对本国群体提出的引起其重视的他国运动和群体的要求进行干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跨国群体宣称赞成这样的干预,并常常在向其他国家政

府公布它们盟友的要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参照
194 国家的力量去理解这种关系,就像企图把国际政治仅仅理解为
国家政治集合一样,是靠不住的。

许多国家正在发展跨国策略,建立与它们的利益相呼应的
跨国组织。国家鼓励一些运动,如欧洲环境运动,把它们的要求
带到跨国机构,比如欧盟,而抑制这些机构处理其他一些诸如不
太受欢迎的反核运动之类的事务。在 19 世纪中叶,奥地利、俄
国和英国等曾用炮火和刺刀干预斗争事件;在 20 世纪末,国家
不再仅仅发动战争;它们还创立跨国组织和机构来抵制和平息
社会运动。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民族国家和民族社会运
195 动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我们为伴。

结论：社会运动的未来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英格兰后，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穿过英吉利海峡，迫切要求他的法国同仁参加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1814年，在英国第二次废奴运动高潮中，托马斯·克拉克森再次沿用了同样的方法。但是，美国最重要的研究反奴隶制运动的学者写道：“他两次都彻底失败了。”(Drescher 1994)

两百年后，法国在纪念把托马斯·克拉克森引向巴黎的革命时^①，新的革命浪潮又席卷了欧洲的共产主义世界。通过口头、印刷品，特别还有收音机和电视，斗争传遍了正在崩溃的苏维埃集团内部界限，导致罗马尼亚、高加索地区、最后还有南斯拉夫陷入野蛮的对抗中。一年之内，在五十年代的欧洲冲突中占优势的国家体系不复存在。到1991年，就连国际无产阶级的中心苏联也彻底解体，代之以一批半民主、半市场化、充满矛盾的社会形态。

如果我们把1989年运动的快速传播和托马斯·克拉克森无法在革命高潮中把废奴运动带到30英里海域之外的法国相比较，我们会开始理解过去两百年中社会运动所取得的进步。因为不仅东欧人和波罗的海各民族的骚动一齐出现：它们还同时反对类似的目标，只是目标的细节不同而已。1789年，反对奴隶制的倡导者很难把他们的运动传播到30英里海域之外；而

1989年,民主运动在几周内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场既温和又致命的运动浪潮。

这种民主化转变的意义并不确定,我们从1992年前南斯拉夫解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但它对于社会运动的未来具有深刻的含义。不仅因为这些变化关上了20世纪最重要的革命运动的大门,而且因为到1989年底,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运动已变得普遍,并且形成模式化特征。^②无论在哪里,普通民众很容易提出反对强大敌手的集体要求。本章所要研究的就是理解这些变化的含义。我在审视当今社会运动学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之前,先简要概括了我们的一些主要发现。

两个否定声明和一个综合要求

在转入那些具体问题之前,有必要强调本研究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提供一个专一的模式以证明所有地方的一切斗争政治自产生之日起的共同属性。我已经试着确认使斗争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得以产生的步骤,和通过与不同的动员形式、认同形成、组织、机遇和限制的交叉来形成社会运动和主要斗争周期的过程。下面两种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则提出了更广泛的要求。

合理化斗争

三十年前对运动感兴趣的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开始研究这些课题。不过,他们不是从行动如何开展的角度研究,而是从集体行动难于形成之谜入手。这可能与早期的思维模式有关,那时一般认为,共同利益的确立足以导致集体行动。经济学家曼科·奥尔森和他的追随者,使许多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运动事业的影响——看到,集体行动并非自动产生于怨愤,而

要求个人积极参与。奥尔森发现,由于存在对他人实践“坐享其成”的倾向,有一个严重的集体行动问题始终伴随着集体行动组织者的生活。

为此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幸运的,另一个则没有那么幸运。其一,从对不满的确认到决意行动,这条暂时形成的链条被看作对可察觉的机遇、限制和刺激再三权衡的结果。其二,对个人参与的过分关注,忽略了集体行动包含的广泛社会过程。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问题”只是一个谜,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法则,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相对于许多可能性,集体行动确实发生了,它常常为那些没有什么资源和内在力量的人所促成。

奥尔森认为,“大群体”通过可选择的刺激和限制来调动成 197
员,所以人们首先在这个观点中寻找“谜底”。然而,尽管奥尔森的理论对利益集团是说得通的,却不足以充分解释运动,一个简单的原因是:除了斗争,运动很少有可利用的刺激或限制。因此,有必要去发现人们互相作用、受集体行动传统影响及被体制、网络和身份认同所促进或阻碍的方式。只要人们意识到集体的利益,与同类人联合起来,并认为他们的反抗有可能获得成功,他们将会在最令人沮丧的环境下起来斗争。

近年来,从奥尔森的视角开始研究的学者已经超越了奥尔森的市场模式,认识到人们带给集体行动的多种动机(Chong 1991; Golden 1997; Hardin 1995; Lichbach 1995, 1997)。例如,马克·利齐巴奇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四个主要模式:类似市场的、契约性的、公有的及等级性的。他在其《反叛者的两难》(Lichbach 1995)一书中,比任何其他理性主义者更进一步,发现各种各样构成斗争的情况,对不同主办人和不同赞助群体的起源、运作和结果进行了中层理论分析和总结。而绝大多数理性主义者却对蒂利所说的这些决定的“顺流”联系和后果不甚明了。特别

是,它们使得决定很难做出:

- 如何辨别和解释有利益导向的决定、决策制定者在具体活动中对决策的真正实施以及活动所涉及结果三者间的关系。

- 如何解释和处理渐进影响、延时影响、间接影响、环境协调影响和运动代理人未注意的影响。

- 如何解释和描绘个人决定的状况和决策制定者的状况之间的相互依赖,不管其是同时发生的,还是随时间推移发生的。

在本研究中,我部分地赞同理性主义者——尤其是他们强调机遇和限制变化,不是刺激人们去行动,就是提醒人们停止。我还主张,斗争周期有点像经济周期的逻辑,挑战者之间对于支持者的竞争有助于解释一个周期的动力。但我如果不把观察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和制度背景中,我就不能很好地描述运动的出现、动力或结果。由于采用了一种与理性选择相反的观点,本研究具有更多的具体性。

文化与斗争

在过去的几年内,像约翰·弗兰(Foran 1993),汉克·约翰斯顿(Johnston 1995)及最近的埃里克·塞尔宾(Selbin 1997)等具有文化定向的学者,已经为集体行动的问题提供了一套颇有说服力的答案,与理性主义者在方法上的个人主义和理论上的一元论相比,他们的观点是现象学的个人主义和理论的调和论,强调叙事,强调行动者对他们所处的形势的界定,强调社会构造。塞尔宾特别讲究一种完全文化方面的方法,一种对于个人经历的独特性、斗争的不同形式和“混乱的”人类互动很敏感的方法(Selbin 1997)。

在本研究中,我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文化主义者的洞察力,特别是斗争手法的概念、斗争构造的观点及对斗争周期中的集体身份认同和扩散的重视。但我并没有被引诱去把所有的斗争都解读为有关意义的纷争,而是退回到自己的立场上。社会构造论既有魅力,又有危险,因为它会不再注意意义结构背景,远离社会网络和联系结构,脱离想像和现实经验的重要联系(Castells 1997:29)。像研究民族主义的马克·贝辛格(Beissinger 1996)一样,我关注具有明显意义的事件;像研究法国巴士底狱斗争的斯威尔(Swell 1996)一样,我认为文化必须根植于结构变化之中;像研究教堂中的妇女运动的卡赞斯坦(Katzenstein 1998)一样,我试图表明政治机遇如何引起话语性的反应;像研究斗争集会的蒂利(Tilly 1995a, 1995b)一样,我关注人们集体行动时的选择。

现实实际上是“混乱的”,既像埃里克·塞尔宾正确地宣称的那样,也像许多理性选择理论家否认的那样。我与后者的争论是:用一般研究法则取代混乱会导致高度抽象,很少造成持久的效用;而我对前者的质疑是:接受混乱和信奉现象学,会导致丰富而不相干的叙事,很容易以观察者的解释取代主体的解释。

本研究的设想是: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混乱,既不是通过提出关于任何地方或任何时刻出现的斗争的普遍法则,也不是通过展示特殊性,而是通过审视运动中的力量。我们在第一部分追溯了运动中的力量的历史发展过程,接着又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对此进行了分析。通过在理性选择理论无根据的表述和文化主义过于有根据的解释之间寻找中间地带,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么做的时候,我尽量用有限的一套概念,如机遇和限制、斗争手法、框架和动员结构、斗争周期和体制反应等。在探讨一些最后的结果和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总结一下本研

究的发现。

机遇、限制和资源

199 本研究中已经讲了很多政治机遇和限制方面的变化,因此只需要重申一点,即虽然它们本身并不能“解释”社会运动,但它们在引发一般斗争事件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在这些一般斗争事件中,社会高层精英暴露出他们的软弱,新的社会行动者和冲突方式不断出现,联盟得以形成,镇压变得迟缓或不稳定。一些社会部门比另一些社会部门对机遇变化的反应更快,但这只是说怨愤、身份认同和威胁发生了改变,并在许多方面相结合。一些机遇因素,如政府实力或镇压,比其他因素更持久,而斗争事件的爆发并非仅仅以稳定的组织为基础。

如果我们把政治机遇结构提升为普遍包容的法则,我们将总能发现它所不能“说明”的运动,那些因为机遇而产生的运动正在结束。这当然不是本研究的观点。实际上,我试图证明的是,运动依靠运动所采取的动员形式、意义和集体认同,以及它们建立于其上的社会网络和联系结构,从斗争一般阶段中的特殊互动发展起来的过程。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通过上两个世纪的结构和文化变化,探索了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又从分析的角度,通过利用斗争手法、框架和动员结构来描述这个过程。对这些进行简要回顾,将促使我们理解当前运动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新旧斗争手法

早在现代社会运动出现以前,斗争形式就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暴动、叛乱、革命、内战和宗教战争。现代社会早期的结构使宗教或王朝战争成为可能,却禁止那些寻求面包、信仰、土地和

免受国家压迫的自由者把他们的利益汇集起来。那时人们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是直接的、狭隘的和支离破碎的，这些要求的特点就反映了人们所受的压制。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以巩固中的国家为核心形成的社会，为那些感到自身利益受损的群体提供了更多的跨地区联系、更快的通信、更密集的社会网络，尤其还有斗争目标和活动范围。在人们获得国家创建带来的机遇时，这些过程都没有停止。为了形成一场社会运动，组织者——无论来自于已存在的群体，还是来自于斗争中新出现的群体——都必须为运动制造焦点。社会运动不是现代化的自动结果，而产生于长期的、痛苦的、最终相互作用的国家和公民形成过程，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形式长期跨国的扩散。

200

斗争手法、动员结构和框架

一旦机遇开放，限制缩小，组织者就会利用三种主要资源：从文化上常见的斗争手法中产生和革新而来的斗争形式；人们生活在其中并建立的非正式网络和联系结构；组织者在社会上发现的和在斗争中建立的文化体系。运动分别利用集体行动的不同形式，并将它们结合起来促进人们彼此联系，及与对手、与支持者和第三方的联系。它们既利用这些活动形式文化上的熟悉性，又在其边缘进行改革，以激发支持者的想像力，在对手中制造恐慌。集体行动最好被看作是社会运动的付出和收益，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付出，因为它既是交流和动员的手段，也是给对手的教训和挑战。

集体行动的付出和收益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决定运动的动力。如果一种特殊形式的集体行动收益减少，人们开始厌倦斗争，组织者就有必要发展新的形式，吸引新的参与者，或使他们

与对手的互相作用激进化。我们在运动中常发现一些冲突和缺点,以及运动和国家之间不断增加的对抗,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试图通过使用新的更大胆的集体行动形式来保持运动的良好势头;还有部分原因则在于:活动分子圈中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力量平衡的改变。

在社会运动的形成中,不仅有一种向特殊集体行动形式发展的“拉力”,还必定有一种集体认同和团结的“推力”。团结主要与利益相关,但只有以共同意义和集体认同为核心,建立舆论,才能产生持久的运动。意义和集体认同部分来自传统,部分来自与对手的对抗活动。它们同时也是由运动内部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区别成功与失败的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运动把来自传统的理解与激进主义的要求相联系的能力。

集体行动通常由组织所领导,但这些组织有时是受益者,有时是鼓动者,有时却是大众政治的破坏者。反复出现的关于组织是产生运动还是压制运动的争论,只有在我们对它们所依靠的不太正式的结构,如社会底部的社会网络和将它们与其他组织相连的联系结构进行审视时,才能解决。过度组织化可能扼杀运动中的力量,而无组织化则可能使运动追随者陷入权力分散的暴虐,维持一场运动是这两者之间微妙平衡的结果。

机遇、周期和运动的消耗

集体行动的斗争手法、文化框架和动员结构仅仅是潜在的力量来源,它们可以像被用来发动叛乱那样,很容易地被用来进行社会控制。第九章所描述的反复发生的斗争周期,就是把潜在的动员变为行动的政治机遇更广泛扩散的产物。在冲突和改革的严峻考验中,挑战者和他们的对手不仅利用可获得的机遇,还通过制造新的活动形式、锤炼新的“主要框架”和形成迫使国

家对其周围的混乱作出反应的联盟,为其他人创造机遇。

斗争周期通常引起压制反应,而即使在压制中也常夹杂着改革。特别在体制内的社会高层精英看到,他们有机会可以扩大他们与挑战者之间的联盟时,统治者就被置于一个易受攻击的位置,结果常常就造成改革;而一旦冲突瓦解,好战者退下来医治创伤,许多运动果实就会被颠覆,而这又使其后的运动参与、大众文化变化和残留的运动网络不断增加。如果斗争周期是一个播种时节,那么斗争事业的新加入者、社会高层精英和当权者,在紧随其后的运动解散时期,常常会得到收获。

如果斗争周期由扩大中的机遇开始,那么它们又怎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的呢?难道仅仅因为人们厌倦鼓动,因为正在削弱的派别斗争的发展,因为组织变得压抑;抑或是因为高层精英对挑战者的镇压和安抚?虽然所有这些都是促进斗争周期性衰退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系统化的原因,那就是:运动中的力量取决于外部机遇的动员,当机遇从最初的挑战者扩展到其他的集团,并转向高层精英和当权者时,运动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力量来源。在短暂的时期里,运动中的力量似乎不可抵抗,却很快消失,并无情地变成更为体制化的形式。比较聪明的权力拥有者通过有选择地促进一些运动和压制或忽略另一些运动,来利用机遇。

新的运动,变化的问题

自1989年以来的斗争岁月都有助于强化这里总结的许多发现。但是它们也带来新挑战的浪潮,不仅挑战国家,还挑战处在相对和平的20世纪60和70年代运动阴影之下的运动形象。其中一些对运动理论的挑战,如所谓新社会运动学派,已经像它们的前辈一样,随着这些运动的过时而黯然失色(Calhoun 202

1995;Offe 1990);其他一些对运动理论的挑战,则还在国际政治和社会运动理论的议程上。最令人烦恼的是“敌对的运动”和20世纪90年代的认同政治;威胁较小却同样重要的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较为克制的斗争和分化激进主义的潮流。这些问题的基础是关于世界是否正进入一个普遍动乱时期的普遍问题,或更确切地说,是世界各国正使运动制度化的问题。这些都是结尾这一章最后要探讨的问题。

敌对运动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暴力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在中东和北非,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运动从1979年的伊朗革命中获得鼓舞,不仅挑战埃及那样的世俗政权,还挑战沙特阿拉伯那样的王室神权政治。在北非,一场同样的运动使苏丹被控制,而另一场运动则拼命反对阿尔及利亚政府。在阿富汗,这种运动的成功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惊人。那里,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出现了政党斗争,原教旨主义民兵因此在内战中相互冲突。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动荡的并不单单是原教旨主义者。在中非,1994年卢旺达的一场种族灭绝战争造成大量移民涌向邻国,并在扎伊尔引起一场灾难性内战,使扎伊尔的腐败政权在1997年被推翻;在东南亚,缅甸和印尼的独裁统治受到民主运动的挑战;在拉丁美洲,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的一场叛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而在1997年,一场不顾一切的游击运动则使上百名人质被关押在秘鲁的日本大使馆里。

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被这些事件震惊了,一些学者机械地将过去的动员模式应用于新的挑战,另一些学者则完全否定社会运动理论的传统。难道90年代民族和宗教矛盾的高潮,以及游击运动和内战的高潮,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危机

的外部反映吗？有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战后社会和平和经济扩张的综合也在资本主义中心消失了。在西欧，北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法国民族阵线那样的右翼政党、比利时弗莱姆斯布洛克佛兰德人要求独立的运动、奥地利自由党以及光头仔的暴力，这些连续不断的痛楚，又得到那些为失业率上升和反移民恐慌所困者的支持，愈演愈烈。

美国也没有能幸免这种“丑陋运动”的灾难。虽然十年前的和平运动、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已经不太明显，新的不怎么温和的运动正在美国组织起来。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基督教联盟，虽然从不与之结合，却影响到政党的纲领和提名过程（Usher 1997）；在西部和西南部各州，战斗的反政府运动和武装民兵攻击教堂和犹太人机构，藐视联邦政府；在得克萨斯州中东部城市韦科，当联邦官员试图把宗教团体成员逐出一个低矮的综合楼时，这个团体的成员竟以自焚相抗；在俄克拉何马城，一颗旨在打击政府的炸弹炸毁了一幢联邦大楼，炸死上百名市民。 203

即使在西方公民政治体制下，一系列“身份认同运动”的兴起也具有大众政治的混合传统。运动的身份认同论后继者信奉“差别”，这取代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普遍目标。差别论虽然有明显的加强团结的好处，却也有解散联盟和脱离对手的缺点。重视集体身份认同而忽视机遇的运动，则因为朝运动内部而不是外部看，在友好范围内建立堡垒而不冒险闯入纷争地带，从事的是毫无结果的“比对方更完美”的训练，最终常常以托德·吉特林辛辣的名言为结局——“当右派占领白宫时，它们还在向英语系推进。”（Gitlin 1995:ch. 5）

20世纪90年代暴力的、世俗的和自我封闭的身份认同运动的传播和引人注目的成功，反映了我在这本书里描述的运动

的力量。但它们也给社会运动理论提出了难题：怎样看待暴力的增加、民族矛盾的复发、文明的衰退和冲突的国际化？我们可以在多大范围内允许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西方公民运动范例塑造我们的模式？（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7）一些研究民族主义、民族矛盾和恐怖主义的学者总结说，这些模式在 1989 年之后的世界完全是落后于潮流的。如果我们的理论还有点用的话，它们就应该提示出运动不同类型的因果动态发展。此外，随着世界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其他趋势也更常见。

有节制的斗争^③

拉塞尔·达尔顿在他关于公民政治的优秀教科书中，写到他在四个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调查结果：

在调查期（1974—1990）结束时，每个国家内非传统的政治活动都比一开始更普遍……在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抗议正成为一种更普遍的政治活动。（Dalton 1996:75）

204 这些变化并不是线性的或在所有国家都相同的。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抗议周期结束时，在和平的瑞士与动荡的意大利这样大相径庭的地方，斗争的规模比一开始更大（Kriesi 1985; Tarrow 1989a）。克瑞埃西和他的同事考察了西方国家 70 年代和 80 年代“新”社会运动的趋势，其中对三个国家的抗议周期的描述与我们在 60 年代看到的情况相似。80 年代末，德国、荷兰和瑞典新社会运动引起了比 70 年代中期更多的抗议活动（Kriesi et al. 1995:74）。^④

与三十年前的情况相比，今天的斗争政治不仅更频繁，似乎

还得到更广泛的各种组织和更多领域人们的运用。尤其在美国和西欧,除了全体选民和“公共利益”集团,宣称支持“远距离问题”的利益组织已经显著地增加。这类组织经常把制度的倡导与更有斗争性的行动相结合(Minkoff 1994; Walker 1991)。甚至一些老组织,如美国严肃的谈话团体或德国从前的温和组织,其抗议活动也有所增加。

自6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行动者在抗议活动中越来越突出。英国中产阶级为反对新的高速公路或野蛮狩猎而抗议;法国卡车司机为反对过早退休而堵塞交通;尼德兰天主教和新教牧师为争取和平而示威;意大利店主为反对更严格的税收而抗议。除了传统的学生、农民和工人抗议团体,这些都是90年代斗争政治中常见的人物。

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性别上,虽然男人仍然比女人抗议得更多,达尔顿写道:“有证据表明,这种模式正随着性别作用的缩小而改变。”(Dalton 1996:78)想一想过去二十年内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从菲利斯·施拉弗莱(Phyllis Schlafly)的反平等权利修正案运动和80年代母亲们反对酒后驾车活动,到反堕胎围堵和1993年华盛顿的同性恋者游行,妇女越来越明显地、越来越多地扮演领导角色。在拉丁美洲,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反军事统治、反酷刑和反失踪的抗议活动都是由妇女组织发起的。在英国,反对核武器的格林汉姆公地抗议也是完全由妇女组织的。

常规与斗争

随着我们走进一个新的世纪,斗争变得更加复杂,远不只是数量的增加或行动者的扩大。首先,在大多数西方国家,1970—1990年间参加斗争性较少的集体行动形式(请愿与和平示威)

的人数在报道中增长最多,而参加更具斗争性的集体行动形式(如占领建筑物和政治暴力)的人数仅略有增长(Dalton 1996: 76)。在美国,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政治暴力的使用显著减少(Gurr 1989)。所以,偶尔发生的像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那样引人注目的事件,就非常令人震惊。在我们有可比较资料的国家中,更具斗争性的集体行动形式只有在60年代到80年代末之间的西德似乎增长了,而且只有和平运动一类的“新”社会运动是如此。^⑤

此外,一般公众对抗议合法性的“接受”仅局限于很少几种抗议活动,并在达尔顿所分析的大多数国家中逐渐消失(参见Crozat 1998)。自60年代以来,只有在一个西方国家即德国,人们增强了对更具对抗性的行动的赞同,而在意大利,情况则完全相反(比较一下Crozat 1998和Rucht 1998b)。总的来说,欧美的证据表明,西方公民接受并实际运用的激烈斗争形式的数量似乎比二十年前更有限。而与我们在第六章所说的“常规手段”联系在一起的和平形式,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增加了,尤其是请愿与和平示威。

最后,正如抗议方法已扩散到新的人群中那样,我所说的社会运动组织中经常出现的激进主义即好斗倾向已经减弱。这可能是更普遍的私有化倾向的部分表现,罗伯特·普特南把它描述为“社会资本”在美国一类国家中的衰退(Putnam 1995)。但这甚至在抗议活动增加的法国也能发现(Ion 1997)。因此,这里有一个未来社会运动之谜:我们怎样把抗议活动(不管有多温和与符合常规)的增加和扩散与好斗倾向的衰减相调和?下面是一个假设。

分化激进主义

群众战斗性的衰减并不意味着典型社会运动的衰落；不过，它确实反映了传统运动中组织的衰退和第八章所描述的向其他运动形式的分化。随着群众运动组织在数量上和战斗性上的削弱，具有运动使命的自助群体、有目的的社团、服务组织及政党和利益群体已经变得更加突出。尽管每个新的斗争周期都能使群众运动组织复兴，但这些组织很快就显示出不稳定和易分裂的特征，最终朝许多方面分化。

在60年代后不久的美国和稍后的西欧，有运动使命的公众利益群体和政党普遍发展。如果说利益群体在美国较为典型，而绿党这样的政党在西欧较为重要的话，那可能是选举制度不同的结果。两者其实拥有许多共同的特征：领导层的职业化、主要针对公共当局的定向，还有（最好的情况下）支持者大规模参与的被动形式。

公众利益群体的重要性不应该受到“纯”运动形式探索者的 206 讥讽。公众利益群体作为“运动中间站”和技巧、信息及交流的来源，能发起更具战斗性群体本身产生不了的抗议活动。特别在斗争周期间的停止不前时期，它们有助于使运动提上日程的主题保持活力，并为运动联盟提供专门指导和资源。

同时，许多活动形式都避免与政治参与或社会中的激进主义发生关系。也有一部分群体涉及直接参与和寻求选民的个人发展。它们包括美国的社群运动群体、广泛的自助和支持群体以及促进家庭教学和意识提高群体。这些群体虽然不直接以动员群众为目标（确实，它们常常代替动员），它们可以保持与运动目标相关的舆论，并为自我发展提供服务 and 机遇。在像美国天主教会和西欧工会这样差别很大的机构里，“小组”和促进意识提高的群体，在动员的低谷时期，能继续促使激进主义保持

活力。

其他和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形式,如德国 1968 年运动产生的自治组织,为更多的公众提供了专业化服务。在国际层面上,一系列松散的支持群体和团结协会,有时与它们的政府紧密合作,有时与国内群体合作,为第三世界的人民提供健康服务、技术咨询和合作。在西方,一场以绿色和团结为目标的消费运动正在发展壮大,它使第三世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无需经过谋取利润的中间人,直接销售到世界各地。

最后,过去的大规模运动并没有消失,而是根据社会变化调整了它们的形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已经看到活动积极分子及其领导者自由而权力分散的关系网的发展,这些活动积极分子及其领导者一般围绕特别的活动组成联盟,向政治当局提出要求。即使他们提出自发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大部分核心还是高度专业化的。活动积极分子及其领导者的关系网络不是大众党派或大众运动官僚组织,但它们在少数组织骨干分子的领导下,采取联合行动形式,动员了一大半零星的活跃市民。

这些运动的“新”在于它们是“自发的”,而它们的前身都是“有组织的”;或它们提出“身份认同要求”与“旧”社会运动所谓的“工具性”要求相对照;或它们习惯性地采用非常规的行动方式(实际上它们主要采用的是常规的请愿与和平示威)。它们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具有更多按需使用的资源,更容易接近媒体,能通过更便宜更迅速的方式引起地理流动和文化互动,号召不同类型与运动相关联的组织共同合作,迅速组织起来展开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旧的权力集中的大众运动的衰落对社会运动来说,不是损失而是收益。下面是在这些资源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创新。

跨国斗争

对于本研究所针对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民族社会运动是斗争政治的主流。这是因为巩固的民族国家日益发展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对于在它之前的国家形式，还是对于它所包含的更小的领土单位。而大约在 20 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民族国家却开始受到挑战：以国家为基础、由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联合产生的帝国的挑战；附属领土动员起来的身份认同的挑战；跨国公司那样的跨国实体的挑战。

电视、低廉的航空旅行和电子通信是否正在加快国家解体的进程？在世界各地的运动中，如 1989 年的东欧的运动、1994 年的恰帕斯运动和绿色和平组织在公海的活动，电子通信和活动积极分子跨国流动小组，在挑战国家的独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作为社会运动，它们的未来尚不明确；但是近来的变化毫无疑问地加速了跨国扩散的进程，并给予组织者新的动员武器。这是先前一章提到的问题，在世界历史的目前阶段，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是愚蠢的，因为它涉及的实际上是主权民族国家的制度。

运动和机构

在本研究的许多地方，我们已经看到运动和机构紧密互动的过程。这不只是一个挑战制度的问题，尽管挑战制度是社会运动培育的中心形象，还有一个和制度性行动者合作、在各种时候争取制度支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 1968 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失败和第十章中讲到的美国妇女运动的胜利相比较，后者肯定得益于机构的合作和参与。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机构的参与是一柄双刃剑。社会运动如果太疏离机构，就有孤立化和偏执化的危险；而如果和机构合

作太密切,并采取机构的惯例,则会受到社会机构的逻辑和价值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跨国倡导网络的情形中所发现的一种危险,跨国倡导网络常常假冒运动之名,享受基金会、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财政援助。它们是鼓励微弱的国内运动,还是继续作为自由流动的精英网络,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和它们所针对的政府都不得不小心关注这个问题。

有些类型的机构看上去比其他类型的机构更能促进运动。我们反复看到中央集权的国家如何趋向于在国家层面上组织抗议,而联邦制国家又如何给运动行动和“战场选择”(venue shopping)提供了可选择的场所。极权国家一方面试图镇压抗议,另一方面也激化抗议,使自己在机遇开放和限制瓦解时,比民主国家的处境更危险,就像我们从1989年前苏联和中欧东部的情况中所看到的那样。民主国家对挑战者有利,但是60年代以来警察实践的改革虽然使力量动员越来越容易,运动的破坏力却也被消除了。

民主国家的运动已经学会把机构内外的活动结合起来。像保护艾滋病者权益联合会这样具有破坏性的组织,不仅其“生命力”令运动反对者苦恼,还以艾滋病受害者的名义在公共场所上演夸张的“拟死示威”。其活动积极分子保留了特别的委员会和群体,专门处理它们每天的事务,游说和协调其他委员会(Ernst 1997:17)。当今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种持续的制度或非制度性的实践,是否正导致社会更加动荡,或造成运动的驯服化?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在斗争的性质和政府对于斗争的控制手段上,一直存在着缓慢的、参差不齐却坚定不移的文明化倾向。由于模式化斗争手法把社会运动和国家连在一起,直接的暴力

攻击形式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数字的力量、团结和国家与运动间的非正式对话。随着暴力水平的降低和非暴力活动的采用,60年代的斗争过程在这方面树立了典型。而过去二十年的游击战、人质抓捕、爆炸事件和民族矛盾必然又使我们怀疑,采用和平斗争手法的趋势是否不过是地方性的插曲,并正在逆转。

暴力多发生在穷困的“南半球”,但西方国家公民反思暴力在非西方世界的演化时,并没有高人一筹的感觉。战斗的伊斯兰教或整体民族主义的严格信仰,要不是因为使用暴力方法的话,与西方文化近来的趋势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星期天早上在电视节目中鼓吹褊狭政治化的部长们、拒绝承认妇女生育自由权利的胎儿“拯救者”、对教育和个人生活长久价值的正统攻击者、宣称自己的民族或种族优越论的身份认同运动者,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方法完全不同,但像法国民族阵线,或由“上帝党”的狂热产生的美国民兵运动,它们之间有多少差距呢?

现代国家的公民先前经历了如此“疯狂的瞬间”,足以使我们记起,在伟大的法国民主革命时期,砍下的人头曾被长矛挑着 209 在巴黎周围展示,与90年代出现的暴力和褊狭可谓异曲同工。最近的突发事件更让人担心:20世纪末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正促使“运动社会”的形成,与1765年在巴士底、1789年和1848年在巴黎爆发的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非暴力抗议运动相比,运动社会将有一个更广泛的文化效价和更迅速的全球扩散。

据信由1989年解放造成的新世界秩序难道正在转向持久的暴力与混乱?暴力斗争的资源竟如此普遍易得、整体主义认同竟传播得如此之广、好战分子竟如此不受国家的限制,以致会导致一个持久的暴力运动社会?或者与先前的运动周期一样,当前的民族和宗教运动潮流部分而言是过度发展的,部分而言

是驯化的,部分而言又是为政治过程所调停的?

世纪末的暴力和褊狭包含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趋势。但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运动大潮,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它的动力变得与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斗争政治相似,那么它的力量一开始将非常猛烈、无法控制和广泛传播,而最终却是短暂的和制度化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会像先前的运动浪潮一样,将渐渐消散,“如同冲散了许多泥土而在后面留下冲积物的洪流”
210 (Zolberg 1972:206)。

注 释

导论

- ① 关于这一带有阐释性综合的论文,请参见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6, 1997。
- ② 换句话说,我不同意拉塞尔·哈丁在《集体行动》一书中的观点:“没有理由根据实际问题的范围将该理论(集体行动)分类。”如果像哈丁所言,对参与解释的概括会导致更大的理论力量,那么活动资源和行动者协调的问题在所有实际领域中都是可以比较的。
- ③ 种族民族主义学者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冷漠得到大多数社会运动学者的热情回报。细读一些运动文本的目录,可发现他们对相对自由民主的“公民”运动有较多兴趣,而对过去十年出现的“坏”运动趣味索然。
- ④ 查尔斯·蒂利写道:“当局和轻率的历史学家通常将大众斗争描述为混乱的……但对这种斗争研究得越深,我们越会发现它的有序性。我们发现它的有序性既是由产生于日常生活的习俗和组织中的集体行动造成的,也是由被集体行动触动其利益的群体在一连串指示、谈判和斗争中遇到的困难造成的。”(参见 Charles Tilly, *The Contentious French*, p. 4)
- ⑤ 这种运动被社会学家玛丽·卡赞斯坦描绘成“主题不明的”,她曾在《机构中的抗议》(*Protest inside Institutions*)一书中,研究了激进的美国天主教妇女运动。我将在第七章回到话语与集体行动的关系。
- ⑥ 一些社会运动研究者把普遍意识标准推向了极端。例如,鲁道夫·赫伯勒认为,运动必须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参见 Rudolf Heberle, *Social Movement: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而其他人,如阿尔贝托·梅卢齐认为,运动有意通过不断协商“构成”集体身份认同(参见 Alberto Melucci, *Getting In-*

olved: *Identity and Mobilization in Social Movement*)。

一 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

- ① 关于那些集中关注与正常社会活动对立的民间暴力的理论家的描述,参见 James Rule, *Theories of Civil Violence*, ch. 3。
- ② 当时在社会主义者圈子中流行着这样的理论:革命领导权必然主要由一个极小的知识分子小组来承担。列宁批评该理论道:“其实并非必须如此,这只是因为我们(俄国)太落后。”(*What is to Be Done?* pp. 123—124)
- ③ 1924年,葛兰西写道,“党的错误在于:以抽象形式对组织问题给予优先考虑,而组织问题实际上只意味着创造一套官员机构,这些人对官方观点的正统态度是可以依靠的。”(见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lxii)
- ④ 这种特别的危险存在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边缘,即中产阶级和农民中。(参见 Stephen Hellman, “The PCI’s Alliance Strategy and the Case of the Middle Classes”, 和 Sidney Tarrow, *Peasant Communism in Southern Italy*)。
- ⑤ 在此我不打算总结该学说,而只是推荐读者参阅道格·麦克亚当的硕士论文,参见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ch. 1。
- ⑥ 群体大小的问题吸引了许多研究公共利益和策略理论传统的学者。(参见 John Chamberlin, “Provision of Collective Goods as Function of Group Size”; 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ch. 3; 及 Gerald Marwell and Pam Oliver, *The Critical Mass in Collective Action: A Micro-Social Theory*, ch. 3。)
- ⑦ 例如,在美国汽车制造业的集体利益中,通用汽车公司有足够的兴趣去领导国内汽车制造者,包括那些小得无法独自采取行动者。但如果有足够的群体成员不劳而获,那么领导者所做的努力不仅无效,而且他们的努力本身也将造成不劳而获。
- ⑧ 毫不令人吃惊,扎尔德的论文和处女作(1970)研究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形成、转变和政治活动。
- ⑨ 在美国,汤普森的文化语言和他对意义的重视得到一位在人类学方面很有天分的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1976)的欣赏。斯科特利用汤普森的理论研究农民对商业化压力的反应,还在葛兰西文化霸权观念的影响下,继续把他的思想一般性地运用于农民反抗的研究(参见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1985),后来才从集体行动转向他所谓的“隐藏文本”。

- ⑩ 在有关革命的领域中,约翰·福兰提供了一本颇具文化敏感的著作,马克·塞尔宾 212 则试图把机构置于革命研究的中心。(参见 John Foran,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Mark Selbin, *Morden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
- ⑪ 关于这个概念发展和使用的主要历史标准,参见 Eisinger 1973, Kitschelt 1986, McAdam 1982, Piven and Cloward 1977, Tarrow 1988, 以及 Tilly 1978 和 1986。
- ⑫ 此后,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经历了多次转变,本书后面将对其中一些理论进行分析。关于他对该领域的重大贡献,可参见本人的评论文章,“The People’s Two Rhythms”。
- ⑬ 敏锐的批评请参见 Gamson and Meyer, “The Framing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 ⑭ 有些评论家认为,可以辨别影响个别社会运动的机遇结构。事实上,很少有政治方法理论家采用此观点。例如,戈德斯通(1980),麦克亚当(1982)和塔罗(1989a, 1996b)认为,机遇结构倾向于扩大群体规模,而且早期的起义者可以为他人创造机遇(参见第九章)。
- ⑮ 此观念由蒂利提出(参见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ch. 6; “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 or Social Movements”, 和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h. 1), 后来他还详细解释了该理论,并作了重要修正。
- ⑯ 一些主要资料来自于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及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William Gamson, *Talking Politics*。
- ⑰ 实验研究人员也认识到合作的社会动机很重要。在一篇绝妙的研究文章中,威廉·盖姆森和他的合作者表明,一个支持性的群体环境对于激发个体主动反对不公正的当局是十分必要的,否则人们在独自面对当局时可能会忍气吞声(Gamson, Fireman and Rytina 1982)。同样,罗宾·道斯和他的助手在对群体选择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后发现,在制造集体行动方面,自我动机和主观标准都没有“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作贡献的狭隘观念”强(Dawes, Van de Kragt, and Orbell 1988: 96)。他们在《不是你或我,而是我们》一文中指出,在社会困境中,“人们马上开始谈论‘我们’该做什么,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劝导群体中的其他人合作(或背叛!),哪怕其他人的行为与发言者自身得到的回报无关。”
- ⑱ 同时,欧洲学者如汉斯皮特·克瑞埃西(1985)发现,运动的亚文化是集体行动赖以形成的源泉。社会学家阿尔贝托·梅卢奇(Alberto Melucci 1988; 1996; ch. 4)也认识到运动网络对界定他在意大利所研究的运动的集体身份认同方面很重要。

- 他们的观点正好吻合。
- 213 ① 哈丁暗示了这一点,他指出:“可以根据一大类场合中较小亚群体的互动,形成一种涵盖很大一类人行为的常规,尽管这些人都不亲自与群体中的许多人互动。”(参见 *Collective Action*, p. 186)
- ② 就像杰拉尔德·马维尔和帕姆·奥利弗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关键的大众》中所说:“奥尔森的‘大群体’问题总是由‘小群体’方案来解决”(1993:54)。

二 模式化集体行动

本章的部分内容参见 Sidney Tarrow, “Modular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Why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Not Enough”, *Politics and Society* 21, pp 69—90, 1993。

- ① 关于这场审判,参见 Hans-Jürgen Lusebrink, “L’imaginaire social et ses focalizations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à la fin du XVIII siècle”, 以及 Sarah Maza,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Affairs*。
- ② 关于街垒的开创性研究正由特劳戈特进行着,他正在调查街垒的演进和功能变化,对我这部分书稿曾提出过宝贵意见。(见 Marc Traugott, “Barricades as Repertoire: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the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 ③ 蒂利把“洗劫惯例”描绘成 18 世纪的普遍现象(Tilly, “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 or Social Movements”),他发现人们常常用洗劫来惩罚那些欺骗非法顾客和公共官员的旅店和妓院老板,而用洗劫来惩罚虐待下人的房东似乎还是革命前的创举。洗劫现象一直贯穿于法国大革命的始末,最突出的表现是在 1789 年 5 月的暴动中,关于后者的情况,请参见 Simon Schama, *Citizens*, pp. 326—332。
- ④ 例如,戈德肖在对 1848 年革命的详细研究中,至少为街垒在法国的单独使用列举了九种不同的原因(Godechot, *Les revolutions de 1848*)。关于街垒在 1848 年革命中使用过程的分析,请参见 Sarah Soule and Sidney Tarrow, “Acting Collectively, 1847—1849: How the 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 Changed and Where It Happened”。
- ⑤ 蒂利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贡献如此之大难以概括。有关的简要参

考书目和评论分析参见 William Sewell Jr,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Loyalties in France: Why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de a Difference", 以及 Sidney Tarrow, "The People's Two Rhythms: Charles Tilly and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 ⑥ 这个概念对蒂利的著作而言并不新鲜。他曾写道：“无论何时，令人惊奇的是，考虑到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的而在原则上可以采用的无数方法，考虑到实际群体此时或彼时用来追求其共同目标的许多手段，某个人群所有的集体行动斗争手法总是出人意料地有限。”(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s*, p. 151, 1978)
- ⑦ 这取代了我先前的术语“抗议周期”。该术语如今对我来说，受到了与现代术语“抗议”的联系的严重限制。
- ⑧ 蒂利写道：“由于相似群体一般有相似斗争手法，我们就可以更放松地讨论某时某处某个人群的所有一般斗争手法。”(*The Contentious French*, p. 2)
- ⑨ 如同所有包罗万象的历史图式，斗争手法概念会因为非常不同于“独立的社会学方法”，和低估了重大事件的重要性而受到批评(Sewell 1990:548)。对那些使用它的人来说，它还会被指控对集体行动的意义无动于衷(pp. 540—545)。“重大事件”的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运动周期的作用，将在第九章中进行论述，而关于斗争“构造”的作用则将在第七章中论述。
- ⑩ 以下段落主要参考 Tilly,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及 Steven Lawrence Kaplan, *Provisioning Paris*。
- ⑪ 戴维斯(Natalie Davis)在《暴力的仪式》一文中极生动地再现了法国早期现代宗教纷争的野蛮模拟特性。
- ⑫ 在法国，在集会方面类似于现代社会运动的第一场乡村运动克洛堪运动是宗教战争的产物。参见 Yves-Marie Berce,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 ⑬ 关于再现南欧农民土地强占的史料，参见 Eric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Julian Pitt-Rivers, *People of the Sierra*, 及 Sidney Tarrow, *Peasant Communism in Southern Italy*。
- ⑭ 安德鲁·查尔斯沃斯聚焦英格兰农业劳动者的抗议活动，发现只有在 1816 年的土地暴动中，“来自乡村的不同职业者通过各自对其工人伙伴的抗议和游行的响应达成了共同的事业”(见 Andrew Charlesworth, *An Atlas of Rural Protest in Britain*, p. 146)。

- ⑮ 送葬抗议在南非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主要的动员形式。每次警察向示威者开枪,大规模的送葬抗议就接踵而来。
- ⑯ 注意这种实践早在“联合抵制”这个术语产生以前就有了,殖民者用“不进口”这个词来指称。现代所用的“联合抵制”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 1880 年,当时在爱尔兰人们用这种方法反对一个名叫 Boycott 的船长。就如法语词 boycotter 一样,该术语很快在西方蔓延。
- 215 ⑰ 事实上,这仅仅加强了一种在其他地方正在取得成功的普遍联合抵制,波士顿商人和共和党人的联盟利用了破坏进口茶叶的陈规。参见 Richard D. Brown,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Massachusetts*。
- ⑱ 我非常感谢西摩·德雷谢尔对本部分初稿的评论。参见 Seymour Drescher, *Capitalism and Antislavery*; 及 Drescher, “British Way, French Way: Opinion Building and Revolution in the Second French Slave Emancipation”; 和 Leo d’Anjiou, *Social Move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First Abolitionist Campaign Revisited*。
- ⑲ 由于整个欧洲都爆发了革命,政治动乱又威胁着爱尔兰,这对英国政府来说已无法忍受。政府动员了 15 万名“自愿”警察来阻止在肯辛顿公地进行的宪章派请愿活动。参见 Dorothy Thompson, *The Chartists*, ch. 3; 关于肯辛顿公地的游行活动,参见 Raymond Postgate, *The Story of a Year: 1848*, p. 117。
- ⑳ 小威廉·斯维尔有力认为(参见 William Sewell Jr,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 of Structures”),只是随着 1789 年 7 月巴士底狱被攻克,城市起义才正常地与人民主权观念相联。
- ㉑ 关于导致“瓦片之战”的事件以及它为何能引起广泛的联盟,夏马进行了总结,参见 Schama, *Citizens*, pp. 272—287; 关于当时各省贵族和议会对法令的反应,参见 Jean Egret, *The French Pre-revolution, 1787—1788*, pp. 170—177。
- ㉒ 参见 Traugott, “Barricades as Repertoire”, pp. 43—56; “Neighborhoods in Insurrection: The Parisian Quartier 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of 1848”。街垒在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中被利用的情况还不完全清楚。而霍布斯鲍姆却认为,街垒从未被利用过。参见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p. 146。
- ㉓ 即使在本世纪,丹尼埃尔·塔尔塔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 1997)仍发现有证据表明 1919 年至 1968 年间法国建造了 31 种不同的街垒。
- ㉔ 出自 1848 年 4 月 21 日给他的歌剧剧本作者皮亚韦的信。引自 Open University, *Music and Revolution: Verdi*, p. 42。
- ㉕ 我曾对此做过更技术化的论述。可参考 Dieter Rucht, Ruud Koopmans and Fried-

helm Neidhardt, eds., "Studying Contentious Politics: From Event-ful History to Movement Cycles", *Acts of Dissent: The Study of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三 出版和结社

- ① Antoine de Baecque, "Pamphlets: Libel and Political Mythology", 该文分析了 1787 年后的政治色情手册;另见 Schama, "Body Politics", *Citizens*, pp. 203—227, 该文论及对玛丽(Marie-Antoinette)的诽谤。夏马写道,“正因为她在法国变成‘奥地利人的妓女’……才使君主的正统性遭到无法估量的破坏。”(p. 205)对此,有人曾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可参看 Lynn Hunt,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② 本部分的标题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丹尼尔·罗尚(Daniel Roche)出版的一部优秀论文集书名相同。这部论文集主要讨论了出版业在法国革命前夕和革命中的作用。至于本书这个部分所论述和扩展的独特思想,得感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启发,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ch. 3。 216
- ③ 有关本话题的很好介绍,请参见 Jack Goody ed.,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Lawrence Stone,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Kenneth Lockridge, *Literacy in Colonial England*;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Alvin Gouldner, "Prologue to a Theory of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古尔德纳通过论证现代激进主义主要植根于文字交流模式,进一步将读写能力与反抗联系起来。而我的观点则深受同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作的影响。
- ④ 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造反形式也因造反者是否有读写能力而不同。例如,约翰·马尔科夫就发现,不同地区的农村集体行动的差别是由读写能力的基本指标的高低决定的(John Markoff,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p. 382—383)。
- ⑤ 读者会发现我用“看不见的”群体这个词语取代了安德森所说的“想像的”群体(1991)。1765 年,为自身的商业利益而联合抵制印花税的商人和船主们,也许还未意识到其“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但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是“想像的”,他们会觉得非常吃惊。
- ⑥ 参见 Elizabeth Eisenstein, "Revolution and Printed Word", p. 195。关于法国 16 至

18世纪图书生产和阅读的历史,请参见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要理解引发法国大革命的禁书和小册子的重要性,请阅读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和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 ⑦ 当法国书商们向印刷社订购哲学著作时,瑞士出版商答道:“我们没有,但我们知道哪儿有,并能随时向订购者供货。”(引自 Darnton and Daniel Roche, “Philosophy under the Cloak”, *Revolution in Print*, p. 31)注意,“哲学著作”是一个代号,包括纯哲学、政治传单、轻度色情文学等范围较广的受审查的主题。
- ⑧ 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他是“惟一一位公开反对处死路易十六的法国国民公会成员”(参见 Hobsbawm, *Labouring Men*, pp. 1—4)。对潘恩重要地位所进行的较深入而透彻的研究,可参见 Isaac Kramnick, *Republicanism and Bourgeois Radicalism*。
- ⑨ 参见 Hobsbawm, *Labouring Men*, p. 2。潘恩的语言与《圣经》的语言类似,而不像他之前时代撰写政治小册子的学识渊博的评论家的笔触。例如,他用《圣经》中的类比来说服读过《圣经》的民众,君主制是战争的根源,因为对古希伯来人来说,“承认任何个人的统治,除上帝的统治之外,都是有罪的。”(Kuklich ed., *Common Sense*, pp. 8—9)
- ⑩ 据贝林的报告,1775年有38份美国报纸“遍布辩论和驳斥专栏,刊登书信、公文、演讲摘录和布道辞”。到处都有大幅印张,甚至年历的“一些零散角落和栏目里也有大量的政治评论”。总之,当时有许多小册子。(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 1—2)
- ⑪ 在英国,情况也是如此。当1792年发生对法国革命的反动时,行政官员给自己制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查禁潘恩的《人权论》第二部分和《给致辞者的致辞》。参见 Albert Goodwin, *The Friends of Liberty*, ch. 8。
- ⑫ 1848年巴黎的数据来自 Jacques Godechot, *Les révolutions de 1848*。关于1848年德、意工人阶级出版物的发展,参见 Godechot, *La press ouvrière*。关于佛罗伦萨的新杂志爆炸,参见 Clementina Rotondi, *Bibliographia dei periodici toscani, 1847—1852*。
- ⑬ 安东尼娅·弗雷泽写道:“这个(英国天主教上层阶级)小世界,为了安全起见,通过联姻使其永存,大概可以极简单地说,在这个世界里几乎人人都彼此联系。”(Antonia Fraser, *The Gunpower Plot*, p. 35)尤其请注意同谋者的关系图和他们在米德兰住所的地图。

- ⑭ 主要的资料来源包括: 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Richard Ryerson, *The Revolution Is Now Begun*; Edward Countryman, *A People in Revolution*; Richard D. Brown,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Massachusetts*; Richard W. Walsh, *Charleston's Son of Liberty*。
- ⑮ 正如理查德·布朗所说:“关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镇的战斗消息马上传开来,自动地从一人传到另一人、从一地传到另一地,并通过爱国者网络预先安排和传导。”结果,血腥冲突词汇在殖民地美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社会穿透力传播到各地区。(Richard D. Brown, *Knowledge Is Power*, p. 247)
- ⑯ 例如,约翰逊展示了罗彻斯特的严守安息日运动是如何由来自各地教堂的新教平民组织起来的。(Johnson, *Shopkeeper Millennium*, p. 109)
- ⑰ 关于扩散的一些典型样式,参见 Donald G. Mathews,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as an Organizing Process, 1780—1830”。关于宗教在产生公民道德运动方面的作用,参见 Clifford S. Griffin, *Their Brother's Keeper*; 和 Ian R. Tyrrell, *Sobering Up*; Ronald G. Walters, *American Reformers, 1815—1860*; Walters, *The Anti-slavery Appeal* (这本书阐述了宗教和反奴隶制之间的关系); Herbert Aptheker, *Abolitionism: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这本书着重研究了阶级、性别和政治——以及宗教方面——废奴主义的起源)。
- ⑱ 中产阶级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尽管法国行政部门禁止协会讨论政治,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仅在首都就有许多文化和音乐团体、体育协会和“绅士俱乐部”讨论政治(Harrison 1996:42)。
- ⑲ 例如,霍布斯鲍姆和鲁德报告了许多情况,斯威恩运动鼓动者的关系网就在这些情况中,通过家庭关系组织起来。参见 *Captain Swing*, pp. 205—206。
- ⑳ 参见 Eisenstein, “Revolution and the Printed Word”, p. 197; Darnton,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和 Jack R. Censer and Jeremy O. Popkineds, *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 ㉑ 因为散布反政府言论的书籍而被捕的书商也被赦免。参见 Georges Lefebvre, 218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54; Eisenstein, “Revolution and the Printed Word”, p. 199。

四 国家创建和社会运动

- ① 关于法国国家巩固和公民权之间的关系,参见 Simon Schama, *Citizens*, part I。

关于国家巩固和公民权的一般关系,参见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990—1990*, ch. 4。关于造成国家公民权的不同国家模式,参见 Wynne te Brake, *Shaping History: Ordinary People in European Politics, 1500—1700*。

- ② 托克维尔刻画的旧政权和后来政府的形象都太过宽泛。关于旧政权,如今我们认识到,他夸大了它的力量和法国中间阶级的突出重要性。
- ③ Alexis de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pp. 61—68. 托克维尔的最新阐释者迈克尔·克罗泽,用组织社会学的语言隐约显示了集权和混乱的强论点。参见 Michel Crozier,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 8。关于国家集权和文明社会的原子化造成法国式抗议行为特点的过程,请参见 Stanley Hoffman, “The Ruled”, pp. 111—144。
- ④ 关于第一点的证据,参见 Sidney Tarrow, “‘The Very Excess of Democracy’: State Building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America”。关于南北战争前美国的无政府特点,参见 Stev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 ⑤ 托克维尔觉得古怪而有趣的禁酒运动和他觉得十分危险的州拒绝承认和执行联邦法的运动除外。详细解释可参见 Sidney Tarrow, “‘The Very Excess of Democracy’: State Building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America”。
- ⑥ 塞缪尔·芬纳报告说,1635年抗击西班牙的法国军队人数达到15.5万;1812年拿破仑在对俄国的战斗中,召集了70万人;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集合了16万人参战,仅1814年就征召了30万名士兵;在英格兰,军队人数虽然一般较少,但也在成比例地增长:从1712年征召的7.5万人到反拿破仑战争高潮时的25万人。参见 Samuel Finer, “State 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p. 101。
- ⑦ 芬纳注意到:“18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任何国家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军队都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参见 Samuel Finer, “State 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pp. 101—102。
- ⑧ 唐纳德·雷德写到,约克郡协会号召通过“在王国的若干地区(建立)协会,由各自的委员会和联合体的总代表采取行动,反对(统治全国的)雇佣兵”。参见 Donald Read, *The English Provinces*, p. 12。
- ⑨ 这位行政官叫贝赫提埃·德·索维尼(Bertier de Sauvigny),斯蒂文·劳伦斯·凯普兰曾引用他藏在国家图书馆中的未发表的文献《关于谷物交易的观察》。参见 Steven Lawrence Kaplan, *Provisioning Paris*, p. 23。

- ⑩ 食物供给的任务一般由许多机构和巡查员负责承担。参见 Steven Lawrence Kaplan, *Provisioning Paris*, pp. 36—37。
- ⑪ 据加布里埃尔·阿丹特所言,1736年至1738年间,在英国国内平均税收中,土地税占17.5%,窗口、年金和职务占2.4%,关税占24.6%,国内货物税占52.8%,印花税占2.6%。(Gerbriel Ardant, “Finan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 pp. 201—203)
- ⑫ 例如,纽约的经费来自进口税、各种商品税和小贩的执照税。和在英国一样,只在战争时期征收土地税,使大多数地主只承担少量的殖民地费用,而像纽约市和奥尔巴尼市却得承担数量不均的税收。参见 Edward Countryman, *A People in Revolution*, p. 83。
- ⑬ 例如,在纽约,康丘曼写道:“糖税法、印花税法和汤森法都威胁着州议会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海关部门的调整中又引进一批外国官僚,英国军队驻扎的目的就是强制推行这些官僚的意志。”参见 Edward Countryman, *A People in Revolution*, p. 85。
- ⑭ 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部门”(départments)是一个典型范例。它们不是根据地图绘制员计算的区域大小来划分,也不是由碰巧经过某区域的河流名称来命名,而被设计为(特别在君主曾间接统治过后来才被合并的地区)打破原有地域势力的划分单位。为了与国家领土和财政政策对应,它们最终形成了行政机构,具有了政治特征。
- ⑮ 这个过程直到1928年才完成。罗伯特·皮尔在成为首相前,曾在爱尔兰为英国政府工作,他在殖民政府身陷困境时,在爱尔兰创造了英国民事警察的前身。英国人还从印度的行政事务中汲取教训,把爱尔兰殖民地变成后来建立国家时宗主国革新的实验基地。
- ⑯ 关于这种发展,参见 Roger Gear, *Policing Industrial Disputes, 1893—1895*; 及 Jane Morgan, *Conflict and Order: The Police and Labor Disputes in England and Wales, 1900—1939*。
- ⑰ 例如,标志着共和派决心扩大选举权并引发1848年革命的宴会,是对1830年标志着向奥尔良派政权过渡的宴会的大规模重演。无论哪种情况下,当局者都无法控制法国人聚餐和交际的自然倾向。(Corbin 1994; Tocqueville 1987)

五 政治机遇和限制

本章极大地受益于邦斯、戴维·迈耶和查尔斯·蒂利的意见。

220

- ① 杰克·戈德斯通和查尔斯·蒂利根据研究斗争政治的梅隆(Mellon)研究小组准备编论文集的计划,正准备写一篇论文,探讨“威胁”和社会运动问题。
- ② 关注美国和欧洲研究方法间关系的国际争论的读者将会发现,此处采用的方法与伯特·克兰德曼斯和我曾采用的方法一致,参见 Bert Klandermans and Sidney Tarrow, “Mobilization into Social Movements: Synthesiz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Approach”。
- ③ 有一篇很长很专门的文献论述了经济情况和罢工的关系,约翰·凯南对此进行了最全面的总结和评价。参见 Orley Ashenfelter and Richard Layard, eds., “The Economics of Strike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2。
- ④ 对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薪水激增的经济起因的最综合解释,请参看 Crouch and Pizzorno, eds., “Strike Waves and Wage Explosions 1968—1970: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vol. 2。
- ⑤ 并非总是被承认的政治机遇理论的最终来源,是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ch. 4。也可参见 David Snyder and Charles Tilly,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美国明显的基础研究可参见 Doug McAdam,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Anne Costain, *Inviting Women's Rebellion*; Suzanne Staggenborg, *The Pro-Choice Movement*; 及 David Meyer, *A Winter of Discontent: The Nuclear Freeze and American Politics*。关于这个概念的比较研究用法,可参见 Charles Brockett,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Mary Katzenstein and Carol Mueller,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Herbert Kitschel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及 Tarrow, *Struggle, Politics and Reform*。
- ⑥ “结构”一词被我运用于本书第一版(1994)中,皮特·艾辛格(1973)和赫伯特·凯茨切特(1986)也曾用过这个术语,但它可能使一些评论家产生误会,以为我们假设机遇并不需要被发现就可以作为活动动机。
- ⑦ 艾辛格的观点不只是以托克维尔的预感为基础,他还通过比较地方政府的正式和非正式政治结构之间的差异,利用美国城市的机遇结构,以动荡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 53 个城市为样本,研究了城市抗议群体的行为。他发现,既不是在政治机遇开放水平最高的地方,也不是在政治机遇关闭的地方,而是在政治机遇水平

- 处于中等的地方,这些群体的激进程度最高。
- ⑧ 主要参见 Peter Evans, Dietrich Reuschmeyer, 和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也可参见 Richard Valley, "Party, Coercion and Inclusion", 这篇文章比较了长期以来的美国政府结构和政党体制。
- ⑨ 例如,赫伯特·凯茨切特由法国、德国、瑞士和美国的环境保护活动的差异,上溯到国家结构的体制差异。参见 Herbert Kitschel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 ⑩ 注意克瑞埃西等 1995 年出版的书中发现,法国动员的低水平仅仅是对所谓的新 221 社会运动而言;传统的阶级运动更有活力。这些发现受到了菲里埃尔的挑战,他对法国警察所记录的抗议斗争情况档案进行了仔细研究,在其新作中指出,街上的抗议水平极高。参见 Olivier Fillieule, *Strategies de la rue*。
- ⑪ 参见 Open University, *Music and Revolution: Verdi*, 1976。关于摇滚乐在 1989 年前的苏联是表达不满的一种手段,参见 Sabrina Ramet, *The Soviet Rock Scene*;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摇滚乐在独裁的印度尼西亚也起过相同的作用。

六 斗争行动

- ①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巴尔干冲突的最公正最博学的研究,参见 John Lampe *Yugoslavia as History*; 和 V. P. Gagnon, "Serbia's Road to War"。这里的叙述和图 6.1 均以路透社的报道为依据。更生动形象的叙述请参见 Timothy Garton Ash, "In the Serbian Soup"。
- ② 塞尔维亚的许多城镇中都发生了地方性的游行示威。国际新闻社仅对贝尔格莱德的事件作了准确报道。即使如此,图 6.1 中的示威人数也只能作为粗略的估计。
- ③ 最近关于斗争手法研究的优秀代表作是 Marc Traugott,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另一本更专业的论文集是 Dieter Rucht, Ruud Koopmans, and Friedhelm, eds., *Acts of Dissent*。
- ④ 德拉·波塔表明,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和法国暴力政治的兴起导致了“法律与秩序联盟”和“民权”联盟之间的两级分化。参见 della Porta,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p. 192。
- ⑤ 吉尼·夏普发现,非暴力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罗马平民非但不攻击执政官,反而退到一座山上,这座山后来被命名为“圣山”(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

- lent Action, p. 75)。他还发现,非暴力行动的例子也存在于美国革命、19世纪匈牙利人对奥地利人统治的抵抗和魏玛德国时期击败卡普暴动的普遍罢工和政府行政部门关闭之中(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pp. 76—80)。
- ⑥ 20世纪80年代,不愿施行人流手术的美国医生和医院越来越多,而被迫继续非本意的妊娠过程又使妇女感到羞耻和负罪,这些都证明了运动的影响。苏珊娜·斯达根伯格对反堕胎运动进行了敏锐的研究,可参见 Suzanne Staggenborg, *The Pro-Choice Movement*, part 3。约翰·麦卡锡则分析了一些组织和战略方面的因素。参见 John McCarthy, “Pro-life and Pro-Choice Mobilization”。
- ⑦ 弗莱明·米克尔松指出,从艾尔博格镇 1500 人参加的小集会开始,这种被动抵抗形式后来扩散到其他省市,最终甚至扩散到哥本哈根。“1940年9月1日,当来自全国各地的 74 万人齐集在一起高唱国歌时,被动反抗达到了高潮。”(1996: 8—9)
- ⑧ 例如,在公共场所举行集会的惯例,即使是为了颠覆性的图谋,在欧洲近代早期的教区会议、行会和天主教苦行会仪式上都是常见的。参见 Berce,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pp. 23—25。当第一次克洛堪起义在宗教战争末期开始组织起来时,造反者的集体行动基本形式就是在教区层面上组织起来的集会(p. 7)。
- ⑨ 罗纳德·阿明扎德写到,直到 1872 年法国人口普查时,尽管在手工业和工业制造中的工匠“仅占劳动人口的 21.9%,占工人阶级的 29.5%,仅手工工匠就占 1830 年至 1879 年间罢工人数的 72%”。参见 Ronald Aminzade,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pp. 77—78。
- ⑩ 一个早期的事例是,1765 年在斯帕托菲尔德(Spitalfield)集会的英国织工,分三路进军伦敦去请愿,要求减少对法国丝的进口。参见 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p. 152。
- ⑪ 皮埃尔·法夫雷(Pierre Favre)在《示威》一书第五页中,把示威定义为“在公共场所组织起来的旨在通过和平表达意见和要求而达到政治结果的集体运动”。但请注意,直到 19 世纪末,法国字典才将“示威”作为一个简单名词,尽管示威早已普遍被采用。
- ⑫ 历史学家特德·马格丹写道:“在拿起武器反对政府时,他们似乎致力于一种集体行动固有的暴力形式……但这种形式作为军事力量手段,”他继续写道,“必然不敌法国军队。”参见 Ted Margadant,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p. 267。
- ⑬ 该部分总结了作者的一篇论文,参见 Traugott, e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Between Movements of Madness and the Repertoire of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 ⑭ 以下论述的详细发展可参见 Sidney Tarrow, “‘The Very Excess of Democracy’: State Building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America”。

七 构造斗争

感谢阿明扎德、安德森、布拉特、布鲁明、伯内曼、盖姆森、亨特、卡赞斯坦、克尔泽、拉巴、莱廷、摩西、斯诺、托马斯和我已故的朋友怀尔达夫斯基对本章初稿的评论。

- ① 引自 Archives Nationales, III Isère 9, Correspondance, 1789—1853。转引自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52。
- ② 关于法国大革命中的节日的最透彻研究, 参见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关于圣母、自由女神和共和之象征的研究, 参见 Maurice Agulhon, *Marianne au combat*; 乔治·摩西第一个暗示了象征符号对大众政治未来的重要性, 参见 George Moss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1975。
- ③ 这种结构主义的最新版本可参见 Ron Eyerman and Andrew Jamison, *Social Movements: A Cognitive Approach*; William Gamson, *Talking Politics*; Bert Klaunderman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和 Alberto Melucci, *Challenging Codes*。此外, 还有下面将详细讨论的罗伯特·班福特和戴维·斯诺的著作。本书还把结构主义的观点运用到民族主义上,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关于结构主义的某些问题和详细论述, 可参见 Sidney Tarrow, “Mentalities, Political Cultur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 ④ 参见 Eyerman and Jamison, *Social Movements: A Cognitive Approach*; Laraña, Johnston, and Guasfield, eds., *New Social Movements*; Johnson and Klaundermans,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和 Morris and Mueller, eds., *Frontier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 ⑤ 关于他们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参见 Snow, Rochford, Worden, an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Snow and Benfo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和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Robert Benford, “Frame Disputes within the Disarmament Movement”; 及 Benford and Hunt, “Dramaturgy and Social Movements”。

- ⑥ 我的这些认识得感谢亚瑟·克莱因曼(Arthur Kleinman)在1997年6月举行的行为科学深入研究中心的“斗争政治研究小组”会议上的评论。
- ⑦ 例如,法国反移民法的运动经常通过向火车站,即维希政府把犹太人和其他人送往毒气室的地方,集体行进来唤起人们对流放的回忆。
- ⑧ 特别参见 Leila Rupp, “Imagined My Surprise”, 和 Barbara Ryan,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 ⑨ 我很感谢莎拉·苏尔(Sarah Soule)帮助我收集了下一节讨论所依据的资料。
- ⑩ 在很多方面,宗教和体育象征符号混合的典范是“守信者”,即20世纪90年代美国飞速发展的男子原教旨主义运动。有关报道可参见 Conason, Ross, and Kokorinos, “The Promised Keepers Are Coming”。
- ⑪ 我得感谢比尔·盖姆森在1997年6月的行为科学深入研究中心“斗争政治研究小组”会议上提出了这一点。可参见 Bill Gamson,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和 “Talking Politics”。
- ⑫ 媒体报道也会使运动的一个分支比另一个分支更能树立运动的公众形象。例如,范·朱农(Lesber van Zoonen)发现,由荷兰妇女运动造成的一系列公共事件,提出了三个主要方面的要素,几乎所有媒体来源都有这些要素的特点。这些“系统因素”形成了未来运动的公共身份认同的结构基础。
- ⑬ 但是与一些研究斗争的美国学者想的相反,这并不是美国的垄断:关于中国农村的“权利意识”的讨论,参见 Li and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 ⑭ 集体身份认同的部分讨论请参看 Alberto Melucci,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社会运动中的身份认同形成问题在社会运动领域的若干重要文集中居于核心,可参见 Johnston and Klandermans,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Larana, Johnston, and Gusfield, eds., *New Social Movements*; 和 Morris and Mueller, eds., *Frontier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 ⑮ 重要的是,1980年8月列宁造船厂大门口的木头十字架、教皇画像、琴斯托霍瓦的黑色圣母画像和波兰的戴王冠白鹰画像上方,飘扬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所有工厂的工人团结起来。”(Laba, *Roots of Solidarity*, p. 130)

八 动员结构和斗争政治

- ① 关于霍布斯鲍姆、皮文和克洛沃德的研究方法的比较,参见霍布斯鲍姆对皮文和

- 克洛沃德著作的有趣评论,及皮文和克洛沃德对此的反应。Hobsbawm,“The Left and the Crisis of Organization”;Piven an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 1979。
- ② 下一节的论述参见 Ted Margadant,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The Insurrection of 1851*, 该书是有关社会和政治历史理论化分析的范例。
- ③ 造反者声称:“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宣布,共和国总统违背宪法,人民不得不收回他们的权利。”(Margadant, *French Peasants*, p. 5)
- ④ 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形成,参见 Donald Blake, “Swedish Trade Unions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The Formative Years”;关于奥地利政党以及它与德国政党模式的关系,参见 Vincent Knapp, *Austrian Social Democracy, 1889—1914*, ch. 1;关于德国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社会民主发展的影响,参见 John Plamenatz, *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 pp. 317—329。
- ⑤ 关于这个不大为人理解的运动的基本资料,参见 Daniel Gué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rving Louis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及 James Joll, *The Anarchists*。
- ⑥ 在英国,到 19 世纪 70 年代,革命冲动已经基本消失,而主要倾向一种坚定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形式。在无政府主义让位于工团主义的地方,如法国,结果产生了毫无生气的工运中心主义思想——一种认为革命会从工人阶级的健康本能中产生的信念。
- ⑦ 然而,成长最快的类型是权力最集中的类型:宗教圣会联盟。以“信仰”为基础的社团组织通过良好组织的“网络”,在全国范围内联系起来,能比其他类型的社团组织更有效地使成员获得组织力量、传播技能和效率感,并建立起跨种族的联盟 (Swartz 1997:2)。
- ⑧ 注意,有人发现,基金会的支持并不与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民权运动最汹涌澎湃的阶段同步,而与最制度化、最温和的阶段同步,参见 Jenkins and Eckert, “Channelling Black Insurgency”。
- ⑨ 根据汉斯皮特·克瑞埃西对四个欧洲民主国家中新社会运动组织的研究(1996),有证据表明,新的运动组织现在的成员比以往少。克瑞埃西发现,除绿色和平组 225 织外,1965 年以后创立的组织的成员都比此前创立的组织的成员少(p. 172)。
- ⑩ 不过,普特南的经验研究的核心是在意大利。他和其合作者在意大利以社会资本概念为基础,发表了一部巨著,即 Robert Putnam,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 ① 这方面的观察要感谢汉斯皮特·克瑞埃西。
- ② 例如,荷兰反巡航导弹委员会在一系列国内和平示威中,除联合了最大的工会联盟组织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左翼政党外,至少还联合了十个重大和平组织。参见 Rochon, *Mobilizing for Peace*, pp. 79—80; Schennink, “From Peace Week to Peace-Work”; Robert Kleidman, “Organization and Coalitions in the Cycles of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及 Robert Kleidman, *Organizing for Peace: Neutrality, the Test-Ban and the Freeze*。
- ③ 国民阵线为斯特拉斯堡市召开了国民会议,而斯特拉斯堡市的社会主义市长则和一个全国性组织联盟,在幕后支持大型的反法西斯示威。参见《世界报》,1997年3月31日。我要感谢乔纳森·劳伦斯为我提供了关于示威的数据。

九 斗争周期

本章得益于戈德斯通和蒂利的意见。另外也得益于 Doug McAdam, “‘Initiator’ and ‘Spin-off’ Movements: Diffusion Processes in Protest Cycles”。

- ① 关于运用“因果类推”方法计划的最初陈述,参见 Charles Tilly, “Kings in Beggar’s Raiment”; 关于常见方法,参见 Jack Goldstone,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On the Evolution and Forms of Collective Action”。我很感谢戈德斯通允许我引用他尚未出版的作品,同时谢谢他对本章草稿提出的意见。
- ② 杰克·戈德斯通认为,“在现存政权和政策令人不满的地方,抗议会得到高度支持。在这种条件下,抗议运动的出现和国家对它的和缓应对可能鼓舞其他人……结果会导致全社会范围的抗议。”(1997:21)我和戈德斯通的观点相似,只是“国家和缓应对”这个术语的意义尚不明确。国家的应对可能是和缓的,但辨别一个斗争周期的开始,得看运动要求被其他要求同化的情况——而其他要求往往是拒绝考虑运动要求的结果。
- ③ 文中的概述反映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历,并已在东欧和前苏联近期的经历中得到延伸。这幅图画是否或在哪些方面与其他制度和其他历史时期的集体行动浪潮相似,将由其他学者研究决定。关于与这里论述的概念相连的一系列经验调查,请参见 Marc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 ④ 杰克·戈德斯通指出了另一个事例:1640年的英国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基本团

结的议会和乡绅在是否要对国王采取极端措施的问题上分裂为保皇派和议会派。

- ⑤ 此处的描述参见 Craig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ch. 2 pp. 183—185。
- ⑥ 但更僵化的独裁主义,如伊朗国王政权的灭亡是其镇压模式的结果,它“对经济、宗教和专业精英不加区分的镇压,导致形成一个反国王的全国性跨阶级联盟”(Goldstone 1997:20)。
- ⑦ 以下部分总结了 Soule and Tarrow, “Acting Collectively, 1847—1849: How the Repertoires of Collective Action Changed and Where It Happened”。我很感谢苏尔与我一起分析该部分所依据的数据,并对本章草稿提出了意见。
- ⑧ 关于欧洲各国革命起源的主要背景的调查,参见 Roger Price, *The Revolution of 1848*, 及书后所提供的很好的基本文献目录。
- ⑨ 总的来说,在苏格兰主要存在着宗教分裂,在奥地利之外的哈布斯堡帝国主要存在着种族和民族主义分子的分裂,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主要存在着政治代表问题。民族问题从罗马和两个西西里岛王国的自由改革鼓动开始;仅在它北移到哈布斯堡王朝控制地区时,才染上民族主义的色调。在法国和德国,尽管在起义早期出现了粮食风潮,最重大的冲突却是关于代表制和工人权利的问题。
- ⑩ 马克思曾写道:“资产阶级革命,如 18 世纪革命那样,迅速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不久就到达革命顶峰,随后整个社会却遭到长期狂暴的压制……无产阶级革命……不断自我反省,在发展的道路上连续自我中断,又回到显然已经取得成就之处重新开始。”(Marx, *Eighteenth Brumaire*, p. 19, 1963)
- ⑪ 戈德肖没有提供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信息(除丹麦和普鲁士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短小战争);也没有提供关于希腊、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信息。关于戈德肖提供的资料和提出的问题的更详细分析,参见 Soule and Tarrow, “Acting Collectively”。
- ⑫ 在此处我们必须谨慎,因为戈德肖用的术语“示威”可能缺少我们如今所说的集体行动形式的特点,而像皮埃尔·法夫雷在《示威》一书第五页中定义的那样,是“在公共场所组织起来的旨在通过和平表达意见和要求而达到政治结果的集体运动”。
- ⑬ 关于法国的“事件”,参见 Jacques Capdevielle and René Mouriaux, *Mai 68: L'entre-deux de la modernité*; Mouriaux, ed., 1968: *Exploration du Mai français*; 关于意大利的情况,参见 Peppino Ortoleva, *Saggio sui movimenti del 1968 in Europa e in America*, ; 及 Sidney 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ch. 6。从经济政策方面

227 对法国和意大利事件结果进行比较的研究,可参见 Michele Salvati, "May 1968 and the Hot Autumn of 1969: The Responses of Two Ruling Classes".

- ⑭ 关于这一时期对美国最深刻的反省可参见 Todd Gitlin, *The Sixties*; 及 James Miller, *Democracy Is in the Streets*。
- ⑮ 以下部分内容大多来自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Toward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Revolution".
- ⑯ 但戈德斯通在 1997 年的著作中,对那种把革命和社会运动分开来分析的传统进行了重大挑战。
- ⑰ 蒂利详细说明了有一个以上的竞争者争夺权力,并且每个竞争者都有人支持的情况。一些政权崩溃时,它们在社会中几乎得不到任何潜在群体的支持——就如表面强大的伊朗国王可耻地出逃,是因为他几乎没有人支持。我很感谢戈德斯通向我指出了这一点。
- ⑱ 参见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Toward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十 争取改革

- ① 如果我们再加上非政策目标,如个人改变和运动稳定性,成功的因素就更多了,并且马克斯和伍德得出“对社会运动结果的系统研究没有对导致运动的先决条件的研究深入”的结论的原因,也一目了然。参见 Marx and Wood, "Strand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Collective Behavior", p. 405。
- ② 参见 Taft and Ross 1969; Snyder and Kelly 1976; Shorter and Tilly 1971; Conell 1978; 及 Giugni 1994。
- ③ 在对瑞士和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比较研究中,李·安·巴纳萨克(Lee Ann Banazak 1996)坚持把价值和信仰作为解释两场运动成败差异的首要因素,并怀疑机遇的重要性(她很少谈到限制因素)。“我们必须,”她说道,“超越政治机遇结构,并检验关于群体价值和信仰如何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理论,以及关于感知,尤其是影响行动的感知,如何发展的理论。”(p. 32)但如果瑞士妇女的价值观和感知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运动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p. 217),可能她们所感知的正是巴纳萨克的证据显示的极其没有指望的机遇结构。
- ④ 盖姆森的论著《社会抗议的策略》(*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是分析有利于运动成功的运动内部因素的基本起点。在盖姆森研究著作发表后出现的许多论著

中,有些支持盖姆森的发现,有些则反对盖姆森的发现,还有些得出了与盖姆森不同的结论。对盖姆森研究发表后的回响和批评的全面回顾,参见 Marco G. Giugni, "Outcomes of Social Movement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1994)。 228

- ⑤ 吉尼在后期作品中总结了这些发现、回响和修正(Giugni 1994:9—13)。
- ⑥ 特别是,谢卡特和布洛克发现,从前的抗议者持有“更开明的政治倾向,更多地与自由政党和活动结盟;在‘新阶层’中选择所从事的活动;更有文化;传统宗教倾向较少;与宗教组织的联系较少;结婚较迟,不大愿意生育”(Sherkat and Blocker 1997:1050)。
- ⑦ 参见 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ch. 11。该发现根据的是很少几个例子,以致无法提供数据,但职业边缘化问题对接受采访的大多数前运动领导人都是如此。
- ⑧ 这个小标题的第一部分与麦克亚当《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pp. 213—219)中的内容相同,但这个标题太好,以致不得不借用。
- ⑨ 以下部分总结了本人的一篇文章,参见 Tarrow, "Social Protest and Policy Reform: May 1968 and the Loi d'Orientation in France"。
- ⑩ 参见 Jacques F. Fomerand, "Policy Formulation and Change in Gaullist France: The 1968 Orientation Act of Higher Education"。
- ⑪ 由于更多女权主义学者关注的是意识,组织问题便成为妇女运动研究的薄弱点——这也许反映了运动本身对话语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强调。不过,对组织尤其是非正式运动网络的研究正在增多,例如 Anne Costain, *Inviting Women's Rebellion*, ch. 3;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eds., *Feminist Organization: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Mary Katzenstein, "Feminism with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Jane Mansbridge, *Why We Lost the ERA*, chs. 12—13; 以及 Suzanne Staggenborg, *The Pro-Choice Movement*。
- ⑫ 这部分依据的是我的一篇论文,参见 Traugott, e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Between Movements of Madness and the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Repertoire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十一 跨国斗争

本章的早期版本参见 M. Hanagan, L. Page Moch, and W. te Brake, eds., *Challenging Authority: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1998), ch. 15。

- ① 有关罢工的更详细分析,参见 Imig and Tarrow, "From Strike to Eurostrike: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EuroPolity".
- ② 至于谁创造了“欧洲抗议”这个术语还有待调查。据目前所知,它最早出现在 1997 年 3 月 19 日法国《世界报》的第 24 页上。这个术语没有出现在路透社的新闻电讯中,但在 1997 年 3 月 11 日,路透社引用了一个称那天的游行为“泛欧游行”的法国工会发言人的讲话。
- 229 ③ 当施韦泽声称他将与在该公司巴黎总部的雷诺劳资联合委员会会晤时,80 辆汽车载着 3000 名身穿红绿相间工会夹克的工人,护送代表来到巴黎,并号召团结起来罢工(*Reuters*, 1997 年 3 月 11 日;《世界报》,1997 年 3 月 3 日)。比利时工人接着在 3 月 13 日采取惊人的“突击行动”,越过在杜埃的雷诺工厂界限。
- ④ 这些数据正好将“社会措施”与因雷诺公司放弃对工厂的投资造成的价值损失相结合。但朱佩的策略足以瓦解联盟者。
- ⑤ 史密斯的分析根据的是《国际组织年鉴》,该年鉴用联合国关于非政府组织的记录、自我报道、介绍和媒体来确定组织。史密斯还标记了“所有其基本目标包含某种社会变化形式(根据广义定义)的非政府组织”。参见 Smith, Chatfield, and Pagnucco, ed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Transnational Movement Sector", *Transnational Movements and World Politics*, pp. 45—46, 1997.
- ⑥ 我们对西方和平运动的研究成果丰富(参见 Kleidman 1993, Meyer 1990, Rochon 1988, 以及 Meyer and Rochon 1997),而我们在将宗教作为一种跨国界运动进行研究方面则成果很少,除了埃克尔曼、凯恩、莱文和斯托等少数研究者的论述,可参见 Susanne Rudolf and James Piscatori, *Transnational Religion and Fading States*.
- ⑦ 三种典型的研究追溯了东欧劳工运动经验向新大陆的转移。关于向美国的转移,参见 Isaac Hourwich, *Immigration and Labor*, 1969;关于阿根廷劳工运动中的移民影响,参见 Campo 1973;关于智利劳工运动,参见 Ansell 1972。
- ⑧ 我认为,即使凯克和斯金克对“网络”的定义来自讨论国内网络的 J. 克莱德·米切尔(J. Clyde Mitchell 1973:23),这一点仍然不变。把社会网络分析运用到社会运动研究上的最佳事例,可参见 Mario Diani, *Green Networks*。
- ⑨ 我很感谢凯克和斯金克教授允许我参考她们尚未发表的作品,凯克教授还给本章及前面几章提出了宝贵意见。

结论:社会运动的未来

- ① 即使在法国人欢庆时,他们也在埋葬 1789 年的革命。参见 Kaplan, *Adieu 1789*。

该书把 200 年的纪念当作为法国大革命送葬的庆典,因为弗朗索瓦·密特朗成了国王总统,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富雷(Francois Furet)成了总监。

- ② 即使在意大利,由于远离世界共产主义的边缘,意大利共产党直到 1989 年都很难辨认,因为政党领导人拒绝使用锤与镰刀作党标,并将党名改为左翼民主党。关于这种变化,可参见 Stephen Hellman, "Italian Communism in the First Republic"。
- ③ 这一节和下一节的大部分论述,以及一些报道数据,来自 David Meyer and Sidney 230
Tarrow, eds., *A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 ④ 法国例外,既因为新社会运动行动的“周期”早已在克瑞埃西所研究的 15 年中到来,也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政府领导许多运动组织进行的合作,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抗议斗争全面减少。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研究,参见 Jan Willem Duyvendak, *Le Poids de Politique*。
- ⑤ 这些发现来自迪特·鲁希特领导下的研究结果。参见 Dieter Rucht, "The Structure and Culture of Collective Protest"。鲁希特在此文中指出,他发现示威的、对立的和暴力的抗议形式在 20 世纪 50—80 年代西德的和平运动中日渐增多。 231

参考文献

- Ackerman, Peter, and Christopher Kruegler (1994).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 Agnew, John, ed. (1997). *Political Geography: A Reader*. London: Arnold.
- Agulhon, Maurice (1979). *Marianne au combat: L'imagerie et la symbolique républicaines de 1789 à 1880*. Paris: Flammarion.
- (1982). *The Republic in the Village: The People of the Var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Republic*.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insky, Saul (1971). *Rules for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 Allardt, Erik (1962). "Community Activity, Leisure Use and Social Structure," *Acta Sociologica* 6:67—82.
- Amenta, Edwin, Bruce G. Caruthers, and Yvonne Zylan (1992). "A Hero for the Aged? The Townsend Movement, the Political Mediation Model, and U. S. Old-Age Policy, 1934—195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308—339.
- Aminzade, Ronald (1981).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Study of Mid-Nineteenth-Century Toulouse, Fra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1993a). *Ballots and Barricades: Class Formation and Republican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8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lass Form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8:79—106.
- Anderson, Benedict (1990). "Language, Fantasy, Revolution: Java, 1900—1945,"

- Prisma* 50:25—39.
-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rev. ed. London: Verso.
- (1992).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World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Identity Politics,"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msterdam, Netherlands.
- Anderson, Eugene N. , and Pauline R. Anderson (196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sell, Alan (1972). *Politics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in Chi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pter, David E. , ed. (1964).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 Aptheker, Herbert (1989). *Abolitionism: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 Ardant, Gabriel (1975). "Finan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 in Charles Tilly, ed.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64—242.
- Badie, Bertrand (1976). *Stratégie de la Grèv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1997). "Le jeu triangulaire," in Pierre Birnbaum, ed. , *Sociologie des nationalism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p. 447—462.
- Bailyn, Bernard (1967).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naszak, Lee Ann (1996). *Why Movements Succeed or Fail: Opportunity, Culture, and the Struggle for Woman Suffr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rkan, Steven E. (1984). "Legal Control of the South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552—565.
- Beissinger, Mark (1996). "How Nationalism Spread: Eastern Europe Adrift," *Social Research* 63:97—145.
- (1998). "Event Analysi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Protest Mobiliz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Dieter Rucht, Ruud Koopmans, and Friedhelm Neidhardt, eds. , *Acts of Dissent: The Study of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

cies. Berlin: Sigma.

- Beloff, Max (1963). *Public Order and Popular Disturbances, 1660—1714*.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 Benford, Robert D. (1993). "Frame Disputes within the Disarmament Movement," *Social Forces* 71:677—701.
- Benford, Robert D., and Scott A. Hunt (1992). "Dramaturgy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ower," *Sociological Inquiry* 62:36—55.
- Bensel, Richard (1990). *Yankee Leviathan: The Origins of Central State Authority in America, 1859—18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cé, Yves-Marie (1990).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erejikian, Jeffrey (1992).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649—657.
- Bermeo, Nancy (1997). "Myths of Moderation.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du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27:305—322.
- Bevilacqua, Piero (1980). *Campagne del mezzogiorno tra fascismo e dopoguerra*. Turin: G. Einaudi.
- Blake, Donald (1960). "Swedish Trade Unions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The Formative Years,"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19—44.
- Bloch, Marc (1931).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Paris: Armand Colin.
- Blocker, Jack S., Jr. (1989).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s: Cycles of Refor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 Blom Amélie (1997). "Mobilisation et mondialisation des communications: La protestation contre *Les versets sataniques*." unpublished paper, Paris.
- Bob, Clifford (1997). "The Marketing of Rebellion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Insurgencies,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the Growth of Transnational Support." Ph.D.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Bobbio, Luigi (1979). *Lotta continua: Storia di una organizzazione rivoluzionaria*. Roma: Savelli.
- Bonnell, Victoria (1983).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dreau, Vincent (1996). "Northern Theory, Southern Protest: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alysis in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Mobilization* 1:175—189.
- Boyte, Harry C. (1980). *The Backyard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rand, Karl-Werner (1990). "Cyclical Aspects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Waves of Cultural Criticism and Mobilization Cycles of New Middle-class Radicalism," in Russell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eds.,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42.
- Brewer, John (1976).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The Sineu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Knopf.
- Bridges, Amy (1986). "Becoming American: The Working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57—196.
- Bridgford, Jeff (1989). "The Events of May: Consequences for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France," in D. L. Hanley and A. P. Kerr, eds., *May '68: Coming of Age*. London: Macmillan, pp. 100—116.
- Bright, Charles C. (1984). "The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121—158.
- Bright, Charles, and Susan Harding, eds. (1984).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rinton, Crane (1965).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 Brockett, Charles D. (1991).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3:253—274.
- (1995). "A Protest-Cycle Resolution of the Repression/Popular-Protest Paradox,"

in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17—144.

Brown, Richard D. (1970).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Massachusetts: The Boston 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 and the Towns, 1772—177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Knowledge Is Power: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Bruneteaux, Patrick (1996). *Maintenir l'ordre.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violence d'Etat en régime démocratiqu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Brysk, Alison (1994). "Acting Globally: Indi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in Donna Lee Van Cott, ed., *Indigenous People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p. 29—51.

Buechler, Steven M. (198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The Case of Illinois, 1850—1920*.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unce, Valerie (1984—1985).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from a Soviet Asset to a Soviet Li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1—46.

(1991). "Democracy, Stalinism and the Management of Uncertainty," in Gyorgy Szoboszlai, ed.,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Budapest: Hungar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p. 138—164.

(forthcoming).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stein, Paul (1985). *Discrimination, Jobs, and 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Equal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Interest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Anne Costain and Andrew McFarland,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oulder, Colo.: Rowland and Littlefield, ch. 3.

Burstein, Paul, Rachel L. Einwohner, and Jocelyn A. Hollander (1991). "The Succes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A Bargaining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Bushnell, John (1990). *Moscow Graffiti: Language and Sub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 Calhoun, Craig (1982).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4a).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4b).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C.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pp. 9—36.
-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73—216.
- Calvino, Italo (1985). *Il barone rampante*. Milan: Garzanti.
- Capdevielle, Jacques, and René Mouriaux (1988). *Mai 68: L'entre-deux de la modernité*.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Cardon, Dominique, and Jean-Philippe Huertin (1991). "Tenir les rangs. ' Les services d'encadrement des manifestations ouvrières (1909—1936)," in Pierre Favre, ed., *La manifestation*.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pp. 123—155.
- Castells, Manuel (1994). "European Citie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ew Left Review*, 204:18—32.
- (1997).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2,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Censer, Jack R., and Jeremy D. Popkin, eds. (1987). *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erny, Philip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595.
- Chamberlin, John (1974). "Provision of Collective Goods as a Function of Group Siz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707—716.
- Champagne, Patrick (1996). *Maintenir l'ordre: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violence d'Etat en régime démocratiqu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Charlesworth, Andrew (1983). *An Atlas of Rural Protest in Britain, 1548—19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hartier, Roger (1987).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1).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ong, Dennis (1991).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ristie, Ian (1982). *Wilkes, Wyvill and Reform: The Parliamentary Reform Movement in British Politics, 1760—1785*. London: Macmillan.
- Collier, Ruth (1997). "Between Elite Negotiation and Working-Class Triumph: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unpublished book manuscript.
- Conason, Joe, Alfred Ross, and Lee Cokorinos (1996). "The Promise Keepers Are Coming: The Third Wav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Nation*, October 7, pp. 11—19.
- Conell, Carol (1978). "Was Holding Out the Key to Winning Strikes? Massachusetts, 1881—1894," Center for Research on Social Organization Working Paper No. 187. Ann Arbor, Mich.
- Corbin, Alain (1994). "L'impossible présence du roi: Fêtes politiques et mises en scène du pouvoir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in A. Corbin, N. Gêrôme, and D. Tartakowsky, eds., *Les usages politiques des fêtes aux XIX—XX siècles*.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p. 77—116.
- Corbin, Alain, N. Gêrôme, and D. Tartakowsky, eds. (1994). *Les usages politiques des fêtes aux XIX—XX siècles*.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 Cortright, David, and Ron Pagnucco (1997). "Limits to Transnationalism: The 1980s Freeze Campaign," in Jackie Smith, Charles Chatfield, and Ron Pagnucco,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World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ch. 9.
- Costain, Anne N. (1992). *Inviting Women's Rebellion: A Political Proce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ostain, Anne N., and W. Douglas Costain (1987).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the

- Women'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Mary F. Katzenstein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Public Poli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196—214.
- Costain, Anne N., and Andrew McFarland, eds. (1998). *Social Move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ott, Nancy (1977). *The Bonds of Woman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ountryman, Edward (1981). *A People in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New York, 1760—179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ourty, Guillaume (1993). "Barrer, filtrer, encombrer: Les routiers et l'art de retenir ses semblables," *Projet*, no. 235 (fall): 143—168.
- Cross, Whitney R. (1982). *The Burned-Over District: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nthusiastic Religion in Western New York, 1800—1850*.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rozat, Matthew (1998). "Are the Times A-Changing? Assessing the Acceptance of Protest in Western Democracies," in David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 2.
- Crozier, Michel (1967).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0). *The Stalled Society*. New York: Viking.
- d'Anieri, Paul, Claire Ernst, and Elizabeth Kier (1990).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22:445—458.
- Dalton, Russell (1994). *The Green Rainbow: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Western Euro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Citizen Politic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2nd rev. ed. Chatham, N. J.: Chatham House.
- d'Anjou, Leo (1996). *Social Move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First Abolition Campaign Revisite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Darnton, Robert (1979).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Philosophy under the Cloak," in Robert Darnton and Daniel Roche, eds.,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7—49.
- Davis, John A. (1988). *Conflict and Control: Law and Order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y*.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 Davis, Natalie (1973). "The Rites of Violence: Religious Rio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59:51—91.
- Dawes, Robyn M., Anthony J.C. Van de Kragt, and John M. Orbell (1988). "Not Me or Thee but We: The Importance of Group Identity in Eliciting Cooperation in Dilemma Situations: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s," *Acta Psychologica* 68: 83—97.
- de Baecque, Antoine (1989). "Pamphlets: Libel and Political Mythology," in Robert Darnton and Daniel Roche, eds.,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65—176.
- del Campo, Hugo (1973). *Los orígenes del movimiento obrero argentino.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25.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 della Porta, Donatella (1990). *Organizzazioni politiche clandestine. Il terrorismo di sinistra in Italia durante gli anni Sessanta*. Bologna: Il Mulino.
- (1995).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tate: Thoughts on the Policing of Protest,"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2—92.
- della Porta, Donatella, Olivier Fillieule, and Herbert Rieter (1998). "Policing Protest in France and Italy: From Intimidation to Cooperation?" in David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 5.

-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Herbert Rieter, eds. (1997). *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Sidney Tarrow (1986). "Unwanted Childre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Cycle of Protest in Italy, 1966—1973,"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4:607—632.
- d'Emilio, John (1992). *Making Trouble: Essays on Gay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Routledge.
- Diamanti, Ilvo (1993). *La Lega: Geografia, storia e sociologia di un nuovo soggetto politico*. Rome: Donzelli.
- Diani, Mario (1995). *Green Networks: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tali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1996). "Linking Mobilization Frames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sights from Regional Populism in Ital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1053—1069.
- (1997).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Capital: A Network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 Outcomes,"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Glasgow.
- Drescher, Seymour (1982).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British Colonial Slavery," in James Walvin, ed., *Slavery and British Society, 1776—1846*.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22—48.
- (1987). *Capitalism and Antislavery: British Mobil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British Way, French Way: Opinion Building and Revolution in the Second French Slave Emancip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709—734
- (1994). "Whose Abolition? Popular Pressure and the Ending of the British Slave Trade," *Past and Present*, no. 143:136—166.
- Durkheim, Emile (1951).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Duyvendak, Jan Willem (1994). *Le poids du politique: Nouveaux mouvements sociaux en France*. Paris: L'Harmattan.
- Egret, Jean (1977). *The French Pre-revolution, 1787—178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ikelman, Dale F. (1997). "Trans-state Islam and Security," in Susanne Rudolf and James Piscatori, eds., *Transnational Religion and Fading Stat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p. 27—46.
- Eisenstein, Elizabeth (1986). "Revolution and the Printed Word," in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 eds., *Revolution i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86—205.
- Eisenstein, Zillah (1996). *Hatreds: Racialized and Sexualized Conflict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 Eisinger, Peter K.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11—28.
- Elias, Norbert (1994).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 Ernst, Claire (1997). "Americans in Paris. Act Up—Paris and Identity Politics," *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preparation.
- Esherick, Joseph W.,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1990). "Acting Out Democrac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835—865.
- Evans, Peter B.,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Sara M. (1980). *Personal Politics: The Root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New Left*. New York: Vintage.
- Evans, Sara M. and Harry C. Boyte (1992). *Free Spaces: The Sources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yerman, Ron, and Andrew Jamison (1991). *Social Movements: A Cognitive Approach*.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 Fantasia, Rick (1988). *Cultures of Solidarity: Consciousness, Actio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rk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vre, Pierre, ed. (1990). *La manifestation*.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Fendrich, James M., and Ellis S. Krauss (1978). "Student Activism and Adult Left-wing Politics: A Causal Model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for Black, White and Japanese Students of the 1960s Generation," in L. Kriesberg, e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vol. 1. Greenwich, Conn.: JAI,

- pp. 231—255.
- Ferree, Myra Marx,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eds. (1995). *Feminist Organization: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Fillieule, Olivier (1997). *Stratégies de la rue: Les manifestations en Franc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Finer, Samuel E. (1975). "State-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84—163.
- Finnemore, Martha (1996). "Norms,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Insights from Sociology's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565—598.
- Fireman, Bruce, and William A. Gamson (1979). "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p. 8—44.
- Fish, M. Steven (1995). *Democracy from Scratch: Opposition and Regime in the New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omerand, Jacques (1975). "Policy Formulation and Change in Gaullist France. The 1968 Orientation Act of Higher Educ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8:59—89.
- Foran, John (1993).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 Foucault, Michel (1972).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 Franzosi, Roberto (1989). "From Words to Numbers: A Generalized and Linguistics-Based Coding Procedure for Collective Event-Data from Newspaper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263—298.
- Fraser, Antonia (1996). *The Gunpowder Plot: Terror and Faith in 1605*.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Freeman, Jo (1987). "Whom You Know versus Whom You Represent: Feminist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ry Fainsod Katzenstein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Conscious-*

ness,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Public Poli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215—244.

Furet, François (1981).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gnon, V.P. (1994). "Serbia's Road to War," in L. Diamond and M. Plattner, eds., *Nationalism,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117—131.

Gamson, William (1988).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Conn.: JAI, pp. 219—244.

(1990).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2nd rev.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92a).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53—76.

(1992b).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mson, William, Bruce Fireman, and Steven Rytina (1982). *Encounters with Unjust Authority*.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Gamson, William, and David Meyer (1996). "The Framing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75—290.

Ganley, Gladys (1992). *The Exploding Political Power of Personal Media*. Norwood, N.J.: Ablex.

Gans, Herbert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the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Garner, Roberta Ash (1994). "Transnational Movements in Postmodern Society," *Peace Review* 6:427—433.

Garner, Roberta Ash, and Mayer N. Zald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Movement Sectors," in Gerald Suttles and Mayer N. Zald, eds., *The Chal-*

- lenge of Social Control: Citizenship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Modern Society. Essays in Honor of Morris Janowitz.* Norwood, N. J.: Ablex, pp. 119—145.
- Garton, Ash, Timothy (1984). *The Polish Revolution.* New York: Scribner.
- (1990).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97). "In the Serbian Soup,"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24, pp. 25—30.
- Geary, Roger (1985). *Policing Industrial Disputes: 1893—18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lb, Joyce (1987). "Social Movement Succ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Mary F. Katzenstein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ern Europe: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Public Poli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267—289.
- Gerhards, Jürgen, and Dieter Rucht (1992). "Mesomobilization: Organizing and Framing in Two Protest Campaigns in West Germa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555—596.
- Gerlach, Luther P., and Virginia H. Hine (1970). *People, Power, Change: Movement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7).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1995). *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 Why America Is Wracked by Culture War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 Giugni, Marco G. (1994). "The Outcomes of Social Movement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Working Paper No. 197. New York: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1997). "Was It Worth the Effort: The Outcom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 unpublished pape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

cial Research.

- Giugni, Marco,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eds. (1998). *How Movements Matt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lenn, John K., III (1997). "Citizens in Theatres: Framing Competition and the Velvet Revolution in Czechoslovakia, 1989," unpublished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Godechot, Jacques (1971). *Les révolutions de 1848*. Paris: Albin Michel.
- ed. (1966). *La presse ouvrière, 1819—1850*.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en, Miriam A. (1997). *Heroic Defeats: The Politics of Job L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one, Jack A. (1980). "The Weakness of Organization: A New Look at Gansson's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1017—1042
- (1991).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7).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On the Evolution and Forms of Collective Action,"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 Goldstone, Jack A., Ted R. Gurr, and Farrokh Moshiri, eds. (1991). *Revolutions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 Goodwin, Albert (1979). *The Friends of Liberty: The English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ody, Jack, ed. (1968).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uld, Roger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uldner, Alvin W. (1975—1976). "Prologue to a Theory of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Telos* 26:3—36.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1380.
- Green, John C. (1995).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the 1994 Election: A View from the State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5—8.
- Grew, Raymond (1984). "Th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State," 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83—120.
- Griffin, Clifford S. (1960). *Their Brothers' Keepers: Moral Steward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5*.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Guérin, Daniel (1970).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urr, Ted R. (1971).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0). "On the Outcomes of Violent Conflict," in Gurr,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pp. 238—294.
- (1989). "Political Terrorism: Historical Anteceden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in Gurr, ed., *Violence in America*. vol. 2, *Protest, Rebellion, Reform*.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p. 201—230.
- Habermas, Jürgen (1981). "New Social Movements." *Telos* 49:33—37.
- Hamilton, Charles (1986). "Social Policy and the Welfare of Black Americans: From Rights to Resourc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1:239—255.
- Hanagan, Michael (1998).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Deterritorialized Migrants, and the State System: A Nineteenth-Century Case Study," in Marco 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eds., *How Movements Matt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nagan, Michael, Leslie Page Moch, and Wayne te Brake, eds. (1998). *Challenging Authority: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rdin, Russell (1982).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95). *One for All: The Logic of Group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Harrison, Carol (1996). "The Unsociable Frenchmen: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cqueville Review* 17:37—56.

Heberle, Rudolf (1951).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Hellman, Judith Adler (1987). *Journeys among Women: Feminism in Five Italian C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llman, Stephen (1975). "The PCI's Alliance Strategy and the Case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Donald L. M. Blackmer and Sidney Tarrow, eds., *Communism in Italy and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72—419.

(1988). *Italian Communism in Transi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 Compromise in Turin, 1975—198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talian Communism in the First Republic," in Stephen Gundel and Simon Parker, eds., *The New Italian Republic*. London: Routledge, pp. 71—84.

Hill, Stuart, and Donald Rothchild (1992). "The Impact of Regime on the Diffusion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M. Midlarsky, 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mmunal Strife*. London: Routledge, pp. 189—206.

Hirschman, Albert (1982).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ric J. (1959).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2).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4).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4). "Peasant Land Occupations," *Past and Present* 62: 120—152.

(1978). "The Left and the Crisi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3, pp. 3—5.

Hobsbawm, Eric J., and George Rudé (1975). *Captain Swing*. New York: Norton.

Hochschild, Arlie (1990). "Ideology and Emotion Management: A Perspective and Path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odore D. Kempet, ed., *Research Agendas*

-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117—132.
- Hoffer, Eric (1951).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Hoffmann, Stanley (1974). "The Ruled: Protest as a National Way of Life." in Hoffmann,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New York: Viking, pp. 114—144.
- Hollis, Patricia (1970). *The Pauper Press: A Study i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of the 1830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rowitz, Irving Lewis, ed. (1964).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 Hourwich, Isaac (1969). *Immigration and Labor: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Europe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rno.
- Hubrecht, Hubert G. (1990). "Le droit français de la manifestation," in P. Favre, ed., *La manifestation*.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pp. 181—206.
- Hunt, Lynn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Imig, Doug, and Sidney Tarrow (1996). "The Europeanization of Movements?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ctober 1983—March 1995,"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96.3.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 (1997). "From Strike to Eurostrike: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Euro-Polity,"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 Ingle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on, Jacques (1997). *La fin des militants?* Paris: Editions Ouvrières.
- Isserman, Maurice (1987). *If I Had a Hammer: The Decline of the Old Left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Left. New York: Basic Books.

- Jenkins, J. Craig, and Craig Eckert (1986). "Channelling Black Insurgency: Elite Patron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812—830.
- Jenkins, J. Craig, and Charles Perrow (1977).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Farm Worker Movements (1946—197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249—268.
- Johnson, Chalmers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Paul E. (1978).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Revivals in Rochester, New York, 1815—183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Johnston, Hank (1995). "A Methodology for Frame Analysis: From Discourse to Cognitive Schemata," in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217—246.
- Johnston, Hank,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1995).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Joll, James (1980). *The Anarchists*. 2n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afka, Franz (1937). *Parables and Paradoxes*. Translated by Ernst Kaiser et al. New York: Schocken.
- Kane, Ousmane (1997). "Muslim Missionaries and African States," in Susanne Rudolf and James Piscatori, eds., *Transnational Religion and Fading Stat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p. 47—62.
- Kaplan, Steven L. (1982). *The Famine Plot Persuas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2, Part 3.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1984). *Provisioning Paris: Merchants and Millers in the Grain and Flour Trad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3). *Adieu 1789*. Paris: Seuil.

- Katzenstein, Mary F. (1987). "Comparing the Feminist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An Overview," in Mary F. Katzenstein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Public Poli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3—20.
- (1990). "Feminism with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Unobtrusive Mobilization in the 1980s," *Signs* 16: 27—54.
- (1993). "The Spectacle as Political Resistance. Feminist and Gay/Lesbian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 *Minerva: Quarterly Report on Women in the Military* 11: 1—16.
- (1995). "Discursive Politics and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eds., *Feminist Organization: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35—52.
- (1998). *Faithful and Fearless: Moving Feminism into the Church and the Milita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Mary F.,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1987).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Public Poli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atznelson, Ira (1981).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Keck, Margaret E. (1995). "Social Equity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Brazil," *Comparative Politics* 27: 409—424.
- Keck, Margaret E., and Kathryn Sikkink (1995). "Transnational Issu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1998a).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8b).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in the Movement Society," in David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 10.
- Kennan, John (1986). "The Economics of Strikes," in Orley Ashenfelter and Richard

Layard,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2.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pp. 1091—1137.

Keniston, Kenneth (1968). *Young Radicals: Notes on Committed Yout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Kertzer, David (198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ielbowicz, Richard B., and Clifford Scherer (1986).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L. Kriesberg, e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Greenwich, Conn.: JAI, pp. 71—96.

Kitschelt, Herbert (1986).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57—85.

Klandermans, Bert (1988). "The Form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Consensus,"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Conn.: JAI, pp. 173—196.

(1989).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B. Klandermans, ed., *Organizing for Change: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2. Greenwich, Conn.: JAI, pp. 1—20.

(1997).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Oxford: Blackwell.

ed. (1989). *Organizing for Change: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2. Greenwich, Conn. JAI.

Klandermans, Bert, H. Kriesi, and S. Tarrow, eds. (1988).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Conn.: JAI.

Klandermans, Bert, Marlene Roefs, and Johan Olivier (1998). "A Movement Takes Office," in David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 8.

Klandermans, Bert, and Sidney Tarrow (1988). "Mobilization into Social Movements:

- Synthesiz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Conn.: JAI, pp. 1—38.
- Kleidman, Robert (1992). "Organizations and Coalitions in the Cycles of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unpublished paper,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 (1993). *Organizing for Peace: Neutrality, the Test Ban and the Freez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Klein, Ethel (1987). "The Diffusio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in M. F. Katzenstein and C. McClurg Mueller, eds.,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23—43.
- Knapp, Vincent (1980). *Austrian Social Democracy, 1889—1914*.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Kornhauser, William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Kowalewski, David (1989). "Global Debt Crises in Structural-Cyclical Perspective," in W. P. Avery and D. P. Rapkin, eds., *Markets. Politics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 Lynne Reiner, pp. 357—384.
- Kramnick, Isaac (1990). *Republicanism and Bourgeois Radic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1985). *Bewegung in der Schweizer Politik*. Frankfurt: Campus.
- (1991).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ts Impact on Their Mobilization," WZB Occasional Paper No. 91—103, Berlin: Wissenschaftszentrum.
- (1996).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a Political Context," in D. McAdam, J. McCarthy, and M.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52—184.
- Kriesi, Hanspeter, R. Koopmans, J. W. Duyvendak, and M. G. Giugni (1995) *The politics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and Dominique Wisler (1996). "Social Movements and Direct Democracy in Switzer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0: 19—40.
- Kubik, Jan (1994). *The Power of Symbols and the Symbols of Powe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 d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Central Europe," in David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 6.
- Kuran, Timur (1991).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in Nancy Bermeo, ed.,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7—48.
- Laba, Roman (1990).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oland's Working Class Democrat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itin, David (1988).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589—597.
- Lampe, John R. (1996). *Yugoslavia as History: Twice There Was a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e, Peter, Cynthia Irvin, and Sidney Tarrow (1989). "Phases of Mobiliza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since the 1960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5—42.
- Laraña, Enrique,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eds. (1994).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e Bon, Gustave (1977).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Penguin.
- Lefebvre, Georges (1967).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enin, V. I. (1929). *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Le Roy Ladourie, Emmanuel (1980). *Carnival in Romans*. New York: Brazillier.

- Levine, Daniel H. (1990). "Popular Groups,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Relig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 718—764.
- Levine, Daniel H., and David Stoll (1997).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Empowerment and Power," in Susanne Rudolf and James Piscatori, eds., *Transnational Religion and Fading Stat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p. 63—103.
- Li, Lianjiang, and Kevin J. O'Brien (1996).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22:28—61.
- Lichbach, Marc (1995). *The Rebel's Dilemm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Contentious Map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Mobilization* 1: 87—98.
- Lichterhan, Paul (1996).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Community: American Activists Reinventing Commit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ebaugh, Peter, and Marcus Rediker (1990).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and the Atlantic Working Cla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225—252.
- Lipsky, Michael (1968). "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1144—1158.
- Lipsky, Michael, and David Olson (1976). "The Processing of Racial Crisis in America," *Politics and Society* 6:79—103.
- Lockridge, Kenneth (1974). *Literacy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An Enquiry into the Social Context of Literacy in the Early Modern West*. New York: Norton.
- Lohmann, Susanne (1994). "The Dynamics of Information Cascades: The Monday Demonstrations in Leipzig, East Germany, 1989—1991," *World Politics* 47: 42—101.
- Lumley, Robert (1990). *States of Emergency: Cultures of Revolt in Italy from 1968 to 1978*. London: Verso.
- Lusebrink, Hans-Jürgen (1983). "L'imaginaire social et ses focalisations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à la fin du XVIII siècle," *Revue Roumaine d'Histoire* 22:371—383.
- Maier, Pauline (1970). "Popular Uprisings and Civil Authori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7:3—35.
- (1972).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 New York: Knopf.
- Mann, Patrice (1990). *L'activité tactique des manifestants et des forces mobiles lors des crises viticoles du midi, 1950—1990*.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 Mansbridge, Jane J. (1986). *Why We Lost the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gadant, Ted (1979).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The Insurrection of 185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koff, John (1996). *Waves of Democracy*.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1997).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easants, Lords, and legislato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arseille, Jacques, and Dominique Margairez (1989). *1790. Au jour le jour*. Paris: Albin Michel.
- Marwell, Gerald, and Pam Oliver (1993). *The Critical Mass in Collective Action: A Micro-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x, Gary, T., and Michael Useem (1971). "Majority Participation in Minority Movements: Civil Rights, Abolition, Untouchabil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7:81—104.
- Marx, Gary, T., and James L. Wood (1975). "Strand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Collective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63—428.
- Marx, Karl (1963a).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63b).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67). "Towards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in Loyd D. Easton and Kurt H. Guddat, eds.,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New York: Doubleday, pp. 249—264.
- Mathews, Donald G. (1969).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as an Organizing Process, 1780—1830," *American Quarterly* 21:23—43.
- Maza, Sarah (1993).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Affairs: The Causes Célèbre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zey, Sonia, and Jeremy Richardson (1993). *Lobby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

- 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1982).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3). "T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ace of Insurg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735—754.
- (1986). "Recruitment to High 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64—90.
- (1988). *Freedom Sum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Initiator' and 'Spin-off' Movements: Diffusion Processes in Protest Cycles," in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17—240.
- (1996).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3—40.
- (1998). "On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Domestic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Anne N. Costain and Andrew McFarland,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oulder, Co.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 14.
-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and Dieter Rucht (1993). "The Cross-National Diffusion of Movement Idea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8: 56—74.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1996). "To Map Contentious Politics," *Mobilization* 1:17—34.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1997). "Toward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in Marc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Zuckerman, eds., *Ideal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Advancing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ohn D. (1987). "Pro-Life and Pro-Choice Mo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Deficits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p. 49—66.

(1997). “The Globalization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n J. Smith, C. Chatfield, and R. Pagnucco,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World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ch. 14.

McCarthy, John D., and Jim Castelli (1994). *Working for Justice: The Campaign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Poor Empowerment Group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Aspen Institute Nonprofit Sector Research Fund, Aspen, Colo.

McCarthy, John D., and Clark McPhail (1998).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 in the USA,” in David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n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 4.

McCarthy, John D., Clark McPhail, and David Schweinberger (1997). “Policing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Herbert Rieter, eds., *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cCarthy, John D., and Mark Wolfson (1992). “Consensus Movements, Conflict Movements and the Cooptation of Civic and State Infrastructures,” in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73—297.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73). “The Trend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nograph. Morristown, N. 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Also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87, pp. 337—392.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1241. Also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87, pp. 15—48.

McPhail, Clark (1991).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New York: Aldine De

- Gruyter.
- Melucci, Alberto (1988). "Getting Involved: Identity and Mobiliz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Conn.: JAI, pp. 329—348.
-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rshon, Carol A. (1900). "Generazioni di icader sindacali in fabbrica. L' eredità dell' autunno caldo," *Polis* 2:277—323.
- Meyer, David (1990). *A Winter of Discontent: The Nuclear Freeze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 Meyer, David, and Josh Gamson (1995).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Elites: Celebri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Inquiry* 65:181—206.
- Meyer, David, and Tom Rochon (1997). "Towards a Coalitional Theor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 Rochon and D. Meyer, eds., *Coalition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p. 237—251.
- Meyer, David, and Suzanne Staggenborg (1996). "Movements, Countermovement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1628—1660.
-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Meyer, David, and Nancy Whittier (1994). "Social Movement Spillover," *Social Problems* 41:277—298.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6). "World Societies and the Nation-State," unpublished paper,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Meyer, John W., David John Frank, Ann Hironaka, Evan Shofer, and Nancy Brandon Tuma (1997). "The Structuring of a World Environmental Regime, 1870—199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623—651.
- Michels, Robert (1962).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 Mikkelsen, Flemming (1996). "Conten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Denmark in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European Conference on Social Movements,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Bilbao, July.
- Miller, James (1987). *Democracy is in the Streets: From Port Huron to the Siege of Chicago*.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Minkoff, Debra C. (1994). "From Service Provision to Institutional Advocacy: The Shifting Legitimacy of Organizational Forms," *Social Forces* 72:943—969.
- (1997). "Producing Social Capital: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Civil Socie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 606—619.
- Mitchell, J. Clyde (1973).
"Networks,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n Jeremy Boissevain and J. Clyde Mitdneu, eds., *Network Analysis: Studies in Human Interaction* The Hague: Mouton pp. 15—36.
- Molotch, Havvey (1979). "Media and Movements,"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p. 71—93.
- Moore, Barrington, Jr. (1978).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White Plains, N. Y.: M. E. Sharpe.
- Moore, R. Lawrence (1994). *Selling God: American Religion in the Marketplace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Jane (1987). *Conflict and Order: The Police and Labor Disputes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0—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Aldon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New York: Free Press.
- Morris, Aldon,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1992).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R. J. (1983). "Voluntary Societies and British Urban Elites, 1780—1850: An Analysis," *Historical Journal* 26:95—118.
- Mosse, George (1975).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H. Fertig.

- Mouriaux, René, ed. (1992). 1968. *Exploration du Mai français*. 2 vols. Paris: Harmattan.
- Nelkin, Dorothy (1975).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echnical Expertis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5:35—54.
- Oberschall, Anthony (1996). "Opportunities and Framing in the Eastern European Revolts of 1989,"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3—121.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ffe, Claus (1990). "Reflections on the Institutional Self-Transformation of Movement Politics: A Tentative Stage Model," in Russell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eds.,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2—250.
- Oliver, Pam (1989). "Bringing the Crowd Back in: The Nonorganizational Element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Louis Kriesberg, e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11. Greenwich, Conn.: JAI, pp. 1—30.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Neil, Michael (1993). *The Roar of the Crowd: How Television and People Power Are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 Open University (1976). *Music and Revolution: Verdi*. London: Open University.
- Ortoleva, Peppino (1988). *Saggio sui movimenti del 1968 in Europa e in America*. Rome: Riuniti.
- Osa, Maryjane (1995). "Ecclesiastical Re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Geo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Religion in Poland,"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3: 193—209.
- (1998)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Labor Protest in Poland, 1989—1993,"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March.
- Ozouf, Mona (1988).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gnucco, Ron (1996). "Social Movement Dynamics du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 Synthesis of Political Process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ist Theories," *Research on Democracy and Society* 3:3—38.
- Pagnucco, Ron, and David Atwood (1994). "Global Strategies for Peace and Justice," *Peace Review* 6:411—418.
- Paige, Jeffrey M. (1975). *Agrarian Revolutions: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 Paine, Thomas (1989).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rcheron, Annick (1991). "La mémoire des générations: La guerre d'Algérie-Mai 68," in Olivier Duhamel and Jérôme Jaffré, eds., *SOFRES: L'état de l'opinion, 1991*. Paris: Seuil pp. 39—57.
- Perry, Elizabeth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tt-Rivers, Julian (1971). *The People of the Sierra*.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Cloward (1977).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93).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2nd ed. New York: Vintage.
- Pizzorno, Alessandro (1978). "Political Exchange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Industrial Conflict," in Colin Crouch and Alessandro Pizzorno, eds.,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vol. 2. London: Macmillan, pp. 277—298.
- Plamenatz, John (1954). *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Longmans, Green.
- Popkin, Jeremy D. (1989). "Journals: The New Face of News," in Robert Darnton and Daniel Roche, eds.,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41—164.
- Popkin, Sam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stgate, Raymond (1955). *The Story of a Year: 1848*. London: Cassell.

- Price, Richard (1997). "Reversing the Gunsights: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akes Aim at Landmines,"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Price, Roger (1989).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 Putnam, Robert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65—78.
- Putnam, Robert,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Quattrone, George A., and Amos Tversky (1988). "Contrasting R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719—736.
- Ramer Sabrina (1987). *The Soviet Rock Scene*. Washington, D. C.: Kenn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ussian Studies.
- Read, Donald (1964). *The English Provinces, c. 1760—1960: A Study in Influ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 Rihoux, Benoît (1997). "Mobilisations de parents de victimes et comités blancs," in N. Bornay, P. Lannoy, and L. Panafit, eds., in *La société indicible*. Brussels; Luc Pire, pp. 65—80.
- Risse, Thomas (1995). *Bringing Transnational Politic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isse, Thomas, and Hans Peter Schmitz (1995). "Principled Idea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Human Rights Area: Insights from African Cases,"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September.
- Risse, Thomas, and Kathryn Sikkink (1997). Introduction to T. Risse and K. Sikkink, eds., *The Soci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ces*.
- Robins, Kevin (1995). "Globalization," in Adam Kuper and Jessica Kuper (eds.),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London: Routledge, pp. 345—346.

- Rochon, Thomas R. (1988). *Mobilizing for Peace: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Culture Moves: Ideas, Activism, and Changing Valu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chon, Thomas R., and Daniel Mazmanian (1993).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8:75—87.
- Rochon, Thomas R., and David Meyer (1997). *Coalition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Rogers, Kim Lacy (1993). *Righteous Lives: Narratives of the New Orleans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Rosenau, James (1990).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nthal, Naomi B., and Michael Schwartz (1990). "Spontaneity and Democracy in Social Movements," in Bert Klandermans, ed., *Organizing for Change: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2. Greenwich, Conn.: JAI, pp. 33—59.
- Ross, Marc Howard (1997).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in Marc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 4.
- Roth, Guenther (1963).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A Study on Working-Class Isol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Totowa, N. J.: Bedminster.
- Rotondi, Clementina (1951). *Bibliografia dei periodici toscani, 1847—1852*. Florence: L. S. Olschki.
- Rucht, Dieter (1990). "Campaigns, Skirmishes and Battles: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the USA, France and West Germany," *Industrial Crisis Quarterly* 4: 193—222.
- (1991).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 Germany: Between Activ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Dieter Rucht, e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ankfurt:

- Campus; Boulder, Colo. : Westview.
- (1993). "The Impact of National Contexts on Social Movement Structures: A Cross-Movement and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unpublished paper, Berlin Wissenschaftszentrum.
- (1997). "Limits to Mobil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in J. Smith, C. Chatfield, and R. Pagnucco,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World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ch. 11.
- (1998a) "Mobilizing for Distant Issues," in John Guidry, Michael Kennedy, and Mayer N. Zald, eds. *Globaliz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preparation.
- (1998b). "The Structure and Culture of Collective Protest in Germany since 1950," in David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Boulder, Colo.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 2.
- ed. (1991).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Boulder, Colo. : Westview.
- Rucht, Dieter, Ruud Koopmans, and Friedhelm Neidhardt, eds. (1988). *Acts of Dissent: The Study of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Berlin: Sigma.
- Rudolf, Susanne Hoerber (1997). "Religion, States, and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in Susanne Rudolf and James Piscatori, eds., *Transnational Religion and Fading States*.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p. 1—26.
- Rudolf, Susanne Hoerber, and James Piscatori, eds. (1997). *Transnational Religion and Fading States*. Boulder, Colo. : Westview.
- Rule, James (1988). *Theories of Civil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pp, Leila J. (1980). "'Imagine My Surprise': Women's Relationship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ntiers*: 5:61—70.
- Rupp, Leila J., and Verta A. Taylor (1987). *Survival in the Doldrums: The American Women's Rights Movements, 1945 to the 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yan, Barbara (1992).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Ryerson, Richard A. (1978). *The Revolution Is Now Begun: The Radical Committees of Philadelphia, 1765—177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alvati, Michele (1981). "May 1968 and the Hot Autumn of 1969: The Responses of Two Ruling Classes," in Suzanne Berger, ed., *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29—363.
- Schama, Simon (1989).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 Scheler, Max (1972). *Ressentiment*. New York: Schocken.
- Schelling, Thomas C. (1960).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ennink, Ben (1988). "From Peace Week to Peace Work: Dynamics of the Peace Movement in the Netherlands,"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JAI Press, pp. 247—279.
-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1986).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Schnapp, Alain, and Pierre Vidal-Naquet (1988).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Textes et documents, novembre 1967—juin 1968*. 2nd ed. Paris: Seuil.
- Schneider, Cathy (1995). *Shantytown Protest in Pinochet's Chil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chumaker, Paul D. (1975). "Policy Responsiveness to Protest-Group Demands," *Journal of Politics* 37: 488—521.
-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lbin, Eric (1993). *Modern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7). "Contentious Cartography," *Mobilization* 2:99—106.

- Sewell, William, Jr. (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848," 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45—70.
- (1990).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Loyalties in France: Why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de a Differe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18: 527—552.
- (1996).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25:841—881.
- Sharp, Gene (1973).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Boston: Porter Sargent.
- Sherkat, Darren E., and T. Jean Blocker (1997). "Explaining the Political and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Protest," *Social Forces* 75:1049—1076.
- Shorter, Edward, and Charles Tilly (1971).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gmann, Jean (1973). *1848: The Romantic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n Europ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ilver, Beverly (1992a). "Class Struggle and Kondratieff Waves, 1870 to the Present," in Alfred Kleinknecht, Ernest Mandel,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New Finding in Long Wave Research*. New York: St. Martin's, pp. 279—295.
- (1992b). "Labor Unrest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Ph. 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kowronek, Steven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elser, Neil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mith, Christian, ed. (1996). *Disruptive Religion: The Force of Faith in Social Movement Activism*. New York: Routledge.
- Smith, Jackie (1994). "Organizing Global Action," *Peace Review* 6:419—426.

(1997).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Sector," in J. Smith, C. Chatfield, and R. Pagnucco,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World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ch. 3.

Smith, Jackie, Charles Chatfield, and Ron Pagnucco, eds. (1997).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World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Snow, David E., and Robert Benfo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1988,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pp. 197—217.

(1992)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n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33—155.

Snow, David, E. Burke Rochford, Steven Worden, and Robert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64—481.

Snyder, David, and William R. Kelly (1976). "Industrial Violence in Italy, 1878—190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131—162.

Snyder, David, and Charles Tilly (1972).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1830—19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520—532.

Soboul, Albert (1964). *The Parisian Sans-culott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skice, David (1978). "Strike Waves and Wage Explosions, 1968—1970: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in Colin Crouch and Alessandro Pizzorno, eds.,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vol. 2. London: Macmillan, pp. 221—246.

Soule, Sarah, and Sidney Tarrow (1991). "Acting Collectively, 1847—1849: How the 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 Changed and Where It Happened,"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October.

- Spriano, Paolo (1975). *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Italy, 1920*. London: Pluto.
- Staggenborg, Suzanne (1991). *The Pro-Choice Movement: Organization and Activism in the Abortion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edly, Homer R., and John W. Foley (1979). "The Success of Protest Groups: Multivariate Analys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8:1—15.
- Stinchcombe, Arthur (1987). Review of *The Contentious French* by Charles Till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248.
- Stone, Lawrence (1969).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69—139.
- Strang, David, and John W. Meyer (1993).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Diffusion," *Theory and Society* 47:242—243.
- Swarts, Heidi (1997). "Comparative Models of Community Organizing in American Cities," unpublished paper, Cornel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 Szymanski, Ann-Marie (1997). "Think Globally; Act Gradually." Ph. 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Taft, Philip, and Philip Ross (1969). "American Labor Violence: Its Causes, Character, and Outcome," in Ted R. Gurr, ed.,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Praeger, pp. 281—395.
- Tamason, Charles (1980). "From Mortuary to Cemetery: Funeral Riots and Funeral Demonstrations in Lille, 1779—1870,"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15—31.
- Tarde, Gabriel de (1989). *L'opinion et la fou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Tarrow, Sidney (1967). *Peasant Communism in Southern Ital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Old Movements in New Cycles of Protest: The Career of an Italian Religious Community,"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s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Conn.: JAI, pp. 281—304.
- (1989a).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b). *Struggle, Politics and Reform: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ycles of Protest*. Western Societies Paper No. 21.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 (1992). "Mentalities, Political Cultur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Constructing Meaning through Action," in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74—202.
- (1993a). "Modular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Why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Not Enough," *Politics and Society* 21:69—90.
- (1993b). "Social Protest and Policy Reform: May 1968 and the Loi d'Orientation in Fran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5:579—607.
- (1995a).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Between Moments of Madness and the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in Marc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89—116.
- (1995b).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onflict: Reflections from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8:223—251.
- (1995c). "Mass Mobilization and Elite Exchange: Democratization Episodes in Italy and Spain," *Democratization* 2:221—245.
- (1996a). "The People's Two Rhythms: Charles Tilly and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8:586—600.
- (1996b). "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2—92.
- (1998a). "Fishnets, Internets, and Catnets: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in Michael Hanagan, Leslie Page Moch, and Wayne te Brake, eds., *Challenging Authority: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h. 15.
- (1998b). "Studying Contentious Politics: From Event-ful History to Movement Cycles," in Dieter Rucht, Ruud Koopmans, and Friedhelm Neidhardt, eds., *Acts of Dissent: The Study of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Berlin:

- Sigma, ch. 2.
- (1998c). "'The Very Excess of Democracy': State Building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America," in Anne Costain and Andrew McFarland,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h. 2.
- Tartakowsky, Danielle (1996). *Le front populaire: La vie est à nous*. Paris: Découverte/Gallimard.
- (1997). "1919—1968: Des barricades?," in Alain Corbin, ed., *La barricade*. Paris: Presses de la Sorbonne.
- Taylor, Verta (1995). "Watching for Vibes: Bringing Emotions into the Study of Feminist Organizations," in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eds.,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223—233.
- Taylor, Verta, and Marieke Van Willigen (1996). "Women's Self-Help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 The Postpartum Support and Breast Cancer Movements." *Mobilization* 1:123—142.
- te Brake, Wayne (1997).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Divergent Path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urope," unpublished paper, Purchase Colle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1998). *Shaping History: Ordinary People in European Politics, 15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omas, Daniel (1997). "Norms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The Helsinki Accords, Human Rights and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1975—1990."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Thomis, Malcolm I., and Peter Holt (1977). *Threats of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89—1848*.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 Thompson, Dorothy (1984). *The Chartists: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 Thompson, E. P. (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 (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50:76—136.

- Tilly, Charles (1964). *The Vendé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5a).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80—455.
- (1975b).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83.
-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 Addison-Wesley.
- (1982). "Britain Creates the Social Movement," in James Cronin and Jonathan Schneer, eds.,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in Modern Britain*.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p. 21—51.
- (1983). "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s, or Social Move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461—478.
- (1984a).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1984b).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C. Bright and S.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297—317.
-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990—1990*.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1991). "Prisoners of the Stat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Working Paper No. 129. New York: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1992). "How to Detect, Describe, and Explain 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 unpublished paper,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1993). *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 Oxford: Blackwell.
- (1995a).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 Britain, 1758—1834," in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5—42.
- (1995b).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a).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7b). "Kings in Beggar's Raiment," *Mobilization* 2:107—111.
-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45). *Democracy in America*. 2 vols. New York: Vintage.
- (1955).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Stuart Gilbert.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Anchor.
- (1987). *Recollections: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 Touraine, Alain (1988). *Return of the Actor: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raugott, Marc (1990). "Neighborhoods in Insurrection: The Parisian Quartier 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of 1848," unpublished paper.
- (1995a). "Barricades as Repertoire: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the History of French Contention" in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43—56.
- ed. (1995b).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ucker, Robert C., ed.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New York: Norton.
- Turner, Lowell (1996). "The Europeanization of Labour: Structure before 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325—344.
- Turner, Ralph T., and L. M. Killian (1972). *Collective Behavior*.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 Tyrrell, Ian R. (1979). *Sobering Up: From Temperance to Prohibi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 1800—1860*.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Usher, Douglas (1997). "Republican Rules and Religious Right Takeovers,"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Chicago, April 18—20.
- Valelly, Richard M. (1993). "Party, Coercion and Inclusion: The Two Reconstructions of the South's Electoral Polit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21:37—68.
- van Praag, Philip, Jr. (1992). "The Velvet Revolution: The Role of the Stud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Informal Networks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re-

sented to the First European Conference on Social Movements, Berlin Wissenschaftszentrum, June.

van Zoonen, Liesbet (1992). "A Dance of Death?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Media,"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Vernus, Michel (1989). "A Provincial Perspective," in Robert Darnton and Daniel Roche, eds.,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24—138.

Vejvoda, Ivan (1997). "Cogito Ergo Ambulo; First Steps in Belgrade," *Bulletin of the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Program*,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2:1—2.

Wade, Robert (1996). "Globalization and Its Limits: Reports of the Dea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in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Dore,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60—88.

Walker, Jack (1991). *Mobilizing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 Patrons, Profess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Walsh, Richard W. (1959). *Charleston's Sons of Liberty: A Study of the Artisans, 1763—178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ers, Ronald G. (1976). *The Antislavery Appeal: American Abolitionism after 183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American Reformers, 1815—186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Walton, John (1989). "Debt, Protest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in Susan Eckstein, ed., *Power and Popular Protest: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99—328.

Walzer, Michael (1971).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New York: Atheneum.

Wapner, Paul (1995).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orld Civic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47:311—340.

(1996)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orld Civic Poli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ebster, Richard (1960). *The Cross and the Fasces Christian Democracy and Fascism in Ital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llman, Barry, and Milena Gulia (1998). "Net Surfers Don't Ride Alone: Virtual

-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 in Peter Kollock and Marc Smith, eds.,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 Whittier, Nancy (1995). *Feminist Gener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Wickham-Crowley, Timothy (1992). *Guerillas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lentz, Sean (1984).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sler, Dominique, and Marco G. Giugni (1996). "Social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al Selectivi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9:85—109.
- Wood, Gordon S. (1991).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 Yashar, Deborah J. (1996). "Indigenous Protest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in Jorge I. Domínguez and Abraham Lowenthal, eds., *Construct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1990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87—105.
- Zald, Mayer N. (1970).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YM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ald, Mayer N., and Roberta Ash (1966).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Growth, Decay and Change," *Social Forces* 44:327—341. Also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7, pp. 121—141.
- Zald, Mayer N., and Michael A. Berger (1978). "Social Movements in Organizations: Coup d'Etat, Bureaucratic Insurgency, and Mass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823—861. Also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7, pp. 185—222.
- Zald, Mayer, N.,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1987).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Zdravomyslova, Elena (1996). "Opportunities and Framing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ase of Russia,"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2—137.

Zolberg, Aristide R. (1972). "Moments of Mad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2: 183—207.

(1978). "Belgium," in Raymond Grew, ed., *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99—138.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 abeyance structures 暂缓结构 129, 130
- abolitionism 废奴主义 38, 48, 57
- access 通道 77—78
- activism 激进主义 207
- Act-Up 保护艾滋病者权益联合会 112, 187
- Adams, John 约翰·亚当斯 165
- advocacy networks 倡导网络 188—193
- affluence 富裕 72, 131, 132
- Afghanistan 阿富汗 185, 203
- agency 机构 108
- agrarian revolt 农民起义 33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168, 185, 203
- alignments 结盟 78
- Alinsky, Saul 绍尔·阿林斯基 130
- alliances 联盟 24, 79—80, 88, 163, 164
-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37—38, 59—60, 63, 182, 218n. 15
-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126—127, 130—131, 149
- anger 愤怒 112
- annealing process 锻炼过程 165—167
- anomie 混乱 14
- antiabortion movement 反堕胎运动 88, 97, 222n. 6
- antislavery movement 反奴隶制运动 38—39, 46, 48, 52, 182, 183
- antiwar movement 反战运动 15, 63, 114, 134, 150, 156
- apathy 冷漠 168
- Arafat, Yassar 亚西尔·阿拉法特 86
- armed insurrection 武装起义 40—41, 128
- assembly 集会 65, 223n. 8
- association 社团 36, 47—50, 67; 在法国 65; 与媒体 53; 模式 43; 权利 65; 在苏联 74—75; 工人社团 126
- Austrian Freedom Party 奥地利自由

- 党 203
- authoritarian systems 极权体制 97
- authorities 当局 3, 141, 144
- autonomous sector 自治部门 136
- autoriduzione 拒付租金和公共事业
开支 145
- Balkan conflict 巴尔干冲突 4
- banquets 宴会 154
- barricades 街垒 29—30, 40—41, 65,
96, 145, 152—154, 186
- BBC 英国广播公司 115
- Belgium 比利时 114, 116, 176—177
-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91, 93, 95
- Berejikian, Jeffrey 杰弗里·贝雷基
坎 86
- Berkeley 伯克利 166
- Berlin 柏林 196
- Big Chill, The* (film)《大寒》167
- Black Power movement 黑人力量运
动 112
- blockages 封锁 190—191
- Bolivia 玻利维亚 193
- Bolsheviks 布尔什维克 89
- boomerang effect 回旋器效应 191
- Bosnia 波斯尼亚 91, 112
- Boston tea party 波士顿茶党 38
- boycotts 联合抵制 37—38, 40,
215n. 16
- Brazil 巴西 79, 187—188, 191
- Brownshirts 褐衫党 94
- Brussels 布鲁塞尔 116
- Burma 缅甸 97, 203
- Bush administration 布什政府 172
- cabinets de lecture 阅览室 44
- camcorders 可携式摄像机 179
- Camisards“短衫党”35
- campaigns 行动 134—135
- Canada 加拿大 186—187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0—11, 31
- carbonari 烧炭党 49
- carnival 狂欢 94
- cartoons 政治性漫画 43
- Cathars 卡特里派教徒 34
- Catholic Action 天主教活动 85
- Catholic Association 天主教社团 48
-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教会 23,
34—35, 47, 80, 97, 120—122,
134
- Catholics 天主教徒 112, 129, 182
- celebrations 庆典 31
- celebrities 名人 132
-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80
- centralization 中央集权 56—58
- chambres 宿舍 49, 125
- charivaris 闹剧 32, 37
- Charter 宪章 77, 174
- Chartists 宪章派 39, 149, 216n. 19

- Chiapas 恰帕斯州 203, 208
- Chicago 芝加哥 150, 156
- Christian Coalition 基督教同盟 80, 203
-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115, 133
- churches 教堂 128—129, 134; 黑人教会, 22
- circumcision 割礼 183
- Citizen's Dignity(group) 公民的尊严(团体) 75
- citizenship 公民权 56, 58, 64—66
- Civic Forum 市民论坛 89
- civic movements 公民运动 128—129
- civil disobedience 非暴力反抗 84
- civil rights movements 民权运动 115, 166—167; 与黑人教堂 22; 与分散 129; 与破坏 96—97; 与选举联盟 78; 构造 117—118; 与得失 86; 制度化 127; 分化 149; 镇压 83; 与罢工 102; 与电视 115
- Civitavecchia 奇韦塔维基亚 153
- Clarkson, Thomas 托马斯·克拉克森 196
- class 阶级 6, 17, 51—52, 64
- class conflict 阶级冲突 11—12
- class consciousness 阶级意识 11
- class solidarity 阶级团结 99
- Cleraux affair 克利罗案 29, 31
- Clinton administration 克林顿政府 172
- coalitions 联盟 51—52, 144, 147, 157, 164, 207
- collaboration 协作 134—135
- collective action: contentious 集体行动: 斗争的 3—4; 传统的 98—100; 死亡 36; 构造 17, 21, 40, 110—11, 191; 马克思的论述 11; 模式 198; 持续 23—25; 跨国的 180—185; 由工人发起的 64
- collective behavior theory 集体行为理论 14, 15
- collective challenges 集体挑战 4, 5
- collective identities 集体认同 4, 13, 14, 119—120, 135, 162
- Colombia 哥伦比亚 149, 193
- colonization 殖民化 59
- Committee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ND) 解除核武器委员会 134
- common purpose 共同目标 5—6
- communal movement 公众运动 207
- communal ties 公共关系 47
- communication 通信 132, 146—147, 179, 186; 电子通信 8, 188—189; 全球通信 193—194; 印刷 36
-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13, 75, 79, 89, 128, 132, 230n.2
- communities of print and association

- 出版和结社的共同体 50—51
- community action organizations 社群
活动机构 130—131
- conferences 会议 190
- conflict 冲突 144—146
-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USSR)(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75
-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CORE)
种族平等大会 129,166—167
- connective structures 联系结构 4,
22, 23, 124—126, 129, 137,
173, 188—189
- conscription 征召 63
- consensus 舆论 5, 14, 83;舆论形成
113, 116;舆论动员 17, 21—2,
112—116
- Constituent Assembly (Russia)(俄
国)立宪会议 127
- constraints 限制 13, 19—20, 199—
200
- contention: contained, 斗争:有节制
的 204—205;与文化 198—199;
斗争文化 16—18;斗争周期 7,
24—25, 141—160, 与革新 102;
机构化 101;模式化形式 103;典
型变化 102—103;手法 20, 30—
32, 93, 97,98—100;与社会运动
2—3;在苏联 73—76;与国家创
建 58—59;持续 6—7;与策略的
互动 102;跨国的 176—195,
208—209;被威胁引发的 86—87
- Continental Association 大陆联盟 48
- Continental Congress 大陆会议 60
- convention 常规 104
- cooperatives, European 欧洲合作社
129
- coordinations 协调 130
- corporate ties 社团联系 47, 52
- corporatism 社团主义 56
- corresponding societies 通信会社 35,
50
- countermovements 对抗运动 88,
145, 157
- Croatia 克罗地亚 153
- Croquants 克洛堪 33, 47, 215n. 12
223n. 8
- crowd psychology 群众心理学 10—
11
- cultural framework 文化框架 4
- cultural hegemony 文化霸权 12—13
- cultural symbols 文化符号 122
- cultural theorists 文化理论家 143
- culture 文化 16—18, 72, 118—
120, 198—199
- cycles of contention 斗争周期 7, 8,
24—25, 103;界定 10;遣散阶段
147—150;要素 142—144;结局
160;缺少学术方法 143—144;动

- 员阶段 144—147; 非革命的 157—159; 革命的 141—142; 157—159; 与 1848 年革命 150—155; 与学生运动 155—157
-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78, 81, 155, 174
- Day of the Tiles 瓦片之战 39—40
- days of rage 愤怒的日子 156
- dazio 关税 62
- de Gaule, Charles 夏尔·戴高乐 171
- death 死亡 36
- decentralization 权力分散 129—130, 207
- defection 脱党变节 159
- Dehaene, Jean-Luc 吉恩—卢卡·德哈涅 176
- Demobilization 遣散 147—150
- Democratic convention(1968) 民主党大会(1968) 150, 156
- Democratic Platform 民主政纲 84, 174
- Democratic Platform(group) 民主政纲(群体) 75
-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s 民主化运动 75, 100, 103, 155, 159, 196
- democratization effect 民主化后果 145
- demonstrations 游行 42, 65, 75, 92—93, 97, 100, 102, 103, 136, 186, 206, 223n. 11; 武装的 101, 124; 在 1848 年革命中 152, 153
- Denmark 丹麦 97
- departments 部门 220n. 14
- Depression 大萧条 73
- deprivation 贫困 4, 14
- Diderot, Denis de 丹尼斯·狄德罗 45, 50
- diffusion 扩散 24, 51—52 144—145, 156, 186—187, 194, 196
- direct action 直接行动 33, 145
- Directorate for the Environment, Nuclear Safety and Civil Protection 负责环境、核安全和公民保护的欧盟理事会 181
- discourse 话语 17
- disillusionment 幻灭 165
- disruption 破坏 92, 96—98, 104
- dress 服装 94, 106
- Dutch Committee against Cruise Missiles 荷兰反巡航导弹委员会 226n. 12
- Dutch Patriot movement 荷兰爱国运动 148, 182
- early risers 早期的造反者 77, 87—88, 165, 171, 175

- Earthy Day 地球日 134
 eastern Europe 东欧 149; 民主运动
 97—98, 103, 159; 革命 89
 economics 经济学 15, 16
 Ecuador 厄瓜多尔 193
 effigies 肖像 37
 Eighteenth Brumaire 雾月十八日
 124—125
Eighteenth Brumaire louis Bonaparte
 《路易斯·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51, 227n. 10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艾森豪威
 尔政府 89
 electronic mail (email) 电子邮件
 179, 181, 193
 elite transaction 精英交易 159
 elites 精英 79, 88—89, 144, 162—
 163
Encyclopedie (Diderot) (狄德罗的) 百
 科全书 45, 50
 Engels, Frede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 11, 151
 environmental movement 环保运动
 162; 在欧洲 195; 在意大利 130,
 169; 在拉丁美洲 193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环保机
 构 134—135, 187—188
 equal rights amendment 平等权利修
 正案 88, 205
 Estate General (法国的) 三级会议
 46
 ethnic nationalism 种族民族主义
 145
 ethnicity 种族性 4, 6
 Europe 欧洲 127—128, 130, 204—
 205
 European Environmental Bureau 欧
 洲环境保护署 181, 190
 European Parliament 欧洲议会 176
 European Union (EU) 欧洲联盟
 176—177, 180—181, 186—187,
 190, 192—193; 环境理事会 190
 Eurostrike 欧洲罢工 176—177
 executives 执行人 162
 expertise 专门技术 131
 extremism 过激主义 4, 150, 也见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facilitation 促进 80, 149—150
 factionalization 分化 148, 149, 158
 factory councils 工厂委员会 145
 factory legislation 工厂立法 66
 factory occupations 占领工厂 102
 famine 饥荒 33—34
 farm workers movement 农场工人运
 动 79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4, 15
 Fascist-Vatican Concordat 法西斯—
 梵蒂冈协约 85

- Faure, Edgar 埃德加·福尔 171
- fax machines 传真机 179, 181
- fear 恐惧 145
- February Days 二月起义 41
- federalism 联邦主义 81
- feminism 女权主义 57, 97, 104, 112, 174
- feudal society 封建社会 32—36
- fishing wars 渔战 86—87
- food provision 食物供给 59, 60—61
- food riots 粮食骚动 33—43, 36
- foot binding 缠足 183
- foundations 基金会 131
- frame and framing 框架和构造 13, 14, 17, 21—22, 40, 146, 191, 201; 调整 110; 集体行动 110—111; 贯穿斗争 121; 与斗争周期 145—146; 与情感 111—112; 与身份认同 118—120; 不公正 111; 马克思主义的 109; 媒体 112—116; 在波兰 120—121; 与宗教 112; 革命组织的 87; 权利的 117—118
- France 法国 130; 社团 47, 65; 共产党人 132; 抗议周期 231n. 4; 生态运动 104; 1851 年起义 52—53, 124—125; 精英 79; 第五共和国 81, 169; 杂志 46; 五月事件 (1968) 88, 103, 114—115; 运动参与 167; 网络 49; 旧政权 29, 49, 56; 机遇 73; 18 世纪 80 年代, 29—30; 国家创建 60—61; 罢工, 163; 强政府 56; 学生运动 169, 170—171, 173; 卡车司机运动 102; 城市起义 39—40; 暴力 95
- franchising 赋予特权 133—134
-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72
- Franklin,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45
- Free Speech movement 言论自由运动 166
- Free Trade Unions of the Baltic 波罗的海自由贸易联盟 120, 121
- Freedom Summer campaign 自由之夏运动 22, 165, 166
- Freemasons 共济会会员 49
- French and Indian War 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 62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182; 与社会运动领域的发展 10; 与粮食供给 61; 雅各宾阶段 60, 108, 148—149; 与媒体 47, 50; 与运动特性 4; 与表现 94; 与 1848 年革命 151; 与象征符号动员 106; 抗税起义 44; 托克维尔的论述 56; 暴力 96
- “fun and games” theory “玩乐”论 6
- fund raising 募集资金 132

-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 115, 133, 185, 194, 203
- funerals 葬礼 36, 37, 215n. 15
- gabelle 税 62
- gains and losses 得失 86—87, 187—188
- Gandhi, Mohandas 圣雄甘地 97
- Garibaldi, Giuseppe 朱塞佩·加里波第 151
-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同性恋运动 17, 132, 135
- Gdansk 格但斯克 120
- gender 性别 205
-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公司 21n. 7
- Germany 德国 89, 129, 205—206; 社团组织 130; 生态运动 104; 政治文化 108; 社会民主党 125—126; 学生运动 160
- Girondins 吉伦特派 96, 149
- glasnost' 公开化 75
-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8, 178—182, 179—180
- Gorbachev, Mikhael 戈尔巴乔夫 74—75, 79, 89
- Godon riots (1780) 戈登暴动 38, 60
- graffiti 涂鸦 97—98
- grain seizures 抢谷风潮 33—34
- grain shortages 粮食短缺 61
-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12—13, 212n. 3
- Great Britain: antislavery movement 英国: 反奴隶制运动 52; 社团 47, 48, 50; 工厂工人 51; 报纸 46; 解除核武器运动 134; 请愿 38—39; 职业警察力量 65; 衰退 150; 1640年革命 227n. 4; 与奴隶贸易 183; 国家创建 59—60; 征税 62—63; 暴力 95
- Green parties 绿党 84, 130, 136, 168, 206
- Greenham Commons 格林汉姆公地 130, 203
- Green peace 绿色和平 133, 178, 185, 192, 208
- Grenoble, France 格勒诺布尔 39—40
- Grenville, George 乔治·格林威尔 37
- grievance theory 怨愤理论 13
- grievances 怨愤 14, 15, 31, 33, 110, 111
- Guatemala 危地马拉 193
- guerilleros 游击战士 106
- guild socialism 基尔特社会主义 225n. 6
- Gunpowder Plot 黑火药阴谋 47
- Gydina 格迪纳 120

- Hap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155
- Hausmann, Baron 豪斯曼男爵 65
- heretical sects 异端宗派 34—35
- historical economists 历史经济学家 143
- “Hot Autumn”“热秋” 167
- human rights 人权 132, 180, 188
- Hungary 匈牙利 154
- identity 身份认同 13, 21—22, 118—120
- identity movements 认同运动 204
- identity politics 认同政治 17, 119—120, 203
- ideological packages 意识形态包裹 17
- ideology 意识形态 21, 146
- immigrants 移民 4, 64
- incentives 动机 5, 15, 198, 213n. 17
-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46, 165—166, 203
- innovation 革新 102, 131—135, 145
- institutionalization 制度化 148—149
- institutions 机构 22, 208—209
-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 13
-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有目的的社群 206
- interaction 互动 146—147
- interest groups 利益群体 5, 89, 101, 162, 205—207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国际组织 180—181
- Iran 伊朗 83, 115, 185
- Iraq 伊拉克 113
- Ireland 爱尔兰 220n. 15
- “Iron Law of Obligarchy” “寡头政治铁律” 123, 126, 135
- Islam on Move 运动中的伊斯兰 46
- Islamic fundamentalism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185, 194, 203
- Islamic Salvation Front 伊斯兰拯救阵线 185
- isolation 孤立 167—168
- Italy 意大利 130, 204, 206; 无政府主义者 127; 共产党 13, 132, 230n. 2; 与选举 84, 78; 环保运动 130, 135, 169; 土地运动 78; 运动参与 168;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145; 镇压 85; 五月滑坡 79; 国家力量 82; 罢工 162; 学生运动 156, 160; 恐怖主义 88
- Jacobins 雅各宾派 60, 108, 148—149
- Japan 日本 168
-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165
- Jerusalem 耶路撒冷 86

- Jew 犹太人 86, 154
- Journal de Normandie* 《诺曼底日报》 46
- Juppé, Prime Minister Alain 阿兰·朱佩首相 177
- Kafka, Franz 弗朗茨·卡夫卡 101
- Kennedy administration 肯尼迪政府 78, 89
- Kenya 肯尼亚 149, 183
- King,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金 127
- Kuwait 科威特 113
- land revolts 土地暴动 35
-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205
- Le Chapelier law 勒沙普利耶法典 49
- leadership 领导 12, 14, 15, 21
- Lenin, Vladimir 列宁 12, 108—109, 157, 212n.2
- Lenin shipyard 列宁造船厂 120—121
- Liberty Tree 自由之树 37
- Lisbon 里斯本 41
- literacy 识字 44, 217n.4
- lobbying 游说 5
- localism 地方主义 33, 56—58
- loi d'orientation (法国高等教育)定
位法 170, 171
- Lotta continua“继续斗争”(意大利左翼团体)168
- Louis Napoleon 路易·拿破仑 124, 154
- Madrid 马德里 41
- maggio 马吉奥运动 155
- mairies 市镇厅 125
-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38—39
- Marche blanche, la 白色游行 114
- Marcos, Ferdinand 马科斯 97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11—12, 51, 85, 151, 154, 227n.10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10—13, 108—109
- master frames 主要框架 118, 144, 146, 156, 202
- Mazzini, Giuseppe 马志尼 151
- McCarthy era 麦卡锡时代 83
- McGovern, George 乔治·麦戈文 168
- meaning construction 意义建构 17
- media 媒体 22, 43—44, 112—116, 131; 出版 44—47, 67, 224n.12
- Memorial(group) 备忘运动(群体)75
- mesomobilization“中间动员” 135, 137
- Messina 墨西拿 41

- Mexico 墨西哥 193, 203, 208
- Michels, Robert 罗伯特·米歇尔斯 123, 126, 135
- Milan 米兰 41
- militancy 战斗状态 206—207
- militia movement 民兵运动 4, 209
- Milosevic, Slobodan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91—92
- miners 矿工 144
- minority rights movement 少数派权利运动 17
- mob frenzy 暴徒论 6
- mobilization 动员 112, 144—147
- mobilizing structures 动员结构 22—23, 201
- mock trials 模拟审判 37
- modular repertoire 模式化手法 37—41
- modularity of association 社团的模式化 48—49
- moments of madness 疯狂时刻 103
- Montagnards 蒙塔格纳人 49, 101
- Moses, Bob 鲍勃·摩西 165
-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反对酒后驾车的母亲们 205
- movement society 运动社会 8—9
- mutual-aid societies 互助社团 129
-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78
- naming 命名 110, 173
- Nanterre, University of 南泰尔大学 170
- narodniki (俄国)民粹主义分子 127
- National Assembly (French) (法国)国民会议 171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 122, 146
- National Front (French) (法国)国民阵线 135, 203, 209, 226n. 13
- National Guard 国民自卫队 154
-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 全国妇女组织 173
-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民族社会运动 18
- national state 民族国家 58—59; 巩固 36; 在英国 59—60; 全球化的侵蚀 180, 181; 形成 54—56; 在法国 60—61; 力量 81—83; 作为目标和媒介 63—66; 与跨国社会运动 194; 在美国 61—63; 与暴力 94—95
- 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 (NWRO) 全国福利权利组织 98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4, 6, 17, 183, 187
- nazism 纳粹主义 4

- Nelson, Jack 杰克·纳尔逊 166
- Netanyahu, Prime Minister 内塔尼亚胡总理 86
- Netherlands 荷兰 134, 151
- networks 网络 47—50, 169; 电子邮件, 193; 在法国 49; 绿色 190; 与体制 134; 与动员 22—23; 与人员补充 124; 街垒的作用 40, 41; 社会的 4, 49—50, 188—189; 跨国的 133, 188—193; 与妇女运动 173
- New Deal 新政 73, 145, 155
- New Left 新左派 84, 127—128, 156, 171
- new social movement school 新社会运动学派 202
- newspapers 报纸 39, 45—47, 217n. 10, 218n, 11
-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组织 131—132, 181
- nonimportation 禁止进口 38
- nonviolence 非暴力 95, 96, 103, 118, 122, 156
- norms, international 国际标准 183
-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 95, 112, 203
- Oklahoma City bombing 俄克拉何马城爆炸 204, 205
- Olsonian theory 奥尔森理论 15—16, 23, 21, 197—198
- Operation Rescue 手术搭救 88
- opportunities 机遇 71—72; 衰退 89—90; 因素 76—80; 对于精英 88—89; 制造和扩散 87—89; 与抗议 77; 跨国的 190—191
- organization 组织 206; 义务 98; 欧洲人建的 36; 正式等级 123; 与革新 131—135; 列宁的论述 12—13; 新旧组织 146; 与资源动员理论 14; 三个方面 123—124
- organizational change 组织的变化 135—137
- outbidding 代价过高 88
- outcomes 结果 25, 161—164
- Paine, Thomas 托马斯·潘恩 45, 217n. 9
- Painites 潘恩分子 60, 150
- Palestinian Authority 巴勒斯坦当局 86
- pamphlets 小册子 45
- paradigmatic change 范式性变化 102—103
- Paris 巴黎 29, 40—41, 65, 153—154
- Paris Commune 巴黎公社 41
- Parliament, English 英国议会 62—63

- parochialism 教区制度 33
- participation 参与 5, 8—9, 133, 205
- particularism 排他主义 33
- Party of God 上帝之党 209
- passive resistance 被动抵制 97—98
- Patriotic Society 爱国者协会 48
- peace movement 和平运动 134, 185, 192, 206
- peasant revolts 农民起义 35
- People on the Move, The 运动中的人民 46
- Performance 表演 93—94, 107, 113
- Perot, Ross 罗斯·佩罗斯 77
- personalism 个人至上 130
- Peru 秘鲁 78, 203
- Peteroo massacre 彼得卢大屠杀 65
- petitioning 请愿 38—39, 40, 66, 67, 206
- Philippines 菲律宾 97, 149
- Poland 波兰 80, 81, 85, 120—121, 162
- polarization 两级分化 127—128, 147—149
- police 警察 64, 65, 95, 08, 101, 102
- political cleavages 政治分裂 20
- political culture 政治文化 108, 122
- political exchange 政治交换 187—188, 194
- political historians 政治历史学家 143
-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政治机遇 144, 163, 173—174, 199—200
-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政治机遇结构 13, 18—20, 55, 183, 200
-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5, 12—13, 59, 80, 89, 101, 162, 168
- political process models 政治过程模型 18—19
- Political Unions 政治联盟 48
- Pompidou, Georges 乔治·蓬皮杜 170—171
- Popular Front, French 法国人民阵线 73, 102, 145, 155
- Populists 民粹主义者 128
- postmaterialism 后物质主义 72
-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17
- Prague Spring 布拉格之春 97
- price riots 价格骚动 34
- primitive rebellions 初级反抗 124—125
- proabortion movement 赞成人工流产合法化运动 134
- processions 游行 100
- pro-choice movement 亲选择运动 88, 134
- profession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专业运动组织 16
- professionalization 专业化 132, 168

Promise Keepers 守信者 133, 224n. 10
 prospect theory 前景理论 86
 protest 抗议 24, 77, 95; 周期 103, 183; 作为政治资源 18; 城市 83
 Protestants 新教徒 35, 112
 Proudhon, Joseph 约瑟夫·蒲鲁东 126
 public meetings 公共会议 63, 152
 public opinion 公共舆论 162

 Quakers 教友派信徒 47

 race 种族 112
 racialism 种族主义 150, 158, 167
 radio 广播 114—115
 Radio Free Europe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 115
 rational choice 理性选择 15—16, 72, 198—199
 reading clubs 读书俱乐部 50
 Regan administration 里根政府 104, 172
 recruitment 人员补充 124, 190
 Red Brigades(意大利)红色旅 169
 Reform Act 改革法案 48
 Reform Societies 改革团体 39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186
 religion 宗教 6, 34—35; 与社团的

发展 48; 与构造 112; 想像 120; 与网络 225n. 7; 政治的 115
 religious movements 宗教运动 64, 80
 renaming 重新命名 5
 Renault 雷诺 116, 176—177, 229—30n. 3
 repertoires, concept of 手法概念 215n. 9; 斗争的 20—21, 30—32, 93, 97, 98—100, 145—146; 常规的 206; 变化的 101—104; 与框架 201; 新的 31—32, 37—41; 模式化的 37—41; 新旧手法 200; 传统的 31—37, 42
 repression 镇压 20, 64—66, 80, 149—150, 158; 模式 83—85; 与暴力 96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 203
 resistance 抵抗 7
 resources 资源 31, 181, 201; 财政和行政 131, 132; 贫乏 5; 动员 13—17
 retributive action 惩罚行动 34
 revolutions of 1848: 1848 年革命: 在比利时 152; 与游行示威 100; 影响 186; 作为第一个现代周期 150—155; 在法国 29—30, 41, 46, 145, 153—154; 1848 年革命在德国 153, 155; 在匈牙利 153; 在

- 意大利 152, 153, 155; 在瑞士 152
- Revolution of 1905 (Russia) 1905 年俄国革命 149
- revolution of 1789, 1789 年革命 34
- rights, concept of 权利的概念 40
- riots 骚动 6, 24, 33—34, 52
- Rochester, New York 纽约州罗彻斯特市 48—49
- Romania 罗马尼亚 196
- Rome 罗马 152
- Rouen 鲁昂 152
- Russia 俄国 85, 95, 127, 149
-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157, 159
- Rwanda 卢旺达 203
- sacking routine 洗劫惯例 214n. 3
- Santer, Jacque 雅克·桑特尔 176
- Sarawak 沙撈越 191
- Schweitzer, Louis 路易·施韦泽 176, 229n. 3
-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大觉醒 48
- Second International 第二国际 182—183
- self-help groups 自助群体 206
- Serbia 塞尔维亚 91—92, 153
- serenade 小夜曲 37
- service organizations 服务组织 206
- Shell Oil 壳牌石油 185
- Sicily 西西里 41, 153
- sit-ins 静坐 42, 84, 97, 156
-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38
- slogans 口号 5
- social constructionism 社会建构论 199
-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 130, 149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Germany) 社会民主党(德国) 125—126
- Social Initiative for Perestroika 改革的社会倡议 75
-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MOs) 社会运动组织 16, 136, 137
- social movements 社会运动: 与斗争 2—3; 定义 2, 10; 动力 19; 与机遇 71—72; 结果 25; 性质 4—7; 与斗争手法 32; 在美国 56—58
-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 17
- 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 (Russia) 社会革命党 127
- social theorists 社会理论家 143
- socialization 社会化 43
- solidarity 团结 6, 119
- Solidarity 团结工会 81, 120—121
- songs 歌曲 43
- Sobs of Liberty 自由的哭泣 50—51

- South Africa 南非 101
- Soviet Union 苏联 73—76, 89, 97—98
- Spain 西班牙 79, 186
-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4, 15
- Stamp Act controversy 印花税之争 48, 50—51
- state structures 国家结构 20
- strategies 策略 81—83, 114—116
- strikes 罢工 42, 65, 72, 99—100, 102, 103, 162—163, 183
- student movement 学生运动 144; 作为斗争周期 155—157; 在法国 81, 155, 156, 160, 169, 170—171, 173; 与非暴力 97, 与电视 115; 在美国 81, 96, 97, 155—157
-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166—167, 129
- Student Press and Information Center (STIS) 学生新闻和信息中心 78
- 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96, 156
- suffrage movement 妇女选举权运动 58, 64, 66, 228n. 3, 151, 154, 162, 183
- Sugar Act 糖税法(1764)38
- Sweden 瑞典 82
- Switzerland 瑞士 82, 94, 151, 163, 204, 228n. 3
- symbolic mobilization 符号动员 106—108
- symbols 象征符号 113—114, 121—122, 146, 173
- system responsiveness 系统反应 161
- Taliban 塔利班 185
- tax revolts 抗税起义 44, 52, 62
- taxation 税收 31, 47—48, 52, 59, 61—63, 220nn, 12, 13
- technology 技术 179, 193—194
- television 电视 115, 131, 133, 156, 181
- temperance movement 禁酒运动 57, 81, 82, 104, 167
- terrorism 恐怖主义 95, 150
- Thailand 泰国 97
-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31—132, 190, 207
- threat 威胁 19, 72, 86—87, 95
-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29, 55—57, 74, 151, 219n. 2
- trade union 工会 11, 64, 128, 168, 207
-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跨国斗争 208—209; 与全球化 178—182; 与网络 189—192; 强论点 181—

- 182, 194; 分类 184—189
- transnational issue networks 跨国问题网络 133
- trans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跨国非政府组织 181, 182
-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跨国社会运动 182—186
- transportation 交通 8, 36
-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153
- uncertainty 不确定 145
- United Farm Workers 联合的农场工人 79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132, 180, 190
- United States 美国: 社团 48; 公民运动 128—129; 破坏 96—97; 杰克逊时代 56—58; 运动参与 167, 168; 新左派 127—8; 机遇 72, 73; 宗教 115; 国家创建 61—63; 政府弱点 57; 罢工 162; 丑陋运动 203—204; 妇女运动 171—144
- urban insurrection 城市起义 39—40
- urban movements 城市运动 18
- urban politics 城市政治 64
- vanguard theory 先锋队理论 12—13, 109
- Vendee Rebellion 温迪暴动 63
- V. E. R. D. I. 意大利之王 85
- Vienna 维也纳 41
-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15, 63, 128, 150, 156
- Vilvoorde, Belgium 比利时维尔福德 176—177
- violence 暴力 4, 88, 92—96, 104, 148—149, 205, 209—210; 反移民 4; 衰退 63—64; 与革命 158; 在 1848 年革命中 152—154
- visual symbolism 视像符号论 114
- Vizelle, Chateau of 维济尔城堡 40
- Vlamsblok 弗莱姆斯布洛克 203
-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自愿组织 133
- Vzliad (Viewpoint) 观点 75
- Waco, Texas 203—204 得克萨斯州的韦科
- Walenty nowicz, Anna 安娜·瓦伦第诺维茨 121
- Walesa, Lech 列赫·瓦文萨 121
- war 战争 31, 59—60
- warring movements 敌对运动 203—204
- Weather Underground 气象人地下组织 169
- Weathermen 气象人 96
- Wilkes, John 约翰·威尔克斯 38, 46, 59

- women 妇女:和社团 49,在格林汉姆公地 130,205;与自助群体 136
- women's movement 妇女运动 17, 166, 171—174, 183, 188;与名人 132;与破坏 96—97;与选举 84;与情感 112;灵活性 104;与国际会议 190;在第三世界 190
- Workers on the Move “运动中的工人” 46
- workers 工人 10—13,57,64, 125—126, 144, 163, 186;工人文化 12—13;在英格兰 51;与欧洲罢工 176;动员 71—72;与学生 170;与罢工 99, 102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180, 188
- World on the Move, The “运动中的世界” 46
- Wyvill,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夫·怀韦尔 59—60
- Yeltsin, Boris 叶利钦 75,76, 79
- Yorkshire Association 约克郡协会 48, 59—60
- Young Poland movement 青年波兰运动 120
-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78, 144, 196
- Zaire 扎伊尔 203